

古今香港系列　梁濤主編

香江夜譚

劉澤生著







【扯旗山】又名太平山。海拔五百五十四公尺。雄踞港島西部。爲島上第一高峯。謂曰「扯旗」。當內有別情。


古·今·香·港·系·列

●"古今香港系列"編輯委員會

主編：梁　濤

編委：(按姓氏筆劃排序)

尹耀全　朱維德　何守信　李志剛

吳倫霓霞　余慕雲　冼玉儀　林秉輝

科大衞　梁沛錦　張　徹　楊國雄

盧國沾　鍾景輝　簡而清　霍啓昌

梁　濤主編

古・今・香・港・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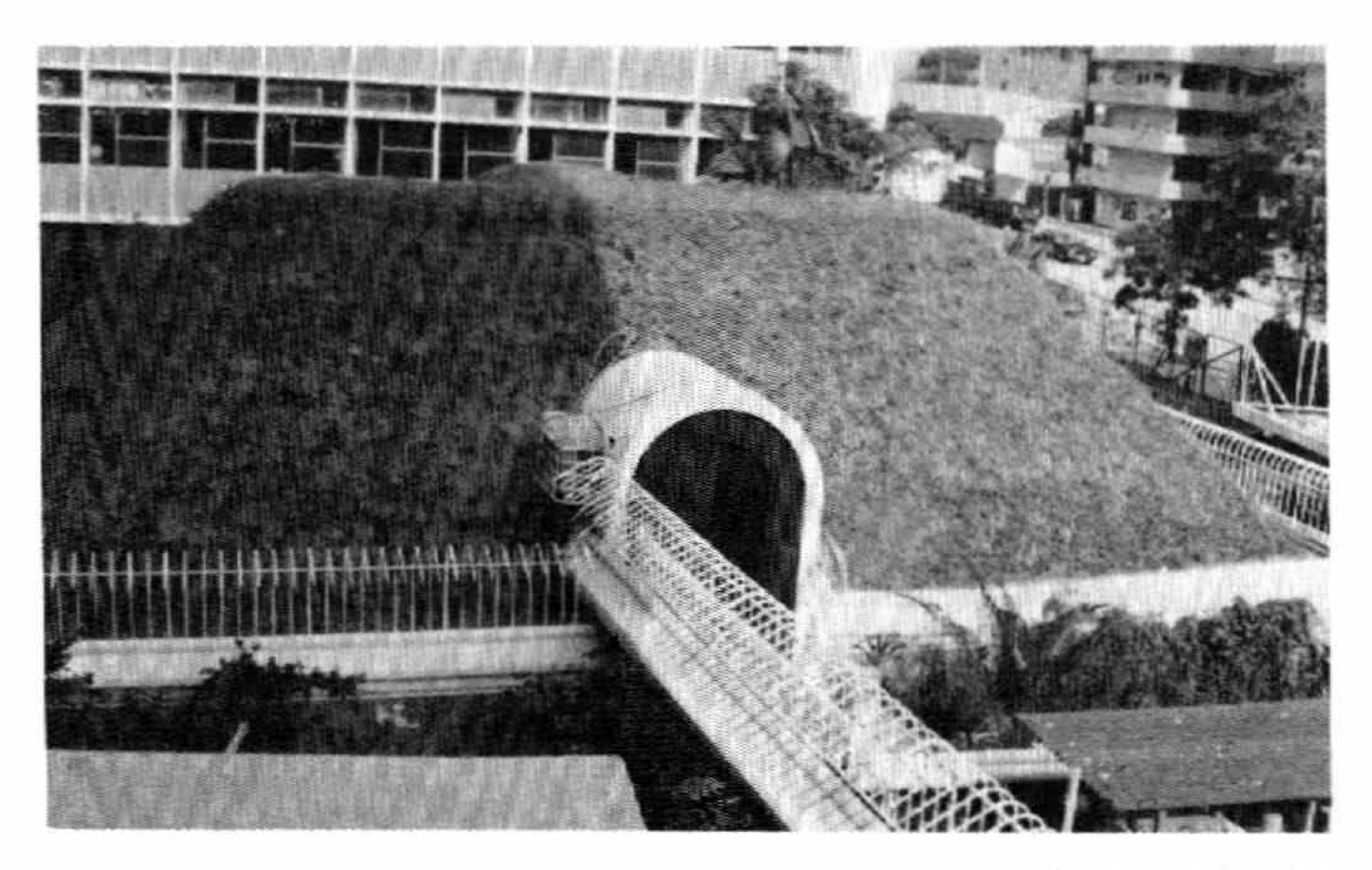
劉澤生著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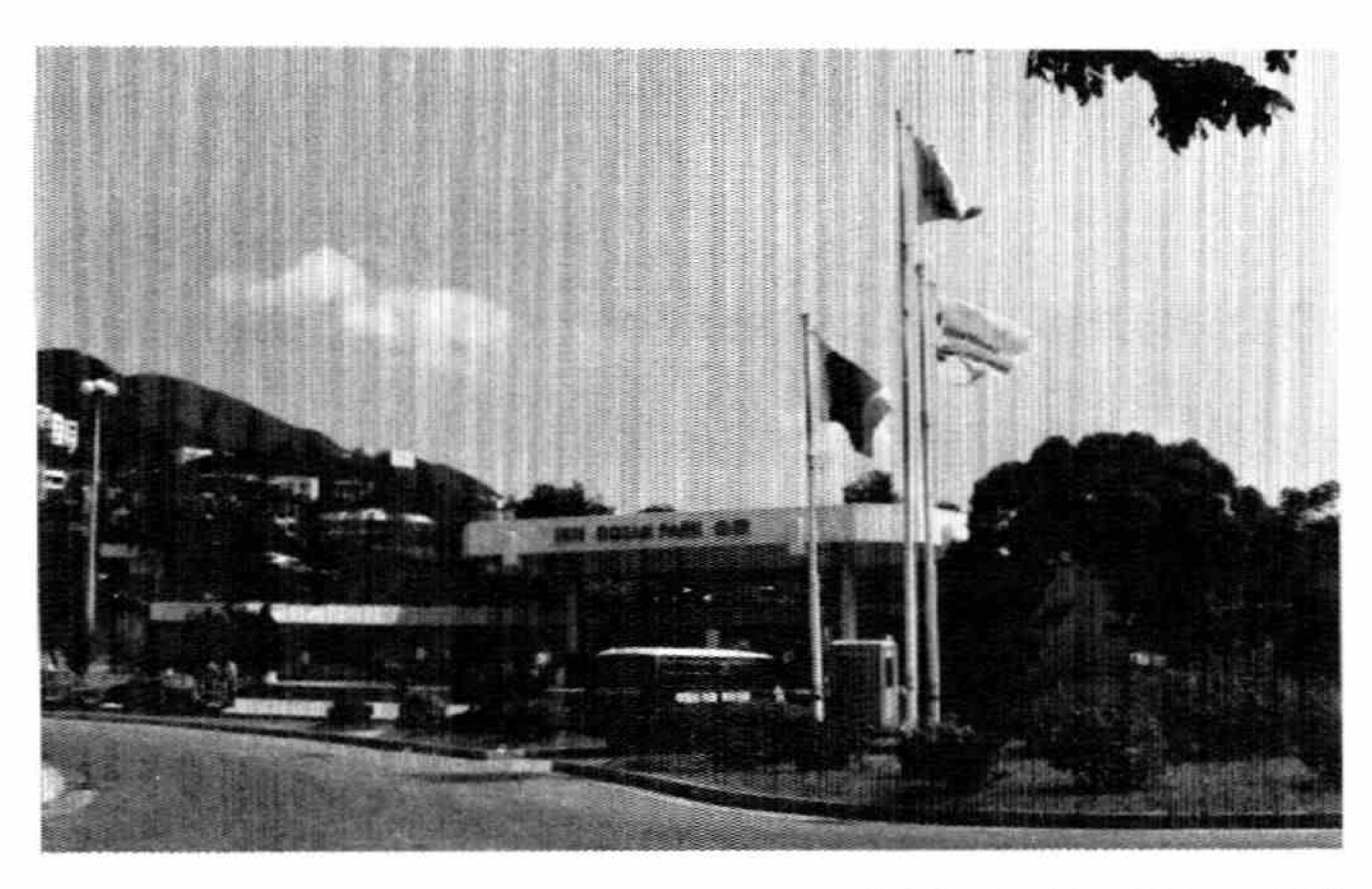
● 古今香港系列
策　　劃：潘耀明
執行編輯：姚永康

● 香江夜譚
責任編輯：向谷樺
攝　　影：劉澤生
裝幀設計：阿　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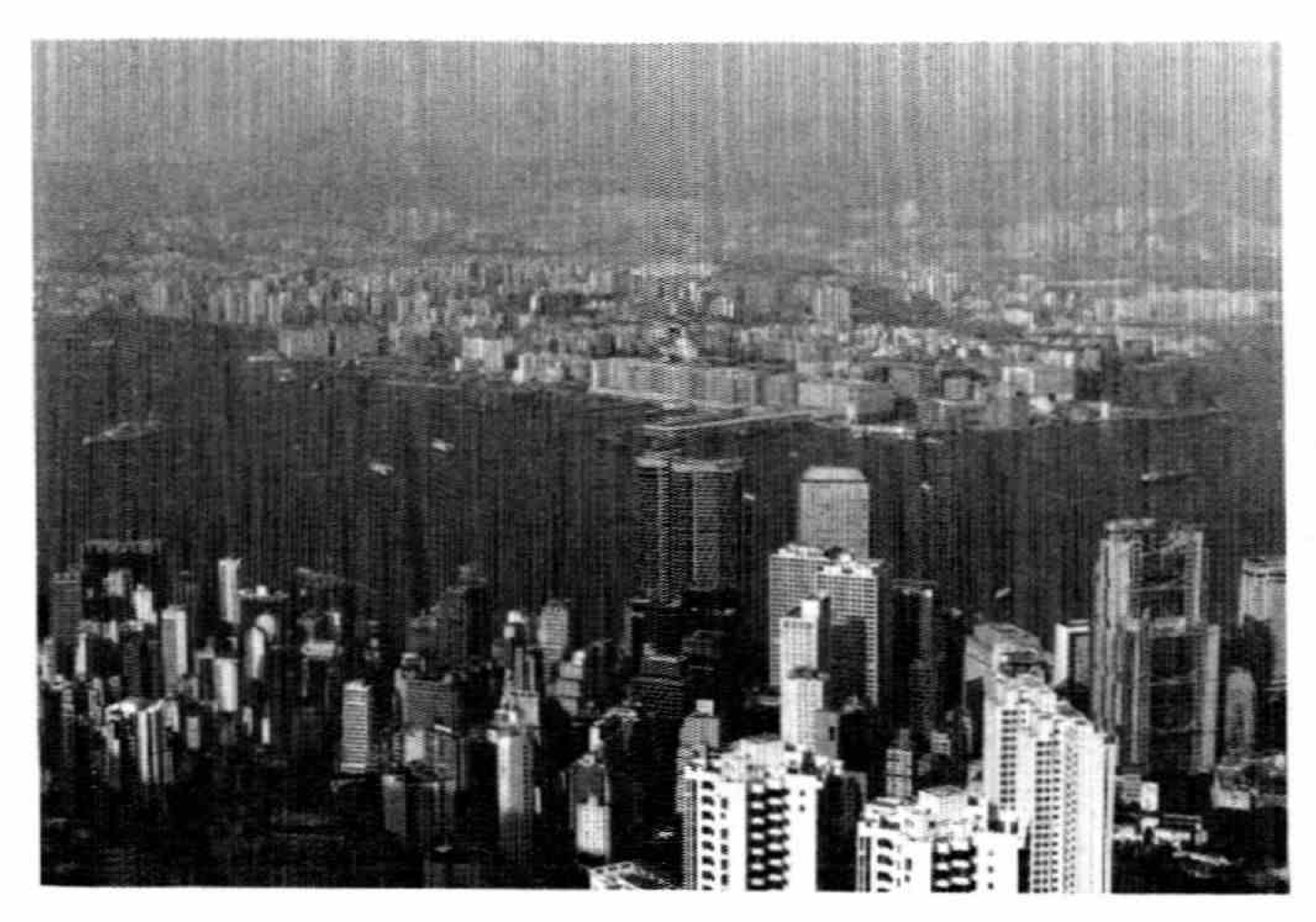
書　　名　香江夜譚（古今香港系列）
作　　者　劉澤生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 Kong
印　　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三號七樓
版　　次　1990年4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1997年5月香港第一版第四次印刷
規　　格　32開（121×184mm）272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 · 04 · 0796 · 2
© 1990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深水埗李鄭屋村漢墓(見《漢墓探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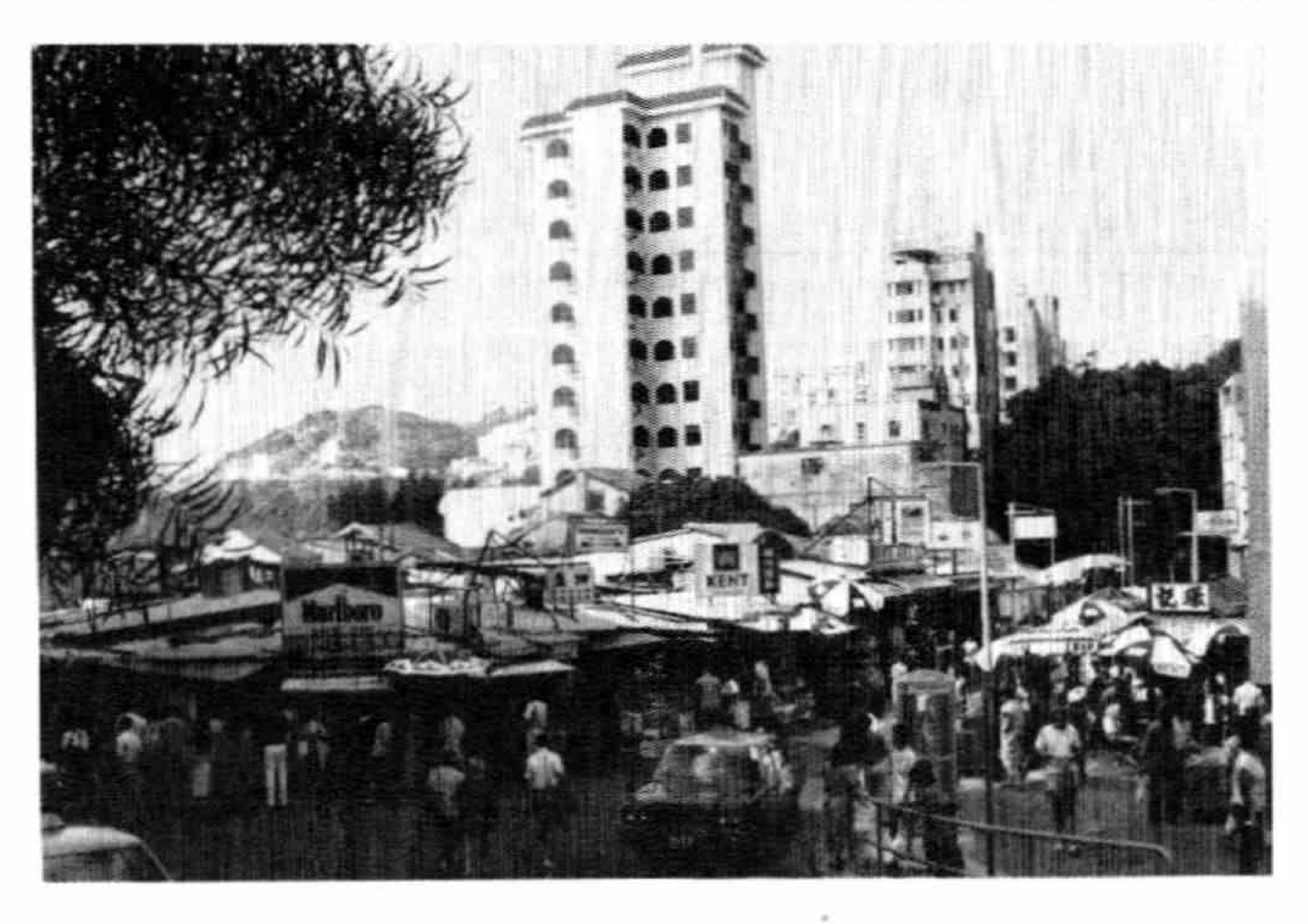


海洋公園(見《香江八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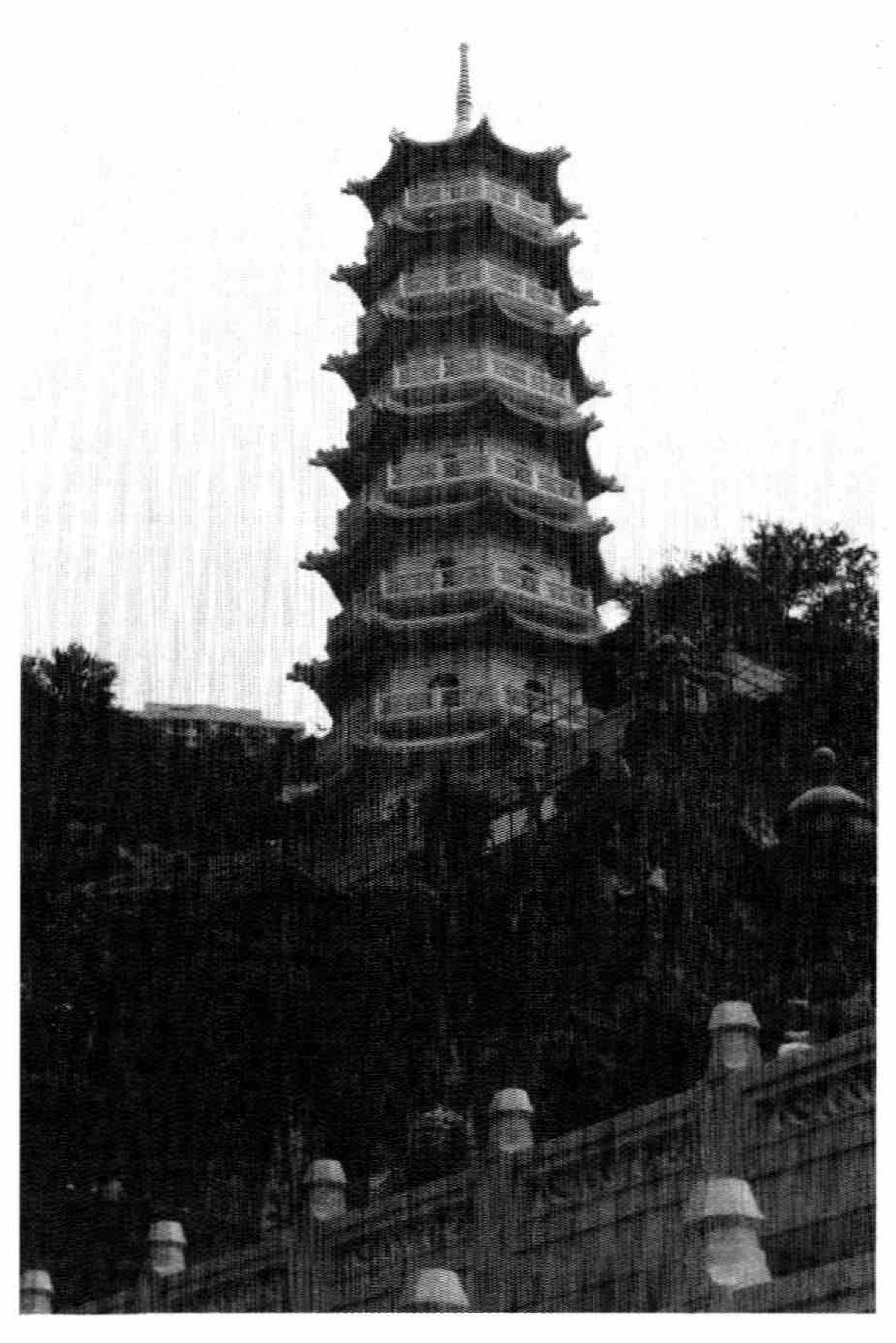
太平山俯瞰(見《旗山星火》)

赤柱大街(見《赤柱晨曦》)





淺水灣海濱公園（見《淺水丹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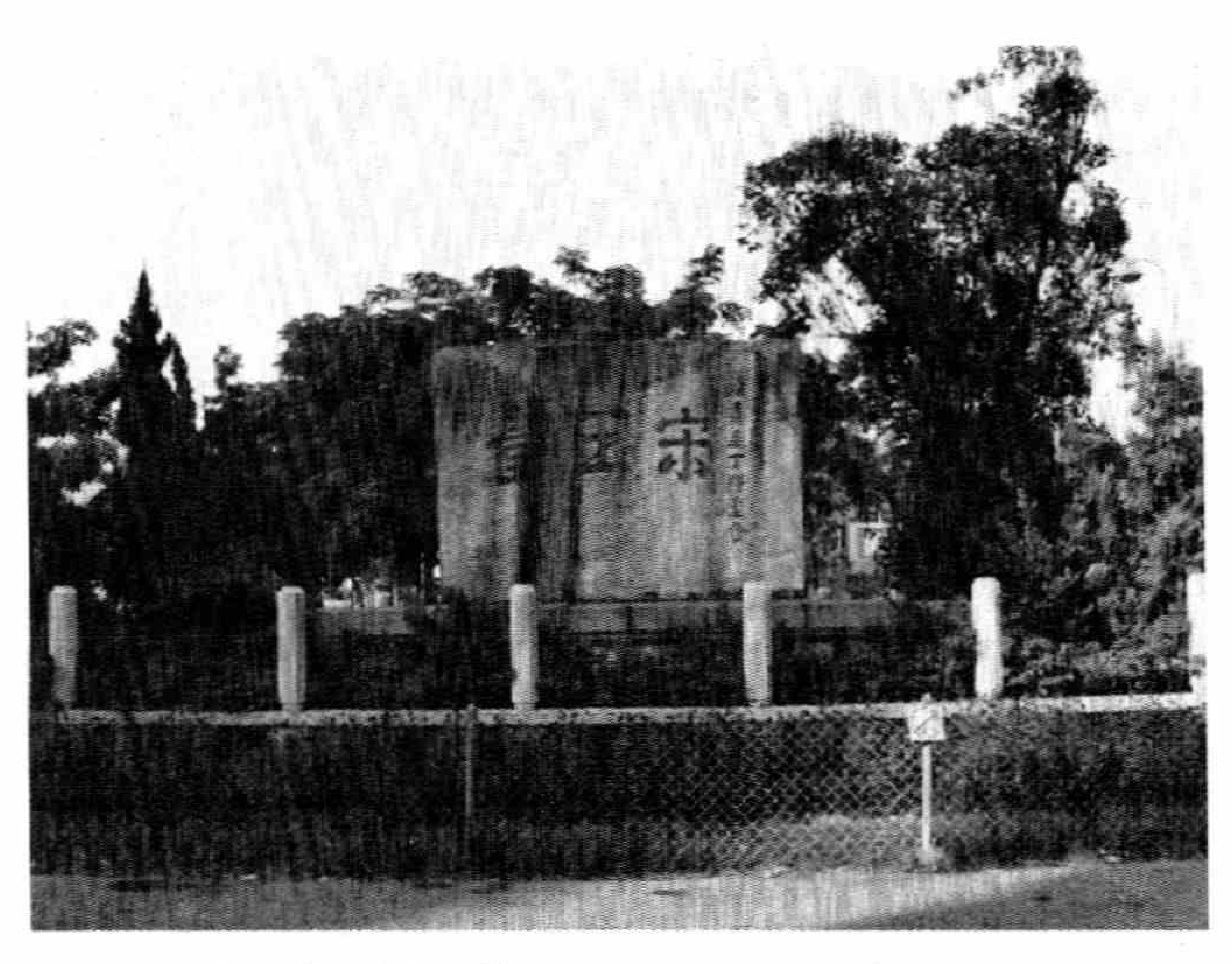


虎豹别墅一景（見《虎塔朝暉》）

快活谷馬場（見《快活蹄聲》）



九龍城寨一角（見《殘堞斜陽》）



宋皇臺公園（見《宋臺懷古》）

侯王古廟（見《侯王古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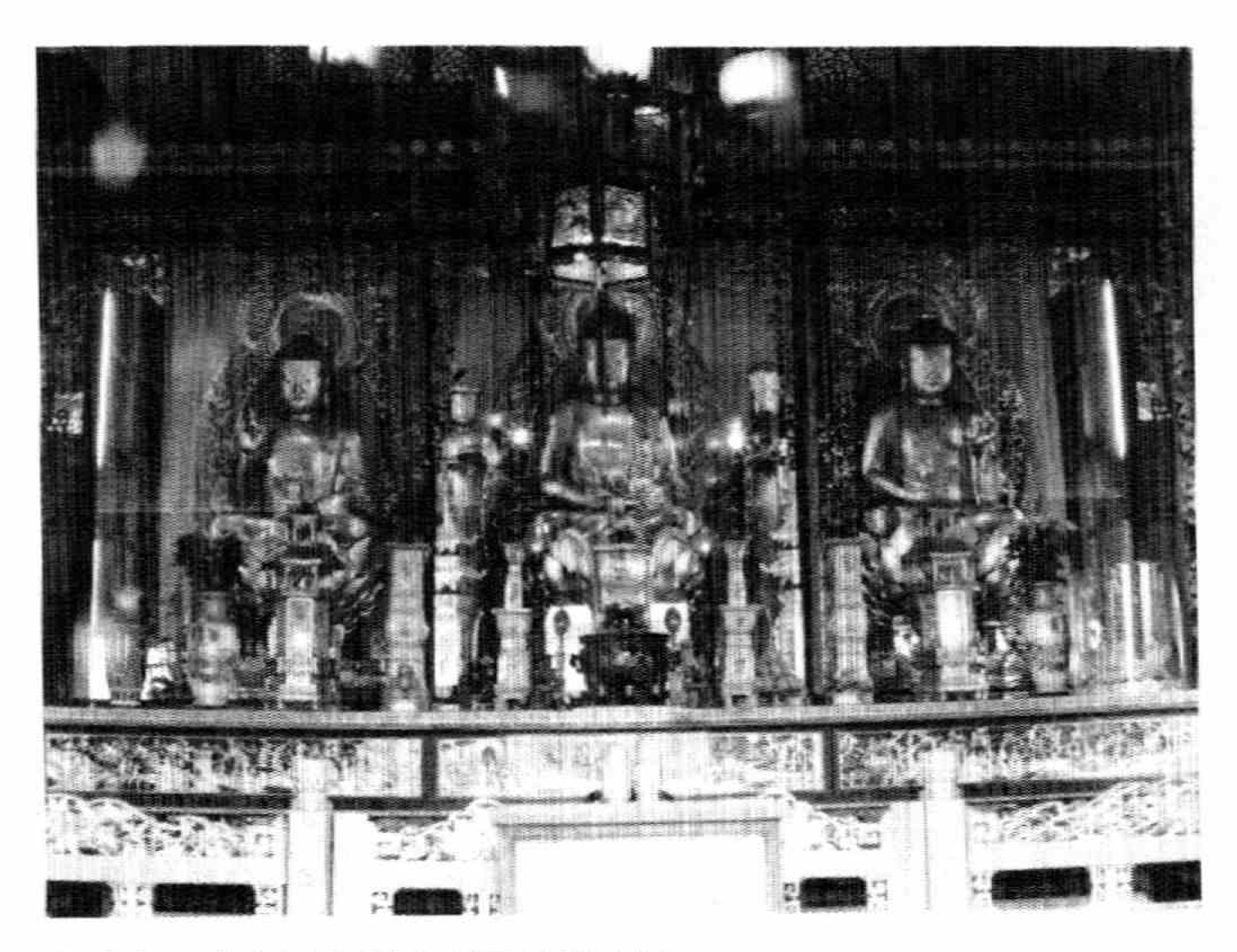




青山禪院的"高山弟一"石刻(見《杯渡仙蹤》)



大嶼山銀礦灣(見《大嶼山考》)



寶蓮寺大雄寶殿內景(見《寶蓮禪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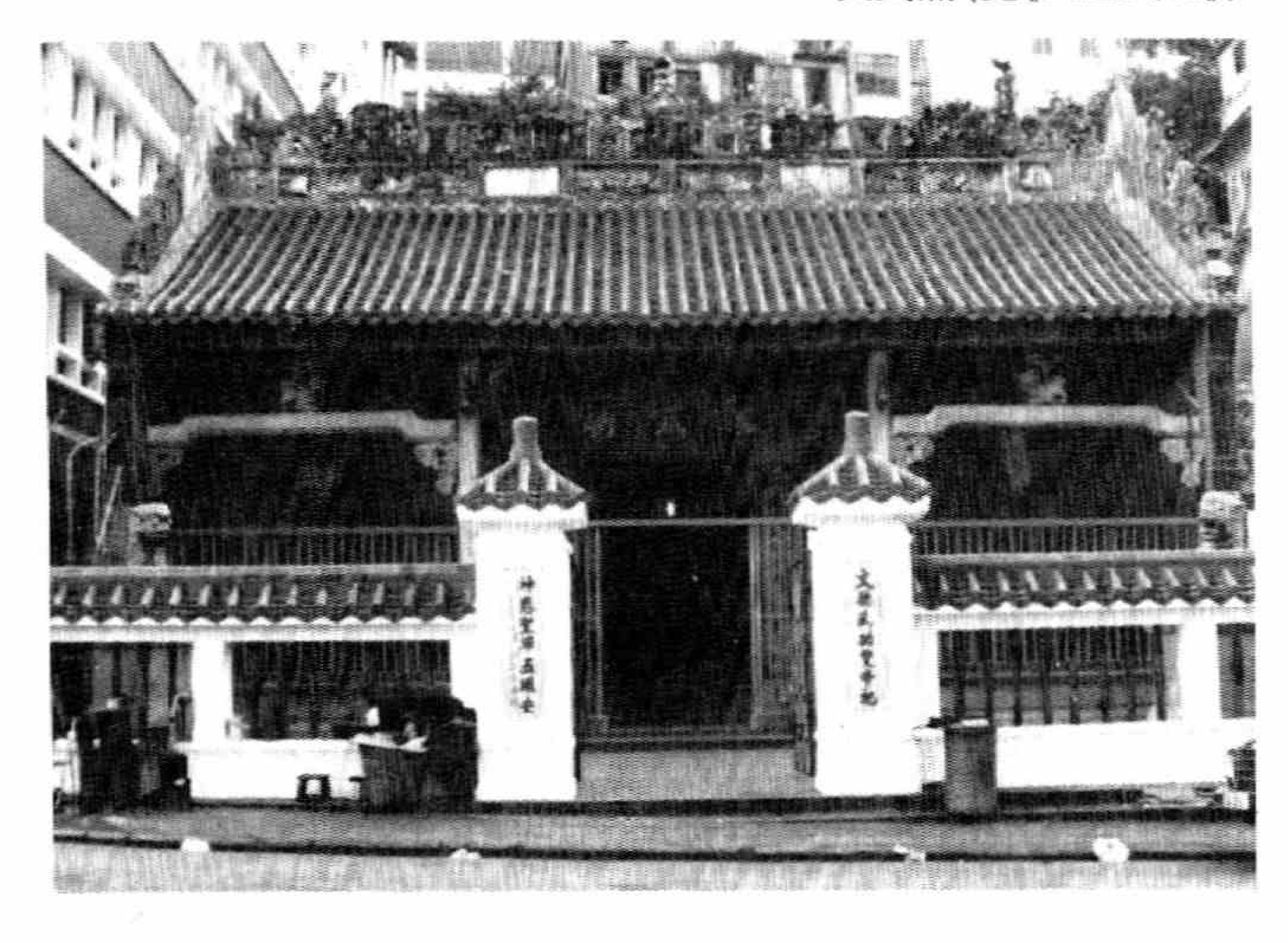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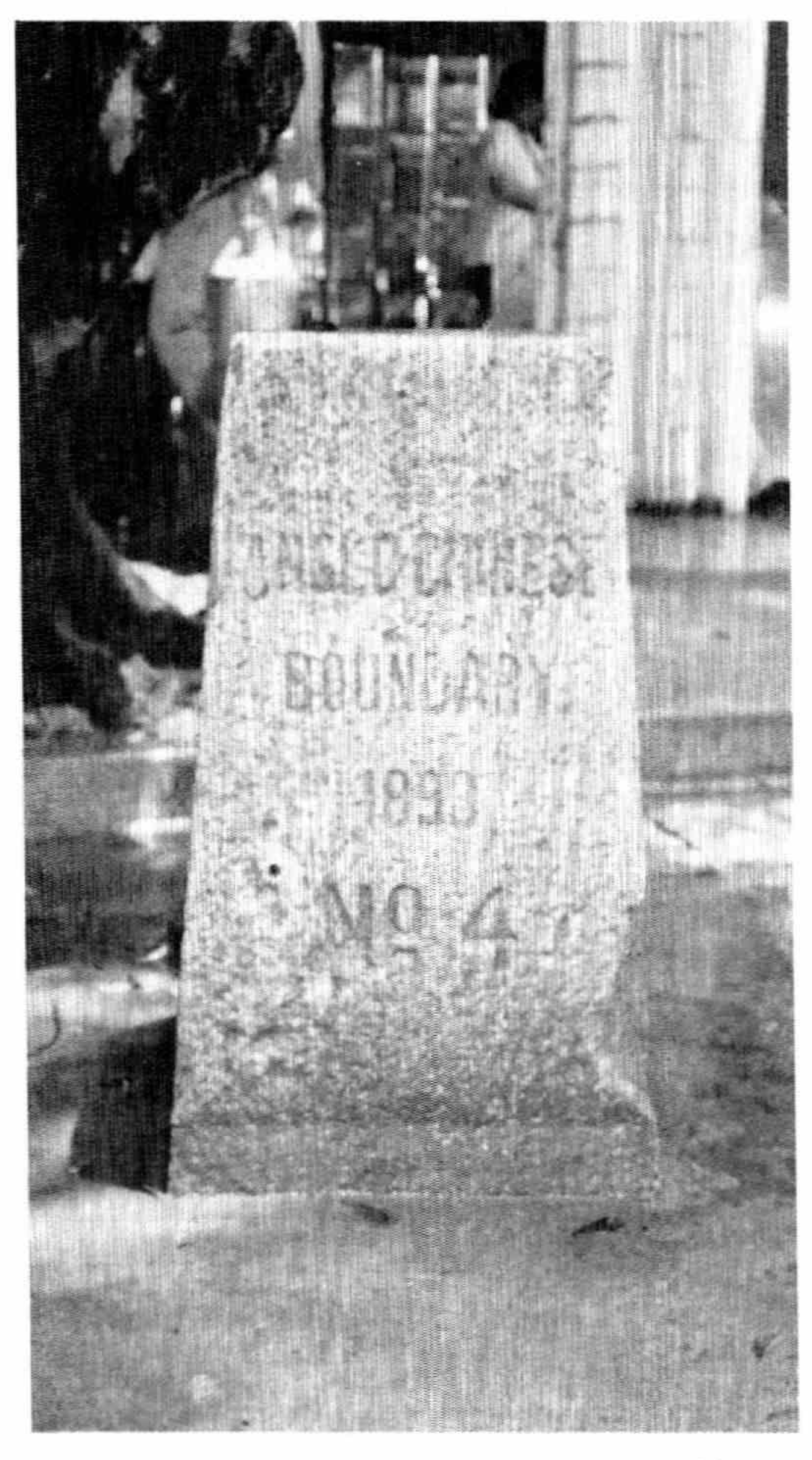
坐落於淺水灣一隅的天后碑座
(見《天后傳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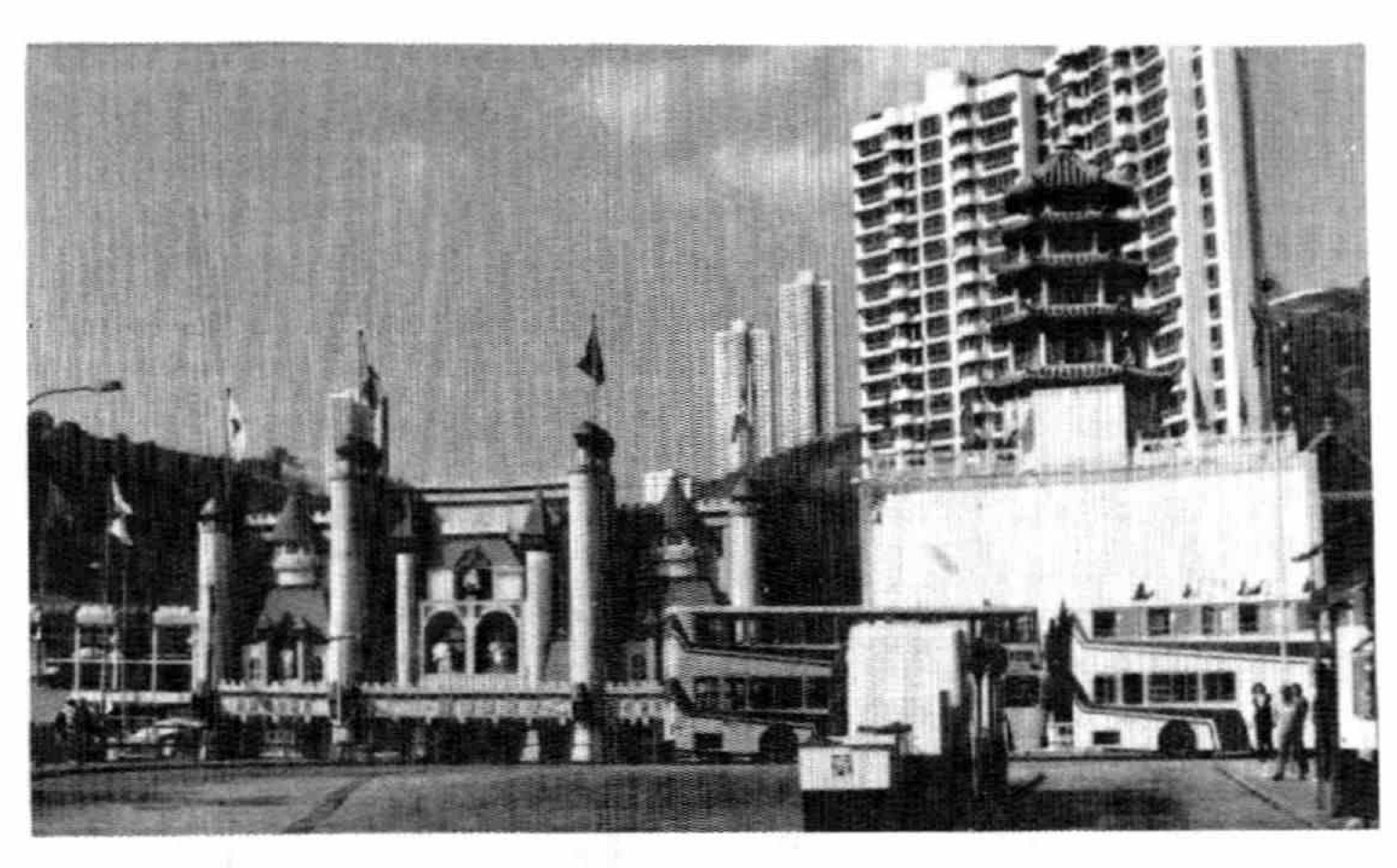
黃大仙祠的門前牌坊
(見《黃大仙祠》)

文武廟(見《文昌武帝》)





沙頭角中英街第四號界碑(見《沙頭海角》)



荔園遊樂場(見《宋城漫筆》)

宋城一景(見《宋城漫筆》)



錦田吉慶圍鐵門(見《租借新界》)

立法局大樓(見《開山塡海》)





葵涌貨櫃碼頭（見《開山填海》）

滙豐銀行門前的銅獅（見《銀行今昔》）



尖沙咀舊火車站鐘樓
（見《鐘樓話舊》）



港督府（見《總督譯名》）



“古今香港系列”總序

自從“香港學”作爲研究香港的歷史、政治、經濟、地理、文化、教育及風俗等專門學問被提出來之後，旋即引起香港和海內外文化學術界的重視。從實際情況來看，不少香港市民雖然生於斯、長於斯，但對此間社會各方面的演變缺乏應有的認識。“香港學”的異軍突起，相信會有助於促進香港市民關心自己的社會，瞭解自己的社會。

迄今爲止，有關香港社會各個領域的研究，用各種不同形式去開拓的範圍已頗爲寬廣。其中，有的是追溯開埠前的香港前代歷史，有的是探討百多年來香港某個方面的發展軌迹，有的是評述香港的現狀和預測未來的前景。其他如地方掌故、街道命名、風土人情，等等，均見有專題介紹。可以說，不管論者採取的是何種角度，是宏觀還是微觀，研究的項目確實是多彩多姿的。

“香港學”既然已經成爲研究香港社會的一門學問，出版界便有必要與致力於這方面研究的學人携手，共同爲搜集、整理和積累香港的地方史料而努力。多年來，香港學者在各個領域所進行的專題研究，其成績是應予肯定的。倘若我們能夠將這些研究成果，有系統地結集出版，這對於從事“香港學”研究工作，以及有興趣瞭解香港社會的本港和海外讀者，無疑會帶來或多或少的助益。

香港三聯書店有計劃地出版“古今香港系列”，正是

朝着這個方向出發的。這套叢書的選題，其內容當然與香港社會相干，但取捨的準則，則考慮以香港人所關注，或以對本地產生過相當影響的人、事、物爲主。至於每種選題均由一位作者作出全面的撰述，這樣的處理是過往類似的叢書所少有的。儘管在編寫、出版過程中不免會遇上困難，但我們仍樂意嘗試走出新的一步。

此外，這套叢書邀請了十六位資深的香港學研究工作者及在本身行業中有豐富經驗和出色表現的人士，組成編輯委員會，彼此交換心得，集思廣益，力圖使整套讀物從選題、內容到形式，均達到較完善的境地。

"古今香港系列"是一套普及性的知識讀物，爲適應讀者的需要，行文力求通俗易懂，生動活潑，取材既有資料性，又具趣味性。總而言之，這套叢書的出版，希冀能予香港史研究者提供有用的參考資料，對"香港學"的健康發展，起到拋磚引玉的推動作用；同時，亦爲香港和海內外讀者瞭解香港今昔面貌帶來一系列多元化的知識。

應當指出，這套叢書中各種選題所作的闡述和探討，並非等於絕對的定論，其中亦可能存在不足之處，希望行家和廣大讀者給予指正。謝謝大家的愛護和支持！

梁　濤

1988年3月1日

序　言

"古今香港系列"自問世以來，承蒙海內外朋友的愛護和批評，我們將再接再厲，繼續豐富它的內容。劉澤生先生這本《香江夜譚》，正是爲了進一步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而出版的。

在此之前，還沒有以小品式的散文介紹香港古今歷史的作品編入本系列裏，《香江夜譚》算是一個開端。本書涉及古今香港人事變遷的範圍頗爲廣泛，從漢代及於當代，從文化、經濟、教育、軍事、自然、地理、人物，以至各個年代生活的異同，無所不談，不拘一格。書中收入小品文共五十篇，每篇的內容各自獨立。因此，讀者既可順序閱讀，亦可隨意抽選一篇欣賞。

香港人實在太忙碌，生活節奏緊張。很多人無法擠出太多時間讀書，甚至連看報的時間亦有限，因此惟有利用乘搭車、船的時候來閱讀書報。人們生活如斯繁忙，促使香港報紙近年在版面編排上，作出適當的調整，譬如在處理新聞標題時，盡量用最扼要的字句點出大概內容，讓一些讀者能從新聞標題掌握大意。事實上，很多讀者正是用這般閱讀習慣去瞭解每日所發生的本港新聞及世界大事的。至於香港報紙的副刊，同樣亦作出相應的編排。大凡暢銷的報紙，其副刊皆以小塊欄目登載短文爲特色。其中文體都是以小品式散文爲主，方便讀者利用上下班的空隙

時間，在車船上翻閱，以符合緊張的都市生活節奏。

《香江夜譚》使用小品式散文介紹香港地方史迹，是作者經過仔細觀察港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接到一些讀者的來信後而決定採用這種形式。作爲“古今香港系列”的一種，旣能拓展整套叢書的新選題，又能發揮作者選材與寫作方法的個性，這不失爲一種有意義的嘗試。但願本書能適合廣大讀者的需要，同時亦希望大家不吝賜教指正！

梁　濤

1989年12月12日

前 言

有關香港歷史和掌故的書，在香港和內地都已出版了多種，還有不少在印刷中。這表明此類圖書在市場上有較大的需求，有很多讀者渴望取得更多關於香港過去的有益的知識。

這本《香江夜譚》是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古今香港系列”中的一種。全書共收文章五十篇，內容以香港古代歷史和名勝古迹的介紹爲主。但涉及的問題亦包括近百年來香港社會、經濟、文化的演變，資料頗爲充實。香港有哪些史前文化遺址？在英國佔領前香港的經濟、文化是怎樣的情況？英國如何佔領香港？英佔時期香港社會經濟怎樣發展和演變？第二次大戰期間香港經歷了哪些劫難？……對於這些爲廣大讀者感到興趣的問題，作者都能綜合當代許多學者研究的成果作出扼要的介紹，並能冶科學性、知識性和趣味性於一爐，讀來更加引人入勝。

我和作者劉澤生君相交有年，也曾就有關香港歷史的一些問題交換過意見。我對他不畏生活清苦仍然多年堅持研究香港歷史是深爲佩服的。他曾有機會改行從事其他收入較豐的職業，但是他都放棄了，十年如一日地繼續從事“爬格子”生涯，往往寫稿直到深夜。如果不是對香港和香港歷史抱有一股特殊的感情，我想他是不會這樣做的。

我從香港人口還不到八十萬的日子起，就居住在香港。

作爲一個“老香港”，我對香港也是有一份特殊感情的。這也許是我喜歡閱讀有關香港歷史、掌故的書刊（包括這本《香江夜譚》的原因。我想，許多香港人（不論在港居住時間長短）都會抱有相同的感情的。一些作者曾經討論過香港人之中的“過客情意結”問題。不少人認爲香港青少年多數對香港缺乏歸屬感。但我懷疑這種看法，恐怕它是片面的吧。我倒認爲，許多香港人即使由於種種原因移居別地，也還是不會輕易忘懷這個故鄉的。從香港的過去，或者說過去的香港人身上，他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們的心靈深處都以香港的驕人成就爲驕傲，也同樣關心着這顆“東方明珠”的未來。

對於那些想要更全面、更深入地瞭解香港的現在，因而亦要瞭解她的過去的朋友們，我願意介紹你們一讀這本《香江夜譚》。

金應熙

1988年9月

目　錄

滄海桑田

香港，芳香的海港！多麼動聽的名字，美麗的地方。然而，當你乘船橫渡那碧波蕩漾的維多利亞港的時候，當你驅車穿越那暢通無阻的海底隧道的時候，當你月夜泛舟、凝望兩岸如畫風光，或者倚欄尖沙咀東部、憧憬未來美好歲月的時候，你是否想到，在那遠古的年代，香港曾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也許，你還記得中國有句成語，叫做“滄海桑田”吧。滄海變桑田，這要經過多麼漫長的歲月，又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事情！就說一萬年前的香港吧。那時的香港島與九龍半島還是一片相連的陸地，屬於大陸山脈的延伸部份，人們往來，並未有今天我們所見的維多利亞海峽之阻，海岸綫離香港還有數十公里之遙，倘若不是由於後來山體的沉降與海水之入侵，造成了香港與大陸的分離，恐怕今日香港之歷史將會重寫。數年前，當香港建造地下鐵路時，科學家們對海底發掘的樣品進行放射性碳——14測定，證明在公元前6000年時，海面就在今海平面之下大約十一米處。香港目前的這種地理環境，大約還是在近五六千年逐步形成的。還是讓我們借助於考古學家們的研究來描述這香江歷史的最初一頁吧。

香港的考古發掘大致上是從本世紀的二十年代中期開始的。早年的一批熱心於香港考古事業的知名學者，如許

地山、林惠祥、陳志良、羅香林、陳公哲以及外籍學者芬戴禮（Fr.D.Finn）、韓以理（C.M.Heanley）、蕭思雅（J.L. Shellshear）、戈斐侶（W.Schofield）等，都曾各自單獨從事過香港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1967年，香港考古學會正式成立，這標誌着香港的考古事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經過六十多年來中外學者的共同努力，考古學界已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爲香港史前史、古代史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礎。目前，在香港地區已發現的屬於新石器時代中期（約公元前4000—前2200年）的遺址約十二處（如深灣、大灣、細灣、春坎灣、蟹地灣、大鴉洲、銅鼓洲等）；新石器時代晚期（約公元前2200—前1200年）的遺址約十四處（如深灣、大灣、榕樹灣、石壁、沙洲、小鴉洲、銅鼓洲、滘西洲、蘆鬚城等）；青銅時代（約公元前1200—前400年）的遺址約三十多處（如深灣、大灣、石壁、萬角咀、大浪灣、牛牯灣、春坎灣、蟹地灣、掃管笏、牛坎沙等），幾乎遍佈於目前的香港島、九龍半島和離島各處。

在香港的考古發掘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位於港島南面的南丫島南部深灣遺址。在這裏發掘所見的厚達三米的文化層中，包括了香港目前所見的遠古文化的幾種類型。它猶如一份歷史年表，向人們展示了古代香港發展的歷史進程。深灣遺址的發現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有的學者譽之爲香港考古學發展的分水嶺，“不僅在方法和技術方面，深灣的前期和後期截然不同，而且更由於在深灣的發掘，使我們對於本港文化發展的次序和年代，有了個系統的認識”。［白爾德（S.M.Bard）：《深灣的意義》］

深灣遺址早在本世紀的三十年代就已被人發現了。但是，有組織、有計劃的系統發掘、研究工作，却是在七十年代才開始的。在香港考古學會的組織下，自1971年秋至1977年春，在這前後長達七年的時間內，先後展開了五期較大規模的發掘工作，使數量頗豐的珍貴文物得以出土。香港有的考古學家將深灣遺址劃分爲八個文化層序，即A層（近代文化層，相當於公元1600年之後）、B層（早期文化層，主要是公元400—1000年）、C層（幾何印紋陶文化層，約爲公元前2000—前200年）、D層（比較貧瘠的文化層）、E層（浮岩文化層）、F層（幾何印紋陶前文化層，約爲公元前4000—前2000年）、G層（比較貧瘠的文化層）及H層（貧瘠層）。其中B層所代表的是秦漢以後的文化，屬於這一時期的出土文物包括有綠釉或褐釉陶碗，素面紅色或灰黑色細泥硬陶，網紋灰白色硬陶等。C層文化層又可分爲兩個層次，即Ca層與Cb層，分别爲青銅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在Ca層，出土的青銅器種類與數量均較多，陶器則以泥質陶爲主，火候較過去提高，流行拍印夔紋等。在Cb層，磨製石器已明顯增多，並出現有肩有段石器，而打製石器和天然礫石工具已經減少，陶器的紋飾也呈現多種形式的幾何形花紋（如拍印曲折紋、方格紋、葉脈紋、雲雷紋等）。F層文化層則屬於新石器時代中期的文化，這一層出土的磨製石器較少（約佔五分之一），而打製石器較多，石�比較原始，雙肩石器較少。陶器則有素面或劃紋細泥軟陶及繩紋夾砂粗陶兩種。深灣F層（以及屬於同一歷史時期的春坎灣、蟹地灣、銅鼓洲等）的考古發掘研究表明，大約在距今五

千多年前，就有使用新石器和陶器的我國先民在這一地區居住，以捕獵、採集、耕作爲生。有關深灣的考古發掘和研究成果，香港考古學會在十年前曾出版過秦維廉（William Meacham）編纂的《南丫島深灣——考古遺址調查報告》一書，內中對此有詳細的紀述，對於希望瞭解香港考古知識的讀者，自可從中獲得有益的參考。

有關香港的考古研究已經引起了香港及內地同行的廣泛注意。有的學者還將香港所發現的史前遺物與內地同一時期的文化進行比較研究，認爲香港的史前文化有別於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而與廣東沿海以至東南沿海有密切聯繫。在香港的大灣、舂坎灣、蟹地灣、銅鼓洲等新石器中期遺址出土的繩紋、劃紋夾砂陶、彩陶、在廣東的深圳、東莞、增城的同期遺址中都有被發現。例如深灣沙丘遺址F層與增城金蘭寺貝丘遺址下層的文化內涵相同，只是它們的年代稍有差別，後者應略早於前者。金蘭寺中層與深灣Cb層同爲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幾何印紋陶遺存，但在所屬的年代上後者似應介於前者的中B層與中A層之間。而香港青銅時代遺址的出土遺物，也明顯地與廣東大陸以至長江以南的青銅文化相一致。

香港歷史，源遠流長；香江夜話，縱論古今。歷史，就是這麼的有趣。曾幾何時，香港已從昔日華南之邊陲漁村小島崛起於世界的東方，成爲令世人矚目的“東方之珠”。眞是物換星移，滄海桑田啊！

摩崖石刻

時光倒流兩千年。

在鯉魚門外東龍島的北部海濱，湛藍的大海上，一字兒擺開着形態各異的獨木舟，蔚藍的天空，飄浮的白雲，魚羣歡躍，海鷗翱翔。一羣身披獸皮、手持魚鏢的原始漁民，正在一處形似巨鳥的石刻前舉行祭祀儀式。人們跪拜、歡呼、擊節……，似航海的凱旋，如征前的祈禱。他們寄望於鳥神的庇護，祈求着漁撈的豐收、海事的平安……

這是畫家筆下東龍石刻祭祀儀式的復古圖。在香港，這種形象逼眞、紋理獨特的摩崖石刻，除了東龍島之外，還有石壁、蒲台、長洲、大浪灣、大廟灣、淸水灣以及滘西洲等，共八處之多。它們大都選擇在距海平面三至五米的紋理幼滑的雲斑岩上，位處海峽或港灣，地形比較隱蔽，而且石刻前面多有一定寬度的平地，旣有神秘感，又便於古人舉行拜祭儀式。石刻上大致均鑿有令人感到撲朔迷離的圖案，有的似乎與鳥或其他動物形象有關。這類石刻在廣東沿海地區似未見過。但是，香港的這些摩崖石刻除了東龍島一處在中國古籍中有記載外，大都還是近數十年來才陸續爲人所發現的，其中最早見諸於報端者，當推大嶼山石壁之東灣石刻了，其發現者即爲早年香港考古學界頗具名氣的陳公哲先生。

說起來這還是頗爲耐人尋味的。數年前，亞洲電視台

曾經播放過長篇電視劇《霍東閣》，劇中人陳公哲早已爲觀衆所熟悉。然而，現實生活中的陳公哲，上了年紀的香港人大概也不會感到太陌生。據陳氏自述，他在1936年"官於平津，因知戰事不久必發，乃卸職南歸，返寓吳門，再返羊城，養晦香江，俾讀平時所欲讀而未讀之書，以香港仔幽靜，不亞杭垣之西湖，乃稅居此中"。（陳公哲:《香港考古發掘及考古學家》，見黎晋偉主編:《香港百年史》）陳公哲在港期間，曾從事學術研究，考古發掘，筆耕著述，頗有成就。1938年，陳氏曾自費在香港進行考古發掘凡八閱月，及後寫成《香港考古發掘》（見《考古學報》，1957年，第四期）等論著。陳氏對東灣石刻有如下紀述:"余在東灣發掘居留時，常與鄉人談掌故。據云:兒時聞父老傳說，去此不遠，岩壁中鑿有石刻，爲前人藏鏹記誌。余往視之，地名沙岡背，……石刻位於東面之低岩，高零點五十七米，闊零點三十四米，長方形，內刻方雷紋六，墨拓一紙而歸。鄉人告余，對方山壁中原有同形之石刻，爲雷轟倒圮。復親往視，石俯卧地中，雖未見其文，而鄉人之語可信，二刻相對，約離二百步之遙"。1962年，在上面石刻附近山谷之峭壁上也發現一處摩崖石刻。隨後，在蒲台、大浪灣等處又相繼有綫條更爲繁複的石刻被發現。不過，話又說回來，香港最爲引人注目的摩崖石刻還是本文開頭所描述的那誘人遐思的東龍一組。

東龍島位於佛堂門之南，是船舶進出香港的交通孔道與重要標誌。古代越族的一支，早在五千多年前便在這一帶活動，東龍石刻就是這衆多遺址中的一個。據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版《新安縣志》卷之三・地理誌記載:

“石壁畫龍——在佛堂門，有龍形刻於石之側。”這是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有關東龍石刻的歷史記載，也是目前香港已發現的最大一處石刻，高達一點八米，寬二點四米，距水面約有四至五米，是香港地區一處重要的考古發現。

從該石刻圖形上看，雖然所刻綫條相當抽象，但仍可辨認出來，其形似鳥而不似龍。據有的學者研究［參見秦維廉（William Meacham）：《香港古石刻》，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出版，1976年］，石刻右側所畫，似乎是一隻裝飾華麗的巨鳥，卧巢而不動。左側的則因綫條繁複，不易確定，但依稀之中仍可見似一正在抓魚的巨鳥，色彩繽紛，形態動人。然而，爲什麼鳥的形象如此爲這些古人所重視呢？這在歷史學、考古學上還是一個頗爲重要的研究課題。

古時，香港地區的原始居民作爲越人的一支，他們的生活大都離不開海，以航海捕撈爲生。而鳥則是雄健、光明的象徵，鳥爲風神，正是以捕魚爲生的沿海越人所崇拜的對象。神話傳說中古代南方還有一種人面、鳥喙、有翼，以食海魚、杖翼而行的驩兜（又作讙兜、讙頭），還有所謂“驩兜國”呢。據《山海經・海外南經》記載，傳說“讙頭國在其南，其爲人，人面有翼，鳥喙，方捕魚。一曰在畢方東，或曰讙朱國”。《淮南子・說林訓》又稱：“鳥有沸波者，河伯爲之不潮，畏其誠也。”東漢高誘作注謂：“鳥，大鵬也，翱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故河伯深藏于淵，畏其精誠。”這種以鳥爲圖騰的崇拜，也是一種原始的宗教信仰。香港的這些摩崖石刻正是古代越人祈求海事平安、物阜民豐的反映，這與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是相

一致的。至於其他的螺形、正方螺形、圓圈等幾何綫條，以及其他的一些動物形象石刻，也許都寄託着先民的某種崇拜。有的學者就考證認爲，石壁、蒲台等處之螺形石刻，當係先民所模仿之古雷字或雲字。古人在傳統上正是將螺紋作爲雷、雲、雨等看待的。在瀕海的香港地區出現如此衆多的螺形紋刻，或許正是與當地先民祈求風調雨順之原始崇拜有關。而大廟灣那類似地圖等高綫的彎彎曲曲的石刻，更被人認爲是一幅"海盜地圖"，至今還是一個不解之謎。

關於這些摩崖石刻之產生年代，也成爲人們所關注的話題。陳公哲就曾著文認爲，東灣石刻之年代約在四五千年以前，並斷言"該刻石不但是香港的最古碑刻，也是華南的最古碑刻，可與貴州之紅石摩崖相媲美"。（見《考古通訊》，1957年，第五期）不過，有人將石刻圖案的形象與中國青銅時代的銅器和陶器的紋飾進行比較研究，認爲大致上應是春秋戰國時代的產物，距今約有二千多年的歷史。這種推論大概是比較可靠的。只是香港的這些石刻，大都分佈於交通不便之離島或遊人難於涉足的郊野之處，這對於有懷古雅興之士，多少就不免有點遺憾之感了。

漢墓探幽

在九龍深水埗，有一處頗值一看的千年古墓，這就是現時香港博物館李鄭屋分館所在的漢墓。它的發現，完全是出於一次偶然的機會。1955年8月9日，在李鄭屋村徙置區的建築工地上，香港生泰建築公司的工人在東京街北端正挖掘一座小山丘時，突然發現地下有一類似防空洞的十字形洞穴及古陶器多件。這一意外的發現驚動了香港的考古學界。由於古墓得到了及時的發掘和良好的保護，至今仍吸引着衆多的市民與遊客，成爲人們探索香港古代歷史的珍貴資料與有趣的話題。

古墓原位於瀕海的一處海蝕台地邊緣，海拔高度約爲十三米，後因歷年填海，現在距海岸已有數百米之遙了。墓室爲磚結構，平面呈十字形，內分墓道、前室、左耳室、右耳室及後室五個部份。全長約八米，寬約十米。前室居中，平面近方形，上爲拱形的圓頂，前爲墓道，其餘三面各通連着一個長方形圓劵頂的單室。後室的後壁有一劵形小龕。墓室所用磚塊均爲長方形，質堅，色紅或灰，長約四十厘米，寬約二十厘米，厚爲五厘米。墓磚大多爲素面，少數磚側留有模印或刻印文字。據有的學者考釋，這些隸書文字爲“大吉番禺”、“番禺大治歷”、“薛師”、“六十四”等。全部出土遺物共六十一件，包括房屋模型四件，壺二十一件，碗兩件，高足盌三件，奩一件，有蓋三脚鼎一件，

及易碎的鏡、碗、小鍾等銅器器物八件。

對於這樣的一座古墓，它該是何時之物呢？它的墓主人是誰呢？這曾經引起過人們的熱烈議論。有人認爲這是六朝墓，有的則認爲是東晋墓，更有人指出這是南宋楊太后的衣冠塚，並推斷出爲1279年張世傑所建。眞是衆說紛紜了。不過，目前多數學者認爲，這是屬於東漢中期的一處墓葬，年代大致介於公元第一世紀末至第二世紀中，距今約有近二千年的歷史。

從考古學上來說，根據學者們的研究，像李鄭屋村這樣的磚室墓，在廣東地區大約始於東漢初期，較中原地區略晚，而與湖南長沙磚墓最初出現於新莽時期則是接近的。有的考古學家認爲，湖廣兩地，南北毗鄰，因而在文化發展和相互影響上是極其密切的。而平面呈十字形的凸頂磚室墓，盛行於東漢中期。後室有小龕的結構則常見於東漢前半期。此外，東漢的墓磚一般爲青灰色，大部份素面無花紋，個別在側面印有幾何圖案花紋或表示吉祥的字樣。這些研究對於鑒別李鄭屋古墓是很有啓發的。

從出土陶器的紋飾與墓磚刻劃的文字上看，該墓屬於漢代墓葬的可能性也最大。在該墓出土的衆多陶器中，有一隻拍印有方格紋的硬陶罐頗爲引人注意。據考古學家們研究，這種拍印紋硬陶器是華南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幾何印紋陶的遺存，在南方一帶的漢墓中甚爲常見，被認爲是南方古代物質文化的顯著特徵之一。據說有人曾經戲言，像李鄭屋村這樣的墓葬如果是在內地發掘的話，其年代的鑒定也許不致引起這麼大的爭論。此外，從歷代建置上說，秦漢時期的香港地區，隸屬於南海郡番禺縣，東晋、隋朝

時期屬寶安縣，唐代則改隸東莞縣。墓磚刻有“番禺”字樣而不稱“寶安”、“東莞”，可見此墓與“番禺”有關，這對於年代的鑒定也是很有參考意義的。而自西漢始，南海郡番禺縣設司鹽都尉，衙署在今寶安南頭，管理附近鹽田。因此，有的學者根據以上的歷史記載以及墓室的規模、陪葬器物的數量等推斷，死者當非一般的平民或下級官吏，而極可能是東漢時的一位鹽官。

然而在李鄭屋古墓中，除了衆多的隨葬品外，並未發現有棺木或骨殖。人們於是紛紛作出猜測，有人認爲這可能是一處“衣冠塚”，也許墓主人是戰死疆場的軍官，屍體未能收回而於此築墓紀念？也許因爲年代久遠，地方潮濕，使屍骨、棺木早已腐朽無存？這些推論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學者們以爲更重要的是從各種不同的隨葬品去探求墓主人所在時代的社會經濟生活風貌及其所反映的歷史意義。

首先引起人們重視的是這些出土的陶製品。除了一般的生活用品外，房屋、井台、陶俑等的設計特別引人注目。漢代鄉村中最主要的建築——屋、倉、井、竈都在此得到反映。從模型上可見，當時人們已經懂得使用木柱支架、屋瓦蓋頂了。那佈局合理、結構複雜的曲尺形房屋以及屋後小院的豬欄。造型優美、綫條流暢的倉庫。神形兼具、栩栩如生的正在簸米、舂米的村婦；製作精美、紋飾雅致的銅鏡、銅鈴，以及那形態逼眞的家犬等等，不禁令人勾勒出一幅古代農業社會鄉村生活的圖景。受中原漢族文化的影響，這些居住在南海之濱的原始越人已經從新石器時代末期的簡單漁獵、原始農耕向封建社會初期更高層次的

農業經濟邁進，農業生產技術與手工、建築藝術均已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這種農業經濟的歷史，我們還可以在其他地區的考古發掘中得到印證。

過去曾經有人認爲，像香港這樣偏僻的地方在古代是不可能與中原文化有很多接觸的，甚至認爲李鄭屋漢墓是代表一種與廣東的"土著文化"無關的"外來文化"。但是，大多數學者的研究表明，這樣的說法是不足爲信的。實際上，類似李鄭屋古墓這樣的漢代遺存，在香港地區還有其他的發現，例如在南丫島就曾有東漢陶罐出土。而在同一時期的廣州出土文物中，更是數不勝數。根據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於1953年至1960年初在市郊發掘的六百六十多座古墓葬中，屬於西漢時期的就有二百四十座，屬於東漢時期的有一百二十七座，且分佈十分廣泛。在與香港毗連的深圳以及佛山等地，近年也有大量的漢墓出土。從這些漢代墓葬的出土文物來着，大致上都是一致的。自秦統一中國以來，中原漢人大量南遷，先進的文化科學技術對於南方邊陲的經濟、文化、技術落後的越族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這些都可以從包括李鄭屋漢墓在內的廣東地區的這些衆多漢代墓葬中得到反映。儘管它們在某些方面還保持着其自身的某種特點，但從本質上來說，與中原地區的漢族文化却是屬於同一文化系統的，它們之間存在着一脈相承的、不可分離的關係。

說來也許還是出於一種歷史的巧合，香港的考古學科也因李鄭屋漢墓的發掘而有了新的發展，並日趨專業化。過去的考古活動，大都是學者們零星進行的，自此漢墓的發掘，香港才有了正式的考古專業隊伍——香港大學考古

隊，並隨後於六十年代在此基礎上發展而成立了香港考古學會，開始了較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工作，這大概也稱得上是另一種意外的收穫吧。

香江八景

八景題詠大概可稱得上中國的文人雅士的一大雅興。古往今來，大凡名城勝地，皆有八景、十景之稱，或讚河山之秀麗，或懷先賢之忠烈，或抒希望之寄託，或發思古之幽情。從中原到邊疆，從塞北到嶺南，直至這包括香港在內的新安邊陲之地，均留下了騷人墨客的畫卷詩篇。“秀擁盧山絢彩霞，森森桃李碧交加”（題《盧山桃李》）、“靜聽扣舷漁歌唱，滿灘明月曬銀沙”（題《赤灣勝概》）……你能看出這裏所指的古代南海之濱新安的旖旎風光嗎？三百年前的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由靳文謨、鄧文蔚纂修的《新安縣志》中，就留下了有關“新安八景”的記載——“杯渡仙蹤”、“赤灣勝概”、“梧嶺天池”、“參山喬木”、“盧山桃李”、“龍穴樓臺”、“鰲洋甘瀑”、“玉勒溫泉”。其中的“杯渡仙蹤”與“鰲洋甘瀑”，就在今日香港地區範圍之內。康熙版《新安縣志》係現存最早的版本，可惜在此之前的《新安縣志》已經散失，不然，讀者也許可以從中看到更早與香港地區有關的“新安八景”的記載了。

從“新安八景”到“香江八景”，說起來還是不能不提到香港地區的歷代建置的。。

隨着中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的建立，香港地區一直處於中國古代歷代王朝有效的行政管轄之下，從未間斷。

大致說來，從秦始皇平定嶺南至公元331年（東晋咸和六年），本地區隸屬南海郡番禺縣。公元331年至757年（唐肅宗至德二年），隸屬東官郡寶安縣。公元757年至1573年（明神宗萬曆元年），隸屬廣州府東莞縣。1573年從東莞縣分出一部份設置新安縣，故本地區又改屬廣州府新安縣所轄。至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英國佔領香港島時，香港地區已在中國的有效管轄下達二千多年了。以上所提及的"新安八景"中的"杯渡仙蹤"，即後來"香江八景"之一的"古刹鐘聲"——位於新界屯門之青山禪寺，於今仍不失爲香港歷史最爲悠久的名勝古迹之一。而目前毗鄰香港、分屬於深圳的"梧嶺天池"、蛇口的"赤灣勝槪"、寶安的"玉勒溫泉"、番禺的"龍穴樓臺"等原有"新安八景"，也歷經數百年來的風雨變遷而以新的面貌爲香港遊客所熟悉，成了港人遊覽、度假的好去處。

姑且不論這"新安八景"的歷史變遷，就說這香港地的名勝古迹與郊野風光吧。她雖無蘇州園林、桂林山水之瑰麗多姿與膾炙人口，缺乏自然旅遊資源與氣魄雄偉的名山大川，但也許你還能口若懸河地歷數出那港島的太平山、文武廟、香港仔、淺水灣，九龍的宋皇臺、侯王廟、九龍城寨、黄大仙祠，新界的杯渡山、凌雲寺、落馬洲、青松觀，離島的鳳凰山、寶蓮寺、張保仔洞、銀礦灣……可見香港也自有其秀麗的風光與獨特的韵味，令那衆多的文人雅士與丹青妙手爲之留下了"香江八景"絢麗多彩的畫卷與蕩人心腸的詩篇。

說起來，八景之類的題詠也並非完全是所謂士大夫階層附庸風雅的吟唱，她也從一個側面令你窺見香港地今昔

的風貌與歷史的變遷。且看這二十世紀初期的“香江十景”——“古刹鐘聲”、“宋臺憑弔”、“破堞斜陽”、“香江燈火”、“小港夜月”、“海國浮沉”、“筲箕夜泊”、“升旗落日”、“西高夏蘭”、“松壑猴羣”。今日之屯門青山，雖仍不失爲佛教名山與郊遊勝地，但這千年古刹的規模比之後起的寶蓮禪寺，畢竟稍遜一籌。而昔日新界大埔水塘叢林中嬉耍的“松壑猴羣”也難得一見了。至於其後的八景、十景，如“旗山星火”、“長橋霧鎖”（也作“仙橋霧鎖”）、“鵝澗榕蔭”、“鴨洲帆影”、“赤柱朝陽”（也作“赤柱朝曦”或“赤柱晨曦”）、“扶林飛瀑”、“鯉門夜月”、“淚灣游泳”（也作“淚灣海浴”或“淚灣水軟”）、“宋臺奇石”（也作“宋臺懷古”）、“殘堞斜陽”，等等，也大同小異，有的已是面目全非，成了詩人依稀記憶中的夢境，如灣仔鵝頸橋一帶，於今既無淙淙流水與綠樹濃蔭的景致，更無那漁翁垂釣與怡然自得之意境，取而代之的是那寶靈頓道、堅拿道、軒尼詩道鱗次櫛比的摩天樓宇與縱橫交錯的高架天橋。有的則早已湮沒，甚至完全改變了其自然景觀，像薄扶林那遐邇聞名的山間瀑布，因水源被截，更是無瀑可飛，無景可言了。儘管文人們雅興猶存，重評爲之“扶林曲徑”，希望從這曲徑通幽的林蔭小道去尋覓那當年迷人的風采，但畢竟是大相徑庭了。近年來，香港地的社會風貌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因而又有人將八景賦予新的內容——“飛橋夜瞰”、“石排烟雨”、“淺水丹花”、“石澳風濤”、“青洲落照”、“飛車絕壁”、“虎塔朝暉”、“快活蹄聲”——連快活谷（跑馬地）的賽馬也自成一景了。

然而歲月流逝，物換星移，八景的更迭終歸難以趕上

歷史的潮流與現實的變遷。後來相繼落成的海洋公園、宋城、青龍水上樂園等一類娛樂場所，以及那迷人的海港秀色與衆多的郊野公園……，都爲這海陬小島增添了新的光彩，雖然人們未必都有那“石排烟雨”與“青洲落照”一類的詩情雅興，但“香江八景”畢竟爲當地的市民與外來的遊客增添了賞景的情趣與娛樂的去處，這倒是不該忘記那些文人雅士的八景題詠的。

旗山星火

旗山，即扯旗山，在歷來衆多“版本”的“香江八景”中，首景幾乎都與此有關，或譽其山上山下那燦若羣星之萬家燈火，或讚其有“仙橋”、“長橋”之稱的凌空縹渺的盧吉棧道，名目繁多，諸如“旗山星火”、“香江燈火”、“升旗落日”、“仙橋霧鎖”、“長橋霧鎖”、“飛車夜瞰”、“飛車絕壁”等等。還有每當日薄西山之際，從青洲遙望那海港燦若黃金的落日餘暉與港九兩岸華燈初上的萬家燈火——“青洲落照”，皆有異曲同工之妙。

扯旗山又名太平山，雄居港島西部，是島上的最高山峯（海拔五百五十四米），它的得名還有一段頗爲有趣的故事。傳說當年海盜張保仔佔據香港時，曾駐兵西營盤，並在這山上設瞭望台，以便及時發現海上情況，扯動旗號通知山下營寨的同夥，因而得名扯旗山。又傳說當地人因祈求太平，故此山又有太平山之稱。傳說歸傳說，這還是留待史家們去考證吧。不過，自從英國人在這裏扯起了米字旗後，扯旗山又有了一個洋名字，叫做Victoria Peak（維多利亞山）這大概取其正好俯視山下的維多利亞港（Victoria Harbour）之意吧。

說到維多利亞山，免不了要說到維多利亞港，這眞可稱得上是中國的第一良港，也是世界的第三大海港（僅次於美國的紐約和巴西的里約熱內盧）。它的得名正是源

於英國女王亞歷山德麗娜·維多利亞（Alexandrina Victoria,1837—1901年在位）的名字。當年英國佔領這個海港時，也正是維多利亞女王當朝的時候。維多利亞港水面寬闊，港深浪平，從東邊入港口的鯉魚門到西邊的汲水門，面積達六千公頃，吃水十二米的巨輪可以自由進出。海港的西北方有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荷蘭鹿特丹）的貨櫃運輸中心——葵涌貨櫃碼頭。位於九龍尖沙咀與港島中區間的最窄處，海面僅寬一千多米，也是觀賞旗山、海港夜景的一大去處。

猶如一位妙齡少女愛在人們面前表現自己的秀麗姿色一樣，香港之美，正是在她薄暮時分或華燈初上之際那迷人的景致，這旗山、海港，霓虹彩幻，構成了"旗山星火"這一歷久不衰的絕妙畫圖。不過，要眞正領略這位少女的風韵，那便非親自登臨這太平山不可了。

對於現代的遊客來說，要登臨太平山已經是一件十分輕鬆的事了。如果你不是徒步登頂的話，則可從中環交易廣場乘15號巴士或在大會堂低座東側乘1號專綫小巴或者的士，便可直達山頂。然而，對於那些新來乍到的外地遊客來說，也許在中區花園道聖約翰大厦嘗試一次山頂纜車會來得愜意些。

太平山上的纜車總站，是一座頗爲壯觀的建築，爲昔日"老襯亭"舊址，最高一層爲露天觀景台，其下設有瞭望台、餐廳、商場，以售賣富有東方色彩的工藝美術品爲主。"老襯亭"對面是停車場與山頂餐廳。沿餐廳旁邊的柯士甸山道上行，不遠便是柯士甸山道遊樂場，再向上步行約二十分鐘，即可抵達山頂公園。至於在"老襯亭"不

遠處，則有“獅子亭”與“明仁亭”，亭下懸崖築有曲徑迴欄，可供遊人駐足賞景，成爲太平山的旅遊好去處之一。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當你在那日暖風和的旅遊季節，乘興登臨旗山，迎風而立，倚欄遠眺，那着實是一種美的享受。近處，是繁華的港島，從西營盤到北角、銅鑼灣、高樓幢幢，千姿百態。遠處，是交通繁忙的維多利亞港、突入海中的九龍半島與長洲、南丫島、大嶼山等離島，還有碧藍的天空、湛藍的大海、透迤的羣山……香江秀色，奪目而來；港九風光，一覽無遺。

然而，當你在那月白風清、夜幕降臨之際，再作一次鳥瞰式的品味，親睹這顆明珠於黃昏落日、華燈初放期間的風采，更是妙不可言。難怪她有世界“四大夜景”之一的美稱，這簡直是一個彩幻的世界，霓虹的海洋。靜止的、飄浮的、耀眼的、清幽的……像繁星傾瀉到地面，似跳動的焰火濺落在人間。這華燈、綠水，這流雲、星星，天上人間，競相輝映。美麗的香江風韵，委實是令人迷而忘返。

“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倘若你興猶未盡，能下山再作一次海港賞夜的橫向掃描，那將又是一番不同的韵味。有人愛作這樣的對比，港島代表一種立體美，重重叠叠，星光輝映；九龍代表一種平面美，天空寥廓，橫無際涯，看海上，萬噸巨輪與渡船、遊艇那浮光搖曳的燈影，再瞧海港兩岸的萬千廣厦，或凌空飛渡、東西伸延的東區走廊，甚至尖沙咀東部海傍的憧憧人影與對對情侶……構成了一幅絕妙的海上賞景圖，這也許是詩人的吟唱與畫家的彩筆所難以再現的。

美哉，香港！

赤柱晨曦

赤柱在香港是小有名氣的，這倒不是因爲這裏有全港最大的監獄與英軍駐地，也不僅僅是大東電報局在此設立的衛星地面站爲香港增添了現代化的光彩，而是它本身具備了古樸的鄉村氣息、美麗的自然風光以至別具特色的赤柱大街，使這古老的海濱漁村聲名卓著，飲譽香江。

“赤柱”一名，本身就有許多美麗的傳說。有人說這一帶過去遍生木棉樹，那高大挺拔的樹幹與紅若噴火的花朵，猶如根根赤紅的擎天巨柱，故名。又有人說，每當晨曦初上之際，沐浴在陽光之下的赤柱半島，羣山披霞，光華萬丈，遙望山崖，恰似那巨大的赤色石柱，云云，故有“赤柱晨曦”（又作“赤柱朝陽”、“赤柱朝曦”）之說。

赤柱地處港島東南一隅，與黃泥涌、香港仔、筲箕灣等同爲島上最古老的聚居點之一。早年居民以從事農業、漁業爲主。有人曾考證稱，“赤柱”一名始於清代乾隆年間（1736—1795），其實此說不確。據歷史文獻記載，起碼在此之前的一百多年已見諸中國史籍，明朝萬曆年間（1573—1619）郭棐所編《粵大記》一書已有“赤柱”的記載，當年繪圖雖不甚精確，但其與大潭、黃泥涌成鼎立之勢，在地理方位上大致還是相符的。康熙年間（1704）清政府曾在此設立“赤柱汛”，派兵駐守；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舒懋官、王崇熙纂修的《新安縣志》（卷之四·

山水略）稱："赤柱山在縣南洋海中，延袤數十里，諸山環拱，爲外海藩籬，有兵防守。"也可見其歷史之悠久了。據說英軍佔領港島初期，曾擬建埠赤柱，但因該地"瘴氣"（瘧疾）盛行而放棄，轉而發展西北部的沿海地區（即後來的維多利亞城區）。開埠初年（1845）莊士頓氏（A.R.Johnston)就曾在倫敦地理雜誌上撰文介紹過當年的赤柱村，他寫道："赤柱村乃是島上最大最重要的一個村莊，有一大隊歐籍軍隊駐紮在這裏。這村莊的人口總計約八百人，其中男子五百，婦女一百，其餘都是兒童。這地方約有一百八十間房屋和商店……居民都從事商業、耕種和腌製鹹魚……"。看來規模還是不小的。

然而歷史的變遷確是令人驚嘆。赤柱這一昔日古老的漁村小港今天已經變成頗負盛名的旅遊、度假勝地。當你驅車來到赤柱大街的時候，再也難以尋找到當年的風貌，但見那不同膚色、不同口音的遊客擁擠街頭，鱗次櫛比的小商店充斥着各式貨物，從衣襪鞋帽到化妝品、小首飾，從工藝擺設到珠寶古董，林林總總，頗令人眼花繚亂。這裏雖然沒有尖沙咀與中環商業區的豪華氣派，却甚有獨特的鄉村風味與東方色彩。近年來，這裏有所謂"國際女人街"之稱，眞有點九龍"女人街"（通菜街）的味道。到此購物的除當地居民外，主要的還是慕名而來的外國遊客，他們光顧赤柱、香港仔的興趣，並不亞於港九的鬧市中心。購物之餘，尚可一睹海濱的旖旎風光與漁村的鄉間野趣，自是一樂。

赤柱一帶還是香港有名的海灣集中地，從東邊的大潭灣、東頭灣到西側的聖士提反灣、赤柱灣以至毗鄰的春坎

灣、南灣，其中尤以赤柱巴士總站附近的大潭灣與赤柱灣兩處海灘爲著。這裏雖不及淺水灣之擁有“天下第一灣”的盛譽，但沙白水清，灣闊坡緩，仍不失爲泳客的好去處。在大潭灣的右側海濱，還設有一間香港航海學校。遊人至此，大可享受一番碧波暢泳、日光浴及燒烤的樂趣。從赤柱巴士總站南行，分別爲聖士提反中學、赤柱監獄與英軍駐地，最南端則爲大東電報局的衛星地面站。

香港大東電報局赤柱衛星地面站是東南亞地區主要的衛星通訊中心之一。該站目前設有四座標準A的天綫，這些碟形天綫直徑達30米，透過印度洋、太平洋上空的地球同步衛星，爲國際電信（電話、專用電報、數據、傳眞及電視）提供服務。首座天綫“香港一號”於1969年9月落成啓用。從此，香港的電視廣播媒介開始進入收發衛星轉播的時代。二、三、四號天綫也於1971年至1983年間先後投入使用。地面站設有中央控制中心以及微波系統，直接與該局設於灣仔新水星大厦以及九龍國際電信大厦電信中心保持聯繫。因半島南端已屬禁區範圍，遊客需取得特別許可才能至此參觀訪問。

從赤柱乘車西行，依次可抵淺水灣、香港仔海洋公園，交通甚爲方便。匆匆的外地遊客如果清早出發，一日之間可以走馬觀花，瀏覽到這幾個旅遊點不同韵味的自然風光，晚上還可邀上三兩知己，在香港仔一嚐海鮮，又是別有一番情趣。

淺水丹花

“淺水丹花”指的是港島淺水灣一帶漫山遍野百花（尤以杜鵑花爲著）盛開時那紅艷欲滴、爭奇鬥妍的美麗景色。

杜鵑花(Rhododendron Simsii)亦稱“映山紅”，又名“山躑躅”，是一種半常綠或落葉灌木，爲世界著名的觀賞植物，在華南一帶甚爲普遍。清初知名學者屈大均（1630—1696)在《廣東新語》卷二十五《木語》中對此花有專門的記述：“杜鵑花以杜鵑啼時開故名。西樵岩谷間，有大紅粉紅黃者、千葉者，一望無際。羅浮多藍紫者、黃者。香山鳳凰山有五色者。是花故多變，而以殷紅爲正色。予詩：子鵑魂所變，朵朵似臙支；血點留雙瓣，啼痕漬萬枝”。香港的杜鵑花品種雖不多，但野生及人工栽種的數量也不少，前者以新界的青山、馬鞍山，離島的鳳凰山以及港島的淺水灣一帶爲多見，後者較著名的則可見諸動植物公園（俗稱兵頭花園）及港督府內。倘若你在二三月份到淺水灣一帶遊覽，便可見到沿海山坡鋪滿殷紅的杜鵑花，以及其他迎春怒放，叢叢簇簇的應時花草，煞是好看，這就是“香江八景”之一的所謂“淺水丹花”。

“淺水丹花”確是頗具詩意的命名。不過，在那春寒料峭的時節專程來到淺水灣畔賞花的遊客畢竟還不多見，人們大可就近在那中區的兵頭花園或選擇在港督府每年一

次的開放日去一飽眼福。淺水灣對於多數市民與遊客的吸引，並不僅僅在那郊野山林、醉人花香，更主要的還在於它擁有迷人的海灘。過去的“香江八景”中就有“海國浮沉”一景，正是指這淺水灣的海濱泳場，不過聽起來似乎就沒有這“淺水丹花”般富有詩意了。

淺水灣是港島南部一處海灣，位於赤柱與香港仔的中點，交通甚爲方便，從中環乘61號巴士可以直達，也可乘往赤柱的6號巴士，在中途下車，淺水灣有別於毗連的深水灣，這裏坡緩灘長，灣闊水淺，浪平沙細，冬暖夏涼（水溫大致介乎於攝氏十六度至二十七度間），是弄潮兒的最佳去處之一。但淺水灣的英文名Repulse Bay却很奇特。

“Repulse”是英國皇家海軍的一艘軍艦的名字，其字面有“攻擊”、“抗拒”之意，據說英國佔領香港初期，該艦常停泊於此，故名。深水灣則直譯爲Deep Water Bay,該處也是泳客的天地。

淺水灣在香港既有“天下第一灣”之美稱，也有“東方夏威夷”之盛譽，雖然這都是出於文人雅士的題詠，但這裏的陽光、沙灘、海水，確是足以令人意蕩神馳，躍躍欲試。這裏的各式設施頗爲周全，附近設有停車場、更衣室、沐浴間、燒烤爐以及商場、快餐店，還備有滑浪風帆等康樂設施，爲遊客提供各種方便。每當夏季來臨，泳客雲集，雪白的沙灘撐起了色彩斑爛的遮陽傘。一些身着各式泳裝的男男女女，還乾脆躺在沙灘上，盡情享受日光浴的恩賜。至於湛藍的海面，更是萬頭攢動，弄潮兒大可在此一試身手，接受大海的洗禮，然而對於匆匆過往的外地

遊客來說，大都無此閑情逸致了。不過，當你漫步沙灘，來到海灣的東頭盡處，一賞海濱公園的秀麗風光與獨特的環境設計，觀看一碧萬頃的海上世界與悠悠帆影，也不失爲賞心樂事。

海濱公園的所在地爲香港拯溺總會會所。跨進富於中國傳統民族風格的古色古香的“千歲門”，就可見一座紅牆綠瓦的宮殿式兩層建築，其雙側分別聳立着高達數丈的巨型塑像——天后聖母與觀音菩薩，人物造型栩栩如生，象徵着保護漁民、泳客海上四季平安。再步下台階，赫然可見瀕海一面有石鎸刻着“天下第一灣”五個大字，先不管它是否有誇大之嫌，但却已十分引人注目。再往前走過“長壽橋”，便是突入海中的小小碼頭，以供小型遊艇、板船泊岸之用。在碼頭與拱橋之間人工塡造的小塊平台上，樹有一盞“慈航普渡燈”，塑有長壽仙翁東方朔的畫像，其形態詼諧滑稽，頗具神韵。此外，尙有鯉魚、瑞羊等動物造型，雕刻也甚爲精美，故惹來衆多遊客至此駐足觀賞，拍照留念。據說一些外國電影、電視攝影隊也常光臨此處，其“知名度”還頗高呢。

淺水灣一帶目前還是香港著名的高尙住宅區，許多高級別墅就建在附近綠樹掩映、碧波環繞、幽雅淸靜的山坡之上，有些還單獨闢有人工草坪、私家泳池，甚具氣派。與淺水灣相鄰的還有一處在香港也頗有名氣的海灘，這就是上文所提及的深水灣。深水灣者，顧名思義，以其水深而得名也。但惟其水深而令不少初學者爲之却步，泳客也比之淺水灣少了。此外，在港島還有很多頗負盛名的海灣，如赤柱灣、大潭灣、大浪灣、石澳灣等等，均爲海浴勝地。

過去“香江八景”中的“淺灣海浴”、“淺灣游泳”、“淺灣水軟”與“石澳風濤”，指的就是大淺灣與石澳的浴場、風光，雖然對弄潮兒也頗具吸引力，但比之淺水灣畢竟是稍遜一籌。

虎塔朝暉

“香江新八景”中有“虎塔朝暉”一景，說的正是港島大坑道虎豹別墅的七層白塔沐浴在晨曦之中的壯麗景致。說到虎豹別墅，在香港可謂是無人不曉的。但對於初到貴境的外地遊客，也許就有人不甚明瞭，而知道別墅原主人家族身世者就更少了。

“虎豹”之虎者，胡文虎也；豹者，胡文豹也，均係鼎鼎有名的華僑商業鉅子。說到胡文虎，人們往往會聯想到那虎標“萬金油”，這幾乎都是家喻戶曉的了，甚至於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也收進了“萬金油”這一條目。這裏還有一個關於“萬金油”的故事，傳說胡文虎年輕時有一次挑擔外出賣藥，被車子撞倒，各式膏丹藥劑散落一地，慌忙中只得將殘藥混裝在一起，回家後急得頭暈目眩，周身不舒服，無意之中他順手將藥罐裏的混雜殘藥往額頭一抹，竟奇迹般的清涼有效，遂靈機一動，取名“萬金油”。不過，這自屬傳說而已，似不足信。胡文虎祖籍係福建省永定縣中川村人，1883年生於緬甸仰光。其父胡子欽，早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便漂洋過海，客居仰光，創辦永安堂藥舖，以賣藥爲生。他根據南洋一帶氣候炎熱的特點，以具有清熱解毒消暑功效的中成藥“玉樹神散”等治病而備受當地人士歡迎。子欽生有三子，名文龍、文虎、文豹。長子文龍早逝。虎豹昆仲繼承父業，廣

聘人才，精心研作，創製成功“萬金油”、頭痛粉、止痛散、八卦丹等膏丹丸散，成了居家旅行之必備良藥，飲譽東南亞一帶，胡氏家族也因此而發迹。二十年代，胡文虎在新加坡設立虎標永安堂總行。嗣後又在香港、福州、厦門、上海、廣州、汕頭、重慶、成都、昆明、漢口、天津等地設立分行，並在歐美等國設立特約經理處，生意日隆。胡文虎本人則出任“永安堂虎豹有限公司”總經理，成了國際知名的“萬金油大王”。

關於胡文虎其人其事，目前所見的評論，內容頗有不同。不過，胡文虎發迹之後，曾多次捐獻巨款以資助慈善、公益事業。三十年代，他曾表示過捐資三百五十萬元，在大陸興辦小學一千所。後來，陸續建成三百餘所，耗資一百五十萬元，至抗戰爆發後才告停止。他又曾捐資三十七萬五千元建立南京中央醫院；捐資四十萬元建立汕頭醫院與厦門中山醫院；捐資二十萬元建立福建省立醫院等等。1946年，他還曾邀集閩籍華僑巨商，擬共同集資開發福建，但此舉未獲成功。胡文虎對新加坡、泰國、緬甸等地的慈善、公益事業也頗多貢獻。此皆爲中外各界人士所稱道。

除了賣藥之外，胡文虎在其一生中還辦成了另一件有較大影響的事業，這就是星系報業的創辦。

胡文虎以“萬金油”辦報，報紙又促使“萬金油”名揚四海，大大提高了胡文虎的知名度，1929年，胡文虎在新加坡始創《星洲日報》。隨後，他接連創辦了汕頭的《星華日報》，厦門的《星光日報》，新加坡的《星中日報》，福州的《星閩日報》，檳榔嶼的《星檳日報》，曼谷的《星暹日報》、《星泰晚報》，香港的《星島日報》、《星島晚報》、

《星島晨報》以及英文《虎報》(*Hong Kong Standard*) 與新加坡的英文《虎報》(*Singapore Tiger Standard*) 等，形成了規模龐大的“星系”報業。胡文虎自任董事長，成爲名噪一時的報業大王。如此私人辦報，在中國新聞史上可謂是獨一無二的。其中有些報紙 (如《星島日報》) 至今在香港仍具一定的影響。胡文虎於1954年在美國檀香山逝世，時年七十一歲 (胡文豹在1944年去世於緬甸)。目前胡氏家族在香港最具影響的人物是胡仙，她女承父 (胡文虎) 業，成了香港星系報業機構的主持人，又是世界中文報業協會主席，勢大財雄，有香港“億萬富豪”之稱，成了香港地家喻戶曉的“女强人”。

虎豹別墅也稱胡文虎花園，又名“萬金油花園”，謂其以“萬金油”發家也，是爲胡氏家族的私家花園。其英文譯名也有兩種，或稱Tiger Balm Garden，或稱Haw Par Mansion。別墅依山而築，佔地甚廣，設計也獨樹一格。巍峨素雅的虎塔高達145呎，是港島僅有的高塔，格外引人注目，成爲虎豹別墅的標誌。據說過去曾有人在此跳塔自殺，故後來便關閉了。有登高雅興的遊客現在也就只能望塔興嘆了。至於園中景致，饒有趣味，既有紅牆綠瓦的亭台樓閣，碧波蕩漾的私家泳池，又有爭芳鬥艷的庭院花園，面目猙獰的泥塑雕像。花團錦簇的別墅中點綴有奇岩異洞與連環壁畫，鮮花盆景與妖魔鬼怪相雜，富麗堂皇之中令遊客有一種近乎迷離而又恐怖的感覺。然則唯其風格之迴異與設計之獨特，倒也吸引了衆多的遊客。它與龍華花園及半山的殘舊木屋區緊相毗鄰，“虎塔朝暉”與“木屋夕照”相映成趣，登臨此地，近觀遠眺，實在令人感慨

繫之。

說到香港的虎豹別墅，還有必要提及一下星洲（新加坡）的另一座虎豹別墅。這是繼香港的虎豹別墅之後，同爲虎豹昆仲建造的又一家私家花園，算來至今也有五十年的歷史了。香港的虎豹別墅雖然也一度有拆建大厦的傳說，但終於還是保留下來，而星洲的虎豹別墅，却於1985年爲新加坡政府從胡氏家族手中買了下來。據年前報道，新加坡的兩家公司與新加坡旅遊促進局共投資三千萬坡幣（約一千四百三十萬美元），擬將星洲虎豹別墅改建成綜合性的新型旅遊勝地。香港的這座虎豹別墅前景又將如何呢?胡氏家族的後人又將如何保存這座私家花園呢?這也許日後還會是一個有趣的話題。

快活蹄聲

快活谷的馬蹄聲牽動了數以百萬計港人之心。如此彈丸之地，自升斗小民，乃至億萬富翁，熱衷此道者眞是不計其數。賽馬，已經成了香港人進行合法賭博、尋求刺激的最流行的方式，也是香港人最喜愛的一項正當的娛樂活動。目前，可稱得上"馬迷"者至少在百萬以上，而每場賽事親臨馬場捧場者平均也約有四萬人，其狂熱程度遠遠超過了對任何體育、文藝等娛樂活動。即使是香港人最爲熱心的足球運動，一場精彩的比賽也只能吸引一二萬觀衆捧場而已。難怪前港督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 1971—1982）就曾經在港府的一次例會上重提這樣的一句流行的舊話: 實際統治香港的是馬會、怡和、匯豐和港督府，而且排名分先後。這並非全屬笑談。試想像，在香港除了"馬會"以外，誰還有如此號召力，令數以百萬計的市民如此爲之投入，如此似癡如醉呢?

其實香港之有賽馬，也並非本地的"土特產"，它是英軍佔領香港後才出現的新玩意。1842年8月29日，淸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了《南京條約》，香港正式爲英國所割佔。是年，香港借用澳門的黑沙灣馬場舉行第一屆賽馬。其後港澳關係曾一度不快，遂停賽數年，至1848年才開始在香港本島舉行賽馬（第四屆）。

香港最早舉行賽馬的地方，就是人們所熟悉的跑馬地，

它的英文名稱則爲快活谷（Happy Valley），這都是英國人佔領香港後才起的名字。當年英軍佔領港島時，就有不少人因"山嵐瘴氣"（現在稱之爲瘧疾），不治而死，漸漸地在這谷地的山邊形成了一片特殊的墳場，即所謂："快活谷"，含有"極樂世界"之意。又由於後來在這塊谷地上修建了跑馬場，故又有"跑馬地"之稱，其實它的所在地原名應爲黃泥涌。

黃泥涌是港島一條古老的村莊，該村建於何年，已不易考，但在明朝萬曆年間（1573—1619）郭棐所編《粵大記》一書所附廣東沿海圖中，就已有"黃泥涌"的記載，距今約有四百年，可見其歷史之悠久。因爲村旁有一條從山上流下來的小涌，涌水經常呈黃色，故名。據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王崇熙《新安縣志》所載，該村隸屬新安縣官富司管轄。今日的跑馬場，正是當年的農田。英國佔領港島之後，便着手物色賽馬場所，最後選中了黃泥涌這塊地方，於1844年動工，前後經歷四年才告成。快活谷的馬蹄聲，終於打破了這裏寧謐古樸的生活。

自從黃泥涌建成跑馬場之後，這一帶逐漸熱鬧起來。每逢賽事，駐港英軍、洋行大班、政府官員以至港督本人，也多爲之捧場。1857年，英國倫敦《泰晤士報》駐華特派通訊員科克（G.W.Cooke），就報道過這個他稱爲"商人們唯一的假日"的賽馬日的情景。他寫道："當我們第一次看見快活谷裏的賽馬場，我們幾乎忍不住地嚷着，這是整個世界裏最饒景致的地方。司令台、看台、馬厩、草場和一切的設備，加上那使人難以忘懷的午餐和香檳，一切的一切，都是第一流的"。當然，這只不過是當年記者

眼光之所及，倘若與今日之賽事相比，那實在是相去甚遠了。初時，馬場的跑道，只是沿着黃泥涌道圈築而成，跑道圈中心的地方還是農田，當時村民仍可在此耕種。而看台也只是用竹料、木板、葵葉臨時搭架而成，與今日堂皇的鋼筋混凝土結構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語，更不用說那瞬息萬變的巨型電子顯像牌等現代設施了。這就是早年快活谷的賽馬——"香江八景"之"快活蹄聲"一景的最初由來。

但是，有賽馬並非就有賭馬。1884年，香港開始成立了一個賽馬的永久性機構——"香港賽馬會"。自從有馬會以來的一百多年中，香港賽馬發生了十分重大的變化——

1890年，香港開始有賭馬;

1891年，香港政府頒佈第七號條例——《賭博條例》，賭馬合法化;

1918年，馬場發生看台大火，燒死六百餘人;

1927年，馬會首次吸收華人會員;

1931年，首次發行大馬票;

1941年至1945年（日佔時期），"香港賽馬會"易名"香港競馬會";

1947年，香港恢復賽馬;

1951年，馬場新建看台，首次安裝的電子計算機正式啓用;

1957年，馬場加建七層高的看台;

1959年，香港賽馬會（慈善）有限公司成立;

1960年，香港賽馬會加上"英皇御准"銜頭;

1970至1971年度，賭馬投注總額約港幣四億元;

1973年，開始賽夜馬;

1974年，設立場外電話投注;

1976年，馬會投資的海洋公園首期工程完成;

1978年，沙田馬場落成;

1985至1986年度，賭馬投注總額突破港幣二百億元大關;

1986年，香港破獲某“造馬”集團，成爲香港賽馬職業化十五年來最轟動的社會醜聞。

…………

自七十年代末有了沙田新馬場以來，快活蹄聲與沙田蹄聲緊相呼應，港島一馬獨霸的局面終於被打破了，香港的賽馬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投注額也直綫上升。目前，馬會儼然成了香港最大的“企業”之一。根據有人對1985至1986年度香港最大的五家企業（不包括匯豐銀行）的營業額的統計比較，馬會該年度的投注額即接近置地、中電、和黃三家營業額的總和，其排名次序如下：香港賽馬會（投注額爲二百一十二億六千四百萬港元）、太古洋行（營業額爲一百三十六億九千二百萬港元）、怡和洋行（營業額爲一百零四億九千七百萬港元）、香港置地公司（營業額爲一百零二億一千六百萬港元）、中華電力公司（營業額爲七十五億三千八百萬港元）、和記黃埔集團（營業額爲五十四億六千六百萬港元），可見馬會之勢大財雄了。1986至1987年度馬季，投注總額更達到創紀錄的二百四十三億六千九百萬港元，港府從中便可取得三十一億九千一百萬港元的稅收，約佔該年度港府財政收入（預

算）四百三十四億零九百萬港元的百分之七點四，成爲僅次於所得稅與關稅的第三大稅收來源。

目前，香港賭馬之風日盛，形式也從最初的馬術競賽發展成包括獨贏、位置、連贏、孖寶、三寶、三重彩、四重彩、六環彩等等投注活動。“英皇御准香港賽馬會”剛剛度過了它的一百周年（1884—1984）紀念，以其近年投注額上升之勢，想必還將有一番盛况。即便是“九七”之後，由於香港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將保持五十年不變，既然將來“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那末，這幸運的馬兒還會繼續跑下去的。

鯉門夜月

不論是皓月當空、碧海流金，還是月淡星疏、漁歌唱晚，都會撥動人們的無限情思。杭州的“平湖秋月”、“三潭印月”，羊城的“粵台秋月”、“鵝潭夜月”，都曾令人爲之傾倒。儘管人們未必都有李白“擧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與蘇軾“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的情趣，但那綠水碧波、清風明月，確是使人遊興倍增。“香江八景”雖未敢比之蘇杭名勝，但秋夜賞月、海港風情，却自是別有一番樂趣。在歷次的“香江八景”中，“鯉門夜月”與香港仔的“小港夜月”，也同樣是令人難以忘懷的。

就先說說這“鯉門夜月”吧。

鯉魚門位於東九龍的最南端，是九龍與港島間的最近點，成爲維多利亞海港東部入口的唯一通道，具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爲歷代兵家之所重。當年林則徐（1785—1850）就很看重這一帶的地位，稱“就粵省海道而論，則凡東越惠潮，北往閩浙之船，均不能不由該處經過。萬一中途梗阻，則爲患匪輕。”目前鯉魚門也是市民品嚐海鮮的一大去處。

關於“鯉魚門”之得名，還有過一段頗有趣味的傳聞。

鯉魚門是否因其地狀似鯉魚而得名，我不得而知。但四十年代初的時候，曾經有位洋作曲家狄桑夫人，路經香港時寫過一首關於“鯉魚門”的歌，倒頗爲有趣。她講了

一個“鯉魚跳龍門”的故事，並認爲這裏因盛產鯉魚而得名，而鯉魚是中國人年宴中的必備佳餚，“鯉”之諧音爲:“利”，“鯉魚”有吉祥幸運之意，因而“鯉魚門”就是“大利之門”了，云云。不過，這位洋夫人大概是不懂得，鯉魚（學名Cyprinus carpio）只是一種淡水魚，鯉魚門的海鮮酒家中儘管有鯉魚可大飽口福，但“鯉魚門”是不可能出產鯉魚的。

實際上，鯉魚門一地與“鯉魚跳龍門”的故事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早在北宋年間，李昉等人所編的《太平廣記》中即有所記載。據該書卷四六六“龍門”條中所引《三秦記》：“龍門山，在河東界，禹鑿山斷門闊一里餘。黃河自中流下，兩岸不通車馬……每歲季春，有黃鯉魚，自海及諸川，爭來赴之。一歲中，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二。初登龍門，即有雲雨隨之，天火自後燒其尾，乃化爲龍矣。”後來民間傳說謂爲“鯉魚跳龍門”。李白有詩云:“黃河三尺鯉，本在孟津居，點額不成龍，歸來伴凡魚。”（《贈崔侍御》）黃河倒是盛產鯉魚的，只是狄桑夫人的“鯉魚跳龍門”故事，對於香港來說，顯然就有點牽强附會了。

不過，鯉魚門還是有數處古迹可供觀賞的，較有名的是一座與海盜有關的天后廟。據說清初鄭成功將領鄭建之餘裔鄭連福、鄭連昌兄弟兩人所率的兩股海盜，曾活躍在香港附近洋面，前者佔據大嶼山，後者佔據鯉魚門一帶，此鯉魚門天后廟即爲鄭連昌所建。廟中原有碑石一方，碑文謂“天后宮，鄭連昌立廟，日後子孫管業，乾隆十八年（1753）春立”。天后廟附近巨石嵯峨，石刻甚多，“海天攬秀”、“奇石鍾靈”、“香海襟喉”、“海角潮音”等題咏，

均値得一看。這裏沒有鬧市的喧囂與過多的霓虹彩幻，在那月色溶溶的時刻，邀上三兩知己或綠水泛舟，或品嚐海鮮，把酒臨風，賞月聽濤，波光粼粼，海空邈邈，怡然自得之感油然而生，這就是“香江八景”中那“鯉門夜月”的迷人境界。只是大多數忙碌的香港人與匆匆的過境遊客，都難得有如此閑情逸致了。

鯉魚門作爲一個傳統的旅遊區，無疑是甚具魅力的，但是旅遊觀光，志趣各異，有些人對香港仔也許就更加趣意盎然，尤其是那些越洋而來的異邦客人，更可在此領略到富於東方情調的漁村秀色，被譽爲香港最著名的旅遊區之一。

香港仔是島上歷史最爲悠久的漁村之一，在英國人到來之前，它與赤柱、黃泥涌、筲箕灣等，同爲港島居民的主要聚居點。但是令人費解的是，香港仔的英文譯名並不是Hong Kong Tsai，而是有點古怪的Aberdeen（鴨巴甸），據說是爲紀念英國佔領香港初期的外交大臣Aberdeen（也譯阿伯丁）而定名的。在英國的蘇格蘭，也有一個叫Aberdeen的城市，那是一處重要的漁港與修船中心。香港仔雖未有此類“中心”的雅號，但早在明代，就已經是香港地區的一個轉運港口了，儘管當年的規模還是很小的。

香港仔地處島南的黃竹坑與華富村間，與鴨脷洲隔海相望（現已有鴨脷洲大橋相連），交通遠比鯉魚門來得方便，是目前香港最大的漁業基地之一。這裏原來的居民大多從事捕撈或魚類加工等行業，每當漁汛時節，香港仔一帶海面那千帆競發、漁歌互答的情景，頗能觸發文人墨客

的詩與靈感，博得了“鴨洲帆影”的雅稱（也曾是“香江八景”之一），不少久居“石屎森林”、飽受都市喧囂困擾的人士，也樂於忙裏偷閑，於工餘假日，或携眷，或偕侶，到此尋求片刻的安逸、逍遙。只是由於近年的塡海開發，棟棟高樓拔地而起，擾亂了這裏幽靜古樸的清夢，遊人再也難覓舊時的風采了。

然而，近年香港仔之聲名大噪，大概還不僅僅在其鄉村漁港的迷人情調，那美侖美奐的海鮮舫，似乎更具撩人的魅力。停泊在灣內的珍寶、太白、海角皇宮，裝飾得金碧輝煌，極盡豪華，不愧有海上宮殿之稱。尤其是那耗資三千二百萬元建造的珍寶海鮮舫，古色古香而又富麗堂皇，使遊客在大飽眼福之餘，還可一嚐這裏精美的中式海鮮，大快朵頤，令人回味無窮。倘若夜間光臨此地，面對那五彩繽紛的霓虹彩幻與迷離奇異的滃濛霧氣，更有一種海市蜃樓的寫意快感，賦予了早年“香江八景”中“小港夜月”的現代色彩。倘若你有幸趕上這裏的傳統節日慶典，一睹端午佳節的龍舟競渡或天后神誕的飄色巡遊，那就更是賞心悅目、令人樂而忘返了。

殘堞斜陽

過去“香江八景”中有“殘堞斜陽”一景，指的正是獅子山下九龍城寨的斷垣殘堞，如血斜陽，它給人以一種蒼涼悲壯的感覺，引人情思，回首往事——

城廓依然在，興亡未可論，
孤帆入滄海，殘笛出前村；
暮色撩鄉思，天風撼廟門，
悽惶登此地，誰不念中原。

這是半個多世紀前一位學人所作的《九龍城晚眺》詩句，表達了作者對失地的痛惜與思鄉的情懷。現在，九龍城寨的城牆早已蕩然無存，無城可言了。然而，這九龍城寨的歷史，却是頗爲悠久的。

據歷史記載，清初九龍尚無城牆之設置，現存兩個版本之《新安縣志》均無記錄。查康熙二十七年（1688）靳文謨、鄧文蔚纂修《新安縣志》卷八《兵刑志》，康熙七年（1668）置九龍墩台一座，安兵三十名；康熙二十一年（1682）奉命裁兵，九龍墩台改爲九隆汛，安兵十名。至嘉慶二十四年（1819）舒懋官、王崇熙修《新安縣志》，該志卷十一《經政四》之《兵制》稱，嘉慶十五年（1810）設九龍汛、九龍炮台。另據道光二年（1822）阮元《廣東通志》，“九龍寨炮台，嘉慶十五年，提督臣錢夢虎議將縣屬佛堂門炮台移建於九龍寨，總督臣百齡行令新安縣勸捐建築。”至此，“九龍寨”仍無“寨城”之稱。

實際上，根據有關史料，正式的城寨係始建於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該城依山而築，歷五年而成。原四周築有城牆，寬二百四十碼，長一百三十碼，城牆高約二丈，東南西北各有一門，南門爲正門，面海而立，城門上塑有"九龍寨城"四個大字。城門前有一座石橋，是爲龍津橋，係九龍城寨出海之主要通道。龍津石橋於同治十二年（1873）動工興建，歷時兩年。該橋原長六十丈，寬六尺，一直伸至海邊。至光緒十八年（1892），因泥沙淤積，海岸後退，故又續建木橋，長二十四丈，橋之盡頭處作丁字形，寬一丈二尺。原橋頭建有龍津亭，亭內嵌有建橋碑記兩方。橋頭面海處爲"九龍炮台"，置有大炮四門。太平洋戰爭期間，日軍拆毀城牆，把牆磚作爲擴建啓德機場之用，後又歷經破壞，城牆已毀，遺址難尋了。原城內有一座龍津義學，與九龍城寨同時建成，係港九地區早年著名學塾之一。據載，該校門上石額"龍津義學"四字便是出於當年新安縣知事王銘鼎的手筆。門的兩旁鐫有對聯："其猶龍乎，卜他年鯉化蛟騰，盡洗蠻烟蛋雨；是知津也，願從此源尋流溯，平分蘇海韓潮。"壁上還嵌有王銘鼎所寫《九龍司新建龍津義學叙》碑記。碑文云："道光二十三年，夷務靖後，大吏據情入告，改官富爲九龍分司。近量宜於遠，築城建署，聚居民以實之。雖備內，不專爲禦外。而此中稟承廟謨，計安海宇，誠大有濟時之識於其間，而非苟爲勞民而傷財也……。"鴉片戰爭爆發後，九龍的軍事地位日顯重要，因而增築九龍城寨牆。以上碑文所指的就是當年築城的環境。世事滄桑，這些都已成了歷史的陳迹。

九龍城寨除了上面所提及的城牆建築以及龍津石橋、龍津義學等外，尚有九龍司衙門、惜字亭及天后廟等古迹。九龍司衙門位於今城寨內之龍津二巷四號，現爲中華傳道會之恩光園，內設恩光幼稚園、城砦中心及城砦老人服務中心等機構，衙門內壁上嵌有光緒十二年（1886）八月十五日所勒《刊刻會議》碑記，詳列有關衙門兵弁出差配餉開支事項，也是一則研究香港歷史的重要史料。惜字亭則係咸豐九年（1859）署大鵬協副將張玉堂捐廉所建。據說張氏生平愛惜字紙，僱人沿街檢拾字紙而焚於亭中，並自撰《敬惜字紙銘》，可惜該亭早已被毀，但城中的天后古廟則於今尚存。

光緒二十四年（1898），英國强逼淸政府簽訂了《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爲期九十九年。《專條》對九龍城寨問題作了專門的規定:

> 所有現在九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其餘新租之地，專歸英國管轄。至九龍向通新安陸路，中國官民照常行走。又議定，仍留附近九龍城原舊碼頭一區，以便中國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來停泊，且便城內官民任便行走。……

就是說，保留九龍城內的中國文武官員，九龍城仍歸中國管轄。保留靠近九龍城的碼頭一區，准中國官、兵、商、民使用，等等。當時九龍城寨內共有居民六十四戶，約四百六十多人，多數從事泥水、小販和務農等業。

九龍城寨並非租借地，這在《專條》的規定中是十分淸楚的。但是，就在英國宣佈“接管”新界的第三天，即1899年4月18日，英方便進一步要求撤走九龍城寨的中國官兵，撤銷中國對城寨的管轄權。5月9日，英國外交部又

進了一步，建議授權香港佔領城寨。5月14日，英國外交大臣張伯倫正式下令佔領九龍城寨。兩天後（5月16日），英軍强行實行武裝佔領，驅逐了中國政府派駐城寨的官員和駐軍。中國政府對此表示强烈的抗議。同年12月27日，英國發佈了《樞密院關於九龍城寨之訓令》，藉口中國官員在九龍城內各司其事，已被發現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單方面宣佈九龍城寨已成爲"女皇陛下香港殖民地的一部份。"當時清政府即嚴正聲明，九龍城寨是中國的領土，管轄權仍屬於中國。其後，英方爲了表示不平等條約"有效"，沒有派兵在此駐紮。但隨後又多次（如1933年、1948年、1962年等）發生逼遷城寨居民的事件，只是因遭到中國人民的强烈反對而終歸於失敗。

然而，歷史畢竟是走過了一百四十多年的歷程。1984年12月，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正式簽字，中英之間的這個歷史遺留問題終於得到了圓滿的解決，這就爲解決九龍城寨問題提供了良好的基礎。1987年1月14日，香港政府宣佈在三年內淸拆九龍城寨，並將之改建爲公園。同日，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發表談話，對此表示充分的理解。新華社香港分社發言人也爲此對新聞界提出的問題作了答覆，指出上述決定不僅符合城寨居民的切身利益，而且也有利於整個香港的穩定繁榮。日後，倘若你舊地重遊，將會在這獅子山下領略到那花木掩映的園林美景，惟昔日"殘堞斜陽"的歷史古迹就再也難以覓尋了。

宋臺懷古

在九龍啓德機場附近，有一處侷促於馬頭涌道與世運道之間的小花園，這就是頗負盛名的宋皇臺公園。在香港衆多的名勝古迹之中，除了九龍深水埗的李鄭屋漢墓、屯門的青山禪寺及佛堂門的天后古廟等外，較有名氣的就非此莫屬了。儘管於今這“宋皇臺”只是偏安於九龍之一隅，其貌不揚，但在中國古代史上却是有其值得記載的一頁。

宋皇臺公園得名於園中所置石刻“宋王臺”三字。“王”字應爲“皇”之所誤，大概係源於元修宋史之謬。香港能够與這“大宋”聯繫在一起，實在是懷舊人士的一大幸事，雖然宋朝的歷史在此導演了蒼涼的最後一幕，但是歷代的騷人墨客却留下了多少慷慨悲歌——

一鞭殘照上烟蘿，驢背詩人自嘯歌，
黃葉疏林秋色好，海天還屬宋山河。
…………

離離禾黍故宮秋，羞見降幡出石頭，
終古難消亡國恨，怒濤嗚咽向東流。

詩人的吟唱喚起了人們對歷史的懷憶，叠現着七百多年前的宋代山河……

據史籍記載，南宋末年，元兵入建康（今南京），陷臨安（今杭州），恭帝被挾北去，陳宜中、陸秀夫、張世傑、楊亮節等護益王昰、衛王昺南逃，於福州擁益王爲帝，

改元景炎（1276）是爲端宗，亦稱帝昰，時年九歲；册母楊淑妃爲皇太后（即楊太后），垂簾聽政，並以陳宜中爲左丞相，文天祥爲右丞相，張世傑爲樞密副使，陸秀夫爲簽書樞密院事。因元兵追逼，帝昰經海路先後亡命於泉州、潮州、惠州。次年春入廣州，後輾轉經梅蔚（一説即爲今大嶼山之梅窩）至九龍官富場（相當於今九龍塘至九龍城以南一帶，包括馬頭涌、土瓜灣等地）設行宮，即所稱"宋皇臺"。後又曾西移淺灣（今新界荃灣），復又轉秀山（今虎門）等地。至景炎三年（1278）四月，帝昰崩於碙州（一説爲今大嶼山），葬永福陵（對此陵地一直史有爭議，有人考證稱今深圳市蛇口赤灣宋少帝陵應爲昰之陵墓，而非帝昺。孰是孰非，仍有待考證。）隨後衛王昺繼位，改元祥興。次年（1279）二月，元兵進襲新會厓山，傳説陸秀夫負幼帝昺蹈海殉國（今赤灣宋少帝陵有今人爲之雕刻的塑像），南宋至此結束。其間宋末兩帝駐蹕香港地區約十個月，後人因此築臺以爲紀念。而名臣文天祥於五坡嶺（今廣東海豐縣北）被俘挾往厓山途中，也曾途經九龍官富場，以及香港地區海域附近之零丁洋，並寫下了《過零丁洋》這一感人詩篇："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飄搖雨打萍；惶恐灘頭説惶恐，零丁洋裏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然而，香港歷史上的這段插曲，經過七百多年的漫長歲月，已經被賦予種種撲朔迷離的傳聞，遂有宋皇臺、侯王廟、二王殿村、金夫人墓、梳妝石、落馬洲以至宋少帝陵等等歷史的古迹與神奇的傳説，至今仍爲人所津津樂道。至於宋皇臺始建於何年，現已難於稽考，但據現存石刻所

見“清嘉慶丁卯重修”字樣，則迄今也有一百八十餘年之歷史了。嘉慶版《新安縣志》卷十八《勝蹟略》中即有“宋皇臺”石刻之記載，但甚爲簡略:“宋皇臺在官富之東，有盤石方平數丈，昔帝舄駐蹕於此。臺側巨石，舊有宋皇臺三字。”不過，原有之宋皇臺並非位於今日公園所在地方。據史家考證，應在九龍城馬頭涌道的一處山崗（英文名稱爲聖山Sacred Hill），距九龍城寨以南約數百米，過去該處附近尚有三條與此古迹有關而命名的街道，即宋街、帝街、舄街。1915年，香港大學賴際熙（煥文）太史籲請政府當局予以保護，由紳商李瑞琴出資贊助，構築石垣，重樹牌坊，並刻有“一聲望帝啼荒殿，百戰河山見落暉”的聯句。日佔時期因擴建啓德機場，宋皇臺爲日軍所毀。戰後始在原址附近擇地闢“宋皇臺公園”，將幸存刻有“宋王臺”三字碑石，經修整後移置園內，供後人憑弔。

宋皇臺公園在香港的衆多“袖珍”公園中，堪稱袖珍中之袖珍，小得有點近乎可憐。除了小小的牌坊與噴泉外，就只有那孤零零的《九龍宋皇臺遺址碑記》（注:該碑刻係由簡又文教授撰文、香港趙族宗親總會贊助，由香港政府於1959年立石的。爲便於讀者參考，謹將碑文附錄於後）與早已斑駁殘舊的“宋王臺”石刻可供懷舊人士發思古之幽情了。不過，慰情聊勝於無，作爲一處“古迹”的保存，却還是不失爲有價值之善舉。舊時的文人墨客，還將此“宋臺懷古”列入“香江八景”。只是今日之香港尺土寸金，“皇上”也屬“徙置”對象，只能偏安於這海角一隅了。倘若“皇上”九泉之下有知，也不知將有何感?

說到宋皇臺，當然還少不了要提到“宋少帝陵”的。

據趙氏族譜記載，謂宋少帝昺蹈海厓門之後，“遺骸漂流至赤灣，有羣鳥飛遮其上。山下古寺老僧，偶往海邊巡視，忽見海中有遺骸漂蕩，上有羣鳥遮居，心竊異之，設法拯上，面色如生，服式不似常人，知是帝骸，乃禮葬於本山麓之陽。”云云。文中所指陵地，即位於今深圳市蛇口工業區赤灣天后廟舊址西南約一公里處。但有的史家對此頗有異議，認爲帝昺是否厓門蹈海身亡，已是一大疑案，更何況新會之厓門與深圳之赤灣地處珠江出海口兩側，海路相距當遠在一百公里以上，那有如此長距離逆水“漂流”之理，更何來之“面色如生”？史實如何，姑且勿論。不過，此陵背倚南山，面對伶仃，倒是頗具氣派，有些“地理”家還謂之爲風水寶地。“風水”之說，自屬題外話，然則作爲旅遊勝地，倒是頗爲引人注目的。1984年，深圳蛇口工業區旅遊公司與香港趙氏宗親會共捐資四十餘萬港元，進行全面修繕擴建，並列爲深圳市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商承祚、著名書法家秦咢生均在此留有墨迹。我日前偕友人同遊至此，懷古撫今，憑弔帝陵，遠眺伶仃，但見水天一色，碧波萬頃，赤灣新城，一覽無遺，深感此乃郊遊遠足的一好去處。香港、赤灣實乃一箭之遙，有懷古雅興之讀者諸君，不妨於工餘假日結伴赤灣一遊，自是一樂也。

附：九龍宋皇臺遺址碑記

宋皇臺遺址在九龍灣西岸，原有小阜名聖山者。巨石巍峩，矗峙其上，西面橫列元刻宋王臺牓，書旁綴淸嘉慶丁卯重修七字。一九一五年，香港大學教授賴際熙，籲請

政府劃地數畝，永作斯臺遺址。港紳李瑞琴贊勷其事，捐建石垣繚焉。迨日軍陷港，擴築飛機場，爆石裂而爲三。中一石摩崖諸字完整如故。香港光復後，有司仍本保存古蹟之旨，在機場之西南距原址可三百尺，闢地建公園。削其石爲長方形，移實園內，藉作標識，亦從衆意也。考臺址明清屬廣州府新安縣，宋時則屬廣州郡東莞縣，稱官富場。端宗正位福州，以元兵追迫，遂入海。由是而泉州而潮州而惠州之甲子門，以景炎二年春入廣州。治二月，舟次於梅蔚。四月進駐場地。嘗建行宮於此，世稱宋皇臺。或謂端宗每每憩於石下洞中，故名，非所知矣。其年六月，移蹕古塔。九月如淺灣，即今之荃灣也。十一月元兵來襲，乃復乘舟遷秀山。計駐於九龍者，凡十閱月焉。有宋一代，邊患迭興，西夏而外，抗遼、抗金、抗元，無寧歲。洎夫末葉，顚沛蒙塵，蹔止於海澨一隅，圖匡復興。後此垕山，君臣所踐履者，同爲九州南盡之一寸宋土，供後人憑弔而已。石刻宜稱皇，其作王，寔沿元修宋史之謬。於本紀附二王，致誤今名。是園曰宋皇臺公園。園前大道曰宋皇臺道。皆作皇，正名也。方端宗之流離播越也，宗室隨而南者甚衆。後乃散居各邑。趙氏譜諜，彰彰可稽。抑又聞之聖山之西南有二王殿村，以端宗偕弟衛王昺同次其地得名。其此有金夫人墓，相傳爲楊太后女，晋國公主，先溺於水，至是鑄金身以葬者。西北之侯王廟，則東莞陳伯陶碑文疑爲楊太后弟亮節道死葬此，土人立廟以祀昭忠也。至白鶴山之遊仙巖畔，有交椅石，據故老傳聞，端宗嘗設行朝以此爲御座云。是皆有關斯臺史蹟，因並及之，以備考證。一九五七年歲次丁酉冬月，新會簡又文撰。文台山趙超書

丹。而選材監刻，力助建碑，復刊行專集，以長留紀念者，則香港趙族宗親總會也。

一九五九年香港政府立石

侯王古廟

香港與宋帝南遷有關之歷史古迹，實際上遠不止上文所介紹之宋皇臺公園，只是傳聞中的有些地方於史無證或爭論不定；有的則交通不便，遊人不便前往。也有的因市政建設與歷史的變遷，早已面目全非，諸如梳妝石、二王殿村、金夫人墓等等便是。然而於今仍遍佈港九各處的侯王古廟，却是多數港人所耳熟能詳的，包括九龍城之侯王古廟、沙田大圍侯王廟、屏山坑頭村楊侯古廟與宜嶺楊侯王廟，大嶼山東涌侯王廟及大澳楊侯古廟等等，其中尤以九龍城侯王古廟爲著，其當年香火之盛，曾居諸廟之首，在香江頗具聲譽。

九龍城侯王廟位於九龍城寨西北方，即今聯合道與東頭村道之交界處，距宋皇臺公園約一公里，交通甚爲方便。該廟北倚獅子山，南眺九龍灣，居高臨下，頗爲可觀。雖年代已屬久遠，然而經多次修葺，於今仍保存得相當完整。廟宇臨街一面護牆高築，壁上“侯王古廟”四字古樸凝重，赫然可見。廟後山坡樹木葱翠，幽雅靜謐，廟側原有兩塊甚爲出名的石刻，一爲“鵝”字石，係一筆寫成，並刻有光緒十三年（1887）東莞黎慶堂所寫“古石書鵝摹逸少，名山駕鶴仰侯王”聯句，歷來爲遊人所讚賞，可惜後來已被毀。另有“鶴”字石，於今猶存，兩旁刻有對聯一副：“道古仙岩歸鶴嶺，侯王顯赫鎮龍疆。”沿護牆之側石階

拾級而上，即爲堂前小亭，琉璃瓦面，四面飛檐。亭前石獅拱衛，肅穆莊重。亭中奉置香爐，香烟繚繞。兩旁擺設盆景多處，香花秀竹，清幽淡雅。樑上懸有光緒六年（1880）廣東大鵬副將賴鎮邊敬獻“至誠前知”牌匾。正殿係青磚砌成，門上塑有“侯王古廟”四字，門側對聯云:“車水馬龍遊勝地，善男信女禮侯王”。廟中奉祀侯王塑像，內壁嵌有香港華人廟宇委員會1966年所泐《九龍城侯王廟廟誌》銅匾一塊，介紹該廟之由來。廟誌稱，“雍正八年（1730年），九龍城居民建廟奉祀侯王楊亮節……楊奉南宋二王走官富（九龍），其忠勇事迹，名垂青史”。該廟於今仍吸引不少香客，每逢農曆六月十六日侯王誕，香火尤盛。

九龍城侯王廟自雍正年間以來，已經有過多次重修。根據該廟遺存下來的碑刻資料所見，清道光二年（1822）曾有過一次較大規模的修葺，羅世常在其所撰《重修楊侯王宮碑記》中稱:“余客九龍之五年，道光二年也。適楊侯王廟榱桷朽腐，衆議重修，杯卜首事八人，隨發緣部簽題，莫不切於來之忱，欣欣樂助，不越月而廟貌煥然”。後於咸豐九年（1859）據說也曾重修，但現存碑刻資料不全。至光緒五年（1879）又作一次修葺，“蓋以鶴嶺秀鍾，龍津顯護，地靈人傑，華采壯觀。緬我侯王宮之落成也，奂輪媲美焉，棟宇維新焉，踵事增華，而聲赫濯焉。茲因鳩工告竣，鳥革暈飛，仰香火之輝煌，而丹流畫棟；燦雲霄之綺麗，而紫映彤庭……。”（見光緒五年立石《重修楊侯王古廟碑記》）從該碑刻所題捐資尚殘存可查之芳名（包括店號、人名）約有四百之多，集資數目頗大，可以

想像重修規模當不致太小。然而這位“名垂青史”的楊亮節究竟爲何方神聖而備受港九香客這般崇敬? 也是值得在此追記一筆的。

楊亮節，即上文（請參見《宋臺懷古》）所提及南宋末年之國舅大人，其姐楊淑妃爲端宗昰之生母。德祐二年（1276），恭帝爲元兵挾持北去，楊亮節等奉二王走婺州（今浙江金華）、下溫州，於是年五月，昰即帝位於福州，立楊淑妃爲太妃，楊亮節居中秉權，勞苦功高。後來，亮節在南遷轉戰途中卒於九龍官富場，當地人士因此立廟以爲紀念。據清末民初學人陳伯陶考證，“宋世外戚多封王，亮節脫二王於險，又輔政，則生封侯，歿封王，亦恩禮所必至。海濱樸魯，故不能舉其名及封郡耳。不然，如珪與亮節俱提舉，亮節尤用事。十四年十一月，劉深追宋主至七洲洋，執如珪，史有其文。如亮不死，後必爲元俘，史當特紀之矣。況從二王海上，史別無楊姓者，焉有晋侯而王，烜恭如是，而史闕文者乎? 余故曰: 此殆亮節也。”陳氏還認爲，“亮節之忠，爲宋外戚所罕有，雖走死，而其英魂毅魄，血食茲土，到今不衰，有以也。”（請參見篇末附錄《侯王古廟聖史碑記》）以陳氏之所見，此廟所奉之侯王當爲楊亮節無疑。

關於楊亮節之死，史學界至今尚無定論，而據大嶼山大澳楊侯古廟所存《南宋侯王楊公亮節事略》稱，楊亮節護帝昰至九龍官富場，因心力交瘁，積勞成疾，竟致一病不起，吐血身亡。後當地鄉民不忍侯王遺體遭元兵凌辱，遂葬於當地山野之中，直至元朝滅亡之後，地方官吏才上奏朝廷，爲侯王立廟紀念。香港大學羅香林教授對此頗有

異議，謂“楊侯王廟所祀者問題，暫亦只能存疑而已”。（參見羅香林等著《1842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但也有認爲此廟並非爲紀念楊亮節而建者。據九龍當地有的故老相傳，稱當年帝昰南遷至官富場，年幼夜聞獸聲，懼而成疾，幸得有自稱家住附近何家村之楊二伯公者爲之醫治而癒。但後使人查訪，始知此人早已死去多年，僅有楊二伯公墓而已，當地人士以爲神靈顯聖，遂建“楊侯王廟”，以爲紀念云云。

這一“侯王之爭”，史學界至今並無一致見解。不過，對於多數信徒來說，他們大都是不去深究這種文字官司的，楊亮節也好，楊二伯公也好，這些傳說都寄託有人們對護君衛國、濟世救民者之崇敬。也許奉祀的對象不盡相同，但香客們的心願却是一致的：祈求神靈保祐他們財丁興旺、四季平安。這大概也是港九兩地侯王古廟林立之緣由所在。

附：侯王古廟聖史碑記

東莞陳伯陶撰並書

九龍砦西北有侯王廟，甚靈異。相傳神楊姓，佚其名；南宋末忠臣。始封侯，晋封王，故稱曰侯王。余曰：此殆楊亮節也。史稱：楊淑妃生益王昰、俞修容生衛王昺。德祐二年，以淑妃弟亮節、修容弟如珪，提舉二王府事。元兵入臨安，奉二王走婺州。范文虎趣婺；亮節等負二王徒步匿山中七日。張全追及；遂走溫州。至元十二年五月，昰即帝位福州；立楊淑妃爲太妃。亮節居中秉權。秀王與檡，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正，遂犯妃嫉。諸將俱憚之。

當時勞苦功高，爲朝廷具瞻如是。自是而後，亮節遂不見於史攷。是年十一月，元兵破建寧；宋主遁入海。十二月，次惠州甲子門。十三年二月，次廣之藍蔚。四月，次官富場。九龍、古官富場地。疑亮節道病卒。葬於斯土。土人哀之，立廟以祀；史實失載也。宋世外戚多封王；亮節脫二王於險，又輔政，則生封侯、歿封王，亦恩禮所必至。海濱樸魯，故不能舉其名及封郡耳。不然，如珪與亮節俱提舉，亮節尤用事；十四年十一月，劉深追宋主至七洲洋，執如珪，史有其文；如亮不死，後必爲元俘，史當特紀之矣。況從二王海上，史別無楊姓者。焉有晋侯而王，烜恭如是，而史闕文者乎。余故曰：此殆亮節也。嗚呼。南宋之亡，諸臣崎嶇海上，有死無貳，皆知不可爲而爲之者也。史稱：朝臣言，秀王有劉更生之忠，曹王皐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乃遣之出兵浙東，被貶而死。因加亮節以忌嫉之名。然福州一隅，不圖進取，何以立國？景炎冲幼，不克親征。非秀王親賢，孰總師干，以係民望？奈何以此爲亮節罪乎。余謂亮節之忠，爲宋外戚所罕有。雖走死，而其英魂毅魄，血食茲土，到今不衰，有以也。因詳考諸書，爲之碑，以告土人。且復爲迎神、送神之曲以侑之。曰：

朝潮兮富場，神之來兮被冕裳。前朱鳥兮後白鷴，背負黃龍兮相戲而蜿蜒。鳴金鐃兮伐銅鼓，小海唱兮公莫舞。蕉荔兮堆盤，神飮食兮酣懽。驅颶母兮搏厲鬼，福我民兮壽無有害。（右迎神）

夕汐兮淺灣，神之去兮朱旗殷。目煌煌兮氣英英，火輪小兒兮銜風以俱行。沈香炷兮烟縷黑。巨礟喧兮浪花白。海鰌海鰌兮峨峨，神具醉兮委佗。射旄頭兮乘箕尾，食茲

土兮享于世。（右送神）

按一統志稱: 宋行宮三十餘所，可考者四。其一爲官富場。新安縣志則云: 土人因其址建上帝廟。今宋王台之東南，有村名二王殿。旁有上帝廟。廟後石址猶存，即其地也。縣志又稱: 楊太妃女晋國公主溺死，鑄金身以葬，名金夫人墓。旁爲耿迎祿墓。詢之土人，則云: 在宋王台西，墓舊有碑。近因牧師築堂其上，遺跡遂堙云。耿迎祿墓，縣志不詳爲何許人。疑亦隨宋二王南奔死葬於是者。因并記之，俾後之覽者有所考焉。　　伯陶又識

民國六年歲次丁巳六月吉日立

杯渡仙蹤

在香港的三大古剎（屯門青山禪院、元朗靈渡寺、錦田凌雲寺）中，青山禪院最爲引人注目。這不僅是以其廣闊的山林與清幽的環境而爲衆多的香客與遊人所嚮往，更以其悠久的歷史與杯渡禪師的神奇傳說而名播香江——

聞說禪蹤此舊遊，一杯飛渡渺滄洲。
山前卓錫泉猶在，岩上懸枝鐘尚留。
石柱高標千古勝，蘭花靜挹四時幽。
登臨欲覓燒丹訣，翹首層巒紫氣浮。

鄭文炳的這首《杯渡山》題詠，（見嘉慶版《新安縣志》卷二十四）道出了禪師的傳說與青山之幽雅。杯渡山因南北朝時劉宋（420—479）之杯渡禪師曾住錫於此而得名。史籍稱“杯渡禪師，不知姓名，嘗乘木杯渡水，因而爲號。遊止靡定，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人莫測其由……（元嘉）五年（428）三月，杯渡……往交廣之間，遂以木杯渡海，憩邑屯門山，後人因曰杯渡山”。（引文同上，見卷二十一《人物志》）

關於杯渡禪師之記載，史誌中頗多趣聞，謂其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遊蹤神秘，出沒無常。梁慧皎所撰《高僧傳》中就有不少有關杯渡之傳聞，文中敘及杯渡在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渡河。無假風棹，輕疾而飛，俄而渡岸，達於京師，見時年可四十許。帶索繿縷，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嚴冰扣凍而灑浴，或著屐上床，或徒

行入市，唯荷一蘆圌子，更無餘物。……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辛鱠，與俗不殊”。眞乃一代奇僧。後杯渡自屯門出海“往交廣之間”而不復來也。此當屬傳說而已，據有人推測，謂此奇僧可能係印度人氏，先由西域而入中土，後循海道而西返。後人爲紀念杯渡禪師而建杯渡菴，此即青山禪院之前身。現山上尚有杯渡岩，置杯渡禪師石像以爲紀念。

杯渡菴又名杯渡寺，建於青山北腰，後一度改爲青雲觀。在早年的“新安八景”中，此“杯渡仙蹤”曾與隔海相望的深圳蛇口“赤灣勝概”齊名，成爲歷代遊人之一大去處。至1928年，陳春亭氏等集資將青雲觀改建爲青山禪院。據有關記載，陳氏原籍福建漳浦，早年客居香江，因信奉佛教而後受戒於寧波觀宗寺，法號顯奇，爲青山禪院住持。其後青山禪院歷經發展而漸具規模，主要的建築有大雄寶殿、地藏菩薩殿、觀音閣、青雲觀、方丈室、居士林等。目前青山禪院雖不及大嶼山寶蓮禪寺之巍峨壯觀，但畢竟自有其千年古刹之勝。

近年來，香港經濟的起飛也爲禪院培添了幾分光彩，現在前往青山旅行，已不是一件難事了，從九龍尖沙咀出發，沿着新闢的青山公路，驅車一個多小時即可直達半山。上山不遠即可見挹曉亭，又稱半山亭。此亭係何東（曉生）爵士所捐建，亭側有碑石一方以紀其事：壬戌年（1922）孟秋，“何曉生爵士與其夫人乘輿登臨，憫遊人陟降之勞，謀建息肩之所。慨然出貲爲亭於半山，顏之曰：挹曉，紀實也”。遊客至此，稍事憩息，捨車以行，慢步上山，飽覽山林勝景，自有一番情趣。稍上即爲“香海名山”牌坊，

係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所題。兩側橫額爲“杯渡”、“錫飛”，下有對聯“樓觀參差淸夜聞鐘通下界，湖山如此何時返錫到中原”；背面有鐵禪法師所題“回頭是岸”四個大字，旁有聯句：“遵海而南杯渡情依中國土，高山仰止韓公名重異邦人。”從牌坊上行再經魚骨墳不遠，即抵青山禪院山門。禪院造型典雅，環境淸幽，門旁刻有“十里松杉藏古寺，百重雲水繞青山”的對聯。經山門拾級而上即爲護法殿、大雄寶殿以及青雲觀、五德觀等。循禪院大雄寶殿後面石級登山，不遠即爲杯渡岩，現存有“高山弟一”石刻一處，係近人曹受培氏於庚申年（1920）摹山頂殘碑而重刻，據曹氏稱：“‘高山弟一’四字，字大逾尺，在新安縣之屯門山。……舊傳爲韓愈題者也，其旁題有退之二字，字劃蝕殘，隱約可辨。……余於己未仲冬探勝至此，剜苔剔蘚，摩挲者久之。旣含名迹之可珎，而又以岩徑陡峭，苦於躋攀，恐衆目之不能快睹也。乃掄工摹刻，置諸青山禪院，以餉遊者。”不過，據後來史家考證，此“高山弟一”四字係宋代新界鄧族之始祖鄧符協所題，而非出自韓愈手筆。寺旁有小徑可以登頂，山上尙有“高山弟一”殘刻、韓陵片石亭等古迹、建築，步行約需一個小時，但那已屬年輕人的世界，一般遊客大都至寺院附近爲止。

遊覽青山，確是一件賞心悅目之樂事。登臨此地，居高臨下，左瞰青山灣，右眺伶仃洋，名山古寺，翠谷蒼松，屯門新姿，海港風情，一覽無遺，令人頗有一點飄然欲去之感。伴隨那悠揚的鐘聲與習習淸風，在這恬靜安詳而又帶有幾分神秘色彩的禪氣之中，此時此地，也許你才能領悟到那“杯渡仙蹤”的意境與遠足郊遊之樂趣。山不在高

（海拔僅五百八十三米），“有仙則靈”。青山以其古老的傳說與幽雅的環境，至今仍令衆多遊客爲之神往。

屯門訪古

屯門，古時曾稱段門，轉音團門。屯門灣，又稱屯門澳，今作青山灣（Castle Peak Bay），因此灣背倚青山之故。青山，即屯門山，據說是以其樹木青葱而得名；又因昔時杯渡禪師曾住錫於此，故名杯渡山。南漢時又封之爲瑞應山。外國人則以其山頂狀似堡壘而謂之爲堡壘山（Castle Peak），目前一般均通稱之爲青山。從歷史上來說，屯門是頗具名氣的。"屯門"一名可能就因其地駐有屯田防衛之兵而得名。中國之屯田制始於漢武帝，而"屯門"一名究竟始於何年，今已難考，但自唐宋以來，"屯門"之名已屢見於史誌，不少文人雅士就爲此留下動人的詩篇——

寄書龍城守，君驥何時秣？
峽山逢颶風，雷電助撞捽。
乘潮簸扶胥，近岸指一髮。
兩巖雖云牢，木石互飛發。
屯門雖云高，亦映波浪沒。
余罪不足惜，子生未宜忽。
胡爲不忍別？感謝情至骨。

這是大名鼎鼎的唐代大文豪韓愈（字退之，公元768—824）遇貶南下赴任途中所作詩句。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韓文公因諫迎佛骨而被貶爲潮州刺史。是年正月，韓氏自長安啓程，乘船經廣州赴任，歷時兩月有餘。

傳說途經屯門海面，忽遇颶風，韓文公小泊於此，風後乘興，遊覽青山，並留下“高山弟一”四字，落款“退之”，其字今仍可見。但是，韓文公遊屯門一說，史學界却是基本上持否定態度的，謂當年韓氏謫守潮州，並非從廣州循海路經香港一帶東航赴任，而是溯內河，取道東江，經龍川而下惡水（即今韓江）。不過，有一點倒是可以肯定的，當年屯門已享有盛名，否則，韓文公若未經屯門，焉知其地之險？無獨有偶，同時代人文學家劉禹錫（772—842）也留下了屯門的記載，有詩爲證——

屯門積日無回飆，滄波不歸成沓潮。
轟如鞭石矻且搖，亘空欲駕黿鼉橋。
…………
翌日風回沴氣消，歸濤納納景昭昭。
烏泥白沙復滿海，海色不動如青瑤。

其實，屯門之聲名遠揚，也遠非始於唐代，在此之前，它早已成爲中外海上交通之要道。如果說虎門爲珠江之門戶的話，那麼，屯門則爲虎門之屏障。屯門灣（即青山灣）坐北向南，東有九逕山，西有杯渡山（即青山），南面與大嶼山隔海相望，形成一個鉗形的良好避風港。古代科學技術落後，海上交通悉靠風帆，且遠洋航行需受季候風所支配，故“番舶”（即阿拉伯、波斯、印度、暹羅、安南等外洋商船）來穗通商，必乘西南季候風東航，多先泊屯門而後再往廣州，回航時則需在此等候東北季候風，故古時屯門又有廣州外港之稱。史籍上說的“其欲至廣州者，則自屯門而入”即指此。唐政府更在此置屯門鎮，設守捉使，以重兵守之。《新唐書》卷四十三《地理志》即有廣州所屬各地軍事設置之記載：“有府二：曰綏南、番禺；有

經略軍，屯門鎮兵。”此爲屯門駐軍之始，也可見其地位之重要。宋時一度置屯門砦，明淸時代曾先後設置過屯門墩台、屯門汛，直至英國租借新界時爲止。

而西方殖民主義者對屯門之覬覦也由來已久。進入十六世紀以後，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等相繼東侵，屯門又成爲中國人民抵抗西方殖民主義勢力的前沿陣地。

最早入侵屯門一帶的是葡萄牙（中國古籍中稱之爲佛郎機，即Frank）殖民主義者。公元1514年（明正德九年），就有以阿爾瓦雷斯（Jorge Alvares）爲首的探險隊到廣東屯門一帶海岸來。至1517年（明正德十二年），以比利·德·安德拉德（Fernão Perez D'Andrade）及葡王使者佩雷斯（Thomas Pires）率領的八艘武裝船艦（包括四艘葡船及四艘馬來船）啓程來華，於同年8月到達屯門海面，並派其中兩船强行駛入內河，到廣州做生意。次年（1518）8月，滿剌加（Malacca，又譯馬六甲）的葡萄牙統治者又派比利之弟西芒·德·安德拉德（Simão D'Andrade）到屯門接替其兄。西芒一夥在屯門一帶，横行霸道，無惡不作，《新安縣志》稱“瀕海之患，莫東莞爲最，海之關隘，實在屯門澳口，而南頭則切近之。……近於正德改元，忽有不隸貢數，號爲佛郎機者，與諸狡猾，凑雜屯門、葵涌等處海澳。設立營寨，大造火銃，爲攻戰具。佔據海島，殺人搶船，勢甚猖獗。虎視海隅，志在吞併，圖形立石，管轄諸番。膾炙生人，以充常食，民甚苦之。”（見嘉慶版卷之二十三《藝文志》，陳文輔《都憲汪公遺愛祠記》）1522年（明嘉靖元年），廣東海道副使汪

鋐親督師船，在當地人民支持下，與敵艦激戰於新安縣（注:《明史.佛郎機傳》作“新會”，可能係“新安”之誤）大嶼山（注: 也有人研究認爲，史籍所稱之屯門島應指大嶼山，而屯門鎮即爲南頭鎮）茜草灣一帶。是役，明軍生擒別都盧等敵寇官兵四十二人，斬首35級，大獲全勝。這是中國軍民爲保衛海疆，用正義抵抗西方殖民主義侵略並獲得勝利的第一仗。隨後，英法船艦也先後在這一帶活動。1637年（明崇禎十年），英商可甸聯合會（Courten's Association）的武裝商船就曾闖入珠江，强行至廣州貿易。這是中英通商貿易之始。

然而歲月易流逝，往事越千年。今日之屯門，已經發展成爲一個擁有三十萬人口的、僅次於荃灣、沙田的新市鎮。倘若韓文公有靈到此一遊，一睹今日之屯門新姿，想必又該有一番詩情雅興吧?！

力瀛書院

在古代香港地區的學舍、書院之中，其歷史之最早者，當推新界錦田桂角山下宋代之力瀛書院。《新安縣志》云，鄧符協“入廣，樂風土之美，卜居邑之錦田桂角山下，創力瀛書齋，以招來學。……子孫世居錦田、龍躍頭、屏山、竹村、厦村等處，至今推爲望族。”（嘉慶版卷二十一《人物》）“桂角山在縣東南四十里……宋鄧符（協）築力瀛書院，講學於其下，今基址尚存。”（同上，卷之四《山水略》）

鄧符協，係宋崇寧年間（1102—1106）進士〔注：據康熙版《新安縣志》卷十《人物志》與嘉慶版《新安縣志》卷二十一《人物志》均作崇寧年間，今從之。另據錦田《鄧氏師儉堂家譜》四世祖符協公家傳按語：“符協祖爲漢黻祖曾孫，爲郡馬公高祖，應是熙寧(1068—1077)進士。而舊譜稱崇寧進士者必係一時訛竄。”此處暫作存疑〕，授廣東陽春縣令，赴任時途經屯門，爲其地山靈水秀所吸引，任滿後即遷居該地，是爲新界鄧族定居之始。新界鄧族主要散居於錦田、厦村、屏山、龍躍頭等處，擁有當地最富庶的地段，成爲本地勢力最大的地主之一，與河上鄉侯氏、粉嶺彭氏、上水廖氏以及新田文氏，並稱新界五大族，均係宋、元、明間先後遷入本地區者。其它歷史較爲悠久者尚有元朗屯子圍陶氏、沙田大圍韋氏以及大嶼山白沙澳翁

氏等。這些早年入遷新界的居民，大都重視族人之文化教育，廣辦學塾以培養子弟應試。

宋代嶺南的經濟文化水平比之中原地區儘管還比較落後，但已有長足發展。宋仁宗時下令州縣立學，至神宗時頒佈《學令》，嶺南自不例外。東莞（宋時今新界地區範圍屬東莞轄）雖地處濱海一隅，然而岑田（錦田）桂角山下之力瀛書院，却是開風氣之先，在新界率先辦學。因現存下來的史料過於簡略，其時書院之規模、辦學時間等在縣誌中未有明確記載，故難以作出更準確的評價。但至嘉慶二十四年（1819）王崇熙撰《新安縣志》時仍“基址尚存”，前後已歷七百餘年之久，估計該書院存在時間當不至太短。又據《鄧氏師儉堂家譜》，鄧符協“性篤學，好交賢士。解任後，築室桂角山下，創力瀛書齋，建書樓，讀書講學，置客館、書田於里中及郭北。修橋樑，發膏火，以資養四方來學之士。樂育英才，多所造就。”似可見其規模尚屬可觀。中國古代之書院制度大致始於唐宋間，倘若單純從時間而論，則鄧符協所創辦之力瀛書齋（院），不獨爲香港地區開設書院、講學育才之先，即令在廣東地區，也是較早的書院之一，比之廣州的禺山書院（設於南宋嘉定年間，即公元1208年至1224年）與番山書院（設於南宋淳祐四年，即公元1244年）都要早百年以上，可惜這處文化古迹早已湮沒了。

繼力瀛書院之後，隨着新界地區之漸次開發與人口的增長，及至明清兩代，估計已有各類書院、書室、家塾、義學約數十所。因清初遷海事件等之破壞，清代以前之學舍已難尋找。據王齊樂先生研究（參見《香港中文教育發

展史》，波文書局，1983年），至今尚有據可查之清代舊學舍，即有錦田區之周王二公書院、二帝書院，上水區的應龍廖公家塾、應鳳廖公家塾、允升家塾、圖南書室、萬石堂、萃英堂、報德祠，屏山區的覲廷書室、述卿書室、五桂書室、若虛書室、聖軒公家塾，大埔區的藝浣堂、敬羅家塾、善慶書室、正倫書室，新田區的文氏宗祠、麟峯文公祠，沙頭角區的鏡蓉書屋、靜觀家塾，九華徑區的養正家塾，龍躍頭區的善述書室，九龍城區的龍津義學等二十五所。此外，相信清代時就讀於縣城之寶安書院（始創於清康熙三十三年，即公元1694年）、文岡書院（始創於雍正二年，即公元1724年）、以及鳳岡書院（始創於嘉慶六年，即公元1801年）者當也不在少數。新界也有一些熱心教育之人士爲辦學而慷慨解囊，以鼓勵當地子弟入學。據史籍記載，上水人廖九我就一次獻出嘗田五十石，作爲文岡書院費用，此即一例。

由於廣設學舍、書院以培養子弟應試，故自宋以來，新界地區考取功名者也大不乏人。其中獲登進士者即有宋開慶元年（1259）沙頭東涌人黃石。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錦田人鄧文蔚。清乾隆十九年（1754）大步涌（大埔頭）人江士元。獲鄉試中舉者有宋寶祐六年（1258）龍躍頭鄧炎龍。明成化七年（1471）錦田鄧廷貞。清順治八年（1651）大莆（大埔）何靈運。清乾隆元年（1736）錦田鄧興璋。乾隆二十七年（1762）錦田鄧晃。乾隆五十三年（1788）金錢村侯倬雲。嘉慶十二年（1807）上水廖有執。道光二十九年（1849）上水廖汝翼等。以上所舉僅係目前史籍中尚有資料可查者。相信在新

界歷代之莘莘學子中，獲取功名者當不在少數。

關於新界早年的這一歷史，雖然香港學者中不乏對此有深入研究者（如羅香林、吳倫霓霞、王齊樂等），但過去內地的史家有關著述中似乎大都未及介紹，這不免有令人遺憾之感。力瀛書院及其它新界早年興學育才之書院、學塾，在古代嶺南文化教育史上是應有它的地位的。

大步採珠

中國有句成語謂“合浦珠還”，喻人去而復回或物失而復得，此源於范曄《後漢書》卷七十六《孟嘗傳》。孟嘗係會稽上虞人，曾任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合浦（原屬廣東，1965年劃歸廣西）珠早已蜚聲於世，而新界之“大步（埔）珠”於今却是鮮爲人知。

大埔，古稱大步，也作大埗。古籍中所稱之大步海，即今之大埔海。南漢大寶年間，後主劉鋹置媚川都，驅使珠民在大步採珠。《新安縣志》云，“媚川都在城南大步海，南漢時採珠于此，後遂相沿，重爲民害。”《東莞縣志》也稱“媚珠池，在南大步海，舊傳南漢時于此採珠，其下多珠，故名。”實際上自南漢以來，大埔即爲合浦以外中國古代最重要產珠地之一，且當年東莞（自唐肅宗至德二年至明神宗萬曆元年，今香港地區所在範圍屬東莞縣轄）之產珠也非僅有大埔一地，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一書中便有記載：“元時東莞之大步海媚珠池，產鴉矗珍珠。又縣之后海、龍岐、青矗角、荔支莊一十三處，亦產珠母矗及

珠贏樹。”大步珠當時雖未及合浦珠之聲名卓著，但在其時珠市之影響當也不小。明代廣東有謂珠、藥、花、香四市，珠市即獨居其一，可見時人對珠之看重。除合浦珠市外，珍珠在廣州也甚暢銷，屈大均謂“天下人無貴賤皆尚珠。數萬金珠，至五羊之市，一夕而售。”“富者以多珠爲榮，貧者以無珠爲恥，至有金子不如珠子之語”。然而大埔之採珠業始於何年？今已難以稽考，但盛於南漢則是無疑的。

南漢（917—971）爲唐清海軍節度使劉隱之弟劉龑所建，置都廣州，歷時五十五年，後爲北宋所滅。南漢劉氏祖孫三代君主皆窮奢極慾，尤其是驅使珠奴冒死採珠，被目爲當時苛政之一。史稱南漢後主“劉鋹據嶺南，置兵八千人，專以採珠爲事，目曰媚川都，每以石鏈其足，入海至五七百尺，人溺而死者相屬也。久之，珠充積內庫，所居殿宇梁棟簾箔，率以珠爲飾，窮極華麗。”此媚川都即爲採珠而設之軍事性組織，以此强迫珠奴採珠進貢朝廷，採珠地點就包括今新界之大埔海一帶，故五代時大步海又稱“媚珠池”。（劉鋹時合浦也同設媚川都）

珍珠歷來爲世人所重，採珠業本爲可獲厚利行業之一。然而古代之採珠却是一件極其危險的勞動。其時生產技術落後，珠人需冒死潛入深水作業，不僅官府勒逼，限時限刻，而且風浪險惡，常遭鯊魚襲擊，稍有不慎即有葬身魚腹之險。宋時即有人著文以紀採珠之苦：“凡採珠必蜑人，常業捕魚，居海艇中，採弗以時，衆裹糧，會大艇以十數，環池左右，以石懸大縆，名曰定石。別以小繩繫諸蜑腰，乃閉氣直下數十百丈摸珠。未移時氣已逼，亟撼小繩，繩

動，船人絞取，人緣大縹上，出輒大叫，死久之始甦。”（蔡絛:《鐵圍山叢談》）如“不幸遇惡魚，一縷之血，浮於水面，舟人慟哭，知其已葬魚腹也”。（周去非:《嶺外代答》）故古人有謂“以人易珠”之說。然而採珠人的血汗與珠寶却是永遠也無法滿足驕奢淫逸的封建暴君的揮霍與慾望。“潾潾愁雲吊媚川，蚌胎光彩夜連天，幽魂水底猶相泣，恨不生逢開寶年。”南宋詩人方信孺《南海百咏》中的詩句，就是當年大步採珠業的生動寫照。

如此採珠，其慘實難以言狀，故而激起珠奴的强烈反抗，《遂溪縣志》就曾有此類事件之記載:“明正德五年（1510），守珠池太監牛榮，激變於雷。榮持勢，横暴苛歛，以飽囊橐，地方苦之，故變。”歷代上書力陳採珠之弊、主張禁採者也史不絕書。宋太祖開寶年間平定南漢後，就曾一度下令廢除媚川都，停止採珠。其後，歷宋、元、明三代，時或官採，時或私採，時禁時弛，產量已不如前。加上珍珠生長周期頗長，“珠一採之後，數年始生，又數年始長，又數年而始老。”（屈大均:《廣東新語》）朝廷不顧珍珠之生長規律而强以濫採，無異於殺鷄取卵、竭澤而漁。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東莞知縣詹勖曾一度下令在大步採珠，歷時五月，但僅得珠半斤，故太祖只能下詔作罷。明代嘉靖末年葡萄牙人來澳門之後，更將波斯灣之珍珠運來中國銷售，對廣東珠市構成新的影響。至清代之後，大埔之採珠業也就日漸式微了。

然而物換星移，世事滄桑，近年合浦之採珠業已賦予了新的內容、新的生機，一門新的行業——珍珠養殖業正在崛起。這也許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合浦珠還”了。而今

日之大埔，早已成了以高科技工業而名噪香江的新市鎮，九廣鐵路、吐露港高速公路橫卧其間，新興的住宅區與工業邨屹立在昔日的大步海濱，任憑你如何尋覓，再也難睹媚珠池之舊時風貌了。

鰲洋甘瀑

“鰲洋甘瀑”是舊時“新安八景”之一，它曾令多少詩人墨客爲之傾倒! 三百年前（清康熙二十七年，即公元1688年）的《新安縣志》（卷十二《藝文志》）就爲我們留下了這一絢麗多彩的海上賞景圖——

海上何年湧巨鰲，千秋遺迹枕寒濤。
石泉時掛明河落，雪乳晴飛白日高。
風急沙汀驚鶴夢，烟明春岸映魚舠。
鵬搏鯤變多奇幻，對景何當賦興豪。

（龍河:《鰲洋賦景》）

流長源遠正滔滔，萬頃烟波湧巨鰲。
何自倚天銀劍在，到看凌日玉虹高。
夜深千尺明于練，瀾若雙流性亦陶。
遙望征帆思共濟，揚清應藉聖心勞。

（廖奇逢:《鰲洋甘瀑》）

從當年縣誌所見之“鰲洋甘瀑”，確是不可多得的一景。然而“鰲洋甘瀑”之所以値得向讀者作專門的介紹，並不僅僅是它的旖旎風光與美好的傳說，更主要的還在於香港的別稱——“香江”一名可能與此有關。

據說在香港東南部的薄扶林、香港仔附近，早年有一處泉水（瀑布）流注入海，附近居民和過往船隻常在此汲水，因其水質清甜甘香，遠近揚名，故有“香江”之美稱。由是，“香江”流注入海的港口也就成爲“香港”了。一說“香港”之名即源於此“香江”的。有些外國學者更乾

脆把“香港”（Hong Kong）直譯爲“芬芳的港口”（Fragrant Harbour），大概就與此說有關。

然而，“鰲洋甘瀑”與“香江”的傳說是否爲同一回事呢？這不僅是從事香港史研究的學者們希望解决的疑問，也許還是多數讀者所感興趣的話題。

據現存兩個版本的《新安縣志》對“鰲洋甘瀑”一景的紀載，稱“鰲洋甘瀑在七都大洋中，有石高十丈，四面鹹潮，中有甘泉飛瀑，若自天而下。”又謂“獨鰲洋在城南二百里，左爲佛堂門，右爲急水門。”許地山先生據此曾著文認爲，“鰲洋”當爲“獨鰲洋”，正是位於現在的香港海面，所謂“香江”即指此“鰲洋甘瀑”，斷言“香港”一名源於“香江”之說最爲可靠。還推測香港也許就是“獨鰲山”，只不過是誌書未載入罷了。許說言之鑿鑿，而從目前所收藏的有關歷史繪畫來看，也有支持此說的。有一幅至今一百多年來常爲史家們所稱引的繪畫，就是1816年前後據說由哈維（W.Havell）所作的有關瀑布的水彩畫，該畫描繪了一羣海員划小艇到瀑布旁汲水的情景。從畫面所表現的地理位置看，與今港島薄扶林華富村一帶頗爲相似。按歷史記載，十九世紀初，外國來華貿易船隻即有不少曾寄泊於石排灣西南一帶海面，並在此瀑布汲水補給。只是在薄扶林水塘建成後，該處瀑布才消失的。

但是有的學者並不同意此說。羅香林先生便撰文指出，獨鰲洋乃在今日新界塔門南部，與今香港島東北之紅香爐山、東南之赤柱山皆相去甚遠，因而“鰲洋甘瀑”與“香港”之得名並無直接關係。孰是孰非，仍有待考證。

那麼，“獨鰲洋”的準確位置該在什麼地方呢？這是

頗難考證的。史籍中所保留下來的有關“獨鰲洋”的記載確是太少了，而且多屬泛論。屈大均在《廣東新語》卷四《水語》之《海中淡泉》中也有提及:“海中淡泉凡六，其在新安七都大洋中者，曰鰲泉;在五都蚊洲者，曰蚊洲泉……皆不以海而鹹者也。”又是一個在“七都大洋中”!此“鰲泉”也許就是“鰲洋甘瀑”。現存兩個版本之《新安縣志》有關記載均屬簡略，地圖描繪也不甚精確。康熙版稱“邑之爲鄉者三，爲都者七，爲圖者五十有七，爲村將五百所。雖烟戶之多寡不同，大都近山者晨星，而濱海者轂擊兵燹寇疫之後，繼以遷界，雖幸而展復，畢竟轂擊者亦轉而晨星矣。乃七都一帶，大半逃編他邑，今亦仍舊誌而存其名。然釐而正之未易也。”（卷三《地理志》）連當年縣誌都發出難以詳辨之慨。及至嘉慶版縣誌也感嘆“考之各都，多有桀錯，而前後無殊者不過十之六七。至七都、長山頭、石潭、莆林村、蓮湖一帶數十餘村，仍入東莞。拈墊、角子頭、鑑巷圍、羊凹村等十餘處久廢無存，新舊異名亦難詳辨。”（卷之二《輿地略》）其中尤以七都最難辨考。康熙版縣誌所存七都村名，計有山下村、竹園村等一百一十六處，今新界東北部份及深圳市之大小梅沙一帶，均應在七都範圍之內。據縣誌輿圖所見，“獨鰲洋”係位於“南佛堂門”、“大金門”之東，“塔門”、“外平洲”之南，“赤柱”、“蒲台”之東北方向，大致相當於今西貢半島與糧船灣洲一帶，以此而言，羅香林先生所稱獨鰲洋在今新界塔門南部之說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從地名考證，“糧船灣洲”又名“高洲”,“高洲”似爲“鰲洲”之變音。如是，則“鰲洋”當爲今之“糧船灣洲”無疑。故此，“獨

鰲洋”之準確位置應在“糧船灣洲”，也即今之萬宜水庫附近。梁濤先生曾專門撰文予以考證，並且認爲七十年代萬宜水庫工地上所發現之古沉船，即是前往該處汲取泉水的。如果此說成立，今後之進一步考證將有不少困難，當年“鰲洋甘瀑”的不少古迹文物（如題詠碑刻之類）也許早已湮沒在這新建的水塘之下了。“大鰲泿說大洋中，片石巍然峙碧空。潮菂翩翻浮玉乳，泉飛滴瀝散清風。”（李可成：《鰲洋甘瀑》，見康熙版《新安縣志》）如此迷人景致，也許將永遠只能寄託在人們美好的懷舊之中。

不過，即使史家們的考證結論不一，但“鰲洋甘瀑”位於今香港地區界內之說還是比較一致的。雖然一般讀者並不刻意於深究這“鰲洋甘瀑”與“香江”之類的歷史淵源，但“香江”之說却是人們所樂於稱道的，諸如“香江八景”、“香江酒家”之類，往往寄託着人們對香港歷史的某種美好的追憶。誠如有人喜歡將廣州稱之爲“羊城”、福州之爲“榕城”、成都之爲“蓉城”一樣，似乎更有點詩情畫意。

莞香餘韵

“莞香”，在香港古代史上常爲人所提及。然則可謂“莞香”？簡言之，即爲東莞所出產的一種“香”料。自唐肅宗至德二年（757）至明神宗萬曆元年（1573）長達八百餘年間，今香港地區範圍皆爲東莞縣所轄。從“莞香”到“香港”，就是這歷史長河中有趣的一頁。

以植物學分類而言，此“莞香”屬瑞香科植物，即所謂“土沉香”，學名Aquilaria Sinensis（Lour.）Gilg古稱蜜香樹，常綠喬木，產於中國南部，歷史上廣東之東莞、香山、德慶、海南島等地均有分佈。其葉革質，卵狀披針形，有光澤；花白色，傘形花序。正是史籍上所稱“幹似柜柳，花白而繁，葉如橘木”。而“沉香”（Aquilaria Agallocha），則亦稱“伽南香”、“奇南香”，產於印度、泰國、越南以及中國的台灣等地。中醫學上用沉香（或土沉香）樹中含有棕黑色樹脂的樹根或樹幹經乾燥加工後入藥。這些樹脂是樹木受蟲蛀或人工砍傷後，由木質部份泌而出，經多年沉積而成，有特殊香氣，故名“沉香”。沉香在醫學上用途頗廣，該藥含揮發油，性微溫，味苦辛，功能納氣、溫腎、主治氣逆、嘔吐、呃逆、脘腹疼痛等症，明代著名醫藥學家李時珍（1518——1593）認爲沉香可治“上熱下寒，氣逆喘急，大腸虛秘，小便氣淋，男子精冷”。（見《本草綱目》）沉香配以烏藥、木香、延胡索等，即

爲沉香降氣散。古時又以沉香作爲製作其他多種香製品的重要原料，且是歲時供神、上貢的佳品。

然而，“莞香”之種植業雖有其悠久之歷史，但究竟始於何年，目前却難有定論。史誌中對此皆未見有明確記載，而《東莞縣志》僅稱“莞香至明代始重於世”。不過，有人推測大概在唐、宋時期，似已有之。唐代劉恂《嶺表錄異》卷中，雖未言及東莞，但對其時廣東南路之香樹已頗多紀述，謂“廣管羅州多棧香樹，身如柜柳，其花白而繁；其葉如橘皮，堪作紙，名爲香皮紙，灰白色，有紋如魚子牋。雷、羅州，義寧、新會縣率多用之。……或云：沉香、鷄骨、黃熟、棧香，同是一樹，而根、幹、枝節各有分別者也。”而沉香樹對土質要求並非太苛，尤宜生長於砂土的山田，東莞一帶土質不少均適宜栽植。《東莞縣志》稱“莞諸物俱不異他邑，惟香奇特，莞三、四、五都皆有香，而牛眠石、金橘嶺爲最”。歷史上東莞比較著名的產地尚有金釵腦、馬蹄岡、南仙村、鷄翅嶺、白石嶺、梅林、百花洞諸處。今新界之沙田、大嶼山一帶也曾爲當年“莞香”之著名產地，《新安縣志》卷三云：“香樹邑內多植之，東路出于瀝源、沙螺灣等處爲佳，西路出于燕村、李松蓢等處爲佳”即指此。著名之品種有“生結”、“馬尾滲”、“黃紋黑滲”等，尤以“女兒香”爲名貴。此“香”乃因香家女鑿取香木時潛取其佳者爲私蓄而得名，爲莞香之精品，價比黃金，史籍稱“歲時供神，以此爲敬”，古詩中也常有人提及：“風流舊俗沿天子，今古芳名屬女兒。”（孟鴻光《東莞香市》）“腰下荷囊脂粉好，背人偷換女兒香。”（見張心泰《粵游小志》）眞是身價不凡。至明清之際，

莞香更是盛極一時，量多質優，遠銷江浙，飲譽全國，故有"莞香"之稱。不少人還以"香"而起家。清初文學家屈大均（1630—1696）在其所著《廣東新語》卷二十六《香語》之《莞香》條中對其時東莞之香業就有過精彩的論述："莞人多種香，祖父之所遺，世享其利。地一畝可種三百餘株，爲香田之農，甚勝於藝黍稷也。""莞香度嶺而北，雖至劣亦有馥芬，以霜雪之氣沾焉故也。當莞香盛時，歲售踰數萬金。蘇松一帶，每歲中秋夕，以黃熟徹旦焚燒，號爲薰月，莞香之積閶門者，一夕而盡，故莞人多以香起家。"明代廣東曾有珠、藥、花、香四市，即所謂合浦珠市、羅浮山藥市、廣州花市與東莞香市，東莞之香能獨居一市，也可見其時莞香之盛了。

但是，畢竟"莞香"來之不易。香木之種植需講究一定的條件，"凡香先辨其所出之地，香在地而不在種，非其地則香種變。"屈大均稱東莞可種香之地僅百餘里，他處則"弗茂且弗香"。而種香以至鑿香更是講究技術，且香樹栽培周期也甚長，需十年之久始有香鑿。屈大均曾詳細描述了莞香之種植過程，謂以其子種之，"苗長尺許，乃拔而蒔，蒔宜疎，使根見日。疎則香頭大，見日則陽氣多。歲一犂土，使土鬆，草蔓不生。至四五歲，乃斬其正幹鬻之，是爲白木香。……正幹已斬，留其支使益旁抽。又二三歲，乃於正幹之餘，出土尺許，名曰香頭者鑿之。初鑿一二片，曰開香門，亦曰開香口。貧者八九歲則開香門，富者十餘歲乃開香口。然大率歲中兩鑿，春以三月，秋以九月，鑿一片如馬牙形，即以黃土兼砂壅之。明歲復鑿亦如之，自少而多，今歲一片，明歲即得二三片矣。"

（見《廣東新語》卷二十六《香語》之《莞香》條）其栽植之艱辛，可見一斑，然至清初以後，前後歷經戰亂，老樹被毀，新苗不繼，後又數年遷界，幾度離亂，無人照料，加上封建統治者貪求苛徵，多方折騰，以致一度頗負盛名之東莞種香製香業日漸式微，難怪屈大均在著述《廣東新語》時便發出如此感嘆："自離亂以來，人民鮮少種香者，十戶存一，老香樹亦斬刈盡矣。今皆新植，不過十年、二十年之久，求香根與生結也難甚。"《東莞縣志》也留下了有關記載，"聞前令時承指購異香，大索不獲，至杖殺里役數人，一時藝香家盡髡其樹以去，是尤物爲禍亦不細矣。然則莞香至雍正初，蓋一跌不復振也。"漸漸地在人們的依稀記憶中，就只留下"莞香"——"香港"之美稱了。

循着"莞香"的餘韵探求"香港"之得名，倒也有趣。據有的史家研究，當年之莞香貿易已頗具規模，其產品多數先運至九龍尖沙咀，用船渡海而集中於港島東南部的一處港灣（即後來的石排灣），然後換載大眼鷄船運往廣州，再度嶺而北，遠銷江浙一帶。因此，尖沙咀古時也稱"香步頭"，而石排灣這個轉運香料的港口則被稱爲"香港"，港口附近的村莊也就稱爲"香港村"了。

說來也挺有意思，歷史似乎往往是在向人們開玩笑，這個"香港"一名發祥地的"香港村"，後來竟是由"父"變"仔"，被降格爲"香港仔"了。不過，最初在史籍上所稱之"香港"，只是"全島中之一隅"，而非指今之香港島全島。用"香港"作全島名稱、見諸於條約上的，還是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的事情。隨後至1860年簽訂《北京條約》和1898年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之後，才有

以“香港”作爲整個香港地區稱謂之說。順便在此提及的是，近二十多年來，香港漁農處還與市政局分別在郊區及市區公園陸續栽植了不少香樹樹苗，以作綠化和觀賞，市民與遊客也得以一睹當年“莞香”之芳容，這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大嶼山考

大嶼山面積爲一百四十一點六平方公里，大約比香港島還大一倍，是一塊富有發展潛力、有待開發的"處女地"。在離島中，它大概可稱得上港人最熟悉的一塊地方了。這裏山林廣闊，寺廟衆多，環境幽雅，每逢節假日，不少市民（尤其年輕人）大都樂於至此郊遊遠足，投身於大自然的懷抱，領略如此令人陶醉之山林野趣（關於寶蓮禪寺，詳見另文）。不久前報界更傳出消息說，華資財團的合和與和黃、長實共同提出了港西——大嶼山發展計劃，擬斥資二百五十億港元進行規模龐大的填海工程。此項擬議中的計劃包括在港島與大嶼山間塡造大型人工島，興建新機場及貨櫃船泊位等，並通過修建新塡海的交通幹綫與海底隧道，將人工島、新機場、深水港與港島、九龍、新界大陸連接起來。如是，大嶼山將是香港經濟未來發展之希望所在。一時間，"大嶼山"又成爲人們的熱門話題。

實際上，如果從歷史的角度而言，"大嶼山"的知名度也許要遠遠超過"香港島"，晋代時對外已有頻繁的接觸了。"大嶼山"一名的出現，比之"香港"就要早得多了。說說這"大嶼山"的不同稱謂及其歷史變遷，以作茶餘酒後之談資，也是饒有趣味的。

據史籍記載，東晋時孫恩、盧循起義，元興元年（402），孫恩戰歿，盧循繼任，曾浮海攻佔廣州，任廣

州刺史，但終爲劉裕所敗，投水而亡，餘部多退居大嶼山等處。陳伯陶等所撰《東莞縣志》也有此說："大奚山三十六嶼，在莞邑海中。水邊岩穴，多居蛋蠻種類，或傳係盧循遺種，今名盧亭，亦曰盧余。"文中所稱"大奚山"，即今之"大嶼山"，在現存的《新安縣志》兩個版本中，對"大嶼山"均有記載。康熙版之卷三《地理志》謂："大奚山在縣南一百餘里，一名大漁山，爲急水、佛堂二門之障。山有三十六嶼，周迴二百餘里。有異鳥，見則大風生。山下有村十餘，多鹽田。宋以爲李文簡食邑，今仍之。"嘉慶版之卷四《山水略》稱："大奚山一名大嶼山，在縣南百餘里，爲急水、佛堂門之障。山有三十六嶼，周圍二百餘里。有異鳥，見則大風生。山中有村落，多鹽田。宋以爲李文簡食采，今仍之"。縣誌所稱李文簡即係宋番禺人李昴英。1955年及1981年，在大嶼山梅窩涌口及萬角咀先後發現"李府食邑稅山"界石各一方，今存香港博物館。

大嶼山除了"大奚山"、"大漁山"之稱外，尚有多種不同稱謂——大溪山、大魚山、大姨山、大崳山、大移山以及爛頭島等，這種情況在香港其他地方是不多見的。

大嶼山之稱爲"大奚山"，已見諸上舉《東莞縣志》與《新安縣志》，更早的記載還可見於宋元時代。古時"大奚山"又稱"大溪山"，係私鹽之地，爲朝廷所禁，其時史籍中多有提及。《宋史》稱："慶元三年（1197）夏，廣東提舉茶鹽徐安國遣人捕私鹽於大奚山。八月，知廣州錢之望遣兵入大奚山，盡殺島民。"該書修於元至正三年至五年（1343—1345）距今已有六百四十多年的歷史。明

嘉靖年間（1522—1566）黃佐所修《廣東通志》中也有類似記載:“東莞縣大奚山，在縣南大海中，有三十六嶼，周三百餘里。居民不事農桑。不隸徵徭，以魚鹽爲生。”《大清一統志》則謂“大奚山在新安縣南，一名大漁山。《輿地紀勝》謂在東莞縣海中，有三十六嶼，居民以魚鹽爲生。”清時大嶼山之稱謂最爲複雜。康熙年間（1662—1722）工部尚書杜臻之《粤閩巡視紀略》稱“大奚山在合連海中，俗曰大姨。又有小姨山與倶峙，中環三十六嶼，周圍三百餘里……。”嘉慶年間（1796—1820）三水人范端昂《粤中見聞》則謂之爲“大魚山”；道光年間（1821—1850）兩廣總督阮元巡視該地時則稱之爲“大崳山”。近人宋學鵬先生（1880—1962，曾任教於皇仁書院及英皇書院）更考證了大嶼山之稱爲“大移山”緣由，謂大嶼山“本與大陸相連接，蓋爲今日寶安梧桐山相連，後以地層變化乃自成島嶼，有若梧桐山所移出者，故曰大移山”。

說來更有趣的是，大嶼山還得了一個“爛頭島”的“雅號”。據說因爲島上的最高峯——鳳凰山（海拔九百三十四米，僅次於新界的大帽山）山顛雙峯並列，中間微凹，似乎缺了一塊，故有“爛頭山”之稱，“爛頭山”所在之島也就成了“爛頭島”了。據說今“大嶼山”之所以不譯Da Yu Shan 或Tai Yu Island而譯爲Lantau Island，即是源於此“爛頭”（Lantau）之音譯。但是，也有的學者不同意此說，認爲Lantau一名並非源於“爛頭山”，而是因明清以來，大嶼山一帶皆屬“南頭寨”汛兵所轄，故Lantau應爲“南頭”之音訛。香港大學饒宗頤教授即持此說。有的學者則考證稱，所謂“爛頭”者，當係粤音“浪頭”之

意。粤人俗稱“大浪”爲“浪頭”，以喻其地海浪之洶湧。大嶼山上今仍有“大浪灣”等地名。故此Lantau並非源於“爛頭山”或“南頭寨”，倒是因“浪頭”而訛音“爛頭”。港大高級講師林天蔚就曾著文作此論證，並斷言大嶼山之中英譯名雖來源不同，但同是明清間之“浪白”却是無可懷疑的。看來，有關Lantau的考證還遠未有定論。

然而，大嶼山之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小有名氣，並非因爲它名字之衆多。傳聞之廣泛與魚鹽之利便，更主要的是它在海防上之險要以及其悠久的歷史古迹，其中常爲史家們提及的是有關“碙州”之爭。

說到“碙州”，首先就要追溯到七百多年前發生在這南海之濱的一段歷史。南宋末年，恭帝被俘，陳宜中、陸秀夫、張世傑、楊亮節等護益王昰、衛王昺南逃，於福州擁益王爲帝，改元景炎。次年春，帝昰入廣州，後輾轉至九龍官富場設行宮。景炎三年，帝昰崩於碙州。據所傳陳仲微《二王本末》記載：“景炎三年（1278）三月，帝自廣州還碙州，四月崩於此，羣臣欲散去，陸秀夫曉以大義，共立衛王昺，改元祥興，因黃龍見於海中，升廣州爲翔龍府，碙州爲翔龍縣。”有的史家認爲，上文所指“碙州”，即今之大嶼山，而非化州之“硇州”。但新版《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版）則不同意此說，謂碙洲今作硇洲或硇州，“在廣東雷州灣外東海島東南海中。宋置寨。1277年，宋端宗被元兵追擊，駐留於此。端宗死後，陸秀夫、張世傑等復立其弟趙昺爲帝，據傳‘黃龍’見於海上，因置翔龍縣於此，元廢。”這些都是史家們的論爭，對於多數香港市民來說，他們也許倒是寧信其有而不信其無，

大嶼山能與大宋末代皇帝沾上邊，成爲海上行朝，爲今日之香港增添一處不可多得的旅遊點與津津有味的話柄，也是一大幸事。

寶蓮禪寺

說到大嶼山，人們往往會提到寶蓮禪寺。不少遠道而來的遊人、香客，就是爲了一睹這鳳凰山下的佛門勝地。寶蓮禪寺，已經成了香港地市民郊遊遠足與遊客尋幽探古的一大去處。

佛教，與基督教、伊斯蘭教（即回教）並稱爲世界三大宗教，在香港頗有影響。香港的佛教以大乘教義爲主，主要的宗派有禪宗、律宗、密宗、天台宗、淨土宗、華嚴宗等等。據有人估計，香港地信佛者當有近百萬之衆。佛教產生於印度，距今約有二千五百多年的歷史。東漢明帝永平十年（67）時傳入中國，大約在南北朝劉宋時期（420—479）前後即已傳入香港，時杯渡禪師曾住錫於屯門（後人因名曰杯渡山），爲紀念此一代奇僧而建杯渡寺，此即今青山禪院之前身，至今當有一千五百年歷史，可見佛教在香港傳播歷史之久遠。繼劉宋之杯渡寺後，年代較爲久遠的尚有唐代元朗厦村之靈渡寺與明代錦田觀音山之凌雲寺。然而更多的還是近數十年所興建，諸如寶蓮寺、觀音寺、靈隱寺、延慶寺、羅漢寺、西方寺、東普陀、竹林禪院等等。據說全港現有大小寺院、蓮社、精舍約五百餘所，其最爲巍峨壯觀者，當推後起之寶蓮禪寺。

寶蓮禪寺位於大嶼山鳳凰山支脈昂坪山中，四面高山環抱，東有鳳凰山，西有獅子山，南有木魚山，北有彌勒

山、蓮花山，係全港地勢最高的寺院之一，從梅窩乘車，大約一個多小時即可抵達山門。該寺山林廣大，構築精巧，氣勢不凡，其規模在香港的衆多寺廟道觀之中，可謂首屈一指，爲香港三大佛教聖地之一。寶蓮寺山門係巨石雕砌而成，頗爲壯觀，上書“寶蓮禪寺”四個遒勁大字，兩旁配以對聯:“寶樹繞重樓周匝儼成極樂剎，蓮光通法界萬方咸仰佛陀門。”寺內大雄寶殿供奉金佛三尊，每天吸引了衆多的善男信女至此頂禮膜拜，終年香火鼎盛，香客不絕。殿前置一巨鼎，於今約七十餘載，鑄造精美，古樸素雅。殿下爲法堂，內有觀音菩薩像，旁書聯句“此生有幸不昧前因便向山中修淨業，佛法無邊回頭是岸願從香海禮慈航。”堂壁置五百羅漢像。寺中尚有韋馱殿、彌勒殿、祖堂、清心堂、般若堂、如是堂、藏經閣以及涼亭、蓮池、齋堂等。寺後花園樹木婆娑，清幽宜人。園中建有舍利塔，內藏紀修和尚（1862—1938）眞身。據《大嶼山寶蓮禪寺碑記》云: 1923年，“有紀修老和尚者，自鎮江金山來，衆推爲第一代住持。破衲蕭疏，藜羹粗飯，攘剔灌栵，以啓山林於斯。初結大茅篷，介左鳳凰、右彌勒兩峯間，與青山顯奇、羅浮妙參、鹿湖觀清，竝世同時，人儞四老。開堂接衆，坐香參禪，雲水安居，宗風丕振。鳩募建大雄寶殿，及木寮僧舍齋堂。火宅生涼，伽藍粗具，宏施博濟，上悳無儞。”至1930年，紀修和尚退席，寶蓮寺由筏可和尚接掌。今日之寶蓮禪寺，金碧輝煌，寺內寺外，綠樹掩映，繁花點點。離開那喧囂的鬧市街頭，至此“修心養性”作一日之遊，“觀慧日，聽潮音，來禽親人，停雲補衲，剖胸以洗棘，冥心而逡情，邀陶令於溪邊，思子春於海上，

參差萬象。”（出處同上）令人頗有出塵脫俗之感。

寶蓮禪寺山門所對爲木魚峯，一座世界最高的露天青銅釋迦牟尼佛像即將安奉於此，目前基礎工程已告完竣。因大佛坐基係仿照北京天壇之圜丘而設計建造，故名“天壇大佛”。

天壇大佛由中國航天工業部屬下“中國航天工業科學技術諮詢公司”承建。佛像由廣州美術學院設計，南京晨光機器廠承鑄，高達二十六點四米，重約二百五十噸，分成二百一十六塊鑄造，然後再逐塊裝嵌。該項工程經費預算高達六千萬港元。大佛造型設計莊嚴安詳，含首作微笑狀，以示其慈愛。左手施“與願印”，代表給予衆生福樂的慈願；右手施“無畏印”，代表救拔衆生的悲心。大佛的設計是佛教精神與造型藝術的結合。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擔任籌建委員會名譽主席，並爲天壇大佛賦詩：“稽首天中天，毫光遍大千，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表示對佛陀的讚頌。整個工程預計1989年竣工。這一富有藝術欣賞價值的傑作將爲此名山古寺增添異彩，成爲中外香客與遊人參觀朝拜的勝地，這對發展香港的旅遊業也將是有所裨益。倘若日後重評“香江八景”，也許這被譽爲“融宗教、藝術及科技於一身”的“天壇大佛”（或“寶蓮禪寺”）該會佔有一席之地吧？

到寶蓮寺旅遊，一般需要一天時間，寺中也可提供素食渡宿，時間充裕的遊客還可在此留宿一晚，領略這山林野趣與暮鼓晨鐘之意境。或結伴夜攀鳳凰（山）觀日出，自有一番情趣。大嶼山其他可供遠足之旅遊點仍甚多，如有全港第三高峯之稱的大東山（海拔八百六十九米）、風

光秀麗的梅窩、歷史古迹的萬角咀，以及衆多的寺院精舍。此外，尚有值得一顧的旅遊點如大澳水鄉、東涌古堡、貝澳海灘、石壁水塘等等。遊客至此，或佛門朝聖，或登頂觀日，或山中探勝，或林中尋幽，或露營燒烤，或岸邊聽濤，各具特色，各適其適。這就難怪大嶼山、寶蓮寺對遊人、香客有如此吸引力了。

天后傳說

香港的宗教信仰與風俗習慣實在令人嘆爲觀止。如來、觀音、呂祖、耶穌、天后、孔子、關帝、濟公、黃大仙、土地公，等等，都可以在此找到其虔誠的信奉者，其中不乏有值得介紹之處。說起來，天后娘娘的傳說還是饒有趣味的。

天后姓林名默娘，相傳爲福建莆田人氏，生於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三月二十三日，爲宋初都巡檢林願之第六女。據稱此女自生至彌月不聞啼聲，故名。默娘自小聰穎好學，八歲從師訓讀，深諳內經諸典，秘承玄微之法。長成後時常神遊海島，爲海人引航除災，屢顯神功，被譽爲“通玄靈女”。宋雍熙四年（987），默娘升天而去，時年二十有八，當地人崇奉爲“媽祖”。此後歷代均加封於默娘。宋徽宗時已爲其立廟，賜額“順濟宮”。高宗時詔封之爲“崇福夫人”。光宗時祂進封爲“靈惠妃”；元世祖時册封祂爲“護國明著天妃”。明成祖時加封祂爲“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天妃”。清聖祖時進封祂爲“天后”。數百年間，自一凡女進而天后，個中緣由，足以令人回味再三。

天后之傳說眞假若何姑且勿論，有趣的是一介福建女子，竟然不辭千里之遙，“落戶”香江，成爲衆多後人之膜拜神明，這就值得考究了。

大凡古代之宗教信仰，作爲一種意識形態，都有其歷史淵源。“天后”之傳說出自福建莆田，實非偶然。莆田係介於福州與厦門間之濱海地區，瀕臨台灣海峽，人們世代從事航海捕撈生涯。在科學技術並不發達的古代，特別是當發生自然災害而又無法預測、控制時，便寄望於以祈禱、祭獻等方式，借助虛幻的神力以保海事平安。因此，“天后”的出現是與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及莆田的特定社會地理環境相適應的。香港地區亦然。自宋以來，福建等地沿海漁民蛋戶南遷來港漸多，他們大多仍操舊業，以航海捕撈爲生，並帶來了原有的宗教、風俗。因而香港地區一向倚賴海洋爲生的古代漁民，寄望於天后保祐，祈求風調雨順與海事安全，這是可以理解的。

天后作爲沿海地區居民（漁民）供奉最多的海神，大陸如此，台灣、澳門如此，東南亞一帶也仍可見，當然在香港也不例外，眞可謂是“名揚四海”了。據說目前全港擁有信衆多達25萬，現存天后廟最少還有24間，且多分佈在瀕海地方，如佛堂門、鯉魚門、香港仔、銅鑼灣、筲箕灣、油蔴地、赤柱、長洲、坪洲等處，大都終年香火不絕。每年農曆三月二十三日的天后誕，至今仍是香港最隆重的節日之一。是日除了善男信女前往天后廟上供參拜外，有的地方還舉行舞獅、飄色巡遊之類的慶祝活動，場面蔚爲壯觀。然而，現在的旅遊娛樂成份也許比昔日純粹的宗教信仰更濃厚些，人們在緊張的勞作之餘，也藉此得以一天的休息調節，自是一樂。

不過，天后廟之於香港，若以歷史之悠久、規模之宏大、信衆之廣泛、香火之鼎盛，當非佛堂門之大廟莫屬。

每逢天后神誕，船艇雲集，旌旗飄揚，人聲鼎沸，鼓樂喧天，四方香客至此朝覲，摸龍床，祈添丁，敲銅鐘，求好運，當有一番熱鬧景象。

大廟的準確名稱應爲"北堂天后廟"，即後來所稱的"佛堂門天后廟"，因其譽滿香江，故名"大廟"，似有"唯我獨尊"之意。而佛堂門實非佛教之地。據明末清初歷史地理學家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一書考證，因"番舶至此，無漂泊之恐，故曰'佛堂'。"該處由南佛堂（即南堂島，也稱東龍島）和北佛堂（即田下山半島）對峙構成，形勢險要。《新安縣志》之《山水略》云："佛堂門……潮汐急湍，巨浪滔天，風不順，商舶不敢行。"如此險峻水道，而歷代以來又一直是海上交通要衝，古時閩浙一帶入粵船舶皆經此地，可以想像當時海人所需之精神寄託，以求"無漂泊之恐"。大廟之出現也可謂是"應運而生"了。

佛堂門之天后廟，原並不止北堂一處。據香港林氏族譜記載，其時有南北兩廟，現存大廟的摩崖石刻上載——

古汴（今開封）嚴益彰官是場，同三山（今福州）何天覺來遊兩山。考南堂石塔，建於大中祥符五年（1012）。次，三山鄭廣清堞石刊木，一新兩堂。續，永嘉（今溫州）滕了覺繼之。北堂古碑，乃泉（今泉州）人辛道朴鼎撊於戊申，莫考年號。今三山念法明、土人林道義繼之。道義又能安其規，求再立石以紀。咸淳甲戌（1274）六月十五日書。

這是香港史上的一則重要史料，可見大廟至今已逾七百年了，大概也是港澳以至廣東地區現存天后廟中最早的一間。

據史家考證，石刻中所稱土人林道義，其曾祖父林長勝係福建莆田人，宋時舉家遷居九龍黃大仙彭蒲圍（今大

磡村），長勝之孫松堅、柏堅，於南宋初年在海上遇颶風，船貨皆失，幸抱船桅及“林氏大姑”（即天后）神像，漂浮至東龍島北岸始得生還。緣此，松堅兄弟即在此建廟以謝神恩，是爲南佛堂天后廟之由來。後據說出現“南堂敲鐘北堂響，南堂焚寶北堂烟”的奇異現象，鄉民以爲此係天后顯聖，意欲北堂建廟。不過，傳說終歸是傳說，隨後松堅之子林道義在該廟海峽對面的田下山半島南端再建一廟却是事實，是爲北佛堂天后廟，即今之大廟，南堂天后廟反而冷落了。說來實在有點玄之又玄，天后眞是“法力無邊”，難怪後人要爲之頂禮膜拜了。

在古代海人眼中，天后確是被崇奉爲他們的救星。“英風護國千秋泰，烈氣庇民萬古安”（見鯉魚門天后廟）；“聖德與天同道遠，母儀無處不深恩”（見長洲天后廟）；“職掌乾坤，兆民叨庇護；功扶社稷，海角頌升平”（見茶果嶺天后廟）；“德著莆田，是處有天皆俎豆；澤流急水，由來無日不馨香”（見急水門天后廟）。這些鐫刻在港九各處天后廟的對聯，就是這種信仰的反映。

然而，香港的天后廟儘管在數量上頗多，但比之其他廟宇，則規模上還大都較小，“氣魄”似乎還不够大，倒是聳立在淺水灣畔海濱公園的天后巨型彩色塑像，甚爲壯觀，爲此旖旎多姿的濱海風景區生色不少，只是這已有別於一般香客所雲集的天后廟，成了遊客旅遊觀光的一大去處。不過，話雖如此，比之關雲長、黃大仙來說，天后在香港還不算是最具影響的。

黃大仙祠

在香港，除了關帝外，"黃大仙"之鼎鼎大名，也可稱得上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了。"黃大仙——有求必應"成了一句流行甚廣的市井口頭禪。九龍龍翔道的嗇色園黃大仙祠，更是香客們的一塊"聖地"與中外遊人的一大去處。然則這"黃大仙"究竟爲何方神聖，竟有如此魅力令這現代都市衆多市民迷而信之？還是讓我們來看看這位"大仙"的自述吧——

> 予初乃牧羊之孩，驅羊於浙江金華府城北之金華山。金華之名，乃金星與婺女星崢嶸，故名也。此山之北，有赤松山焉。予即居此之地，遊人罕到，林木參差，雲霞障漫，青翠巍峨，岫岩深隱。其中有洞名曰金華，乃洞天福地中三十六洞之一也。予少家貧，炊糠不繼。八歲牧羊至十五歲。幸得仙翁指示，引至一石室中，煉藥回生，丹成九轉，凡塵之事，一概閑拋。後四十年，兄初皆尋之，不獲。適道士善卜，乃得兄弟相見。兄問羊何在？予曰："在山之東。"往觀之，第見白石磊磊而已。予叱石竟成羊焉。兄從此修眞，亦列仙班。予本姓黃，名初平，晋丹谿人。因隱於赤松山，故號赤松仙子，與前從遊之赤松子有異也。予不言，爾等亦莫之知，故自爲之序焉。

妙極！原來這"赤松仙子"還是來自"牧羊之孩"。大概少時"炊糠不繼"之苦於今記憶猶新，這就難怪他老人家日後不忘當年牧羊之苦，"慈悲爲懷"樂於爲普天下之芸芸衆生排苦解難了。至於這"黃大仙"靈與不靈，大概也只有他老人家自己才知道。

這則大仙“自述”見諸黃大仙嗇色園《赤松黃大仙自述》，以及蘇屋村黃大仙祠《黃大仙師序》，顯然係後人所作，與《金華縣志》所載已略有不同。《金華縣志》版本較多，現以光緒年間所撰版本（卷十一《人物》之《方外》）爲例，試作比較——

> 晋皇初平，丹谿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尋之，歷年不獲。後見市中一道士善卜，問之，道士曰：“昔見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得非是乎？”初起聞之，即隨道士去，視之，果初平也。相見悲喜，旣問羊安在，答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之，但見白石累累，曰：“山東無羊也。”初平因與偕往，先行而叱曰，羊胡不起，於是白石皆蠢然變動，成羊數萬頭。……初起喜曰：“我弟其得神仙道乎，亦可學否？”初平曰：“好之便得。”初起由是留就初平，棄妻子學之，絶粒，服松柏、茯苓，至萬日，日中無影，顏如童子，乃俱還。鄉里親戚略盡，復去。臨行以方教南伯逢。其後，初平更號赤松子，初起更號魯班。

看來此“皇初平”即上之“黃初平”了，皆號“赤松子”，故有“赤松黃大仙”之稱。據《金華縣志》所載，金華昔時曾建有“赤松觀”，在縣東北二十里之赤松山，即初平叱石成羊之處，係吳越錢武肅王修，始建年代不詳。至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改稱“寶積觀”，觀東有“二仙祠”（此“二仙”爲指初起、初平二人。故有人謂“黃大仙”並非初平一人，而是指初起、初平兄弟）。縣誌謂當年宮殿、庭宇爲江南道宮之冠，但後燬於大火。至明成化戊戌年（1478）與萬曆甲申年（1584）曾先後重建，但於今無存。唐代詩人孟浩然就曾留下有關赤松道士的詩句：“海上求仙客，三山望幾時；焚香宿華頂，裛露采靈芩；屢躡莓苔滑，將尋汗漫期；倘因赤松子，長與世人辭。”

關於"黃大仙"還有其他多種傳說。一說此黃大仙（初平）即係跟隨葛洪之黃野人。葛洪（284—364）係東晋時道教理論家、醫學家、煉丹術家。傳說初平跟隨葛洪之後，"凡塵之事，一概閑拋"凡四十年，自金華隨師至道家譽之爲第七洞天、第三十一福地之廣東羅浮山採藥煉丹，並隨師母鮑姑學針灸術，後頗有所成。據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十八《怪語》條云："黃野人，相傳葛洪弟子。洪仙去，留丹柱石間。野人服之，居羅浮爲地行仙，往往與人相遇……山中仙靈頗衆，人稀得見，惟黃野人數數與人遇。……大率每年九月六日至九日，黃野人必出，以是日候之，然往往見之不識云。"屈大均在文中記有多處黃野人之離奇神秘傳聞。今羅浮山冲虛觀內尚有黃野人之造像，原有之黃野人庵則已早廢，現存有"赤松黃大仙殿"。昔日之廣州芳村及南海西樵，均建有黃大仙廟，佔地甚廣，構築宏大，惜已無存。唯今廣州越秀山下之千年古觀"三元宮"保存尚好，有文史雅興者自可從中探求若干微妙話題。

話說遠了，還是讓我們將話題轉回香港來吧。有趣的是，這位遠在浙江金華府的黃初平（大仙）氏，何以跋涉千里來港，而且突然在這短短數十年間，聲譽鵲起，名重香江。

據稱，九龍黃大仙祠至今僅有六十多年之歷史。1915年，道侶梁仁庵等人自廣東西樵山普慶祖壇奉接黃大仙師寶像來港，初在灣仔開壇闡教。後來李亦梅、譚傑生、梁仁庵、郭述亭、張殿臣、陳柱石、唐麗泉諸公，於1921年在九龍獅子山下之竹園村現址擇地築園，是爲今黃大仙祠

之基礎。1971年，在嗇色園金禧紀念之際，赤松黃大仙祠重建落成，旋爲全港規模最大的宗教場所之一。

然而這嗇色園也不僅僅是道教場所，園中尚安奉着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畫像，供奉着燃燈古佛，庋藏着道教、佛教和儒家經典，這也是頗有意味的。《黃大仙嗇色園規則》第一條即申明："本園以提倡闡揚儒釋道三教之理性道學，並增設贈醫施藥，以期勸善普濟爲宗旨。"香客至此，何去何從，悉聽尊便。這種特殊的宗教環境，在香港衆多的寺廟道觀之中，也是不多見的。

園中還有不少傳統建築甚爲精美，頗具藝術欣賞價值，如"赤松黃大仙祠"牌坊、黃大仙正殿、迴廊、三聖堂、意密堂、盂香亭、"金華分迹"牌坊以及九龍壁等等，都是值得鑒賞一番的。在孔道門前盂香亭的紀念碑中，有一段文字頗有意思，特别闡明三教同源之意。碑文曰："盂香亭之建設也，廼秉仙師訓示，同以供奉聖佛，闡揚佛法，以成三教同源之本旨。……亭位仙師殿前之左，質取渾樸，不尚雕飾。戶分四門，亭形八角，中奉聖佛，朝夕炷香禮佛。……亭前照壁，忠字留題，用以喚醒世人，點綴五行之景……"。九龍壁上那栩栩如生的九龍塑像，更是"拍友"的好去處。壁上尚有中國佛教協會主席趙樸初之"九龍壁"題字與詩句："昔聞叱起山頭石，今日欣看石作龍；萬古海天添勝迹，九龍翔舞九龍中。"眞是寓意深長，讀來令人回味再三。

文昌武帝

文武廟位處上環荷李活道之“黃金地段”，交通甚爲方便。廟中奉祀文昌、關聖二帝，至今仍香火鼎盛，係香港地最爲著名廟宇之一，也是香港現存較爲完整的一處歷史建築。

上環文武廟始建於何時，今已難以稽考。民間傳說，早在英佔香港前即有此廟，甚至有人猜測爲海盜張保仔捐資所建，但此說於史無證。據現存文武廟中之光緒二十年（1894）《重修香港文武二帝廟堂碑記》，該廟曾於道光庚戌年間（1850）重修過，可見最少當有一百四十年之歷史。碑刻對該廟修建之緣起及年代等均有記載，茲摘錄於此——

> 香港地處廣州口外，一島孤懸，大海環繞。自諸國通商以後，凡海運之入中土者，先至止焉。由是行而商者，皆出其途；生而賈者，視爲樂土。其中羣萃雜處，雖重九譯，靡不梯航而至，以抱以貿，樂其利而忘其勞。獨是遠方之人，自爲風氣，要皆先入以爲主。故其識見卒不爲中土所移易。而聖人神道之教，勢亦遏而不行。嗚呼。地則香港，時至今日，即我中土之人，耳濡目染，身其地亦復心其人，皆意中事耳。而尚勤有功於民則祀之念，用以知其畏神服教有足多者，即於文武二帝廟之重修見之。廟記：曩者重修於道光庚戌之歲，而究其所自始，則詢諸港地之故老，亦無明徵。嘗考文昌七星石申星經，以爲主營計天下事。而於開文運與司文柄，初未及言；至道藏諸書，始舉張仲以實之。其所言果報之說，深有合於聖人惠迪吉從逆

凶之旨，以挽世道人心之將墜。武帝事蹟在史傳第蜀志一編，僅存大略。其所著靈感於後世，又非陳壽所及知。然此始不具論，蓋誠則能格，感而遂通。……溯庚戌之歲重修，迄今數十寒暑，廟貌漸就摧剝。港之人仍其棟宇之舊制，而新其丹雘焉。

誠如碑中所記，文昌"開文運與司文柄"，係神話故事中主宰功名、祿位之神。據傳文昌帝君姓張名亞子，號梓潼，晋朝人，生於太康八年（287）二月初三日，居蜀七曲山（今四川梓潼縣北）。唐宋時，封至英顯王。據道教傳說，玉帝命其掌管文昌府與人間祿籍，故元代仁宗延祐三年（1316）加封爲"輔文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後又將之與天上主文運之星宿文昌星合而爲一，稱文昌帝君。唐劉禹錫有詩云："莫道騷人在三楚，文星今向斗牛明。"此"文星"即上所指之"文昌星"，皆源於道教之傳說。而武帝者則於史有本，是即三國蜀漢大將關羽，被奉爲忠君之臣。後經歷代封建帝王渲染、神化而尊之爲"帝"。關羽字雲長，出生年月不詳，河東解縣（今山西臨猗西南）人，從劉備起兵，曾爲曹操所俘，後仍歸劉備。建安十九年（214）鎮守荊州，二十四年兵敗身亡。明朝時封之爲"協天護國忠義大帝"。清代祀典，除崇祀大成至聖先師孔子外，文昌及關帝，均在崇祀之列。每歲舉行春秋二祭，春祭文昌帝君在夏曆二月初三日，秋祭在八月，擇日舉行。春秋二祭關聖帝君在夏曆二月與八月。文昌之於香港，知名度似不太高。倒是這位關老將軍，在這現代都市中竟被崇奉爲保護神，成了一位家喻戶曉的歷史人物。

荷李活道之文武廟，歷經多次重修，於今仍保存甚好，可謂香港地一處不可多得之古建築。該廟宇構築精巧，色彩絢麗，廟前護欄拱衛，"文德武功雙帝祀，神恩聖澤五

環安”的門聯十分引人注目。廟堂平面呈二進式，有前後殿之分，中間是一加蓋天井。後殿正中供文武兩帝，其左側爲城隍，右側爲包公，中間置有香案。天井懸掛巨型塔香，設精美銅香爐、梵化爐多個。前殿有屏風以及十殿閻王、福德祠。廟堂縱深近八十呎。廟中終日香客不絕，香火鼎盛，也是頗爲吸引海外遊客的一處小小名勝。

正是由於文武廟在一些香港人的心目中迷而信之的地位，因而早年也曾出現過文武廟前斬鷄頭誓願的有趣故事，意謂發誓而有僞，其命運將受上天嚴懲，有如此鷄之身首異處，不得好死。據説有畏神鬼而又做賊心虛者，不敢在廟前發誓，是非曲直因而可由此判斷。這大概與這些人畏懼關羽這位武功蓋世的紅面將軍的心理有關。四十多年前由黎晋偉主編的《香港百年史》一書，曾收錄有一則關於在文武廟前斬鷄頭誓願的故事，謂1918年9月17日，有商人李文溪及和隆店因錢債問題，控告陳裕文，請法庭判明陳裕文是否爲昌興號店東。昌興號司理馮玉南出庭作證，要求原告證人許籍華前往文武廟斬鷄頭誓願。許表示同意，但要被告陳裕文同去。法官同意其要求。至誓願當日，高等法庭翻譯陳國英用黃紙繕寫了一份措詞極爲毒辣的誓詞，雙方買了砧板一塊、雄鷄一隻、菜刀一把及香燭等物，由兩位律師陪同前往。但到達文武廟後，被告陳裕文要求原告先誓。原告不肯，故斬鷄之事未能舉行。次日雙方到法庭要求判斷，原告律師亞立巴士稱，被告陳裕文已犯簽假名、發假誓之罪，自應先斬鷄頭發誓，而不該讓原告先誓。後法官宣佈取消殺鷄爲誓之舉，並依法律判決原告勝訴。

這種在文武廟前斬鷄頭誓願之民間習俗，實在近於兒戲。1851年12月30日，香港高等法院翻譯高和爾（後任總登記官兼撫華事務官）即曾呈文按察司，歷數此法之六大弊端，主張廢之。在馬沅《香港法例匯編》一書中，對此有頗詳記述。除“殺鷄爲誓”外，早年香港法院所採用之華人習俗誓願方式，還有“擲地碎杯”、“焚化黃紙”等。當然，這種早期的習俗在現在看來，只能是成爲人們閑談叙舊之笑柄而已。

不過，作爲一處歷史古迹，文武廟的保存確是有其自身價值。目前與文武廟相鄰的是列聖宮與公所、三處風格相似之古式建築沿荷李活道一字兒擺開，頗具氣派。在尺土寸金之高層樓宇“狹谷”中，尚能如此完整地保存一處古建築羣，也算是難得了。

沙頭海角

沙頭角位於新界的東北部，瀕臨大鵬灣的沙頭角海，背倚巍峨蒼翠的梧桐山，從上水、粉嶺驅車約二十分鐘即可抵達。如果經沙頭角口岸前往深圳旅遊，乘車穿過梧桐山隧道，十五分鐘便可到達市中心，交通甚爲方便。它那獨特的地理環境、帶有幾分神秘色彩的“中英街”以及近年的經濟變遷，使這小小的沙頭角成爲一塊頗爲引人注目的地方。

首先值得一提的還是這“沙頭角”一名之由來。有人說此處因梧桐山流下的河水夾帶泥沙，經過漫長的歲月沖積而形成海角的一處淤積地，遂有“沙頭角”之稱。傳說清朝時有一位大臣，有次來此地巡視，但見碧濤粼粼的海灣與銀白如洗的沙灘，不禁詩興大作，脫口吟出“日出沙頭，月懸海角”的佳句，“沙頭角”因而得名，云云。

不過，如果單純從邊界劃分的獨特地理環境來考究，則還是短短的數十年前的事情。1898年6月9日，英國與清政府簽訂了《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專條》規定:“今中英兩國政府議定大略，按照粘附地圖，展擴英界，作爲新租之地。其所定詳細界綫，應俟兩國派員勘明後，再行劃定，以九十九年爲限期。……查按照粘附地圖所租與英國之地內有大鵬灣、深圳灣水面，惟議定，該兩灣中國兵船，無論在局內、局外，仍可享用”。英國在

末正式接管新界之前，曾派當時香港政府輔政司駱克（J.H.S.Lockhart），會同廣東補用道王存善，於1899年3月18日共同勘界。次日，雙方簽署了《香港英新租界合同》，對邊界的走向作了規定——

> 北界始於大鵬灣英國東經綫一百一十四度三十分潮漲能到處，由陸地沿岸，直至所立木樁接近沙頭角（即土名桐蕪墟）之西，再入內地不遠，至一窄道，左界潮水平綫，右界田地，東立一木樁，此道全歸英界，任兩國人民往來。由此道至桐蕪墟斜角處，又立一木樁，直至目下涸乾之寬河，以河底之中綫爲界綫，河左岸上地方歸中國界，河右岸上地方歸英界。沿河底之綫，直至逕口村大道，又立一木樁於該河與大道接壤處，此道全歸英界，任兩國人民往來。此道上至一崎嶇山徑，橫跨該河，復重跨該河，折返該河，水面不拘歸英、歸華，兩國人民均可享用。此道經過山峽，約較海平綫高五百英尺，爲沙頭角、深圳村分界之綫，此處復立一木樁，此道由山峽起，即爲英界之界綫，歸英國管轄，仍准兩國人民往來。……

同年4月，英國完成了對新界的接管，沙頭角也就變成了邊界上的市集了。

對於上文《香港英新租界合同》中“北界始於大鵬灣英國東經綫一百一十四度三十分潮漲能到處”一語，在後來的有關文件中提法略有不同。現將1901年5月31日《香港英新租界水面照會》中有關內容摘錄於下——

> 爲照會事：新租界水面英國之權至何處一事，現准香港總督來文內開：“本港政府並不以爲英權可至流入海灣之河港與流入租界深圳河之河港，但可至各海灣水盡見岸之處與深圳全河至北岸之處。至於流入各海灣及流入租界深圳之各河港，本港政府甚願於各該河港口，由此岸水盡見岸之處，至對岸水盡見岸之處劃一界綫，爲英國權所至之止境”等因。本總領事查香港總督文內有深圳全河至北岸一語，自是指租界內之深圳河

至陸界相接之處爲止。

（摘自《英國領事致兩廣總督照會》）

……惟謂各海灣潮漲能到之處與深圳全河至北岸潮漲能到之處爲英權所可至，語頗寬泛，易滋誤會。嗣後新租界各海灣與華岸毗連者，應以沿灣水盡見岸之處爲界……。

（摘自附錄《兩廣總督陶模諮總理衙門文》）

到過沙頭角的人都可以看到，從伯公坳到大鵬灣這一段，基本上是以從梧桐山流下來的一條小河爲界的。但在小河流至大鵬灣近處（即現在從深圳方向進入沙頭角的橋頭），却右轉彎而從西邊入海。現在還可以見到在橋頭的右側河底近中綫處有一斜立於河中的界碑，這就是刻有"中英地界"字樣的第八號界碑。從第八號界碑向右轉，即現在橋頭前方不遠處，便是第七號界碑，原來的小河便是從這個方向折向西入海的。由於原有河道狹小，水流不暢，逐年淤塞，而致後來小河被迫改道直入大鵬灣，就成了目前橋頭入海這一段的河道。而原來的舊河道却幾經淤積而成了陸地。現在的中英街就是原來淤積的舊河道的位置，以街中心的石碑爲界，左側爲華界，右側爲英界。正是這條全長僅約二百五十米的中英街，成了沙頭角最有特色的街道，兩側商店林立，生意興旺。"英界"一側擺滿出售時裝、金飾、百貨、食品、烟酒等攤檔。"華界"一側新建的銀行、商場、書店，替代了昔日低矮的舊式房屋。街道中間既無圍牆，也無鐵絲網，熱鬧的街景使人難以尋覓它的過去。更有不少大陸遊客遠道而來，以一睹中英街之"廬山眞面目"爲快。

有些初到沙頭角的遊客，由於不瞭解這段歷史，誤以爲當初劃界時將沙頭角一分爲二，其實不然，原有的桐蕪

墟位於華界之內，英界的墟市是後來沿河界右側發展起來的。中英街過去缺乏排水系統，路面寬僅三至六米不等，且崎嶇不平，特別雨天，行人甚感不便。1983年雙方經協商，決定統一對中英街路面進行全面整修，除了保持原有碑石的位置和街道的寬度外，統一鋪設了水泥路面。而現有的八塊界碑，則是在1899年勘界時的木樁位置上改立的。石碑華界一側刻有“光緒二十四年·中英地界”字樣，英界一側刻有“ANGLO—CHINESE BOUNDARY 1898”的標誌，並各自注明係第幾號界碑。太平洋戰爭期間，部份界碑曾被日軍移動。1948年，曾由當時的新界民政署長班輅與廣東省政府民政廳長徐景唐會同有關人員，重新勘定，豎立被移動的界碑。這種狀況一直持續至今。

然而，現在到沙頭角旅遊尚有若干限制。由於兩邊都同名之爲“沙頭角”，因此，香港居民從新界聯和墟方向出發前往英界的“沙頭角”，過了蓮雀嶺以後便進入“禁區”範圍。而內地遊客從深圳市區前往華界的“沙頭角”，則需持有特許通行證才能進入鎮內。不過，也許正是因爲這樣，才更爲沙頭角增添了幾分神秘的色彩。

宋城漫筆

香港，似乎與大宋王朝存在着一層特殊的關係。在這遠處南疆之濱海一隅，竟然保存了多處與宋代有關的古迹與傳說——宋皇臺、侯王廟、梳妝石、落馬洲……，大宋的歷史（960—1279）正是在這裏翻過了它那蒼涼的最後一頁。然而，意想不到的却是在這南宋滅亡七百周年後的1979年，一座仿古的宋代“城池”建築，又屹立在這繁華的現代都市中，與周圍的摩登樓宇相映成趣，引人矚目。這歷史的巧合本身就足以令人爲之浮想聯翩。

宋城——這座面積僅有數千平方米耗資一千五百萬港元興建的“迷你”型仿古建築，就座落在九龍西北部荔園遊樂場的一角，它的主人爲香港亞洲電視董事長邱德根，承建者則是從內地請去的兩位福建人士。自從1979年落成開放以來，宋城一直是香港最爲吸引遊客觀光的旅遊點之一，在一些外國旅遊者的印象中，這座不成其爲城的“城池”，其知名度甚至似乎超過了它的老祖宗——河南的開封“城”。據說，這“宋城”的創作靈感與籃圖設計，正是源於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的。

張擇端，字正道，北宋東武（今山東諸城）人，自幼讀書，遊學於汴京（今河南開封），性習繪事，工於界畫，徽宗時供職於翰林畫院，尤擅於繪舟車、市肆、橋樑、街道、城郭等，《清明上河圖》即爲其代表作。畫家以其嚴

謹的構圖、嫻熟的技巧，忠實而生動地再現了北宋汴梁城清明時節的社會生活風貌，“其中位置。若城郭、屋廬之遠近高下，草樹馬牛驢駝之大小出沒，以及居者、行者、舟車之往還先後，皆曲盡其意態，而莫可數計，蓋汴京盛時偉觀也。”張擇端的這幅《清明上河圖》，近千年來一直是中國美術寶庫中的奇葩，成爲學者們研究宋代社會歷史的稀世珍品。雖然香港地的這座“宋城”之藝術價值，實在難以與《清明上河圖》媲美，但畢竟慰情聊勝於無，在這石屎森林中獨闢蹊徑，對於有懷古雅興者，多少尚可領略到幾分“大宋”的昔日韵味；對於遠涉重洋來港旅遊觀光的外國人士，更不失爲尋幽訪“古”之一大去處。

話雖如此，宋城的設計、施工應該說還是有頗高的藝術造詣的。那古樸典雅的城牆與斗拱飛檐的武樓建築，一下子就把遊客的思緒帶進了一千年前的宋代社會。漆有朱紅“宋城”字樣古色古香的巨型燈籠高懸在城樓兩側，遍插在雉堞上五顏六色的大宋犬牙三星幡迎風飄揚。身着宋代服裝、手持差棒的僕役佇立門側，笑容可掬的古裝小姐迎接着每一位來“大宋”造訪的客人。城門內牆煞有介事地高掛着大宋宣和二年四月十日發佈的《通緝令》……此時此地，確是令你大有置身汴京街頭之感。

城內建築也仿照宋代風貌而設計。入城門數步，便是幽幽小河，精美別致的木造拱橋橫跨兩岸，堤邊垂柳絲絲，繁花簇簇，彩燈高懸，幡旗飄蕩。而河中畫舫相依，漁翁垂釣，亭台倒影，波光搖曳。小河左岸是古色古香的沁園春酒莊、宜春酒寮、素濤軒茶寮、博古齋裝池……古樸淡雅，錯落有致，一泓綠水，一曲清唱，香茗甘醇，陶人心

醉。右岸也甚具東京古道韵味，橋側是富麗堂皇的豐樂樓酒家，備有傳統的中國酒菜，還有店小二精彩的拉拉麵即席表演，皆令外國遊客爲之傾倒。你還可用那隨門票贈送的印有天聖元年“戶部奏准印造”的“大宋通行寶鈔”，買到你所喜愛的各式小吃。走過街心豎立的大型牌坊，便是錢莊、酒家、香店、藥舖等各式固定舖戶與露天攤檔。其中尤爲有趣的是在街頭相掌算命的“一禪居士”，口若懸河，維妙維肖，以其流利的英文爲遠道而來的異邦遊客預卜未來，指點迷津。大街轉角處爲神氣飄逸的二郎神廟，最後則是王員外的大富之家了。

不過，最吸引人的旅遊項目還是在豐樂樓前觀看節目表演。這裏既有中國的民族舞蹈與地方戲劇，也有傳統的雜技頂碗、神鞭、水流星，還有魔術、耍猴、拳擊與劍術，而其壓軸好戲則是迎親花轎表演。伴隨着“嘭嘭”的銅鑼聲與熱烈的嗩吶聲，一支迎親隊伍款款而來，如花似玉的新娘步出花轎，在媒婆、伴娘的簇擁下，與風度翩翩的新郎同拜天地，隨後向如痴似醉的來賓報以甜甜的嫣然一笑，觀衆爲這舞台上也難得一見的有趣場面報以熱烈的掌聲。據說這是世界上“結婚”次數最多的一對“夫妻”，已經歷過如此數以千次的迎親大禮了。

遊覽宋城，還有一個不可遺忘的角落——蠟像館。這裏陳列了中國歷史上的七十多位人物塑像，雕刻逼眞，栩栩如生，從軒轅黃帝到近代俊傑，既有聖賢明主，也有昏君帝后，既有民族英雄，也有民間傳說等，堪稱宋城一絕。

在香港衆多的旅遊點中，宋城以其獨特的設計而別樹一幟，名揚海外。盡管其門票收費居全港各類公衆娛樂場

所之冠（最便宜的下午場也需一百二十元，）但每天仍吸引了數以千計的遊客（特別是外國遊客）至此一睹風采。宋城之行，着實令人感慨良多，如此區區之地，竟然也再現了宋代京城之一角風貌，使你不得不佩服其構思的精妙與施工的技巧，商人們的"創作靈感"有時就不亞於那些舞文弄墨的文人雅士，一幅千年名畫竟如此"古爲今用"，這大概是張擇端始料之所不及的吧。

遷海復界

清代康熙年間，沿海地區曾遭受過一場毀滅性災難——遷海事件的打擊。新安地處南海之濱，其中現香港地區所屬範圍幾乎都在遷界之列，其破壞尤爲慘重，屈大均嘆之“自有粵省以來，生靈之禍，莫慘於此”。（見《廣東新語》卷二《地語》之《遷海》條）實爲香港古代史上令人最爲悲痛的一頁。

遷海復界是清代初年影響重大的歷史事件。順治、康熙年間，曾率兵收復台灣的將領鄭成功（1624—1662），極力反對其父降清，以金門、厦門爲基地，組織海上武裝與清政府對抗，並頻頻出擊廣東及江浙一帶，對清政府構成甚大威脅。清政府認爲“若無奸民交通商販，潛爲資助，則逆賊坐困以待”。故爲斷其來源，清廷先是於順治十三年（1656）發佈“禁海令”，禁止沿海商民船隻出海，也不許片帆入口，嚴禁外國商船來華貿易。隨後又於順治十八年(1661）頒佈“遷界令”。康熙元年（1662)，清政府勒令廣東沿海東起饒平大埕所，西迄欽州防城，包括新安、東莞、新會、香山、惠來、海豐等共二十四州縣之居民，概行內遷五十里，界外所有莊舍田宅悉被毀棄，城堡台寨概行拆毀，違者立斬不饒。康熙三年，清廷復下令再遷三十里。根據以上所劃界範圍，新安縣被遷的地界竟達三分之二，連縣治南頭也被遷徙，以致於康熙五至八年

（1666—1669），一度裁撤新安縣而歸併於東莞縣。而今香港地區東北自沙頭角起至西北之新田、米埔一帶以南地區，皆屬遷界之列，包括沙頭角、鹿頸、烏蛟田、新娘潭、沙螺洞、汀角、船灣、西貢、蠔涌、清水灣、瀝源堡、沙田圍、鯉魚門、茶菓嶺、吉澳、塔門、大浪、赤徑、新田、米埔、元朗、厦村、屛山、掃管笏、大欖涌、荃灣、深水埗以至長洲、坪洲、青衣島、香港島、大嶼山等處，其對香港地區破壞之烈，由此可見一斑。

遷海之舉，爲沿海地區社會、經濟生活帶來之危害，時人屈大均曾有過頗詳之紀述："歲壬寅（康熙元年）二月，忽有遷民之令。滿洲科爾坤、介山二大人者，親行邊徼，令濱海民悉徙內地五十里，以絕接濟台灣之患。於是麾兵折界，期三日盡夷其地，空其人民，棄貲携累，倉卒奔逃，野處露棲。死亡載道者，以數十萬計。……先是，人民被遷者以爲不久即歸，尙不忍捨離骨肉。至是飄零日久，養生無計，於是父子夫妻相棄，痛哭分携，斗粟一兒，百錢一女。豪民大賈，致有不損錙銖，不煩粒米，而得人全室以歸者。其丁壯者去爲兵，老弱者展轉溝壑或合家飲毒，或盡帑投河。有司視如螻蟻，無安插之恩；親戚視如泥沙，無周全之誼。於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數十萬計。民旣盡遷，於是毀屋廬以作長城，掘墳塋而爲深塹，五里一墩，十里一台，東起大虎門，西迄防域，地方三千餘里，以爲大界。民有闌出咫尺者，執而誅戮。而民之以誤出牆外死者，又不知幾何萬矣。"（見《廣東新語》卷二《地語》之《遷海》條）新界龍躍頭鄧氏族譜中《移村記》也有類似記載，謂其時"插旗定界，拆房屋，驅黎民遷歸界內。

設整台、鑿界埂，置兵禁守，杜民出入。越界者解官處死，歸界者糧空絕生”。海禁、遷海之暴政，實乃罄竹難書，理所當然爲擧國民衆，尤其沿海州縣所强烈反對，廣東之番禺、惠州等地便激起多次起義，遂有王來任上疏請求復界之擧。

王來任係廣東巡撫，他親睹粤省之實況，故於康熙七年（1668）臨危上疏，力陳遷海之害與復界之急，謂“粤負山面海，疆土原不甚廣，今棄於海濱之地，一遷再遷，流離數十萬之民，每年抛棄地丁錢糧三十餘萬兩……”籲請“將原遷之界，悉弛其禁，招徠遷民，復業耕種，與煎曬鹽斤。將港內河撤去其樁，聽民採捕。將腹內之兵盡撤，駐防沿海州縣，以防外患，於國用不無小補，而祖宗之地又不輕棄，於民生大有裨益。”清廷終於在康熙八年(1669）下令允許部份地區復界。後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平定台灣，“遷界令”始正式宣佈廢止。

但初時復界而不復海，海禁依然如舊，這對於濱海地區居民之社會經濟活動仍然構成極大威脅，復界之初，渡船不通，百物騰貴，惟穀價賤，重建家園之難，生活之苦，實乃催人淚下。“村之移也，坼房屋、荒田地，流亡八載，餓死過半。界之復也，復田而不復海，無片瓦、無寸木，蓋茅屋與昔年瓦屋無異。新安邑抵大洋，無渡船通濟載運貨物，麥粟百物皆貴，惟穀特賤，以其無通濟也……故移村苦，苦於八年，死生之數已定；復村苦，苦於穀賤，催科之累難逃。……故日新安偏邑，魚鹽爲利，海界不復，渡船不通，究竟同歸於盡云爾。”（見新界龍躍頭鄧氏族譜《復界記》）這是復界初年新安人民生活之寫照。

復界之後，香港地區除原有部份居民回遷之外，又陸續有來自福建、潮洲以及東江、北江、韓江流域等地居民在此定居。幾經艱苦創業、慘淡經營，在康熙年間成批遷入本區而有史可考者，有分佈於大埔、西貢、荃灣、元朗及大嶼山等處村落約二十餘處。及至雍正、乾隆年間，香港地區人口增多更趨明顯，嘉慶二十四年（1819）王崇熙纂修《新安縣志》時，當地已設有客籍村落約一百九十多處。有感於王（來任）、周（有德，復界時之兩廣總督）二公之功德，新安人民乃建王來任祠以爲紀念，包括西鄉（今深圳寶安縣）、上水（石湖墟）、沙頭角各一所。在新界錦田，則建有周王二公書院，"旣爲恩公崇祀之所，復爲多士文化之堂"，（見《五次重建周王二公書院記》）成爲新界早年興學育才之所。每年農曆五月十九及六月初一周王二公誕辰，當地鄉民仍設祭爲之紀念

海盜春秋

現代的香港以其驕人的經濟奇迹而譽滿全球，令人矚目。然而，殊不知歷史上的香港却曾一度有過所謂“海盜巢穴”的聲名，雖說是物換星移，時過境遷，張保仔一類的傳奇故事早已成爲人們茶餘飯後的話柄，但當年那横行一方的江洋大盜，却是足以使人爲之談“盜”色變，毛骨悚然的。

“海盜”問題在香港已有很久的歷史了。東晋末年（399—402），孫恩、盧循起義，後孫恩戰死，盧循爲劉裕所敗投水而亡，餘部即有部份退居大嶼山等地。早年這批開發大嶼山的居民，就曾被一些史書稱之爲“盜”。這大概算是香港地區有史可查的最早“海盜”。南宋慶元三年（1197），大嶼山島民不堪鹽法苛擾，入海起事，清阮元《廣東通志》之《前事略》引《朝野雜記》云：“大奚山（即大嶼山）在廣東島中。慶元三年，提舉徐安國捕鹽，島民嘯聚爲盜，劫高登爲首，殺平民百三十餘人。”可見上舉兩例均係官逼民反、“落海爲寇”的農民起義。至明代以後，新安一帶“海盜”活動甚爲頻繁，史籍中有關之記載，觸目可見，明代著名盜魁即有許折桂、溫宗善、何亞八、曾一本、李魁奇、劉香等，現僅以王崇熙《新安縣志》卷十三之《寇盜》所錄爲例，列舉於下——

嘉靖十二年（1533），海寇許折桂、溫宗善入寇東莞，千

戶顧晟追捕於春花洋，戰死。後海道江艮材平之。

三十年（1551），海寇何亞八率彝人入寇，東莞所千戶萬里守南山烟墩，遇賊戰死。後指揮使李茂材率官兵剿之。

四十五年（1566），流賊黃西喬等屠劫鄉村，總兵俞大猷討之。

隆慶元年（1567），海賊曾一本入寇，官軍追剿至雷州港，守備李茂材死之。

四年（1570），倭寇流劫鄉村，百戶吳綸率鄉兵戰死。後總兵郭討滅之。

五年（1571），倭賊攻大鵬所，舍人康壽柏禦之……

萬曆八年（1580），老萬山賊肆劫，海防同知周希尹遣兵討平之……

崇正（崇禎）三年（1630），艚賊李魁奇入寇，參將陳拱死之。艚寇百餘隻闌入，拱督寨兵禦之於佛堂門外，擒七艘鹹之。賊忿，直至南頭海，拱以兵少不能禦，入城。賊因登岸設雲梯攻城，守陣者燒大銃斃賊首，折其梯，賊乃解去，南頭地方，盡被焚劫……

六年(1633)，艚賊劉香入寇，閩撫將鄭芝龍敗之。劉香乘風突入。是年二月，直泊虎頭門，殺死守銃台兵，遂抵省河下，芝龍率師出剿，戰于赤崗，破之，賊乃遁去。

七年，劉香復入寇。五月二十日，賊二百餘艘，泊南頭，時總鎮鄧督兵禦之，生擒數賊，賊遂揚帆劫新會之江門。七月初三日，復入南頭，會颶風大作，我兵乘風擊之，賊敗而去。

八年，劉香復入寇，閩撫將鄭芝龍平之……

清代自順治至嘉慶年間，著名盜魁則有黎忠國、李奇、郭婆帶、鄔石二、鄭一、張保仔等——

順治二年（1645）十月十五日，海寇黎忠國、徐鄭石馬等賊，兩次游移流劫，官兵鄉勇禦之，無所掠而去。

（康熙）十一年（1672）九月內，台灣巨逆李奇等，率寇船流劫地方，游移蠔涌，登岸屠掠鄉村。知縣李可成、游擊蔡袒統集鄉勇官兵，協力擒剿，賊見勢難與敵，回奔無路，遂潛

逌灑源等山，李可成旋督兵洩捕，盡行擒殺，地方始寧。

十五年（1676），海賊自惠陽入寇，所過鄉村，盡行屠掠，遂據縣城，次年始克恢復，民獲安堵。

十九年（1680）五月二十九日黎明，海盜突入西鄉、大涌二處，劫掠至盡乃退。六月初一，賊泊白石海沙江，沿劫厦村一帶，唯鷄柏嶺一砦力拒數日，賊百計攻陷，屠戮無遺，僅存在外者二三人。

嘉慶九年（1804），郭婆帶、鳥石二、鄭一等，流劫海洋，擄掠居民，有財者勒贖，無財者逼之爲賊，聲勢日熾，大小匪船，不下千餘艘。不特海面縱橫，即陸地亦遭焚劫。凡濱海村落，皆設立丁壯防守，邑屛山、固戍、榕樹角、灣下等處，俱被賊圍攻，以守禦嚴乃退。

十三年（1808）閏五月廿一日，賊船數十在城西海面肆劫，左翼鎮林國良率師船十九隻，與賊力戰而死。

十四年（1809）十月內，郭婆帶等賊船數百號，泊縣屬大嶼山赤瀝角等處。知縣鄭域輪親率繒漁各船往剿。制府百又撥弁兵船隻數百號，把截港口，竟以風色不順，被賊黨脫逃。

十五年（1810），制府百招撫海賊，郭婆帶等投誠，沿海居民遂無烽烟之警，而安耕鑿之常矣。

王崇熙版《新安縣志》成書於嘉慶二十四年（1819），時張保仔已在閩省任上（張氏於嘉慶十五年爲粤督百齡所招撫），故縣誌中未提及他的這段海盜史。而嘉慶二十四年後的情況，就只能在其他史籍中去查證了。根據現有資料，鴉片戰爭前在香港一帶洋面活動之海盜，當以劉香、張保仔等股之影響爲著，後者將另文予以介紹（請參見《張保傳奇》）。而劉香之於香港，則並非因其部衆之多、横行香江而聲名大噪，倒是與“香港”得名之傳說有關。民間流傳着這樣的一則故事，謂當年香港一帶洋面有個叫“香姑”的女强盜，武藝高强，貌美如花，佔據本島，落草爲

生，因此，該島便名之爲“香姑島”，簡稱爲“香島”，“香港”一名即源於此。這則故事顯然是從海盜劉香的故事演變而來的。然而，姑且不說人們是否樂於接受以海盜之名字爲地名，實際上早在劉香出現之前的明萬曆年間（1573—1619），由方誌家郭棐所撰編《粵大記》一書之廣東沿海圖中，早已有“香港”一名之記載，故“香姑”說實不足爲信。大概是此傳說之香艷刺激與富於傳奇色彩而得以在民間廣爲流傳、至今仍爲人們茶餘酒後所津津樂道。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英國佔領香港，海盜之困擾並未減少，其中影響較大的即有十五仔、徐亞保等股。前者主要嘯聚於高雷海域。1849年10月8日，十五仔擁主力曾與英國海軍激戰於東京灣(即北部灣)，其時十五仔擁有部衆達三千餘人，分乘戰船64艘，配備有火炮1224門，酣戰整日，終爲英軍重創，後十五仔僥倖得以逃脫，遂向兩廣總督投降。而徐亞保力量雖不及十五仔，但却是一個極富傳奇色彩人物，頻具俠義之風，據說所劫多爲鴉片烟船，來去無蹤，使英軍疲於奔命。1849年2月25日，徐亞保就曾仗義懲兇，在港島赤柱黃蔴角村，將闖入民宅調戲婦女又不聽勸阻、行兇打人的英軍皇家工程營上尉科斯達和錫蘭來福槍隊中尉戴亞戳死，棄屍海中。兩年後，徐氏擬步十五仔後塵，接受招撫，乃輕舟赴粵。誰知途經馬士灣（即大鵬灣）時竟爲散匪所截劫，被押解到港。刑訊中徐亞保對前殺死英兵兩人一事自認不諱，被當局判處無期遣戍之刑。後徐亞保在獄中不甘受辱，於1851年4月2日自縊身亡。

在香港開埠初期，還發生多起販賣“豬仔”出國中途

暴動的所謂“海盜事件”。1870年10月4日，粵人郭亞勝等數百人被拐騙自澳門乘法國船“那威里扁諾號”往秘魯，途中郭亞勝等苦力發難，殺船長及水手多人。後郭亞勝因“海盜”罪被解來港究辦。此案經審訊，裁定郭氏被拐販運出洋，爲爭本身自由計起而反抗至於殺人，與自衛殺人無殊，事屬正當，遂判無罪省釋。但其後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開會研討，認爲原判錯誤，訓令香港法院應予更正。

爲對付海盜活動，港府也曾爲此而多次立法，嚴加懲治，但勢仍未減。1874年8月22日，英輪“士拍克號”自廣州開往澳門，中途被劫，船長及船員多人被殺。1890年12月10日，得忌利士輪船公司“南武號”由香港開往汕頭，出海不久即遭騎劫，損失約五萬五千元，二十世紀以後，海盜案仍時有發生，僅二十年代重大騎劫案便有多起發生: 1922年11月19日，港澳輪船瑞安號自港赴澳途中被劫。1926年11月15日，渣甸輪船“新寧號”被劫。1927年10月16日，招商局輪船“愛仁號”被劫。1928年10月，安慶輪船由星洲往厦門遇劫。1929年9月，大阪商輪“地厘丸”遇劫。1929年12月，得忌利公司“海澄號”遇劫，死十四人，傷三十五人，失蹤六十人……

然而，當年在香港一帶海面殺人越貨、橫行霸道的洋海盜和殖民主義强盜，也並非少數。“宏治（弘治）六年（1493），番彝入寇東莞所，千戶袁光捕剿于岑子澳死之。”“正德十一年（1516），番彝佛郎機入寇，佔據屯門海澳，海道汪鋐討之。”（見王崇熙《新安縣志》卷十三）其後英、美、日等國海盜及殖民主義强盜相繼在此肆虐。《新安縣志》、《東莞縣志》、《番禺縣志》、《香山縣志》等史籍均屢

有記載。英佔香港後，這些洋海盜仍有恃無恐，肆意劫掠，爲害甚烈。鴉片戰爭後第一宗被拘捕歸案、經審訊確認的洋海盜爲英國人星克里，該犯原係英艦“亞利爾號”炮兵，於1845年6月19日因海盜罪而判處無期遣戍刑。又英國人芬頓，以護航爲名從事海盜活動，曾殺害葡萄牙人兩名，並截劫華人船隻，於1851年12月被捕歸案，後僅處以有期徒刑三年。葡萄牙籍海員金明太等十人，謀害英商船“希路號”船長羅臣夫婦及大副等七人，也於後被捕押港歸案，其中六人於1853年5月3日被處死刑，另4人判處無期遠戍之刑。1857年7月4日，美國人卜克士因海盜罪被判處無期充軍刑（後在港病死）。1878年10月，英船“吉科佗號”由香港經福州赴澳洲雪梨（悉尼），途中暹羅人亞利、亞生及日本人吉之先後謀殺船長基斯（英國人）及中西船員共六人，次年事敗被押解回港，於同年5月28日被處以死刑。……

歷史上的“海盜”問題，是一個頗爲複雜的問題，既有純屬打家劫舍、殺人越貨的眞正意義上的海盜，也有因不堪生活艱難，官逼民反，鋌而走險，落海爲生者。既有不顧海禁、出海從事對外貿易而被誣爲“奸民”、“倭寇”、“海盜”者，或因海禁而致變“商舶”爲“寇舶”者，也有亦商亦盜，身兼商人與海盜雙重身份者。還有越洋而來，無法無天的英、美、日、葡等國的洋海盜和殖民主義强盜，等等。在早年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香港一帶洋面之“海盜”爲患，眞有點“史不絕書”之慨。進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這一帶的“海盜”活動才基本上消聲匿迹。但是，香港早年歷史上的這一頁，却是頗爲値得研究的。

張保傳奇

在香港古代的歷史傳說中，最爲人們所熟悉的，大概莫過於張保仔的故事。然而，歷史上的張保仔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物呢？故老相傳的故事與歷史事實的記載有何不同呢？這確是十分有趣的。還是讓我們到史籍中去尋找他的蹤迹吧。

清代嘉慶年間，在南海海面上活躍着一批打着紅、黃、藍、白、黑、青諸色旗號的海盜。其中張保仔所在之"紅旗"幫勢力較爲强大，並頻頻劫掠沿海鄉鎮。陳伯陶纂修的《東莞縣志》卷三十三載，嘉慶八年（1803），"海寇郭婆帶、鄔石二、鄭一等流劫海洋，掠新安等鄉。"此鄭一即張保仔之"養父"。陳伯陶在縣誌中引袁永綸《靖海氛紀》，對這段歷史及各幫海盜均有頗詳記述——

> 粵東海盜，時起時滅，由來久矣……嘉慶六年……鄭七大敗中炮死，從弟鄭一遂領其衆，劫掠海上，水師總兵官黃標屢敗之。其後海賊紅、黃、青、藍、黑、白諸旗蜂起。吳知青，號東海伯，黃旗，李宗潮附之。麥有金，號鄔石二，藍旗，其兄麥有貴、弟有吉附之。以海康附生黃鶴爲謀士。郭婆帶，黑旗，馮用發、張日高、郭就喜附之。梁寶，號總兵寶，白旗。李尚青，號蝦蟆養，青旗。鄭一，紅旗。又有閩賊蔡牽爲之聲援，海寇愈熾。惟張保後出，復有蕭嵇蘭，號香山二，梁皮保，蕭步鼇皆屬焉，而張保又屬於鄭一妻石氏。張保者，新會江門漁人子，年十五，隨父捕魚，遇鄭一爲所擄，鄭一嬖之。未幾，使爲頭目。鄭一溺死，石氏領其衆，人稱鄭一嫂。石氏與保通，

使領一隊。保事石氏甚謹，每事稟命而行。保日事劫掠，其黨漸衆。鄉民貪利者，接濟酒米貨財，計其值而倍之，有強取者立殺，以故米糧火藥皆不匱。

上書可見，張保仔原爲新會江門漁家子，十五歲隨父出海捕魚時，爲海盜鄭一所擄，甚受寵愛，被鄭一收爲養子，張辦事精明強悍，不久即成爲鄭一手下一頭目。嘉慶十二年（1807）十月，鄭一遇風溺斃，鄭一嫂石氏繼爲首領，與張保仔關係曖昧（後終爲夫妻），加上張辦事謹慎，遂爲“紅旗”幫首領。

張保仔掌權“紅旗”之後，紀律甚嚴，故其米糧、火藥皆有來源，盛時擁有部屬竟達三四萬之衆，船艦也有五六百艘之多，雖然在粵東海面橫行時間並不太長（自嘉慶十二年至十五年），但給沿海各縣構成極大的威脅，連兩廣總督也深感棘手。僅嘉慶十三、十四兩年間，張保仔便頻頻給官軍以重創，重大的戰役即有——

嘉慶十三年（1808）七月，新爲“紅旗”幫首領之張保，即與左翼鎮總兵林國良激戰於孖洲洋海面。林總兵求勝心切，誤中張保仔圈套，竟力戰不敵，爲張所執殺。《東莞縣志》卷五十二《宦迹略》對此戰經過有所記錄——

林國良，福建海澄人……（嘉慶）十年授左翼鎮總兵。十三年七月，海賊張保屯舟九龍口伺劫，國良往擊之。賊諜知官軍至，預伏戰艦於別港，先以數舟迎之，佯敗。國良覘其舟少，以二十五艘追之。及孖洲洋，賊舟遽合繞國良舟三匝，自辰至未，國良不能出，致死奮戰，保立陣前，國良發巨炮擊保，其彈子及保身而瀉。未幾，賊逼國良舟，保先鋒梁皮保先飛過船，衆蜂擁而過，國良率軍士苦戰竟日……保欲降國良，國良切齒狂罵，賊以刃刺之，遂死。時年七十。

嘉慶十四年（1809）五月，張保仔與廣東提督孫全謀

先後大戰於萬山及廣州灣。初時，孫全謀以官船四十四艘合圍張保於萬山海面，斬首二百餘級，初戰告捷，孫欲乘勝追擊，復又激戰於廣州灣。張保仔先以一部誘之，再以梁皮保截擊孫部之後，勢成左右夾攻，鄭一嫂再率大隊正面攻擊，孫全謀不支，竟丟下官船十四艘，大敗而逃。

同年七月，護理廣東左翼鎮總兵許廷桂與游擊林孫等，爲剿海盜而屯師香山縣南桅甲門。是月初九，張保仔、梁皮保等率各式船艦二百餘艘，與許廷桂激戰於磨刀洋一帶，自晨早直至酉時（下午五至七時），殺得天昏地暗，又值東南風作，張保仔得風勢，縱火延燒官船三十餘艘，許廷桂舵樓也被焚，衆海盜蜂擁而上，許身受數十創，自知傷重，遂投海身亡。

是年百齡任兩廣總督，採取武力鎮壓與誘降相結合手段對付日趨猖獗之"海盜"活動。《東莞縣志》云："自黃標歿後，官軍少有得利者。近者，林國良戰沒于馬洲，孫全謀失利于澳口，二林走竄于娘鞋，廷桂喪衄于桅夾，銳氣頓喪，兵有畏心，乃欲用以剿滅之，誠未見其有當也。爲今之計，惟斷賊糧食，杜絕接濟，禁船出海，鹽轉陸運，俾無所掠，令其自斃。"復又嚴加搜捕"岸匪潛蹤內地爲之耳目、爲之引導者"，並下令民間聯防練兵，鑄炮置械。此舉果令各旗海盜爲之大困。然而，却又促使張保等幫頻頻出擊沿海各縣，香山、新安、東莞、新會、番禺、順德等縣受害尤甚。同年十月，石氏、張保仔又與香山知縣彭恕所率罟船百艘、葡萄牙船六艘激戰，令官軍、葡船爲之大敗。隨後，提督孫全謀又統集所有師船，圍困"紅旗"於大嶼山赤瀝角，相持達八晝夜之久，但終被"紅旗"突

圍而去。次日百齡駕到，也只能徒嘆奈何。

從上多次戰役，足見張保仔實力之强大，連總兵、提督、總督多次督戰及葡萄牙船隊合剿均未能奏效。然而，大嶼山之戰却出現了一個意外的轉機，這就是促使郭婆帶及張保仔之先後投降。

先是在粵東海盜之中，以張、郭所在之紅旗、黑旗勢力最爲强大，平時因互爲猜忌、分贜不均等因，已存有磨擦，至大嶼山之役張保仔"紅旗"幫受困時，張曾向郭婆帶"黑旗"幫求援，而郭却坐視不救，更促使矛盾激化。及至"紅旗"突圍，張遂與郭火併，張保仔受挫。事後，郭婆帶自知日後難與年青力壯的張保仔作對，遂於嘉慶十四年十二月率其部衆五千餘人並大小船隻七十餘艘、火炮四百餘門投降。百齡授郭以"把總"銜頭，並改名郭學顯，搖身一變，當官去了。

郭婆帶投降之後，官軍得以集中精力對付張保仔"紅旗"幫。石氏與張保仔處境日艱，又見郭婆帶降而得官，故爲之心動，表示"紅旗亦願降"。後經在澳門行醫的周飛熊等人從中穿綫，終於在嘉慶十五年（1810）二月向官軍投降。隨後在香山縣芙蓉沙學行受降儀式，張保仔、石氏共率部衆一萬五千餘人，船二百七十餘艘、火炮一千二百餘門向兩廣總督稱降。張保仔投降後於是年夏天，指引官軍擒殺"藍旗"首領鄔石二，又逼降"黃旗"頭領東海伯等。"未幾，餘賊盡平，海氛遂靖"（見《東莞縣志》）。百齡因在任期間平定粵東"海盜"有功，嘉慶皇帝賞他兩眼花翎，加太子少保銜，給予二等輕車都尉世職。而張保仔亦賞戴花翎，以守備起升，後官至閩安協副將。張保仔

投降後改名“張寶”，鄭一嫂石氏也堂而正之從“夫”張寶到福建去了。

關於張保仔投降一事，四十多年前黎晋偉主編的《香港百年史》曾刊有一份《張保仔投降文書》，寫得頗具文采。不過，此文顯然係師爺們所作，意在點綴百齡平定海盜之功績。但透過文書中溢美之詞句，仍可從中窺見其時社會生活的一個側面，尚不失爲一則有價值的史料，故抄錄於此，以供有文史愛好者參考——

竊謂英雄之創業，原出處之不同；官吏之居心，有仁忍之各異。故梁山三劫城邑，蒙恩赦而竟作棟梁；瓦岡屢抗天兵，荷不誅而終爲柱石。他若孔明七擒孟獲，關公三放曹操，馬援之窮寇莫追，岳飛之降人不殺。是以四海豪傑，效命歸心，天下英雄，遠來近悅。事非一轍，願實粗同，今蟻等生逢盛世，本乃良民，或因結交不慎，而陷入萑符，或因俯仰無資，而充投逆侶，或因貿易而被擄江湖，或因負罪而潛身澤國。其始不過三五成羣，其後遂至盈千累萬。加以連年荒歉，民不聊生，於是日積月累，愈出愈奇，非劫奪無以延生，不抗師無以保命。此得罪朝廷，摧殘商賈，勢所必然也。然而別井離鄉，誰無家室之慕；隨風逐浪，每深萍梗之憂。倘遇官兵巡截，則炮火矢石，魄喪魂飛；若逢河伯行威，則風雨波濤，心驚膽落。東奔西走，時防戰艦之追；露宿風餐，受盡窮洋之苦。斯時也，欲脫身歸里，而鄉黨不容；欲結伴投誠，而官威莫測。不得不逗留海島，觀望徘徊。嗟嗟，罪固當誅，梗化難逃國典；情殊可憫，超生所賴仁人。欣逢大人，重臨東粤，節制南邦，處己如人，愛民若赤。恭承屢出示諭，勸令歸降，憐下民獲罪之由，道在寬嚴互用；體上天好生之德，義惟剿撫兼施。鳥思靜於飛塵，魚豈安於沸水，用是糾合全幫，聯名呈叩，伏憫蟲蟻之餘生，拯斯民於水火。從前冒犯之愆，許今日自新之路。將見賣刀買牛，共作躬耕於隴畝，焚香頂祝，咸歌化日於帡幪。敢有二心，祈即誅戮。

張保仔投降之後情况如何，史籍中鲜有記載。後張保仔官至二品，駐守澎湖，且有薦擢總兵之勢，但因諸多大臣反對而作罷。林則徐在江南道監察御史任內，曾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二月二十七日爲此事上了一道奏摺——《副將張保不宜駐守澎湖並應限制投誠人員品位摺》謂"投誠出身之水師副將駐守海外要地，恐屬非宜，請旨酌令改移，並量予升轉限制，以重名器而肅戎行"，認爲張保仔"距悔罪乞降之始未屆十年，而在營遷轉之階已躋二品，從來升任之速未有過於此者"。兩年後（道光二年，即公元1822年），張保仔死於任上。遺有一子，名張玉麟，蔭襲千總銜，可能爲張保與石氏所生。而石氏因正式嫁與張保仔爲妻而得封爲"命婦"，此事尤爲林則徐所不齒，道光二十年（1840）五月十五日，林則徐就石氏財物糾紛案特地上了一道《追奪張石氏誥封摺》，內稱石氏"即鄭一之妻，改適張保，以叠作萑苻之眷屬，竟濫邀翟茀之光榮，是其名節俱虧，實恐沾污章服。查命婦夫亡再嫁，按律尚應擬罪追奪，所以勵貞操而重名器也。今張石氏係再嫁後請封，尤爲冒混，現尚恃係命婦，平空捏詐，纏訟不休，自應奪其原請誥軸，送部察收，仍將該氏飭族約束稽查，庶足以儆奸邪而維風化。"

張保仔曾經是粤東海面上顯赫一時之風雲人物與著名盜魁，民間傳説賦予了衆多傳奇的色彩，時至今日，人們仍爲之津津樂道，從太平山到大嶼山，從鴨脷洲到南丫島，從牛池灣到海心廟，那扯旗山、西營盤、文武廟、藏身洞、藏金洞、藏寶洞……説將起來，眞是玄之又玄，有的地方至今還是人們假日郊遊探勝的好去處。當然，傳説歸傳説，

史實歸史實，當年曾馳騁南疆、橫行一方而令官軍聞風心寒、屢遭敗績的張保仔一類江洋大盜，是大可不必委身於這區區海島而鑽山洞、藏金寶的。不過，作爲茶餘酒後之趣談，一般讀者也就寧信其有而不信其無，不再去認眞深究那些誌籍中的記載了。

鴉片走私

提起鴉片，人們往往就會聯想起吸毒，以及現代毒品的主要來源——“金三角地帶”。在泰國、緬甸、老撾（寮國）三國交界的莽莽叢林中，有一片三角形地帶，以盛產鴉片而聲名大噪。每當春夏之交，漫山遍野的罌粟花競相怒放，姹紫嫣紅，妖艷惹人。至罌粟結果後，烟農們再割取其汁液，製成鴉片烟土。目前香港的癮君子們吸食的鴉片毒品，就大部份是來自這個“金三角”的。

不過，目前“金三角”的鴉片種植業畢竟還是受到當地政府部門的禁止。而在此二百多年前的印度大陸上，在英屬印度政府的公開支持、強制下，其種植、煉製鴉片的規模却要比今日的“金三角”大得多。而且正是這種罪惡的鴉片貿易，竟然引起了一場對中國近代歷史，以至世界歷史都有重大影響的戰爭——鴉片戰爭，並導致了香港的被逼割讓。

鴉片，係英文Opium的音譯，也作“阿片”、“亞片”、“雅片”，又名阿芙蓉，俗稱大烟。它是上面所提及的那種美麗的二年生草本植物——罌粟（Papaver Somniferum）的果汁經凝縮煉製而成的軟膏。鴉片的主要成份爲嗎啡，含量約爲百分之十，具有興奮中樞神經系統、止瀉、鎮痛、止咳作用，但大量吸食對人體的體力和精神有極大的毒害作用，且一經吸食，極易上癮。據說歐洲人早

在公元前四世紀時就知道嗎啡是一種高療效的止痛劑。到了近代，人們又從嗎啡中提煉出純度更高的生物鹼，即近年來香港的絕大多數癮君子所吸食的海洛英。

罌粟原產於南歐及小亞細亞等地，其傳入中國大約可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唐代（618—907），但那時僅是作爲藥用而已。北宋開寶六年（973）的《開寶本草》中就有關罌粟籽藥用之介紹。明代及清初，外國鴉片是允許與乳香、沒藥、阿魏等一類商品按藥材納稅輸入中國的。明代傑出的醫藥學家李時珍（1518—1593）在其《本草綱目》第二十三卷《阿芙蓉》條中也有頗詳的紀述："阿芙蓉前代罕聞，近方有用者，云是罌粟花之津液也。罌粟結青苞時，午後以大針刺其外面青皮，勿損裏面硬皮，或三五處，次早津出，以竹刀刮，收入瓷器，陰乾用之。"主治久痢、赤白痢下等。1589年（明萬曆十七年）的《陸餉貨物稅則例》中，便規定鴉片每十斤稅銀二錢。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鴉片每百斤稅銀爲三兩。但當時鴉片進口的數量還很少，至1729年（清雍正七年）雍正皇帝正式頒佈第一道查禁鴉片的諭旨時，當年的鴉片進口量也只有二百箱。雖然在十六世紀開始，葡萄牙人就已經開始向中國輸入鴉片，並逐步將澳門發展成爲鴉片走私貿易的基地，隨後西班牙人、荷蘭人也加入鴉片走私的行列，而且正是由於荷蘭人的加入，才將吸食鴉片的方法傳入中國的，這也與後來鴉片輸入的增加有關。根據李時珍《本草綱目》記載，當時服用鴉片的方法有兩種，或單獨吞食，如服金丹；或佐以它藥，煎湯飲服，尚未提及槍管灼火吸食之法。有的史家考證認爲，吸食的方法，始於爪哇土人，其後荷蘭人

將之傳入台灣，再經台灣而傳入福建。也與西班牙人將烟草傳入中國有關。而其後鴉片之大量走私進入中國，則主要是與英國有關的。

英國人到中國的歷史，雖然比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人要遲一些，但也可以追溯到三百五十多年前的1637年（明崇禎十年），是年由英商可甸聯合會派遣的五艘武裝商船，在倫敦號船長威代爾率領下，就强行闖入廣州進行貿易。在此後的將近二百年的時間裏，中國的對英貿易一直處於出超的地位。當時中國出口的商品以茶葉爲最大宗，僅1785年（清乾隆五十年）輸往英國的茶葉便達一千五百萬磅以上。而英國輸入中國的商品則主要是毛織品、金屬製品等，但其工業品在很長的一個時期內，一直難以打開在中國市場的銷路。雖然英國政府在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和1816年（清嘉慶二十一年）曾先後派出馬戛爾尼使團和阿美士德使團兩度來華，提出了開放口岸、減低關税以及割讓海島等要求，但均以失敗而告終。因此，早期的中英貿易，英國人不得不運來大量的白銀（主要是西班牙、墨西哥銀元），以彌補貿易上的赤字。據有關資料估計，在十九世紀初年，從廣州流入的外國銀元，平均每年約達一百萬兩至四百萬兩之間。直至1827年（清道光七年），英國的棉紡織品才第一次在中國市場上取得利潤。

在中英貿易的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英國壟斷對華貿易的是1600年成立的領有“皇家特許狀”的東印度公司。從十八世紀中葉開始，英國的東印度公司通過戰爭，排擠法國、荷蘭的勢力，建立了在印度的統治地位，强迫當地農民大規模種植鴉片，並於1773年（清乾隆三十八

年）實行鴉片壟斷專賣制度。從這一年起，鴉片輸入中國的數量遂逐年增加。1773年，輸入中國的鴉片約一千箱，但至英國政府正式取消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專利權的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時，該年輸入中國的鴉片已經達到二萬一千八百八十五箱，六十年間竟然增加了二十多倍！1834年之後，對華貿易向整個英國開放了，鴉片走私貿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僅僅五年的時間，至鴉片戰爭爆發前一年的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鴉片的走私貿易已達到四萬零二百箱，幾乎翻了一番！鴉片的流毒已從中國的沿海都市滲透到內地的窮鄉僻壤，何其令人震驚！

鴉片販子們走私鴉片有各種各樣的手段。較早的時候，他們或者是先將鴉片運至澳門，再從澳門走私入中國內地，或者是囤積在廣州黃埔的躉船上，公開出售。稍後，鑒於清政府的嚴厲禁烟措施，鴉片販子又將躉船從黃埔移到珠江口外的伶仃洋一帶，通過賄賂清朝官吏，勾結中國私販，用"快蟹"、"扒龍"等特製快艇進行武裝走私。在當年的這場鴉片走私貿易中，規模最爲龐大的可數英資的怡和洋行與寶順洋行，以及美國的旗昌洋行等。僅怡和洋行一家便擁有"Austin號"、"Col · Young號"、"Coral號"、"Governor Findlay號"、"Harriet號"、"Hellas號"、"Jardine號"、"Lady Hayes號"、"Omega號"、"Red Rover號"、"Venus號"等船隻從事鴉片走私，是當年鴉片走私貿易中首屈一指的大洋行。〔英佔香港後，怡和是率先進入香港，並在東角（即今銅鑼灣東角道附近）建立據點的主要洋行之一，並繼續其鴉片走私貿易。英佔香港二十年後的六十年代初期，怡和一年的鴉片生意即達到七

百二十萬兩，超過了它其他各項營業的總和。]

鴉片的走私貿易爲英國政府和鴉片販子帶來了巨額的收入。以1805年爲例，東印度公司的每箱鴉片收購價爲一百六十盧比，但在加爾各答拍賣給港脚商人時則上升爲九百八十八盧比，利潤率爲五點一七五倍。而港脚商人將鴉片販賣到廣州時，每箱已達到三千五百盧比，利潤率爲二點五四三倍，從一百六十盧比暴漲至三千五百盧比，這樣的利潤也可謂驚人矣。據統計，僅在1797年至1817年的二十一年間，東印度公司在加爾各答拍賣鴉片所得的純利潤即達一億一千零五十四萬七千五百八十盧比。鴉片稅收成了英屬印度政府的一個重要的稅源，每年收入約達一百萬英鎊左右，約佔全年財政總收入的十分之一。同時，由於鴉片走私貿易所出現的白銀大量外流，導致了中國對外貿易原有出超局面的逆轉，並出現了銀貴錢賤的情況。據有關資料估計，鴉片戰爭前的四十年間，英國運進中國的鴉片即達四十二萬多箱，掠去白銀約三四億元。十九世紀初年，銀錢的比價按規定是每一兩紋銀可兌換銅錢一千文，至1839年，其兌換率已達到一千六百七十八。如是，既加重了民衆的負擔，又影響了清朝的國庫收入，加深了清朝封建統治的危機。

罪惡的鴉片走私貿易理所當然地受到世界上一切正直人士的强烈譴責。英國歷史學家蒙哥馬利·馬丁（Montgomery Martin，約1803—1868年）當年就曾怒斥過這種比非洲奴隸貿易更殘忍的勾當。他寫道："可不是嗎，同鴉片貿易比較起來，奴隸貿易是仁慈的。我們沒有摧殘非洲人的肉體，因爲我們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們

的生命。我們沒有敗壞他們的品格，沒有腐蝕他們的思想，沒有扼殺他們的靈魂。可是鴉片販子在腐蝕、敗壞和毀滅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後，還折磨他們的肉體。貪得無厭的摩洛赫（注：摩洛赫是古代腓尼基人所信奉的火神，他們把兒童作爲向這個火神貢獻的犧牲品）時時刻刻都要求給自己貢獻更多的犧牲品，而充當兇手的英國人和吸毒自殺的中國人彼此競爭着向摩洛赫的祭台上貢犧牲品。”當時中國國內的一些有識之士則紛紛指出，“鴉烟流毒，爲中國三千年來未有之禍”！（魏源《海國圖志》）林則徐更上書道光皇帝，慷慨陳言：“當鴉片未盛行之時，吸食者不過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於天下，則爲害甚巨，法當從嚴。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

泛濫成災的鴉片走私貿易導致吏治腐敗、民生凋敝、兵弱銀荒，嚴重地威脅着清王朝的統治，嚴酷的現實迫使道光皇帝作出了嚴禁鴉片的決定。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12月，道光皇帝終於任命湖廣總督林則徐爲欽差大臣，馳赴廣東查禁鴉片。1839年6月3日，林則徐將收繳的237萬多斤鴉片（其中英國鴉片販子繳交的鴉片約佔二萬餘箱）全部在虎門銷毀。“六・三”虎門銷烟的壯舉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國人民的禁毒決心和維護民族尊嚴、反抗外國侵略的堅强意志，這是近代中國人民反侵略的一頁偉大歷史。今天，當你前往東莞虎門旅行時，還可以看到當年的銷烟池舊址。緬懷“六・三”銷烟的壯舉，每個炎黃子孫都會爲之感到振奮與驕傲。

穿鼻草約

“六·三”虎門銷烟的壯舉使世界爲之震動。同年9月21日，英國政府接到了駐華商務監督義律（Charles Elliot）關於中國禁烟的正式報告。10月1日，英國內閣開會，決定發動侵華戰爭。這就是歷史上所稱的“鴉片戰爭”。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2月，英國政府正式任命喬治·懿律（George Elliot）和查理·義律爲正副全權代表來華。巴麥尊（Lord Palmerston）還照會中國政府，“英國政府要求中國將英國全權公使所指定的面積敷用、位置適宜的沿海島嶼一處或數處，永久割讓予英國政府，作爲英國臣民居住貿易的地方，”否則，英國必“相戰不息”。英軍就是帶着巴麥尊擬割“□□島嶼”的《對華條約草案》來華的。

回顧英國與香港關係的歷史，其實並非始於鴉片戰爭。早在十七世紀末期，英國人對香港地區就已有所接觸。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卡羅利那”號船就曾在大嶼山停留達二個月之久。十九世紀初年，東印度公司測量員霍士保（James Horsburgh）受命對香港海域進行了廣泛的調查、測繪。1816年（清嘉慶二十一年），英國第二次來華使團路經香港時，阿美士德（W.P.Amherst）與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大班史當東（Thomas Staunton）等人，也曾對香港進行了仔細的調

查，認爲香港“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艮港”。當時英國的鴉片走私船就經常在香港一帶海面停留。長期以來，他們對香港已有相當深入的瞭解。至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正式結束了對華貿易的壟斷權與管理權。從此，鴉片的走私貿易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是年七月，英國派駐中國的對華貿易總監督律勞卑(W.J.Napier，又譯拿皮耳、律勞畢）到達廣州。正是這位商務總監督正式提出了奪取香港的主張。他在致函巴麥尊中聲稱，英國應該出兵“佔據珠江東部入口處的香港島，它非常適合各種目的”。隨後，英國政府奪取香港島的政策，在巴麥尊的直接導演下，逐步由計劃階段過渡到實際行動階段。

1840年4月，英國議會正式通過了發動侵華戰爭的決議案。6月，英國的“東方遠征軍”在全權代表兼侵華遠征軍總司令懿律和海軍司令伯麥（Gordon Bremer）等率領下到達香港海面。但是，由於林則徐的認眞備戰，廣東軍民早已嚴陣以待，所以英軍不敢貿然進犯，遂於6月底離粵北上。沿途犯厦門、陷定海，於7月底進犯大沽口。8月9日，向清政府呈送了《巴麥尊子爵致中國皇帝欽命宰相書》，提出了割讓海島、賠償烟價等無理要求。在英軍的武力威脅下，道光皇帝改命直隸總督琦善爲欽差大臣，赴粵辦理中英交涉，並將林則徐、鄧廷楨撤職查辦。

琦善於11月29日到達廣州。他一反林則徐的做法，撤除防務，裁減兵勇。義律見琦善之所做所爲，態度更爲之强硬，談判一開始，就逼琦善在英方所擬條款上簽字。琦善答應賠款五百萬兩，但對給予地方一款，認爲“格於事理”而加以拒絕。義律並不罷休，遂於12月12日照會琦善，

要求賠款七百萬兩，同時提出如能開港貿易，當可不再求地，要求開放廣州、厦門、定海三個港口。並以軍事相威脅，提出英軍暫屯外洋紅坎山，俟各事善定全完之後再撤回本國。琦善於12月15日照會義律，表示通商口岸一事可以代奏，但重申割地是"天朝從來未有之事，其勢斷不能行。"這一談判準則，基本上反映了當時道光皇帝的態度。

對於琦善的答覆，義律當然不會感到滿足。12月17日，義律又照會琦善，同意中國賠款六百萬，並以繼續佔據定海相要挾，提出除廣州以外，另加福建、浙江或江蘇、福建兩省各一處開港貿易。12月29日，義律又重提割地問題，堅持在增加口岸之外，"予給外洋寄居一所，俾得英人豎旗自治，如西洋人（注"即指葡萄牙人）在澳門豎旗自治無異"。並表示不能再讓一步，再減絲毫。1841年1月2日，琦善照會義律，表示"所稱予給外洋寄居一所之說，查天朝準令外國之人前來貿易，已屬大皇帝格外恩施，斷無再給地方之理，亦經本大臣爵閣部堂備文照會。並據貴公使大臣來文內，聲明不再求地，今何以又有予給寄居一所之語？"在受到琦善的拒絕之後，義律遂下令英軍於1月7日攻佔大角、沙角炮台。

大角、沙角炮台失陷，守軍副將陳連陞父子力戰犧牲，珠江門戶受到嚴重威脅。義律、伯麥以此相要挾，於1月8日照會水師提督關天培，提出要將沙角作爲貿易寄居之所等五項要求。1月14日，義律又照會琦善，要求將尖沙咀、香港等處，"讓給英國主治"，作爲寄居貿易之所。屈於英方的軍事壓力，琦善只得於次日覆照義律，表示允許代奏，讓英國"止擇一處地方寄寓泊船"。琦善的這一許諾是從

未得到清政府的同意的，也從未許諾過“香港一島”，而且也僅爲“寄寓泊船”，决非割讓地。1月16日，義律覆照琦善，提出割讓香港的要求，並將“香港一處”改爲“香港一島”。1月20日，義律一方面照會琦善，聲稱英軍即將開赴香港島地駐紥，一方面單方面以公告的形式宣佈他與琦善已經簽訂了包括“香港本島及其港口割讓與英王”等四項條款的所謂“初步協定”，其內容如下——

女王陛下的全權公使茲宣告他和中國欽差大臣已經簽訂了初步協定，其中包括以下各款：

（1）香港本島及其港口割讓與英王。大清帝國對於香港商業應徵收的一切正當捐稅按在黃埔貿易例繳納。

（2）賠償英國政府六百萬元，其中一百萬元立刻支付，餘數按年平均支付，至一八四六年付清。

（3）兩國正式交往應基於平等地位。

（4）廣州海口貿易應在中國新年後十日內開放，並應在黃埔進行，直至新居留地（注：指香港）方面安排妥當時爲止。

（見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

這個“初步協定”，就是所謂的《穿鼻草約》。

實際上，義律單方面制定、宣佈的這個協定，琦善始終未予簽字或蓋關防，事後也未經中、英兩國政府批准。2月26日，道光皇帝在得到廣東巡撫怡良奏報英軍佔據香港後，即將琦善革職鎖拿解京。英國方面，外交大臣巴麥尊於5月14日在看了英方報紙登載的義律所僞稱的這個公告之後，致函義律稱：“在你和琦善之間，對於割讓香港一節，並不像是簽訂了任何正式條約，而且無論如何，我們可以斷言在你發佈通告的當時，這種條約即使經琦善簽字，也絕不是已經由皇帝批准的；因此你的通告全然是爲時太

早。”英國政府拒絕承認這一“協定”。

義律單方面制定、宣佈《穿鼻草約》之舉，是一個極其危險的信號。它表明英軍正在爲佔領香港島制造“合法”的“法律根據”，一場新的軍事冒險已經逼在眉睫了。

割佔香港

在港島上環的皇后大道與荷李活道交界處，有一塊地方叫做“大笪地”，開埠以來曾長期作爲一處市場，成爲小販擺賣的地方，其英文名字爲Possession Point，直譯其意即“佔領角”。在“佔領角”東側尚有一條“佔領街”（Possession Street，即水坑口街）。何以將大笪地譯爲Possession Point，水坑口街譯爲Possession Street呢？這似乎有點令人費解。不過，歷史告訴我們，就在義律單方面宣佈他與琦善已經簽訂所謂“初步協定”——《穿鼻草約》的第六天，即1841年1月26日，英軍就强行在此登陸，宣佈佔領香港，並舉行了佔領儀式。這塊英軍首先登陸佔領的地方，於是就有了“佔領角”之稱。隨後，在“佔領角”所在地方建設起來的街道也就有了“佔領街”（水坑口街）之名。當年這裏還是瀕海的地段，經過一個多世紀的開山塡海，現在早已面目全非了，海岸綫大約向北推進了三百米。現在的文咸街、德輔道、干諾道等，都是近百年來塡海的產物。

英佔香港後的第六天，即1841年2月1日，義律和伯麥即會銜在港發佈了第一張佈告——

照得本公使大臣奉命爲英國善定事宜，現經與欽差大臣爵閣部堂琦議定諸事，將香港等處全島地方，讓給英國寄居主掌，已有文據在案，是爾香港等處居民，現係歸屬大英國主之子民，故自應恭順樂服國主派來之官，其官亦必保護爾等安堵，不致

一人致（受）害。至爾居民，向來所有田畝房舍產業家私，概必如舊，斷不輕動。凡有禮儀所關，鄉約律例，率准仍舊，亦無絲毫更改之議。且未奉國主另降諭旨之先，擬應大清律例規矩之治，居民除不拷訊研鞫外，其餘稍無所改。凡有長老治理鄉里者，仍聽如舊。惟須稟明英官治理可也。倘有英民及外國人等，至（致）害居民，准爾即赴附近官前稟明，定即爲爾查辦。至所有各省商船，來往貿易，均准任意買賣，所有稅餉船鈔掛號各等規費，輸納大英國帑。儻嗣後有應示事，即有派來官憲，隨時曉諭，責成鄉里長老，轉轄小民，使其從順。毋違。特示。

文中所稱之"已有文據在案"，即指所謂的《穿鼻草約》。這是研究香港近代歷史的一則頗爲重要的資料。

尾隨英軍而來的是英美等國的洋行商人。他們陸續從澳門、廣州及伶仃洋等處海面停泊點搬遷來港，搶先在灣仔、銅鑼灣一帶建立他們的立足點，例如位於東角（現百德新街一帶）的怡和洋行貨倉和春園（現春園街附近）的林賽洋行貨倉等等。隨後又開始了島上的修路工程。6月7日，義律宣佈香港爲自由港，聲稱"英國政府對於進出貨物一概不收捐稅"。同月14日，義律在瀕臨維多利亞港的地段劃出土地四十幅（每一幅約佔有一百呎的海岸）進行公開拍賣，結果售出三十五幅，佔地四十一萬七千二百呎。怡和洋行、顛地洋行、林賽洋行、端拿洋行等均爲最早的一批競投者。

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8月10日，接替義律的新任特命全權公使砵甸乍（Henry Pottinger，又譯砵典乍、璞鼎查）抵達香港。隨後即率軍北上。次年2月，砵甸乍在香港採取了兩項具有重要影響的步驟：2月16日，他宣佈"香港與定海將要作爲自由港，對於任何國家的任何船

隻，不收任何種的關稅、港口稅或其他捐稅”。2月27日，砵甸乍將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總部從澳門遷來香港。隨後的3月29日及4月27日，砵甸乍又先後兩次頒佈公告，宣佈以東印度公司的盧比和在香港及中國大陸流通的貨幣，包括中國銅錢及西班牙銀元（俗稱本洋）、墨西哥銀元（俗稱鷹洋）爲法定貨幣，而英國及其他外國貨幣仍得以照幣面價值通用。同時還規定，每英鎊可兌墨西哥銀元五枚，每枚銀元可兌二又四分之一印度盧比或一千二百枚中國銅錢。一切政府賬項及商業貿易均以墨西哥銀元爲支付標準。上述措施對於香港初期的經濟活動產生頗大的影響。

就在英國人開始銳意經營港島的同時，英軍在砵甸乍的率領下，自1841年8月起，先後攻佔厦門、定海、寧波、吳淞、鎮江、南京。18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清政府的全權代表耆英、伊里布終於被逼與砵甸乍簽下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共十三款，其主要內容是:開放廣州、福州、厦門、寧波、上海等五處爲通商口岸，英國可以派駐領事官員。將香港島割讓予英國。廢除“公行”制度，英商在通商口岸“無論與何商貿易，均聽其便”；中國賠償鴉片費六百萬元，商欠三百萬元，軍費一千二百萬元，共二千一百萬銀元;英商的進出口關稅“秉公議定”等等。條約第三款爲割讓香港島的規定——

> 因大英商船遠路涉洋，往往有損壞須修補者，自應給予沿海一處，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據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這就是英國割佔香港島的“法律依據”。

但是，人們並不會忘記，割佔香港島的這一條款，實質上這只不過是在1840年2月20日巴麥尊致懿律與義律的訓令中，將《對華條約草案》第三條："中國皇帝陛下將位於接近中國海岸之□□島嶼割讓予大不列顛、愛爾蘭聯合王國女王陛下，永遠屬於女王陛下，陛下子孫繼位人所有"中的"□□"塡上"香港"二字而已。

然而，在英國方面，對於是否一定要永久地割佔一處島嶼，是存在着某種程度的不同看法的。而且，對於永久割佔的島嶼是香港抑或舟山？也有過兩種不同的意見。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在1841年2月3日致懿律、義律函中曾表示："如果中國政府寧可締結一項商約而不願割讓一處島嶼，那麼這樣一種與割讓一處島嶼對等的條件，女王陛下政府將會予以接受……而商約却可能是對英國利益最有利的選擇，同時也是招致中國政府最少反感的一種辦法。"關於島嶼據點的選擇，巴氏還在該函件中寫道："據女王陛下政府看來，在東海岸一帶的一處島嶼，或是在珠（舟）山羣島中，或是離它不遠，爲了一切商業目的計將會是最好的。因爲它將會提供給英國貿易向中國東海岸中部物產豐富、人烟稠密的鄉村和城市一個發展的機會，並且可以憑藉着運河以及在那一帶地方入海的一些大河，使英國商品容易進入中華帝國的內地。"（見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但是義律及他的繼任者砵甸乍都寧可選擇香港而放棄舟山。從1841年1月26日英軍强行佔領香港島到1842年8月29日的中英《南京條約》，其間經過了一年零七個月的時間，香港島終於通過"法律條文"的形式。"正式"割讓給英國。

1843年6月26日，耆英與砵甸乍在香港舉行了《南京條約》的換文儀式。是日，砵甸乍在港督府公佈有關建立香港政府的英女皇特許令，宣誓就任第一任香港總督。同年8月24日，砵甸乍宣佈曾任護理總督的莊士敦（A.R.Johnston）和首席裁判司金尼（William Caine）爲行政局議員，組成行政局；任命商務總監秘書摩理臣（J.R.Morrison）與莊士敦、金尼爲立法局議員，組成立法局。砵甸乍以總督身份出任兩局主席。英國終於完成了它在香港島割佔後的最初的政府機構組織工作。

漫話九龍

九龍，雖然只是南疆之海角一隅，但是它在歷史上却曾經是一塊小有名氣的地方，大宋王朝的歷史正是在這南海之濱翻過了它那蒼涼的最後一頁，也爲後人留下了這"九龍"的美稱。

史載宋末景炎二年（1277），元兵南下，宋吏部侍郎陸秀夫等護幼帝是、昺兩兄弟南來，駐蹕於此海濱一隅。傳說宋少帝日間登臨小崗巨石，遠眺鯉魚門外，希望勤王之師救駕。一天，帝昺登臨此地，環視四周，但見青山綿延，八峯競秀，乃對羣臣稱："每山一龍，八座山正好八條龍"。陸秀夫答曰："陛下貴爲天子，也是一龍"。帝昺點頭稱是，遂有"九龍"之說。這自屬傳說而已。爾後當地人士在此宋帝駐蹕之處，築台以爲紀念，是爲宋皇臺。早年"香江八景"中之"宋臺懷古"，即指此處。現在，幾度滄桑，巨石已毀，古迹無存，宋皇臺早已面目全非了。今日之懷舊人士，只能在馬頭涌道的宋皇臺公園中，面對當年那殘碑舊刻，聊寄思古幽情。回首往事，無不令人感慨繫之。

不過，也有人試圖從地理學角度來解釋"九龍"之由來，謂九龍半島上山嶺縱橫，奇峯異突，蔚爲壯觀。尤其那慈雲山、飛鵝山、獅子山、大老山、東山、鷄胸山、鷹巢山、琵琶山以及筆架山等九座山峯，氣勢磅礴，如龍出

海，頗有九龍騰飛之勢，故以爲名。言人人殊，此說或可置信。

然則，由於時代的變遷，使用場合的不同，有關“九龍”一名的地理範圍也賦予了不同的解釋，諸如“九龍”、“新九龍”、“九龍司”、“九龍半島”等等。本文如下所要涉及的“九龍”，僅僅是特指中英《北京條約》中之“九龍司地方一區”而言，即今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地方，包括昂船洲，但不包括今新九龍的範圍，面積約十一點一平方公里（據1982年統計）。

從歷史上來說，這裏曾隸屬於“官富場”所轄地區之一。南宋政府曾派官員在此管理鹽政，並派兵駐守官富寨。明洪武三年（1370）置“官寨巡檢司”，所轄範圍大致相當於今整個香港地區及廣東省深圳市之羅湖區、上埗區的一部份。及至英國割佔香港島後，清政府於康熙二十三年（1843），改“官富巡檢司”爲“九龍巡檢司”，其範圍大致包括今香港地區之九龍、新九龍及新界（包括離島），九龍半島上界限街以南地方自然是隸屬於“九龍巡檢司”（簡稱“九龍司”）所轄了，故《北京條約》中有“九龍司地方一區”之稱謂。

九龍位處半島南端，隔着狹長的海峽，與香港島遙遙相對，具有重要之經濟、軍事價值，歷來爲兵家所重。清代初年，清政府便在此置設炮台。鴉片戰爭以前，英船即經常藉故在尖沙咀一帶停泊，並屢屢上岸滋事。1840年（道光二十年），林則徐就頗有見地的指出：“廣東水師大鵬營所轄洋面，延袤四百餘里，其尖沙咀一帶，東北負山、西則有急水門、鷄踏門，東則有鯉魚門、佛堂門，而

大嶼島又即在其西南。四面環山，藏風聚氣，波恬浪靜，水勢寬深。英夷船隻，久欲依爲巢穴。而就粤省海道而論，則凡東越惠潮，北往閩浙之船，均不能不由該處經過，萬一中途梗阻，則爲患匪輕。”1841年1月14日，義律在致函琦善時，曾公開提出要九龍尖沙咀、香港等處，“讓給英國主治，爲寄居貿易之所”。次年，英軍更一度直接在尖沙咀秘密修造營房炮台，派兵駐守，以圖久佔。隨後，英國方面從政府首相到殖民大臣、外交大臣、陸海軍將領以至香港總督，都相繼發表了要割佔九龍的言論，普遍認爲佔領九龍不僅是“絕對必要的”，而且這種佔領“一刻也不可忽略”。

1856年（清咸豐六年）10月，英國藉口“亞羅號事件”，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是年年底，英軍進犯廣州，但不久即爲當地軍民逼退。次年英法組成聯軍，在額爾金（J.B.Elgin 又譯伊利近）、葛羅（J.B.L.Gros）率領下於12月攻陷廣州。兩廣總督葉名琛被俘，廣東巡撫柏貴和廣州將軍穆克德訥投降。（1859年柏貴死後，桂撫勞崇光調任粤撫，後兼署兩廣總督。）英法聯軍攻陷廣州後，成立了以巴夏禮(H.S.Parkes)爲首的三人軍事委員會［另兩人爲英國將軍斯托賓齊(Straubenzee)和法國軍官馬殿那(Martinean des Chenez)］1858年5月20日，英法艦隊攻陷大沽炮台，進逼天津。6月，清政府被迫在天津分別與俄、美、英、法等國簽訂了《天津條約》。11月，又分別與英、法、美訂立《通商章程善後條約》。次年3月，香港總督寶靈（John Bowring）致函英國殖民部，明確要求英國政府採取措施來獲得九龍的割讓。同年10月，英國殖民部副

大臣伊里奧（N. Elliot）轉達了該部大臣紐卡斯爾（Newcastle）的命令，通知陸軍大臣命令駐華皇家軍隊司令，一有機會即盡早佔領九龍半島，並且表示“將來任何時候調整帝國對華關係，總要把這塊地方保留下來”。

1860年（清咸豐十年），英軍擴大侵華。3月初，陸續到達香港的英國陸海軍萬餘人，在司令格蘭特（H.Grant）的率領下，强行在尖沙咀登陸，對九龍實行武裝佔領。同月20日，巴夏禮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將其起草的一份租借九龍的文件交給勞崇光，藉口九龍半島上壞人出沒，秩序混亂，使英國的利益受到損害，提出要麼中國當局派遣官員和軍隊到那裏去驅逐壞人，並在那裏經常留駐一支有力部隊。要麼中國當局劃出一條界綫，把界內地方如香港一樣割讓給英國政府，在未正式割讓以前，可先用出租的方式解決。完全喪失自主權的勞崇光，只得屈從於巴夏禮的威脅，於次日（3月21日）簽字畫押，允將九龍（包括昂船洲）租與巴夏禮，年租銀五百兩。這就是所謂《勞崇光與巴夏禮協定》。協定中還特別規定：“只要英國政府準時交付租銀，中國政府便不得要求歸還上述土地”。

但是，“租借”畢竟還不是英國政府的最終目的。1860年4月18日，英國外交大臣羅素（Russell）在給額爾金的訓令中便指出，“在對中國的任何新條約中，應該努力作出割讓九龍半島的規定”。不久，當巴夏禮租借九龍的消息傳到倫敦之後，羅素即於7月9日密令額爾金，必須進一步取得九龍半島的“完全割讓”。他在訓令中說道：“女王政府雖知由於這個租賃所產生的當前利益，但在考

慮全部情況以後，認爲很有必要獲得九龍半島的完全割讓。爲此訓令閣下，務必努力達到此一目標。這份土地的總量是如此地小，而必須取得它的許多理由是如此地明顯，所以它的割讓，未必能成爲一種藉口而使法國索取舟山，或在中國沿海索取任何其他割讓。”

就在羅素發出要取得對九龍半島的“完全割讓”的訓令當天，額爾金率領的侵華英軍，已經離開上海到達大連灣了。8月，英法聯軍一萬八千人，相繼攻陷塘沽、大沽、天津。9月，英法聯軍在通州八里橋擊敗清軍主力，進逼北京。10月6日，英法聯軍進犯北京西郊圓明園，在洗劫一空後放火縱燒。10月13日，聯軍佔據安定門，控制了北京城。10月24日，額爾金利用中英互換《天津條約》和簽訂《北京條約》的“機會”，根據英國政府必須“獲得九龍半島的完全割讓”的訓令，突然提出要在《北京條約》上增加割讓“九龍司地方一區”的條款。在容不得恭親王奕訢查核勞崇光所簽協定的情況下，額爾金逼迫奕訢畫押蓋印。《北京條約》第六款規定——

> 前據本年二月二十八日（陽曆3月20日）大清兩廣總督勞崇光，將粵東九龍司地方一區，交與大英駐紮粵省暫充英法總局正使功賜三等寶星巴夏禮代國立批永租在案。茲大清大皇帝定即將該地界付與大英大君主並歷後嗣，並歸英屬香港界內，以期該港埠面管轄所及，庶保無事。其批作爲廢紙……。

九龍，終於在英軍的炮口下，由强佔而租借，由租借而割讓，成了英國政府管治下香港“殖民地”的一個組成部份。

租借新界

新界，英文爲New Territories，意即新的地方。中文原無此地名。它係指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一大片地方，包括大鵬灣、深圳灣，以及大嶼山、南丫島、長洲、坪洲等二百多個島嶼，陸地面積約九百七十五點一平方公里（據1982年統計），約佔全港陸地總面積的百分之九十二。從當年簽約的地理概念上來說，其所在範圍應包括今新九龍在內，但不包括九龍城寨。原有人口約十萬，聚居在四百二十三個村莊，隸屬廣州府新安縣。只是在英國租借之後，才有此"新界"之稱謂。

新界是一塊美麗富饒的地方，這裏依山傍海，山明水秀，與香港島隔海相望。香港現有的七個新市鎮——荃灣、沙田、屯門、大埔、元朗及新界西北部、粉嶺、將軍澳均位於新界。香港主要的水塘、菜地、歷史古迹、郊野公園、旅遊勝地，啓德機場和九廣鐵路的大部份，以及連接大陸的四條過境通道（羅湖、文錦渡、沙頭角、落馬洲），集裝箱碼頭和中文大學等也位於此。新界（包括新九龍）現在容納了全港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沒有新界，就沒有今日香港的經濟地位，這是不言而喻的。

說起來，雖然英國正式租借新界於今僅有九十年，但其擴界的歷史却要比這早得多。1864年（清同治三年），

英國就越過界限街的範圍，佔領了九龍西北面深水埗的地方。其後，各種攫取整個九龍半島及附近水域、島嶼的建議紛紛出籠，並在十九世紀末列强瓜分中國的狂潮中，最終獲得這片地方爲期九十九年的"租借"權。

1894年（光緒二十年），日本向朝鮮發動侵略，並直接向中國陸海軍進行挑釁，從而爆發了中日戰爭。因歲在甲午，故史稱甲午戰爭。9月，清朝軍隊在平壤戰役和黃海海戰中受挫。次年2月，日軍攻佔威海衛，北洋艦隊全軍覆沒。4月17日，李鴻章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台灣以及附屬各島和澎湖列島，以及賠償軍費白銀二萬萬兩，等等。《馬關條約》的簽訂加速了列强爭奪中國的步驟。

還在甲午戰爭剛剛爆發的時候，香港總督羅便臣（W.Robinson）就認爲這是進行擴界的大好時機，提出"調整和擴展本殖民地是絕對必要的"，應該在中國從戰爭的失敗中恢復以前施加壓力。1894年11月9日，羅便臣寫信給英國殖民部，强調了所謂"防務安全"的必要，提出"香港邊界應推廣至大鵬灣，從那裏延伸到對面珠江口上的后海灣，或者，至少應該從東北面的鯉魚門入口處，從東向西延伸到九龍背後山嶺的山頂，以便將珠江口的汲水門包括在內，以確保女皇這塊有價值的屬土的安全。再者，加普礁、横瀾、大嶼山以及所有香港三英里以內的海島，均應割讓給英國"。《馬關條約》簽訂後還不到一個月，英國海陸軍聯合委員會便於5月13日向國防部和海軍部提出了《關於殖民地香港邊界問題的報告》，再次提出了擴展和調整香港邊界，聲稱要保衛香港的安全，不僅需要安

全控制香港島與大陸之間的水面，而且有必要控制其南面和北面的海岸。這份報告獲得了國防大臣、海軍大臣的贊同。而英國和香港的一些“商業”團體也提出要抓緊甲午戰後的這個“絕妙機會”，以逼迫中國實現“貿易和僑居條件的巨大改變”。1895年11月16日，倫敦的“中國協會”主席威廉·凱瑟克(William Keswick, 怡和洋行董事會主席)在與英國外交部的會談中便認爲當時的形勢正是“要求擴展九龍邊界包括大鵬灣和鯉魚門兩側的最好時機”。並且認爲擴展邊界將“可以把在香港殖民地附近的中國稅關巡邏船的警備綫推後，使當地的商業有更大的自由”。英國外交大臣沙士伯里（Lord Salisbury）對此作出保證，“協會的意見將得到考慮”。香港立法局議員遮打（C.P.Chater）則直接寫信給港督，認爲當前正是擴界的一縱即逝的“大好時機”，並提出要趕走九龍城的中國官員，趕走中國海關，以容納更多的人口，使工業獲得土地和水源，在家禽、蔬菜方面可以不依賴廣州，等等。港督對此極表贊同。

《馬關條約》剛剛簽訂，俄、德、法三國便聯合導演了一幕“三國干涉還遼”的醜劇，由中國增加賠款三千萬兩，“贖回”遼東半島。隨後，三國以干涉還遼“有功”，强迫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的條約，索取了租借軍港、修築鐵路、開採礦山等等特權——1898年3月6日，德國政府强迫清政府訂立《膠澳租界條約》，强行租借膠州灣，爲期九十九年。1898年3月27日和5月7日，俄國先後强迫清政府簽訂《旅大租地條約》和《續訂旅大租地條約》，租期二十五年。1898年4月10日，法國在已取得廣東、廣西、

雲南開礦等優先權後，又强迫清政府同意租借廣州灣九十九年的無理要求。

面對德、俄、法等國在華勢力的迅速擴張，英國先是以平衡在北方的均勢爲藉口，提出“非租借山東之威海衛停泊兵輪，不足以抵制”，强行租借威海衛，爲期二十五年。繼而又以法國租借廣州灣對英國造成威脅爲藉口，提出了擴展香港界址的要求，包括從深圳灣到大鵬灣劃一直綫，作爲北界，南至北緯二十二度九分，東至東經一百一十四度三十分，西至東經一百一十三度五十二分。根據英國提出的這個擴界範圍，新擴展的陸地面積比前擴大了十多倍，水面擴大了四五十倍。1898年6月9日（清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李鴻章在英國公使竇納樂（C.M.Mac Donald）一手炮製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上簽了字。《專條》的主要內容如下——

溯查多年以來，素悉香港一處非展拓界址不足以資保衛。今中英兩國政府議定大略，按照黏附地圖，展擴英界，作爲新租之地。其所定詳細界綫，應俟兩國派員勘明後，再行劃定，以九十九年爲限期。又議定，所有現在九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其餘新租之地，專歸英國管轄。至九龍向通新安陸路，中國官民照常行走。又議定，仍留附近九龍城原舊碼頭一區，以便中國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來停泊，且便城內官民任便行走。將來中國建造鐵路至九龍英國管轄之界，臨時商辦。又議定，在所展界內，不可將居民迫令遷移，產業入官，若因修建衙署、築造炮台等，官工需用地段，皆應從公給價。自開辦後，遇有兩國交犯之事，仍照中、英原約、香港章程辦理。查按照黏附地圖所租與英國之地內有大鵬灣、深圳灣水面，惟議定，該兩灣中國兵船，無論在局內、局外，仍可享用……。

《專條》規定清政府繼續保有對九龍城的管轄權及碼頭一區，中國兵船有權使用大鵬灣、深圳灣等，這是中國在九龍半島上及附近海域所剩下的一點權利。按《專條》規定，自當年7月1日起實行，租期九十九年。新界，就是從這一天開始被英國"租借"去的。

同年8月6日，《專條》在倫敦換文。次年3月，兩廣總督譚鍾麟派補用道王存善率員赴港，與香港政府輔政司駱克（S.Lockhart）會勘界址。3月19日，雙方簽署了《香港英新租界合同》，擬定了界址的走向。但是，英國强租新界的行徑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强烈反對，錦田、厦村、屏山、粉嶺、林村、大埔等地民衆，展開了長期的武裝抗租鬥爭。至4月16日，英方以武力强行在新界大埔墟頭舉行了升旗儀式，輔政司駱克宣讀了條約和行政局命令，宣佈正式接管新界。

苦力貿易

“苦力”，係英文Coolie（Cooly）之音譯，亦作“咕哩”、“咕喇”、“龜里”，原爲殖民主義者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重體力勞動者的蔑稱。人們習慣上有時也將“豬仔”與“苦力”等同起來。但如果嚴格加以區別，則“苦力”屬於契約工（Contract Labor），而“豬仔”屬於債奴（Indentured Labor）。前者是由西方的人口販子、投機商或代理人進行直接的掠販，在出國前强迫進行簽約的。後者則由華人豬仔頭、“客販”進行掠販，到達目的地（主要是星馬一帶殖民地）後，在出售時再同僱主簽約。另外還有一種稱之爲“賒單苦力”（Credit Ticket System）的，它指的主要是從香港掠往美加及澳洲等地的所謂“自由移民”，以示區別於澳門的“苦力貿易”，即由招工代理人先墊付船費，華工出國後以工資加利抵還，在還淸債務前，必須聽從債權人的控制與驅使。（爲敘述方便，在此暫且統稱之爲“苦力貿易”。）

拐販華工出國的歷史，大致可以追溯到十八、十九世紀之交。在鴉片戰爭以前，即有不少華工以“賣豬仔”的形式被誘騙、拐賣出國。道光七年（1827年），張心泰在《粤游小志》中就有“誘愚民而販賣出洋者，謂之‘賣豬仔’”的記載，這大概是目前中國史籍中所見到的“賣豬仔”一詞的最早文字記錄。光緒十三年（1887），李鍾珏撰《新

加坡風土記》，內稱："二十年來，西人開墾招工，傭值頓貴，於是販賣人口出洋者，名曰'賣豬仔'。設館於澳門，公然買賣。沿海人民或被騙，或被劫，一入番舶，如載豚豕。"豚、豕，豬也。以人喻豬，可見華工地位之低賤了。

而英國之參予苦力貿易，遠非始於佔領香港之時。雖然英國在1807年與1838年已先後宣佈廢除奴隸貿易與奴隸制度，而且當時中國政府是嚴禁民人私自出洋的，但英國的不法商人還是與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美國等一起，進行掠販華工的勾當。十九世紀初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就通過其駐廣州商館的買辦，多次從黃埔、澳門、金星門等偷運華工往東南亞一帶。鴉片戰爭以後，香港更成了苦力貿易的據點。港督麥當奴（1866年至1872年在任）就曾經爲英國的殖民政策辯護，認爲香港是"唯一能够在合法基礎上辦理移民出洋的口岸"。既然當局認爲香港的"賒單苦力"是一種"合法"的"自由移民"，當然就不存在限制、禁止的問題。因此，不僅英國的不法商人直接參予苦力貿易，而且各國從事苦力販賣活動的船隻也有不少到香港補給食物、淡水與燃料，並在香港修船與改建裝載苦力的統艙等等。

1848年和1851年，美國和澳洲先後發現金礦，逼切需要勞工的補充，廉價的華工便成了他們最理想的掠奪對象。加上當時正值中國處於太平天國運動期間，內地的大量人口流入香港或通過香港出洋謀生，形成了香港近代歷史上的第一次移民高潮。而早期從香港出洋的苦力，以去美國的舊金山與澳洲的新金山（墨爾本）爲主。據有的學者研究，十九世紀下半期，被掠販出國的苦力約有二百零五萬

之多; 而在1845年至1874年間經香港出洋的賒單苦力共二十六萬六千三百二十六人，其數量之多，確是令人爲之震驚。另據香港方面的有關資料統計，1861年至1872年間，僅自香港載運往美國舊金山及澳洲等地的華工總數即達十三萬四千六百九十三人，參加載運的有分屬於英、美、德、法、荷、意、智利、丹麥等國籍的船隻四百二十六船次，其中屬於英國籍的有一百七十九船次，佔總船次的百分之四十二。同治八年（1869），清兩廣總督瑞麟爲詳陳粵省招工情形致總署函中稱，"查洋人拐騙華人之事，以粵東爲最多……洋船拋泊則在香港、澳門，距省河四百餘里，鞭長莫及，海關無從稽查……而粵東拿獲拐騙之徒，審明正法者甚是不少，乃因香港皆爲洋人所據，華官不得過問，雖奉招工章程，絕無照章招工之事，而拐騙之徒寄迹香港，恣其所爲，法令所不得及，緝捕所不能到，以故販人漁利，此風未能盡絕。"

可恥的苦力貿易爲英、美等國的不法商人帶來了豐厚的利潤，繁榮了輸入國的經濟，從美國、澳洲的金礦、鐵路，古巴、巴西、秘魯的熱帶種植園到星馬的錫礦、橡膠園，處處都灑下了華工的血汗。同時，也刺激了香港早期的造船、修船業、航運業以及香港早期的轉口貿易（金山莊、南北行等）的發展。一位英國學者就曾認爲，"這個殖民地的成長與繁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中國去星馬、澳洲和太平洋彼岸的移民所造成的。"（安德葛:《香港史》，頁一二六）英佔香港初期，從香港開往舊金山的苦力船，其成本每人不足五元，而船票售價却爲五十五元，利潤率達十倍以上。1872年，有一位叫凱利的美國記者就

曾目擊過一次這種交易的情景。他報道說，從中國運到古巴的這九百名活人，苦力進口商的成本還不足五萬元，但却可以獲得四十萬元的純利。如此驚人的高額利潤，使得苦力販子們競相不擇手段地加入了這場殘暴的販賣活動。

在一百多年前的帆船時代（當時新式汽船投入運輸不久，數量還不多，設備也比較簡陋），從香港到舊金山一般要走二三個月的時間，由於苦力販子唯利是圖，草菅人命，超載濫載，加上路途遙遠，環境惡劣，供應不足，衛生不良，因而海上事故層出不窮，病死、餓死、打死以至被逼投海自殺等者不計其數。1850年2月14日，從香港開往秘魯的英國船“蒙塔古夫人號”，出發時四百五十人，到達目的港時僅存一百五十人，途中死亡三百人，死亡率高達百分之六十六點七。1856年3月13日，英國船“約翰·加爾文號”從香港開往古巴，出發時爲二百九十八人，但到岸人數僅有一百六十三人，死亡率爲百分之四十五。1861年10月5日，載重量爲一千七百零三噸的法國船“禿鷹號”自香港前往舊金山，船上一千多名苦力竟無一生還。據有的學者估計，華工的海上平均死亡率，去古巴的約爲百分之十五點二，去秘魯的約爲百分之三十。苦力販子的暴行激起了苦力們的各種形式的反抗以至海上暴動，他們“力即不足，寧願全體投海以盡”。1857年4月1日，英船“古爾納號”從香港開往古巴，途中苦力暴動，殺死水手約三十三至四十人。

野蠻的苦力貿易理所當然地受到世界上一切正直人士的譴責。就連當年充任香港政府法官的司馬理和詹姆士·懷特奧爾也承認這是一門“可恥的行業”。他們在1867年

聯名向港督麥當奴提出的關於苦力出洋問題的呈文中指出:“如果不是由於英國和法國使用武力在中國奪得立足據點，苦力貿易便無從發生，並且也是可以由中國政府一舉掃除的。因此，我們作爲英國人，覺得英國應對於這種不斷爲人類文明造成玷污的苦力貿易負有一定責任。”“至於這門行業之可耻，那更是無可諱言……應當讓掛英國旗的船隻，完全退出這門可耻的行業。”但是，香港直至二十世紀初年，仍有販賣人口的案件發生。據光緒三十二年（1906）代理新加坡總領事孫士鼎報告，當時香港尚有廣祥合、合興棧、源發棧、鴻發棧等新舊客館（豬仔館）二十一家，可見這場苦力貿易持續時間之長、爲害之烈。不過，進入二十世紀後，香港的苦力貿易已漸漸沒有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鼎盛時期那麼猖獗。

馬棚慘案

中國有句老小皆知的成語，謂之“談虎色變”。香港於今自是無虎可言，但那“火燭”之苦，却是爲害尚烈，大有“談火色變”之慨。尤其係木屋區、避風塘住家艇，甚或郊野山林，一年四季“火燭”累見不鮮。但是，倘若要歷數這香江之百年大火，除日佔時期之戰神大火外，死傷人數最多的，大概就要算是戊午年（1918）跑馬地之馬棚大火了。

賽馬之於香港，確是一件激動人心的盛事，歷經百年而不衰。儘管早年香港的馬場設施還相當簡陋，缺乏周密的安全措施，看台也只是用竹料、木板、葵葉之類臨時搭成，遠不及今日之豪華氣派，但仍然吸引了衆多馬迷與湊熱鬧的市民。1918年2月26日，正値一年一度之周年大賽，又是農曆新年期間（正月十六日），其氣氛之熱烈，可想而知，連廣州也有人專程前往一睹盛況。然而樂極生悲，終於釀成慘劇。

是日下午天色晴朗，觀衆爆滿，賽場內外，萬頭攢動，英姿勃勃的騎士策馬獻技，如痴似醉的觀衆狂呼喝彩。時至第五場賽事，忽然間觀衆棚發生搖挽，隨着一陣驚叫，棚架突然倒塌，一層壓一層，觀衆爭相奔逃，互相踐踏，慘叫之聲，驚天動地。更不幸的是，其時風高物燥，觀衆棚下又正擺着賣熟食的攤檔，爐火熊熊，倒塌的棚架正好

壓在火爐上，一時濃烟滾滾，烈焰沖天。加上滅火設施不足，又缺乏戒備，故雖有消防員、聖約翰救傷隊、警察等合力搶救，但終回天乏術，於事無補，“火燭”一發而不可收拾，前後僅二十分鐘，便一切化爲灰燼。可憐無辜，葬身火海。據現場清理，是次遇難觀衆約六百餘人，僅在一堆屍骨中，便查出殘骸七十二具，或殘肢斷指，身首離異，或焦頭爛額，血肉模糊，眞是慘不忍睹。更有外來觀衆與全家遇難者。例如香港公利洋行買辦麥某一家中葬身火海者即有十四人。該行代司理西人羅沙及家屬八人也同遭此禍。據說當時廣東省督軍公署顧問李某之眷屬十人專程由穗來港觀馬，災後一直未歸，估計也遇此不測。據現場清理所得的金銀飾物等，即有金戒指二百五十五隻、紅寶石戒指二百五十五隻、時錶六十四枚，鎖匙約十六斤。這也可從另一個側面窺見此次罹難者之衆了。

馬場大火震動了整個香港，其場面之慘烈，爲香港開埠以來之所罕見。是日前往馬場認屍、招魂者不絕於道。但由於火勢過猛，死者大多血肉模糊，能辨淸面目者僅十居其一。至於受傷者也爲數不少，政府醫院及東華醫院等均有收治。東華醫院作爲全港最大的慈善機構之一，在災後之救助工作中，發揮了很大作用，僅事發當晚，便施派棺木四百餘具。次日，立法、行政兩局召開特別會議，全體議員爲馬棚大火罹難者肅立致哀。華商總會等民間團體、機構也紛紛召開特別會議表示哀悼，並展開募捐活動。

至於此次馬棚倒塌起火原因，雖經法庭一個多月的連續多次開庭審訊，也未有一致意見。有人謂係匪徒砍斷棚篾，企圖趁機發財；有人則稱上棚觀衆太多，棚架不堪負

荷；有人指責搭棚者偷工減料，棚架支柱多數不入地，棚身不穩；也有人認爲如若棚下沒有熟食檔之熊熊大火，或者消防措施得力，也不致死傷如此慘重……。言人人殊，不甚了了。

事後，有關人士在愉園建醮，延僧尼誦經七晝夜，超度幽靈，俾使寃魂有所皈依。愉園門前樹有一聯："到此便傷心，劇憐爛額焦頭，同胞苦難；入門休墜淚，猶幸超生度滅，我佛慈悲。"場內氣氛，着實充滿了愁雲慘霧，在此謹摘錄其時輓聯數對，以見一斑——

哭父有人，哭母有人，哭夫有人，哭妻有人，哭子哭孫也有人，哭哭哀哀，總是憐君遭浩劫。

嗟天無道，嗟地無道，嗟世無道，嗟邦無道，嗟朝嗟野皆無道，嗟嗟慼慼，幾回搔首惜羣生。

（黃某輓聯）

天道實難論，闕當時車水馬龍，盛會竟何如，興盡悲來，轉瞬繁華成火窟。

人生空競逐，嘆此日身灰骨燼，幽魂今已矣，劫餘善後，愴懷荒渺託慈航。

（東華醫院輓聯）

痛百年未有之奇災，死者難瞑目，生者至傷心，造物非不仁，忍令斷首殘肢，委諸芳草。

合諸天無量三寶佛，吹起大法螺，擂起大法鼓，游魂當來享，尚翼聯翩逐隊，證此菩提。

（東華醫院輓聯）

誰謂無苦海，誰謂無火坑，痛諸君斷體焚身，跑馬場中成浩劫。

那處是天堂，那處是地獄，仗我佛超生渡滅，咖啡園畔有精魂。

（東華醫院輓聯）

除輓聯外，當時園中還有不少輓詩、祭文。及後有關方面將遇難者遺骸約六百具合葬於咖啡園墳場，並立碑文以誌其事，題爲“戊午馬棚遇難中西士女之墓”。（IN MEMORY OF THOSE WHO PERISHED IN THE RACE COURSE FIRE ON FEBRUARY 26,1918.）

這就是七十年前駭人聽聞的戊午年跑馬地馬棚慘案。然而，快活谷的賽事年盛一年，也許馬迷們對此早已淡忘了。

香江之役

太平洋戰爭期間日軍攻佔香港的戰役，是近代香港歷史上唯一的一次大型戰役。雖然戰事歷時僅僅十八天，但其爲香港所造成的災難，却是罄竹難書，至今仍爲年長一輩的香港人所記憶。

香港，作爲英國遠東的海軍基地與經濟中心，其地位之重要，早爲世人皆知。英美一直將其與新加坡、馬尼拉同視爲遠東三大根據地之一。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的“大東亞”戰略中，香港則被視爲其南進的中轉站。日本的海上交通綫，即從日本本島、冲繩、台灣經香港而南下菲律賓、新加坡、印度尼西亞以至澳大利亞等地。因此，日本之欲佔領香港，乃是蓄謀已久的事了。

二次大戰爆發後，英國在歐洲戰場上受到德軍的沉重打擊。至1940年6月，法國投降，英軍被迫撤出西歐大陸，英國本土遭到德軍的狂轟濫炸。次年6月，德軍進攻蘇聯，二次大戰進入了新的階段。老大的英帝國受到了德、意、日的嚴重挑戰。顯然，在這種局勢下英國無暇東顧尚屬可以理解。但是，英軍後來在香江之役的失敗，原因並非僅僅如此而已，對於香港的防務，英國首相丘吉爾早在戰前一年就認爲，英軍根本就沒有可能守得住香港，充其量只不過是一種象徵性的表示而已。另一方面，英國又拒絕與中國合作，旣不武裝香港的中國居民禦敵，又不聯合中國

軍隊抗日，故香江之失陷，自屬意料之中。

而戰前駐港英軍裝備之差，也是難以想像的。當時的皇家空軍中隊僅有老式軍用飛機五架，各種主要艦艇十二艘（包括驅逐艦一艘、炮艇三艘、魚雷艇八艘）；駐港陸軍（包括義勇軍）約一萬多人，其中的二千人——兩營加拿大兵，還是在戰前的三個星期才奉調增援香港的，而且大多數是未經嚴格訓練的新兵。英軍雖在戰前已在新界的城門河谷至垃圾灣構築有一長達十八公里的半月形的號稱遠東馬其諾防綫——垃圾灣防綫，並聲稱可以堅守半年以上，但終無濟於事。日軍方面早已完成了對香港的三面包圍，並在進攻香港的前一年，就在地形與香港相似的廣州白雲山一帶進行模擬夜間突破演習，而且事前派間諜在港九地區進行調查，對駐港英軍的防務知之甚詳。此外，戰前還在廣州、深圳一綫交通要道集結兵力，以供隨時調遣。1941年11月6日，日本大本營發出了以第二十三軍三十八師團爲基幹部隊準備攻佔香港的命令，並於當月完成作戰準備，還確定了從陸上正面進攻香港的作戰方針。同時，尚有日本第二遣華艦隊和第四十五轟炸機隊等從海、空予以協助，投入總兵力超過二萬以上，擁有絕對的海、陸、空優勢。日軍奪取香港，只是時間的問題了。

1941年12月8日凌晨（當地時間爲12月7日上午8時），日軍突襲珍珠港，一舉摧毀太平洋上這一美軍基地。幾乎在同一時間，日軍同時對泰國、馬來亞、菲律賓、關島、威克島、吉爾伯特羣島等發動了進攻。就在日軍偷襲珍珠港之後六個小時（香港時間爲12月8日清晨），日軍轟炸機羣突然對啓德機場及港九各處的戰略要地進行猛烈轟

炸。僅僅幾分鐘之內，皇家空軍僅有的五架老式飛機及其他民用飛機均葬身火海，日軍艦隊則從海上對香港進行封鎖，迅速取得了對香港的制空、制海權。

正當日軍的巨型炸彈在啓德機場上開花的時候，不少香港市民還沉浸在清晨的美夢之中。與此同時，日軍佐野兵團也越過深圳河，在未遭到重大阻擊的情況下長驅直入，當晚便到達新界大帽山一側。其進攻速度之快，連日軍方面自己也感到意外。次日，雙方在城門炮台曾一度發生激戰，但英軍不敵而後撤。是晚，日軍二二八聯隊一部乘英軍兵力配備上的缺陷與疏忽，偷襲城門水庫南方英軍的主要據點二二五高地，突破了英軍防綫上的一處戰略要點。12月10日，日軍提前對"垃圾灣防綫"全綫發起總攻。12月11日，日軍西綫部隊攻佔青衣島。12月12日，東綫部隊在强渡沙田海（12月10日）之後，又一擧攻佔啓德機場，並進入九龍市區。至此，號稱能堅守半年以上的"垃圾灣防綫"已徹底爲日軍所摧毀。同日，駐港英軍司令馬爾比（C.M.Maltby）少將下令退守港島。（關於馬氏退守港島一事，至今仍爲評家之爭議話題，有謂爲英軍慘敗之倉惶潰逃，亦有謂此時九龍已無險可守，戰略上之主動後撤以固守港島，乃不失爲明智之擧。）12月14日，九龍半島戰事基本結束，港島終爲日軍所四面合圍。

日軍攻佔九龍半島之後，立即對港島展開全面的軍事和政治攻勢，一面對島上戰略要點進行轟炸和炮擊，一面於12月13日和12月17日兩次派軍使渡海勸降，但均爲港督楊慕琦（Mark Young）所拒。至12月18日下午，日軍第二遣華艦隊在港島南岸佯攻，其正面部隊則於當晚9時，

在强大的炮火掩護下分别向北角、太古、鰂魚涌等處强行登陸，迅速攻佔了英軍的灘頭陣地，並向縱深發展。隨後，日軍攻佔了黄泥涌山峽水庫，切斷了港島水源，並繳獲了英軍島內火力配備圖，使英軍的秘密火力防禦點徹底暴露在日軍的炮口之下。退守港島的英軍曾組織過頑强的抵抗，戰況遠比九龍之役激烈，輕兵進襲港島的日軍受到英軍全力阻擊，損失頗爲慘重，但英軍孤島奮戰，兵力强弱懸殊，迅速爲日軍所分割，不得不退縮於港島東南部之赤柱一隅及灣仔山峽等處據點。12月25日（聖誕節）下午，楊慕琦終於扯起白旗，渡海至九龍尖沙咀半島酒店，向日軍酒井隆中將稱降。是役，日軍傷亡二千七百餘人，英軍死傷人數約達四千，不少港島居民也死於無辜。駐島英軍餘部九千人，連同港督楊慕琦，都成了日軍的階下囚。僅僅十八天時間，英軍投降，香江易手。從此，香港進入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時期。

日軍佔領香港後，酒井隆中將立即在港實行軍政統治，設軍政府司令部於尖沙咀半島酒店。次年1月19日，日本在港設立總督部，由陸軍中將磯谷廉介出任香港總督（後來磯谷廉介調往台灣，由田中久一繼任，這是日佔時期的第二任，也是最後一任“總督”），以港島匯豐銀行大厦爲總督府。（後搬往花園道，至今港督府仍留下日本建築的痕迹。）“香港”隨之改名爲“香島”，很多街道、商店也爲之易名，如皇后大道中改爲“中昭和通”，德輔道中改稱“中明治通”，半島酒店改稱“松本大酒店”等等。連年曆也不例外，公元1941年改爲“昭和十六年”。

日佔期間，日本在香港實行了野蠻的法西斯統治，大

肆劫掠，濫殺無辜，强姦婦女，無惡不作。英人成了日軍的階下囚自不必說，香港的中國居民被迫“疏散”者竟達一百多萬！全港人口自戰前的一百六十萬銳減至1945年8月的六十萬。戰前所建立起來的工業大部份爲日軍所摧毀，外貿基本處於停頓狀態。房屋被毀約一萬九千個單位，而且還强制使用軍票（初時與港幣的比率爲一比二，1942年10月改爲一比四，後更乾脆禁止港幣流通）及實行糧食配給（初時每人每天限額爲六兩四，後減爲三兩），港九一片廢墟，百物騰貴，餓殍載道，慘不忍睹。

經過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歲月，1945年8月15日，日本終於宣佈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同月30日，英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夏愨（H.J.Harcourt）少將率艦隊抵港。次日，正式成立軍政府。1946年5月1日，香港政府宣告成立，楊慕琦返港，又重新履行他的總督職責了。

抗戰烽火

1941年12月，在日軍攻佔香港的同時，港九各地燃起了抗日戰爭的烽火。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於1943年12月改稱爲"東江縱隊"）決定由第三大隊派出黄冠芳、江水、劉黑仔等率領武工隊進入沙頭角、西貢、大埔附近地區。第五大隊派出周伯明、曾鴻文、黄高陽等率領武裝工作隊進入羅湖、元朗、沙田等地區，建立抗日游擊基地，展開敵後游擊戰爭。次年2月，正式成立港九大隊（港九人民抗日游擊隊），由蔡國梁任大隊長，陳達明任政委，黄高陽任政訓室主任。大隊下設長槍隊、短槍隊、海上隊、市區隊等。從港九市區到新界鄉村，從大鵬灣畔到珠江河口，到處活躍着游擊隊的身影。他們在武裝羣衆、打擊敵僞、肅清土匪、搶救文化人和營救國際友人、配合盟軍作戰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香港於淪陷前，曾一度成了與桂林、重慶、上海等齊名的文化中心。早在蘆溝橋事變後，隨着上海、武漢、廣州等地的相繼淪陷，即有大批文化人薈萃香江。日軍攻佔香港時，他們因來不及撤出香港，遂成了日軍搜捕的重點對象。在此危急關頭，在有關方面的支援下這批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迅即秘密轉移住處，分批偷渡到九龍，再從陸路護送到東江游擊區，經惠州、老隆而到達韶關，最後轉送到桂林、重慶等地。有的則從九龍西貢乘船到寶安的大

小梅沙，而後轉入坪山根據地，或直接護送到汕尾港。也有一小部份是直接經澳門而轉到大後方去的。

這場搶救工作前後一直持續了將近半年的時間，其中尤以1942年1月至2月的工作最爲緊張、驚險。被救脫險者有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茅盾、孔德沚、夏衍、胡繩、黎澍、胡風、戈寶權、張友漁、沈志遠、千家駒、薩空了、劉清揚、胡仲持、廖沫沙、金仲華、范長江、袁水拍、蔡楚生、任白戈、宋之的、張鐵生、周鋼鳴、葉淺予、胡蝶等。此外，被救脫險的還有國民黨官員陳汝棠，以及第七戰區司令余漢謀的夫人上官德賢等。這次虎口搶險的成功，被譽爲“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而參予其事者，其中有香港人所熟悉著名人物周恩來及廖承志等。

在搶救文化人的同時，游擊隊還主動、積極地營救國際友人、配合盟軍作戰，這也是值得大筆一書的一項歷史功績。

香港淪陷後，英軍戰俘九千多人，分別被囚禁於香港七姐妹、深水埗、亞皆老街三處集中營，港府文職人員則主要拘禁於赤柱集中營。在當時日本法西斯統治的極其嚴酷的環境下，游擊隊員冒着生命危險潛入市區，深入虎穴，先後營救了爲日軍所囚禁的外國人士八十一名（英國人二十名，印度人五十四名，丹麥人三名，挪威人二名，俄國人一名，菲律賓人一名），其中包括賴廉士上校（L.T.Ride）、京上校（G.King）、譚臣警察司（W.P.Thomson）、祁德尊少校（J.D.C.Clague）等英軍官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協助賴廉士脫險，其過程頗具傳奇色彩。他在蔡國樑等人的直接幫助下，歷經了將近十

天的艱難險阻，擺脫了日僞的追蹤截擊，才轉移到惠州的。不久，賴廉士擔任了英軍服務團的負責人。（後來曾於1949年至1964年擔任香港大學校長），祁德尊任該團駐惠州前方辦事處主任。抗戰期間，東江縱隊與英軍服務團就曾經攜手合作。賴廉士曾向東縱表示："如果沒有你們的幫助，我們是不會做出什麼工作來的。"

1944年2月11日，美國第十四航空隊飛行員克爾中尉（Donald.w.kerr），從桂林駕機飛襲香港，在啓德機場上空突然爲日軍擊中，油箱起火，被迫跳傘逃生。當時駐港日軍出動千餘人進行嚴密的合圍搜捕。在此生死存亡的危難時刻，克爾得到了游擊隊的特別保護，經過長達半個月之久的巧妙周旋，終於趁日軍疏於防備之際，在黑夜中由游擊隊經海路特別護送到東江縱隊司令部，後再輾轉回到桂林駐地，安全脫險。同年5月與次年1月，游擊隊又先後兩次營救美國第十四航空隊、第三艦隊飛行員勒夫哥中尉（William Lefkoe）等七人脫險。游擊隊營救美軍飛行員的英勇事迹，受到了盟軍的高度評價，也引起了國際輿論界對東江縱隊的重視。1944年7月，美國的《美亞雜誌》還發表了《東江縱隊與盟國在太平洋的戰略》的文章，介紹了東縱的戰績，並指出了敵後戰場的重要與援助敵後游擊隊的必要。被營救脫險的飛行員，則紛紛寫信表達他們感激之情。

港九大隊在這艱苦的烽火歲月中，還積極開展抗日宣傳，廣泛發動和組織當地民衆保衛家園。他們在元朗、西貢、大埔、沙田等地組織了農民自衛隊等抗日武裝隊伍。游擊隊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在港九地區進行了大小

上百次的戰鬥。他們除了消滅、逼走李觀姐、黃慕容、蕭天來等多股趁火打劫、爲非作歹的地方土匪外，在陸上，他們深入市區散發傳單、收集情報；夜襲啓德機場，炸毀日軍的飛機與油庫；虎口拔牙，襲擊日軍哨所；炸毀鐵路橋樑，破壞日軍交通；懲治作惡多端的漢奸、特務，等等。在海上，他們建立了海上游擊隊，發揮近戰、夜戰的特點，出其不意地予敵以重創，破壞了日軍的海上運輸綫。

港九地區的廣大民衆，有的返大陸，投身於抗戰的洪流，有的就地參加了港九大隊，有的則加入了自衛隊、聯防隊、游擊小組等多種形式的抗日組織。爲保家衛國而奮戰，其英勇事迹，可歌可泣，感人殊深。當年港九大隊的活動基地之一，位新界大埔東北部的烏蛟騰村，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該處村民與游擊隊一起，英勇地抗擊了日軍大小十餘次的圍剿掃蕩，該村的李世藩、李憲新、李天生、李志宏、李官盛、李偉文、王官保、王志英、李源培等，爲反抗日本侵略者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港九大隊和香港市民英勇抗日的歷史功績，曾得到當年盟軍的嘉獎。爲紀念1941年至1945年西貢民衆協助盟軍的功績，英軍代表李芝上將敬贈的“忠勇誠愛”的錦旗，至今仍懸掛在西貢區鄉事委員會的會議室裏。在烏蛟騰村還屹立着一座抗日英烈紀念碑，並訂農曆八月十六日爲祭祀日，以供人們前往瞻仰憑弔，緬懷先烈。“紀昔賢滿腔熱血，念先烈彌世功勞。”這題刻於紀念碑園地入口牌坊上的對聯，正是後人緬懷先烈的心聲。紀念碑的碑文上鐫刻着這樣的一段文字：“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法西斯發動太平洋戰爭，港九新界淪爲日本侵略者的佔領區。

新界人民發揚抗暴鬥爭的歷史傳統，在東江人民抗日游擊隊領導下，同日本法西斯展開了可歌可泣的鬥爭。……英雄先烈們的光輝業績同港九新界的山山水水一樣，萬古長存!”這就是後人對抗日英烈的永久懷念。

人口變遷

香港地區發現有人類活動的歷史至今已有五千多年了。經考古發掘表明，中國的先民早就在這濱海之區從事採集、捕撈、耕作與開發，譬如從南丫島等處的文化遺存與李鄭屋村漢墓，這都可以獲得證實。據現存可能爲最早記載"香港"地名的郭棐《粵大記》（成書於明代萬曆年間，即公元1573—1619年間）一書所見，島上即有香港、筲箕灣、黃泥涌等村落的記錄。其後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嘉慶二十四年（1819）先後出版的兩種《新安縣志》，也有類似記載，可惜的是有關的中國古籍對於這些古代的人口變遷並沒有爲後人留下確切的統計數字。據英國殖民部檔案（Co129），英佔前的香港約有居民四千人。1841年1月26日，英軍佔領香港。同年5月，《香港政府憲報》透露，港島人口約爲七千四百五十人，其中農村人口約四千三百五十人，包括當時島上最大的村落赤柱（二千人）、筲箕灣（一千二百人）、黃泥涌（三百人）、香港圍（二百人）以及土地灣（六十人）、紅香爐（五十人）、柴灣（三十人）等處；另有水上人家二千人，其餘爲外來流動人口與小販等。另據1842年3月24日香港的 *The Friend of China*（譯《華友西報》）的調查資料，當時在維多利亞城區的總人口大約已有三千六百四十六人，包括工人、小販、雜役、磚匠等，並已開設有米舖、飯館、

魚鋪、藥鋪、烟鋪、水果店、當押鋪、縫衣鋪、木器店等鋪戶，人口已有較明顯的增加。有人估計，1842年8月29日訂立《南京條約》正式割佔香港時，島上人口當已接近二萬。

英佔香港後，香港的人口變遷有了比較準確的統計。從1841年至1986年的一百多年間，除了個別特殊年份（如日佔時期等）外，香港人口基本上處於一種持續上升的狀態，這裏大致可以劃分爲六個發展階段。

1841年至1860年爲人口快速增長階段。在此期間發生了兩件對香港人口變化有很大影響的事件，一是1851年至1864年太平天國運動期間，大陸大量人口流入香港; 二是1860年英國割佔九龍。二十年間香港人口由原有的七千四百五十人猛增至九萬四千九百一十七人，大約增加了十二倍。

1860年至1898年，香港人口又有了新的增長。1898年6月，英國租借新界，使香港陸地面積驟增約十一倍之多，這對日後經濟的發展與人口的增長及其地理分佈，均有重大影響。1898年香港人口爲二十五萬四千四百人（不包括後來統計的新界十萬人。）

1898年至1941年爲人口穩步增長階段。在這四十餘年間出現過兩次移民高潮: 先是二十世紀初年的辛亥革命，其後是三十年代爆發的抗日戰爭時期。其中僅1906年至1911年間，香港人口即從三十二萬九千零三十八人增至四十五萬六千七百三十九人，年增長率達百分之六點五; 而1936年至1941年間，更從九十八萬八千一百九十人激增至一百六十三萬九千三百三十七人，年增長率達百分之十一。

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爲日佔時期，也是香港人口史上唯一出現的連續四年遞減的非常時期。據估計，日佔期間香港居民不幸死於戰火及被迫“疏散”者約有百萬之多。至1945年8月，全港人口約僅存六十萬，尚不及1920年的人口數（六十三萬零三百零七人）。

1945年至1959年爲戰後恢復階段。日軍投降後，原有被迫疏散的居民紛紛返港，加上大陸正處於解放戰爭時期，內地又有不少人口流入香港，至1947年統計，全港人口即超過戰前的最高歷史紀錄，達到一百八十萬。1959年，香港人口首次突破三百萬大關，達到三百零二萬三千人。

1959年以後，香港人口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此後每十年人口約增加一百萬。1969年爲三百九十萬六千人，1979年達四百九十八萬九千人，1988年更達到五百六十八萬一千三百人，平均每平方公里五千二百八十四人，成爲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

從上所舉六個階段可見，香港人口變遷的最大特點是增減速度快，外來因素影響大。除了英國通過三個不平等條約先後割佔港島、九龍及租借新界而使人口有急劇增加外，還由於大陸及世界的政治、經濟形勢的影響而使香港出現過多次的移民高潮，包括太平天國運動、辛亥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等，尤其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半期與四十年代後半期，香港人口都有急劇的增長。而日佔時期則使香港人口幾乎減少了三分之二（約一百萬）。另外，香港的移民有進也有出，這也是多年來的事實，雖然總的來說還是進大於出。據港府的一項統計資料，以1980年至1987年9月爲例，香港人移居國外者共十七萬七

千二百零二人，平均每年約二萬餘人，其中以移居美國、加拿大、澳洲佔絕大多數，其次爲英國、荷蘭、西德、新西蘭等。

長期以來的高出生率則是本地人口持續增長的內部因素，也是香港人口變遷的顯著特點之一。據現有統計資料顯示，香港人口出生率曾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居於較高水平之上。以戰後香港人口統計爲例，1970年以前，人口出生率均維持在千分之二十以上，其中1951年至1964年每年均超過千分之三十，最高年份（1958）甚至達到千分之三十七點四，而同時期的死亡率則從千分之十點二，降至千分之五點三，人口自然增長率大致維持在千分之二十四至千分之三十之間。進入七十年代以後，香港人口出生率已明顯下降（千分之二十以下），至1987年僅爲千分之十三，死亡率則大致爲千分之五，人口自然增長率也維持在千分之十至千分之十五之間，1987年更降至千分之八。近年來香港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長率的下降顯然是與進入工業化時期以來居民的物質生活、文化敎育和醫療保健水平的提高，以及婦女的普遍就業和廣泛的“家計”宣傳有關。

男女性別比例偏高也是香港人口的一大特點。這種“陽盛陰衰”的局面儘管近年已有改變，但仍大大高於世界的平均數（一百點六）與亞洲的平均數（一百零四點零六），而且越是早期比例越高，這與早期來港居民大多爲男性移民有密切關係。據統計，1847年在港華人之男女性別比例高達六百零一（以女性爲一百），在港外國人之性別比則爲七百八十五。此後男女性別的比例漸趨下降，1861年爲二百八十點八，1911年爲一百八十四點四，直至

1961年才漸趨平衡（一百零五點六）。更爲獨特的是，香港各區之間的性別比也頗有不同。以平均性別比較低的1971年（一百零三點三）爲例，大埔、西貢、離島分別僅爲九十七點四、九十七點八、一百零一點三，這大概與該區的男性被吸引到其他地區就業有關。港島則爲一百零一點五，這主要是由於該區發達的商業與電子業爲婦女提供了較多的就業機會。而荃灣（一百零七點三）與元朗（一百零五點八）的高性別比，則是因爲這些地區新興的工業吸引了鄰近地區的男性前來就業。

居民來源具有特殊的廣泛性與多樣性，則是香港有別於一般城市的又一特點。香港是一個移民的國際性自由港，由於地理、歷史上的等等原因，香港居民大部份來自廣東各地，尤其以廣府（廣州附近地區）爲多數，其次爲四邑（台山、新會、恩平、開平）與潮州，外省則以上海與福建爲多。而在香港本地出生人數的比重也歷來偏低，例如1911年僅佔百分之三十一點五，1921年佔百分之二十六點七，1931年爲百分之三十二點五，說明這一時期外來移民還佔有絕大多數的比重。近年來，這種狀況已有較大改變，據1986年中期戶口統計，在港出生的比例已上升至百分之五十九點三。至於在港居住的外國人，一百多年來所佔總的比例大致在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七之間，據1987年年底統計，香港共有外國人十七萬二千二百人，約佔全港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其中佔首位的是菲律賓人（三萬九千一百人），其次爲印度人（一萬五千八百人）、美國人（一萬四千七百人）、英國人（一萬四千一百人，不包括軍人）、等等。

人口問題是一個涉及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宗教、醫療保健等等方面甚爲復雜的問題。如何控制香港人口的合理增長與最大限度地利用香港有限的空間，提高人口的素質與生活水平，使其與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相適應，這將繼續引起人們極大的關注。

開山填海

香港全境多山，地方狹小，土地分散，島嶼衆多，特殊的地理條件限制了香港的陸上發展。因此，自開埠以來，開山填海就成了與香港人生存攸關的一項長期的歷史使命。

從歷史上看，香港拓展用地的方向大致上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向山坡發展，其二是向海要地。但是由於境內山坡比較陡峭，開拓用地的範圍受到了極大的限制。而香港的海岸綫曲折且多淺灣，維多利亞海港又有鯉魚門、汲水門及周遭羣山作屏障，水流緩慢，潮差較小，有利填海，故自開埠以來，填海造地就成了香港拓展用地的主要方向。同時又由於香港範圍不大，且往往是山、海相連，開山的沙石可就近作填海用料，因而開山與填海又常常是同時進行的。

香港的開山填海工程，從地理分佈上看，主要的區域集中於維多利亞海港兩岸，即港島的堅尼地城、西營盤、上環、中環、灣仔、銅鑼灣、北角、鰂魚涌、筲箕灣、柴灣一帶的北部沿海地區，九龍的葵涌、深水埗、大角咀、油蔴地、尖沙咀、紅磡、土瓜灣、九龍灣、觀塘、茶果嶺至鯉魚門，以及新界的屯門、荃灣的海濱地帶。其次是港島的香港仔—鴨脷洲，新界的沙田、大埔等地。這些開山填海區域已經成了目前香港最重要的商業、工業、居住、道路交通以及文娛康樂場所之一。例如九龍灣畔的啓德機

場、紅磡火車站、葵涌貨櫃碼頭; 中環、灣仔、銅鑼灣、尖沙咀的主要商業區; 觀塘、大埔工業區; 德輔道、干諾道、告士打道、梳士巴利道等交通幹道; 香港大會堂、太空館、文化中心、維多利亞公園、沙田跑馬場等活動場所，更不用說近一二十年來相繼落成的著名樓宇如康樂大厦、交易廣場、華潤大厦、新鴻基中心、鷹君中心、新港澳碼頭、香港貿易中心、海港城與尖沙咀東部的新開發區了。

香港的開山塡海工程，最早大概應是位於上環、中環一帶的沿海地段。因爲當年的城區建設正是位於這一地段的維多利亞城範圍。以當年英軍佔領香港時的登陸點——上環水坑口街附近的大笪地（Possession Point即“佔領角”）爲例，目前距離海岸綫已經達300—400米之遙了。也即是說，從“佔領角”往北推移，現在的皇后大道中以北街區，都是近一個多世紀以來的塡海產物。

開埠以來，港島最早修建的較大規模的馬路應是荷李活道與皇后大道。前者是利用太平山原有的一條山徑經擴展開鑿而成的，後者則大致上是沿着當年的海岸綫而修築的。大約在此期間，港島又相繼開闢了鴨巴甸街、雲咸街、雪廠街、威靈頓街、士丹利街等街道。隨後在第四任港督寶靈（John Bowring）任內（1854年4月至1859年5月），曾有過一個較大規模的塡海規劃，原議定在西營盤一帶的海軍灣（Navy Bay）到銅鑼灣之間修建一條海堤，並在新塡地上修建一條海旁道。但此議遭到了早先已投得維多利亞灣有海權地段的大商人的激烈反對，並由此在立法局中發生了一場爭議，寶靈的塡海提案遭到否決。後來，寶靈只得放棄原有計劃，避重就輕地在黃泥涌入海的“鵝頸

橋”地段進行較小規模的塡海工程。九龍方面的塡海則始於1864年。初期的工程規模比港島要小得多。目前九龍最繁華的彌敦道，還是在本世紀初才正式建成的。

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香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開山塡海工程，當推港島中區的塡海工程了。該項工程從西營盤的屈地街到中環的海軍船塢全綫鋪開，全長有三公里多，前後歷15年（1889—1903）之久，耗資達三百二十五萬元之巨。塡海工程施工次年，英國王子康樂（Connaught即干諾）公爵夫婦訪港，並爲該項工程勒石紀念。爲紀念康樂王子訪港之行，該項塡海工程完成後，便將其主要街道定名爲干諾道（Connaught Road）。這是目前港島北岸海旁最闊的交通要道。從此，干諾道與在此之前先後完成的皇后大道、德輔道，便構成了自堅尼地城、西營盤至上環、中環、灣仔一帶的中心區域的三條最主要的交通幹綫，此後雖經近百年的不斷塡海，但其重要性並無太大的改變。横過中區皇后像廣場的遮打道，也是在同一時期塡海完成的。這一街道的名字，即是爲紀念此一龐大的塡海工程的主要人物遮打（Paul Chater）而命名的。

隨着香港經濟的發展與人口的急劇膨脹，原有主要的商業區與居住區高度集中於港島上環、中環的格局也發生變化。進入二十世紀以後，從港島的灣仔、銅鑼灣、北角、鰂魚涌、筲箕灣到九龍的尖沙咀、九龍灣、深水埗、油蔴地、九龍城等，都展開了不同程度的開山塡海工程。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根據立法局1906年第八號《海陸軍工事條例》進行的海軍船塢塡海工程; 根據1909年第二號《紅磡灣塡築海岸條例》進行的紅磡塡海工程; 根據1909年第九號《建

築避風塘條例》進行的大角咀、望角咀、油蔴地避風塘塡海工程；根據1921年第十七號《海旁東塡築海岸條例》進行的灣仔塡海工程，以及由私人機構進行的九龍啓德海濱塡海工程與北角（七姊妹）塡海工程等等，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經濟的重建與發展打下了基礎。

戰後，香港的開山塡海工程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與戰前對比，已經發生了不少新的變化。戰前的開山塡海工程，除了解決惡劣的居住環境外，主要是開拓中心商業區與滿足軍事用地的需要。戰後的拓展工程則更富於整體的發展規劃，且特別注重於現代化交通設施的建設與工業用地的需要。1953年還成立了城市設計處，進行全面的規劃設計。其中特別重要的工程是啓德機場的擴建與維多利亞海港（如葵涌貨櫃碼頭）的開發與工業邨和新市鎭的發展，等等。這些大都是近二三十年來的事情，多數人都已耳熟能詳了。

經過這一個多世紀以來持續不斷的努力，現已從開埠初年的一千零三十四點四平方公里拓展到1987年底的一千零七十一平方公里。在這塡海所得的三十六點六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容納了一百五十萬的人口，約佔全港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僅以港島爲例，如果我們作一個粗略的比較，就可發現開埠初年島北的海岸綫與今日之皇后大道、英皇道、筲箕灣道的走向甚爲相近，目前港島北部沿岸全長十七公里、闊約二百至一千米的長條狀地帶，包括全港最繁華的商業中心、銀行中心與交通幹道（德輔道、干諾道、遮打道、軒尼詩道、告士打道、洛克道等），都屬於塡海的區域。同時，港府也從開山塡海工程中獲得十分可觀的

財政經濟收益。

但是，根據港府發表的有關1987年統計資料，在境內的一千零七十一平方公里土地面積中，市區已建設土地（即港島、九龍主要市區和新界的荃灣、屯門、元朗、粉嶺、大埔、沙田、將軍澳及天水圍等八個新市鎮，包括區內的公園、花園，但不包括其他未建設的土地）爲一百零五平方公里，佔百分之九點八。郊區已發展土地（郊區市鎮和村落，以及新界其他已發展地點如水塘、道路和鐵路等）爲七十五平方公里，佔百分之七。林地（天然和人工植林地）爲二百二十平方公里，佔百分之二十點五。草地和灌木地(天然草地和灌木地，包括位於郊野公園內者)爲五百三十三平方公里，佔百分之四十九點八。荒地（全無草木，花崗岩石地，可開墾）爲四十四平方公里，佔百分之四點一。沼澤和紅樹地（岸邊鹹水沼澤和紅樹地）爲一平方公里，佔百分之零點一。耕地（包括耕作中和休耕的果園農場）爲七十二平方公里，佔百分之六點七。魚塘（飼養淡水魚和半鹹淡水魚，不包括沿岸海魚養殖場，但包括荒廢魚塘）爲二十一平方公里，佔百分之二。可見目前香港可供開發的土地資源是極爲有限的。隨着經濟的繼續發展與人口的增加（有人預計到本世紀末，香港人口將突破七百萬大關），土地的供需矛盾將越來越大。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和拓展香港有限的土地資源，仍將是一項艱巨的任務。開山塡海還會是解決這一困難的主要出路之一。而中區、灣仔、愛秩序灣、奇力灣、（華富鷄籠灣）、紅磡灣、西九龍以及港島西部至青洲一帶，將是近期塡海的主要選擇方向。

早期報業

香港早期報業在中國近代新聞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這裏，出版了中國的第一份近代化的中文日報——《中外新報》，有歷時近一百三十年的在中國出版時間最長的外文報紙——《德臣西報》（*China Mail*），也有1900年1月25日創刊的興中會的第一張正式的機關報——《中國日報》……。據有的學者研究，自英佔香港的1841年起至十九世紀末的近六十年歷史中，香港大約出版過四十九家報紙，其中以英文報爲多數，共有三十三家，佔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七點三。其次爲中文報，共有十家，佔百分之二十點四。此外尚有六種葡文報，佔百分之十二點三。在以華人佔絕大多數的社會中，英文報紙家數遠遠超過中文報紙，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十分獨特的歷史現象。

歷史上香港的第一家報紙，是1841年5月1日由小馬禮遜（John Robert Morrison，又譯摩理臣，1814—1843）創辦的*The Hong Kong Gazette*（《香港政府公報》，又譯作《香港鈔報》。該報不同於港府1853年9月24日創辦的官方的*Government Gazette*，後者中譯名爲《香港憲報》，早年也譯作《香港政府轅門報》）。這份英文報紙每半月出版一次，每期四頁。小馬禮遜係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之子，生於澳門，諳熟中文。*The Hong Kong Gazette*創刊後不久，小馬禮遜即

作爲砵甸乍譯員隨軍北上。次年3月17日，英文周報*Friend of China*（《中國之友》，又譯爲《華友西報》）在澳門創刊。因砵甸乍決定將駐華商務總監總部從澳門搬來香港，故此，小馬禮遜於同年3月24日將*The Hong Kong Gazette*與*Friend of China*合併，並搬遷在港出版，取名*Friend of China and Hong Kong Gazette*，中文名稱仍爲《中國之友》（周報）。香港政府曾利用該報刊載有關告示。主辦人員爲叔未士牧師（Rev. John L.Shuck）與詹姆士・懷特（James White）等。原有創辦人小馬禮遜大部份時間均不在香港，而是作爲砵甸乍的主要譯員加入了鴉片戰爭的軍事行動，並在《南京條約》談判中充任了重要的角色。英國割佔香港後，小馬禮遜成了香港政府首屆立法局議員。但任命不久，小馬禮遜即客死澳門，時年二十九歲，《中國之友》則於1859年停刊。

繼*Friend of China*之後創刊的另一份英文報紙是*China Mail*（中文名《德臣西報》，因該報主筆Andrew Dixon之音譯而得名。早期香港華人社會有以西報之報主或主筆譯名作該報中文名的習慣。另有一說，《德臣西報》之所以命名"德臣"，係源於該報的主要支持者——怡和洋行的創辦人之一J. W. Matheson之音譯。也有人將*China Mail*譯爲《中國郵報》)。該報創辦於1845年2月20日，最初爲周報，係中國歷史上出版時間最長的一家外文報紙。日佔時期被迫中斷，戰後曾一度改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南華早報》）作爲晚報出版，至1974年8月17日正式停刊，前後發行了近一百三十年。創刊初期，《德臣西報》特別標榜它是唯一刊登港府法令的報紙，以半官

方的面目出現。該報之首任主筆蕭德銳（Andrew Shortrede）與教會關係密切，據說1847年馬禮遜教育會選派容閎、黃勝等人赴美留學，其經費即係蕭氏等人所資助。

十九世紀四十至六十年代，是英文報紙創辦最多的時期，目前仍有史可查者約有二十七家之多，平均幾乎每年即有一家新的英文報紙問世。其中影響較大者可稱得上是1857年10月1日創刊的*Daily Press*（中文名《孖剌西報》，因該報主筆Y.J.Murrow之音譯而得名）。這是香港歷史上的第一張日報，對此後其他報紙之改爲日報有很大影響，也與後來香港中文報紙之創辦很有關係。該報持續出版達八十四年之久，直至1941年12月香港淪陷時才最後停刊。其他早年創辦的英文報尚有*Eastern Globe and Commercial Advertiser*（1843年創刊），*Hong Kong Register*（1844），*Overland Friend of China*（1845），*Dixon's Hong Kong Recorder*（1850），*Hong Kong Evening Mail and Shipping List*（1864），*Hong Kong Telegraph*（即《士蔑西報》，因主筆R.F.Smith而得名，1881年創刊）等等。但大部份僅僅出版數年便宣告倒閉，於今尚能堅持下來的。唯一的一家就是1903年11月7日創刊的《南華早報》。*Hong Kong Standard*還是於1949年才創刊的，至今僅有四十年的歷史。

早期的香港報紙，主要爲英文報紙，辦報人主要爲傳教士或英美商人，他們中不少還是從廣州、澳門搬遷來港的。而早年香港的中文報紙的創辦人或主持人，也大都與教會有各種各樣的關係（或畢業於教會學校）。中文報紙

的出現比起英文報紙要來得晚一些。雖然在1853年已有英華書院的中文雜誌《遐邇貫珍》在港出版，經常刊載有京報、廣東和香港政府的公報、有關太平天國的消息以及國外新聞等等，但嚴格來說並不屬於通常意義上所稱的報紙（1856年停刊）。香港歷史上的第一家中文報紙應是與《孖剌西報》有密切關係的《中外新報》。

《中外新報》創辦於1858年，它既是香港的首家中文報，也是中國的第一份近代化的中文日報。事緣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孖剌西報》因排印《漢英字典》而購買了一套中文活版鉛字，但印完字典後却閑置沒用，因而伍廷芳（伍才）等人與該報達成協議，租用這套鉛字辦起了一份中文報紙，這就是《中外新報》（按：目前史家們對該報主持人爲伍廷芳一說頗有異議，認爲創辦該報時伍氏年方十六，而且尚在聖保羅書院讀書，未必有此可能，有謂似爲黃勝之誤）。《中外新報》是一份晚報，初時爲雙日刊，後來改作日刊。該報設有"京報全錄"、"中外新聞"、"羊城新聞"等欄目，其新聞及廣告主要來源於《孖剌西報》，故初期曾被人視爲該報之中文版。至辛亥革命前後，該報發行量曾逾萬份，在粵港兩地甚有影響。但其後不久，因時局變遷，經濟困難而屢遭挫折，終於1919年宣告停刊，歷時六十一載。

香港的第二份中文報紙則是陳靄亭所創辦的《華字日報》。陳氏原係*China Mail*（《德臣西報》）的譯員，因有感於當時"華人以得爲買辦通事爲榮，不特西學僅得皮毛，且將祖國文化視若陳腐"，遂集資向教會印刷廠購買了一套中文鉛字，於1864年辦起了《華字日報》，由*China*

*Mail*印刷發行，陳氏自任編輯。該報原爲雙日刊，後始改爲日報。潘聲飛等知名文人曾出任過該報主編。《華字日報》係香港出版時間最長的一家中文報紙，至少也有七十七年的歷史，在早年傳播新思想上有過較大的影響，是近代香港重要的中文日報之一。1941年12月日軍攻佔香港，該報被迫停刊，後資料不詳。

如果說《中外新報》、《華字日報》的創辦初期大體上還是依附於英文報紙（如《中外新報》之於*Daily Press*，《華字日報》之於*China Mail*的話，那麼《循環日報》則是完全由華人獨立經辦的一家中文大報。

《循環日報》創刊於1873年12月25日，主辦人爲中國近代知名學者王韜。在此之前，王韜曾在香港一家由西人出資經營的中文報紙《近事編錄》中擔任編輯，對辦報已頗有經驗。1871年，英華書院因故停辦，王韜、黃勝等人合股購買了該校印刷部，並將之易名爲“中華印務總局”，《循環日報》即是在此基礎上創辦的。《循環日報》是一份名副其實的日報，它一開始便堅持每周出版六天（星期日休刊），時事新聞報道迅速，商情船期反映及時，甚得讀者歡迎。同時，該報還開中文報紙發表編者評論之先河，每期必有“論說”一篇，評論洋務，傳播改良，鼓吹變法。初時大多評論皆出自王韜之手筆，文鋒犀利，觀點鮮明，在海內外很有影響。該報於日佔時期停辦，戰後曾復刊約十個月，旋於1946年9月正式停刊（1959年3月至1963年11月曾有另一同名《循環日報》出版）。

二十世紀之後，中文報紙的出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與前六十年的對比恰恰相反，1900年至1959年全港

新辦的報紙大約有二百零二家，其中英文報紙僅有十二家（佔總家數的百分之五點九），而中文報紙却有一百八十七家（佔百分之九十二點六），其他的葡文和日文報紙則只有三家（佔百分之一點五）。僅僅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香港新創辦的中文報紙即有《中國日報》（1900年創刊）、《世界公益報》（1903）、《廣東日報》（1905）、《有所謂報》（1905）、《東方報》（1906）、《少年報》（1907）、《新漢報》（1910）等等，它們大都在支持或同情革命方面曾起過不同程度的作用。

香港報業早年的變遷，是研究近代香港歷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目前，港大圖書館、中大圖書館、大會堂圖書館及香港政府檔案處等均有所收藏。整理、研究這些早年資料，實在是一項繁浩而又富有意義的工作，它將爲人們認識香港近代歷史的變遷提供有益的參考。

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爲港島東華醫院、東華東院與九龍廣華醫院的簡稱，係香港最爲著名的慈善機構之一，其歷史比之保良局還要早一些。當年保良局開創之初所借用作爲辦公及難民棲息的“平安”、“福壽”兩樓，即爲東華醫院物產。追溯東華三院之創業史，首先必須提到香港早年的廣福義祠。

廣福義祠建於1851年，位處港島上環太平山街，最初爲安奉無所皈依的已故華僑神主牌位而設，俾使日後死者親屬可來港携歸故里，以慰死者幽靈。隨後，一些貧病無依及臨危垂死病人，也棲息流寄於此。至1869年4月，第六任港督麥當奴以地方不潔、有礙公共衛生爲由，下令淸除義祠，並示意港府將同意開辦華人醫院。

先是在1866年5月間，居港華人曾呈文港府興建棲留所及醫院，但當任港督麥當奴以已有國家醫院之設而予以拒絕。然而早年居港華人大多崇尚中醫，不願進國家醫院接受西醫診治。據港府的一份文書統計，1868年入國家醫院者，歐西人與印度人爲九百三十四人。而華人以十萬之衆，就醫者僅二百二十三人而已。由是可見華人信任中醫的心理。至1869年麥當奴下令解散義祠時，要求興建華人醫院之事遂舊話重提，華商踴躍捐款。僅兩月時間，即募得三萬餘元。此次得到港府的同意，並撥出上環普仁街地

段十二畝爲建院地址，另撥款十一萬五千元予以資助。1870年3月26日，香港政府正式頒佈第三號條例——《東華醫院立案法團條例》（即《一八七〇年東華醫院條例》）。是年4月9日，由麥當奴主持東華醫院奠基禮。1872年2月14日正式落成啓用，並舉行隆重慶典活動。時創院總理曾送一長聯懸於大堂，紀述建院情形："憶此地古塚荒邱，今忽烟滿丹爐，不知幾載經營，始覺稍償吾輩願；幸斯時窮黎病赤，已屬春回香海，惟冀他朝繼紹，常懷普濟衆生心。"當年創建主席爲梁雲漢（呦洋行），首總理爲李璿（和興金山莊）、陳桂士（瑞記洋行），總理爲陳朝忠（同福棧）、楊寶昭（謙吉疋頭行）、高滿華（元發南北行）、鄧伯庸（廣利源南北行）、陳美揚（天和祥）、羅振綱（上海銀行）、蔡永接（太平洋行）、黄勝（英華書院）、何錫（建南米行）、吳振揚（福隆公白行）等共十三人。

東華醫院之最高行政權力機構爲董事局（舊稱總局）。據《一八七〇年東華醫院條例》云："該局之設，專爲建院施醫，調養貧病唐人，其經費係由衆人樂捐。所有事務，統歸值事辦理。""所設值事，旣遵本例各款，凡局中大小事務，一切歸其管理決斷，並准其議立協理，或多或少，隨時所宜，以得攝理醫院事務……。"關於董事局總理之組成及任期，條例中也有明確規定，少不下六名，多不過十二名，"各值事均以司理一年爲期，期滿可以復舉"。董事局（總局）之組織，其成員即爲總理，而總理之產生，則由局內同人經投票選舉，以得票最多者當選。1872年東華醫院落成之後，改選產生首屆總理（共十二

名），由莫仕揚出任董事局主席，黃家猷、陳兆祥出任首總理，馮普熙等出任總理。其後東華醫院則例歷有變更。1911年，廣華醫院在九龍落成。1929年，又在港島掃桿埔建成東華東院。至1931年，三院統一管理，遂有“東華三院”之稱。在此之前，立法局通過了1930年第三十一號條例——《東華醫院條例》，規定三院院務工作除醫務外，仍兼辦慈善救濟事務。而董事局之權力則擴大至廣華醫院（東華東院事權仍由該院主理）。至1931年統一首屆總理時，董事局人數已增至二十六名。

東華三院董事局中尚有“行頭總理”之設，是爲董事局中之重要成員。據《總理規條》，所舉値事原由各行舉出，“例以正規生意有五間以上，係局內同人者爲一行，每行請舉値事一二位，如南北行、洋行、疋頭綢緞行、藥行、米行、金銀行、洋貨行，須多舉三五位”。以上所稱“値事”，即爲“行頭總理”。另外尚有永遠顧問與當年顧問之設。根據1930年第三十一號條例，“須設顧問總理一班，其職守係隨時遇有關於該法團及法團管理上之事宜，以指導之”。以該條例規定，顧問不得超過十五名，其中四名爲當年顧問，由上任總理中公舉，任期以一年爲限；其餘則由港督委任，是爲永遠顧問，其任期及職守由總督另訂。東華三院之有永遠顧問，始於1896年，例由香港知名人士所擔任。何東、周壽臣、羅旭龢、曹善允、馬叙朝、周錫年、羅文惠、顏成坤、周埈年、李葆葵、李樹芬、鄧肇堅、李耀祥、郭贊等人均曾充任三院之永遠顧問。實際上，能在東華三院董事局中取得一席之地者（包括顧問、主席、首總理、總理等職），大多係香港地中非官即富之知名人

物，可謂利就而名成矣。五十多年前，香港五洲書局曾出版過一册吳醒濂編著的《香港華人名人史略》，書中選載有香港七十七位當代名人史略與九位已故名人史略，至1937年爲止，其中曾在東華三院董事局任職者即在三分之一以上，包括何啓、韋玉、何東、周壽臣、羅旭龢、曹善允、周埈年、羅文錦、李樹芬、何甘棠、李右泉、蔡興、郭泉、周錫年、陳鑒坡、杜其章、容子名、馬叙朝、盧仲雲、何華生、顏成坤、陳符祥、曾寶琦、鄧肇堅、陳蘭芳、劉景清、郭贊、黄卓卿、盧榮傑、蔡惠鴻等人，由是可見一斑。不過有人認爲，在某種意義上來説，東華三院有時並非純粹意義上的慈善機構。在香港歷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中，董事局中有些歷史人物之表現有時似乎就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慈善"作用，如省港罷工期間周壽臣、羅旭龢等人在省港澳間的頻繁活動即其一例。另外，東華三院在溝通、聯絡海外華僑方面所起的紐帶作用，則是香港早年的其他社團、機構所難以比擬的。

自1938年開始，東華三院還設有醫務委員會，以管理三院之醫務工作。醫務委員會成員由醫務總監或其代表一人，三院永遠顧問二人，當年總理三人，巡院醫官（政府代表）一人及東華三院院長三人組成。三院經費來源則除了嘗產收益、一年一度當選總理之捐款以及港府撥款資助外，還有各廟宇收益和海內外各界人士之捐助。此外，三院自創建以來，還多次舉行名目繁多的賣花籌款、售旗籌款、義演籌款、義映籌款、游藝會籌款、萬善緣勝會籌款、慈善遊藝籌款、足球義賽籌款、慈善餐舞會籌款等等。雖然東華三院經費也時有拮据之感，但在應付其本身支出外，

還做了大量的社會慈善福利工作，這是值得稱道的。

東華醫院係香港最早、規模最大的華人醫院之一，"東華"、"廣華"之命名，即有取之"廣東華人醫院"之意。不過也有人另作解釋。東華醫院創建之時，梁雲漢（鶴巢）曾請求知名學者王韜撰寫《創建東華醫院序》，其文曰："醫院落成，錫名東華，其命意固有顯然可見者。況以東也者，生氣之所發；華也者，萬物極之盛。然則宣佈陽和陰行，滋長羣生，有不咸被其休者乎。"（見王韜《弢園文錄外編》卷八）東華三院創院一百多年來，其贈醫施藥、救死扶傷之貢獻最爲突出。尤其在開埠初期，居港華人大都崇尚中醫，因而三院之設，備受當地華人所歡迎。據港府1896年所組織的一個調查委員會報告，也承認有保存東華醫院以中醫治療之必要。該調查報告表明，自1891年至1895年五年間，東華醫院共收容留醫病人一萬二千七百五十八名（其中女病人一千九百五十二名），平均每年達二千五百五十一名。門診病人則爲八十萬三千零五十九名（其中女病人爲二十七萬二千二百七十八名），平均年中醫門診量爲十六萬零六百一十一名。而1895年全港人口僅爲二十四萬八千四百九十八人（其中華人爲二十三萬七千六百七十人），也可從一個側面窺見東華醫院對社會之貢獻。不過，東華醫院早年係純用中醫中藥診治病人的。至1896年後，東華始有西醫之設，但中醫中藥仍是東華三院最大特色之一。經過近百年的發展，至六十年代初期，東華三院已擁有病床三千餘張，成爲香港的醫療服務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除了贈醫施藥外，東華三院還熱心於募捐救災等等慈

善福利事業。香港自開埠以來多次發生之重大火災、風災、水災及戰時救護等，東華三院也多悉力以赴。尤其可貴的是，對於內地之救災搶險等等，三院也不遺餘力，頗有貢獻——

1908年夏季，廣東西江、北江流域水災爲患，受災居民約達八十萬戶。東華醫院與澳門鏡湖醫院及省方九大善堂聯合組成"省港澳救災公所"，辦理救災事宜。東華醫院在海內外廣泛發動募捐，籌款達四十餘萬元，分批匯往災區辦賑。

1915年5月，廣東各地連降暴雨，西江、北江、東江三江暴漲，堤壓崩決多處，災情嚴重。東華醫院爲此次救災及災後之修復工程募捐十五萬元。

1922年6月，廣東潮汕地區遭受颶風襲擊，死亡人數達十萬之衆，房屋倒塌無數，其中尤以澄海縣損失最爲慘重。東華醫院等在港發起募捐，計有東華醫院及華商總會募捐十五萬四千餘元，潮州八邑商會募捐二十一萬餘元，小呂宋、檀香山、吉隆坡等地華僑匯來二萬三千餘元。其後還在汕頭設立"災民孤兒習藝所"，以收容此次受災孤兒。

1931年，廣東、華北地區相繼發生嚴重水災。是年，東華、廣華、東院統一辦理。三院在港共籌款四十二萬餘元，先後匯交漢口等處慈善機構二十二萬元，又匯往廣東各縣急賑及辦理秋瀾等共二十萬元。

1932年，上海發生"一二八"事變，日軍武裝侵犯上海，烽火連天，災民飢寒交迫。東華三院先後在港募款四十一萬餘元，匯交上海廣肇公所代辦散賑。當時難民乘輪由滬回粵經香港時，三院負責資遣回籍者約有一萬六千餘

人。另撥款六萬元在上海設立旅滬廣東同鄉工藝傳習所，收容難民，以謀生計。

1947年，粵、桂、閩三省水災，廣東之東江、西江、北江、韓江流域，連降暴雨，江水暴漲，圍崩基陷，損失慘重。廣西全省九十縣中，遭受水災而急需救濟者達五十一縣。福建龍溪、龍岩等地災情也甚爲嚴重。是次三院共籌到各埠捐款二百萬港元，創歷史上救災籌款之最高紀錄。

…………

東華三院創建至今已近一百二十年，可謂爲香港歷史最爲悠久的慈善機構了。一個多世紀以來，東華三院在贈醫施藥、治病救人、養老送終、救災施賑、興學育才及其它社會福利事業等等方面，皆貢獻良多。在近代香港史上，東華三院應是值得一書的。

保良百年

“保良局”係香港歷史最爲悠久的慈善機構之一，迄今已屆一百一十周年。保良局原名“華人保良會”，初時又稱“保良公局”，顧其名而思其義，謂之“保”護“良”民，秉照“公”道也。據說設局原意，正是旨在保赤安良，爲民除暴。

在回顧保良局歷史之前，頗有必要提及當年港澳娼妓業的狀況。早在香港開埠之前，澳門“青樓”已衆，福榮里、福寧里一帶即爲遠近聞名的“烟花之地”。及至香港開埠，不少澳門妓女即搬遷來港“搵食”。據1845年的一份報告，其時香港已有妓院31家，妓女約有一百五十多人，當年港督戴維斯（又譯爹核士）就曾下令徵收“妓捐”，以開辦花柳病院。時妓女更有“公娼”與“私娼”之分，凡向政府領取有妓女營業牌照者即爲“公娼”，需按時繳交稅項，接受性病檢查。當時香港操此皮肉生涯者，除中國妓女外，尙有西洋（歐洲）妓女與東洋（日本）妓女等。

由於開埠初年歹徒混迹香江，拐騙之風日熾，或販賣人口，或逼良爲娼，或虐待婦孺等等，爲害甚烈。尤其逼良爲娼，成爲一個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引起各界人士之廣泛關注。被拐騙婦女，又以東莞籍爲多。故1878年（光緒四年）11月8日，旅港廣東東莞籍客商盧賡揚、馮普熙、施笙階、謝達盛等四人（後均爲保良公局首屆總理）具稟

港督軒尼詩，揭露拐匪行蹤詭秘，東往西遷，甚至媒婆老媼，俱爲拐帶窩家，“如誘良家婦女到港，初詭騙爲傭，繼則逼勒爲妓，或轉販外洋，或分售各地，童男則賣作螟蛉，童女則鬻作娼婢，總總奸謀，殊難枚舉”。認爲事關攻匪保良，籲請港督俯順輿情，“遇有拐匪，立即就地請差協同拿獲……審明嚴辦。獲匪者則賞給花紅，被拐者則資遣回籍，庶不致良民受害，尤不使拐匪縱橫”。表示願集衆捐資，儲備官庫，遍懸賞格，購綫緝拿，杜絕此風。（見《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隨後由東華醫院借出“平安”、“福壽”兩樓作爲辦公及難民棲息之所。因防範拐誘，實屬急不容緩，故保良公局在未獲政府正式批准注册之前，即已開展“保赤安良”工作。

次年（1879），港督軒尼詩下令由署巡理府法蘭些士草訂《華人保良會保護婦女及幼童章程》共九款，成爲該局最初之組織草案。章程內稱，“此公局之設，特爲保護婦女及幼童起見。一、爲查禁拐匪及被拐之人。二、凡有男女被拐到港，或爲娼婢，或販賣出洋，公局必須設法挽救，使之各回原籍。三、凡遇此等被拐男婦，係要待官訊斷，方能發落。如未送回原籍之前，公局必要收留撫養。四、若被拐之人無家可歸，公局須要代擇配，或設法以安其身，故要建造房宇一所，使無家可歸之婦女幼童，得以駐止安身。……”這大致上可見保良公局成立初期之目的。其後該章程增訂爲二十款。1882年8月，保良公局之章程經英國理藩院批准，正式在香港憲報公佈。及至1893年6月26日，保良公局章程再經修訂，定名爲《保良局組織條例》頒佈施行。該條例共十九章，其中第三章對於保良局

之目的與宗旨有明確的規定:"本社團之組織宗旨,爲協助政府抑制誘拐,保護婦孺,並以函告或其他方法揭露誘拐罪,或其有關罪行人物,俾將此輩依法懲治。營救此等婦孺,協助其重歸戚友團叙,或予以收容,直至妥爲遣嫁,或有人領育,或使其生活有適當解决,或妥爲安置爲止。"該條例一直保持了整整八十年之久,至1973年12月14日,才由港督麥理浩會同立法局商議及同意頒佈施行《一九七三年保良局法例》,對前條例作了較大的修改。對於保良局之宗旨也增加了若干新的內容,例如對應予照料或照顧之婦孺"提供職業訓練以及教育","興辦、維持及管理設於香港之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爲香港社會提供各種社會福利服務"等等。這些改動與香港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要求是相一致的。

根據1893年《保良局組織條例》,保良局的最高機構爲董事局。董事局人數由港督指定,並由華民政務司(即現今的民政司)出任當然主席,行政、立法兩局華人非官守議員等爲當然副主席。董事局下設董事會,由當年總理所組成,爲保良局局務之執行機構。總理每年改選一次,連選連任,(初期最少爲六位,至六十年代時最多爲十六位)據說保良局早年歷屆總理,多數是上屆曾任東華三院總理者,且保良局主席任滿後不久,多被委爲太平紳士。故有人將保良局總理稱之爲"保良局紳",東華三院總理則稱之爲"翁"。至1973年保良局法例公佈後,原有之"董事局"改爲"顧問局",仍由民政司任當然主席,當然成員包括民政署長、社會福利署長、行政立法兩局華人非官守議員代表各一名、以及上屆董事會主席等人組成。保良

局成立之最初六十年間，其總理皆爲男性，及至1937年，始有港紳譚炳堂夫人朱瑞英女士擔任第一位女總理。而保良局之有女主席，則是遲至1971年才由梁焯鏗夫人王培芳女士首次出任的。

保良局開創初期，經費來源頗爲拮据，除由創辦人及各屆紳商捐資外，主要由東華醫院的支持及借用文武廟盈餘公款等，如是多年。後於1891年（光緒十七年）由保良局正式開捐經費，當年即募得捐款三萬餘元。至1932年始，保良局又獲香港政府津貼，是年港府撥給經費七千元。同年，保良局首次有嘗產租金收入（至1975年，嘗產租金年收入已超過一百萬元）。此外，尚有賣花售旗籌款等收益。至此，經費來源始有較大好轉。

由於局務發展，收容日衆，原有普仁街“平安”、“福壽”辦公樓早已不敷使用，加上經費幾經籌劃有所着落，故保良局之局址遂有多次擴充、變遷。早在1880年（光緒六年）8月12日，即有以全港華人紳商名義，由梁安、伍叙、韋玉等人領銜具報輔政司，轉請港督撥給地段興建華商會館與保良公局之舉，文內稱“本港地近外洋，與各埠比鄰，生意日形繁盛，商民雲集，良莠不齊，良者保護宜周，莠者驅除宜盡，故建會館以通達商情，設公局以偵緝匪類”。但此事一擱十餘年，後始獲港督正式批准，並籌得巨款在東華醫院廣福義祠三百六十一號地段興建保良公局局址，並於1896年11月13日竣工落成，港督羅便臣親往剪綵。及至1932年3月4日，保良局又搬往禮頓道三一五八號地段新址。此後，又於1968年興建西翼大厦，1971年再動工興建福利大厦。1978年，保良局舉行創局一百周年的隆重慶典。

這標誌着保良局的發展走上了新的歷程。

保良局自其成立之時起，即依其宗旨，以“保赤安良”爲其要務。最初處理的有關婦孺案件，主要包括被拐賣截回者；被引誘當私娼起獲者；背父母丈夫私逃者；被虐待離家出走者；無親屬照顧而流浪者；自殺獲救者；墮落作不法行爲者以及家庭糾紛等。在歷史上，保良局與內地慈善機構有相當廣泛的聯繫，這對於遣送回原籍的工作有頗爲重要的作用。當時聯繫比較密切的計有廣州的廣仁善堂、愛育堂、方便醫院、廣濟醫院，佛山萬善堂、務滋堂，汕頭同濟善堂，石龍惠育醫院，石歧愛惠醫局，江門明善堂，北海普善堂，梧州廣仁分局，海防普濟醫局，廣州灣赤坎公局，上海仁濟善堂、廣肇公所，以及澳門的鏡湖醫院等等。至於被收容的外籍婦孺，則交由各領事館處理（例如在1898年之前，僅遣回日本的被拐及私逃的日本女子即有40餘人）。而早年保良局在遣嫁女子、招領難民、領育局童等方面也存在不少饒有趣味的傳統習慣，諸如領娶人必須自備花轎、粧奩、書貼到局，並分派“利是”與局中姊妹等；而領育局童者則必須在保良局內關帝神案前立簽黃紙誓章焚化，保證“妥善撫養，愛同親生，毋得視爲婢女，長大之日，尤應擇良匹配，不敢稍存利見，累厥終身”，以昭誠信等等。據於1878年至1891年的統計，在此十三年間由保良局遣回原籍、或由親屬領回、或由華民司發放、或由華民司批准擇配及領育者，凡二千七百五十一人。1892年，當任華民政務司曾對保良局之工作有如此評價，認爲保良局諸值班“協同本署查察拐匪究辦所犯此等案件之人，因設地方一所，以爲安置男女孺童被誘到港，以出

洋而不願去者。並安置婦女被誘為娼，不甘汚辱者。又安置幼童男女被拐者。又安置難民婦女由外洋解回港者……此等案件，最難查訪，苟非藉該局之力，則無所措手足矣……若無此局助理，則本署亦幾有不能妥辦此事矣”。至三十年代，平均每年收容婦孺約有四百至五百人之多，最高年份（1939）達到一千一百五十餘人，殊不簡單。

戰後，因香港社會之變遷及經濟之發展，保良局服務範圍也有所不同，已從過去比較單純的遏止拐帶、保護婦孺而逐漸轉而向外發展，以適應整個社會的需要。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以來，廣設託兒、託嬰園以協助勞工家庭。在興學育材方面，更創辦保良局中學、小學及弱能兒童訓練中心等等，為香港社會提供多種社會福利服務。保良局是香港歷史上影響最廣的慈善機構之一，其“保赤安良”之歷史作用及其對社會福利事業之貢獻，受到各界人士之廣泛好評。

銀行今昔

香港銀行業近年的迅速發展，頗令世人矚目。至1987年底，香港共有持牌銀行154間（其中有76家位居世界首一百家銀行之列），遍佈於港九各處的分行一千三百八十七間，注册接受存款公司二百三十二間，外國銀行駐港辦事處一百四十一間，它們在香港的經濟活動中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然而，香港之取得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畢竟是進入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事情。它所走過的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漫長道路，尤其是銀行業在戰前的變遷，還是值得人們回顧的。

香港歷史上的第一家銀行，係1845年4月在德己立街（D'Aguilar Street）開設的金寶銀行，即東藩匯理銀行（The Oriental Bank也有人譯爲東方銀行）。雖然金寶銀行早期在港主要係接做鴉片進口押匯等業務，存在時間前後也僅僅是五十年，但在香港開埠初年却是頗有影響的。

金寶銀行，實際上是總行設在印度孟買的西印度銀行（The Bank of Western India）的分行。總行成立於1842年。西印度銀行在國外設有數十家分行，在中國的上海、福州、廣州、漢口、厦門等地均有其分支機構，其在大陸的譯名又稱之爲麗如銀行、東藩匯兌，等等。1845年，西印度銀行總行遷往倫敦，並正式易名爲東藩匯理銀行。同年4月即在港開設分行（金寶銀行），成爲最早進入中

國的一家外國殖民地銀行。

金寶銀行（東藩匯理銀行）在香港銀行史上創下了兩項“第一”的紀錄——既是香港的第一家銀行，又是首家在港發行紙幣的銀行。該行在港開業當年，即發行了總額爲五萬六千元的鈔票，但流通範圍並不大。1851年8月30日，該行獲得英國政府的特許狀，並改更其英文名稱爲The 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中文名稱不變）。此後，該行所發行的鈔票須按皇家特許狀條文，庫存鈔票總值三分之一的白銀作爲儲備金。1857年，香港政府宣佈其鈔票可用於繳付政府費用。至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該行達到了極盛時期，其在遠東的地位，“差不多有點象英格蘭銀行在英國的地位”。（見《北華捷報》）連當時已經在港開業多年的渣打銀行、匯豐銀行也自嘆不如。但此後不久，該行屢遭挫折，每況愈下，終於在1884年5月3日倒閉。其後雖還曾組建新東藩匯理銀行（New 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但終歸逃脫不了再次倒閉的命運（1892年）。

繼金寶銀行之後，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間，先後在香港開業的有印度倫頓中國三處匯理銀行（The 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London & China 1857年在港開業）、印度新金山中國匯理銀行（The Chartered Bank of India,Australia & China 1859年）、呵加剌匯理銀行（The Agra & United Service Bank 1862年)、慳度士丹中國日本匯理銀行（The Bank of Hindustan, China & Japan即利生銀行，1862年）、西印度中央銀行（The Central Bank of West India 1863年）以及香港上海匯理

銀行（The Hong 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1865年）等，形成了五六十年代香港銀行業的初創階段。

印度倫頓中國三處匯理銀行是繼東藩匯理之後在港創立、並隨之發行鈔票的第二家銀行，在香港近代銀行史上也佔有一定的地位。該行是1853年10月由一批英國、印度商人創辦於孟買、1857年開始在港營業的。1892年該行進行改組，並於次年以有限公司注册。1958年始將中文名稱簡化爲“有利銀行”（The Mercantile Bank Limited），第二年即爲匯豐所收購，成爲其屬下的銀行之一。1978年起，該行已停止在港發行鈔票。

印度新金山中國匯理銀行，即讀者所熟知的渣打銀行（The Chartered Bank），是現存僅有的幾家香港早期銀行之一。該行1853年成立於倫敦，1859年在香港開設分行，三年後（1862）即在港發行鈔票。1911年其中文名改稱“印度新金山中國渣打銀行”。渣打銀行也是目前與匯豐一樣繼續發行鈔票的有較大影響的一家英資銀行。該行發行鈔票的根據是1853年的皇室特許狀及在1897年、1922年和1939年分別獲得的輔助特許狀的條例。據1983年的一份統計資料，在當時香港的流通紙幣中，匯豐所發行的約佔百分之七十八，渣打約佔百分之二十二。在目前香港的英資銀行中，渣打的規模僅次於匯豐，並與匯豐銀行輪流擔任香港銀行公會主席。

而香港上海匯理銀行（後改名爲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則是總部設在中國的第一家外國銀行。該行創辦之初，包括有英、美、德、印度等股份，但主要的投資和創辦人則

是在遠東多年的英國大洋行，寶順、太古、老沙遜等洋行老闆都曾是匯豐的董事和主要投資者。該行於1864年7月起招股，次年3月便以有限公司的形式在港正式開業，同年4月即發行紙幣。是爲匯豐在港發行鈔票之始。1867年12月，該行正式根據香港法例而成爲銀行經營。在香港銀行史上，若以年資而論，匯豐比金寶整整遲了二十年。但是，匯豐自創辦之時起，就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扶助，竟能屢度風險，發展迅速，後來居上。匯豐還擁有政治上的重要地位，該行代表也常被委任爲香港立法、行政兩局議員。目前，香港雖然沒有中央銀行，但實際上匯豐却執行着很大一部份類似中央銀行的職能，港府有關金融貨幣的一些政策措施，主要地是通過它貫徹執行的。匯豐銀行是目前香港最大的一家英資銀行，並則身於世界最大的二十家銀行之列，爲當前執香港銀行業之牛耳者。

以上僅係香港開埠初年少數幾家與發行港幣有關的銀行。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外國來港設立銀行（或分行）者與日俱增，例如1890年來港開辦的日資橫濱正金銀行（Yokohama Specie Bank, Ltd.）、法資的東方匯理銀行（Bangue de L, Indo-chine， 1895年）、日資的台灣銀行（Bank of Taiwan，1901年）、美資的萬國寶通銀行（International Banking Corporation，1902年），以及荷蘭銀行（Netherland Trading Society1906年）、新加坡的四海通銀行（Bank of Sze Hai Tong 1915年）等等。至二次大戰前陸續在港設立分行的還有美國運通銀行（The American Express Co., Inc. 1916年）、友邦銀行（Underwriters Bank Inc. 1932年）、華比銀行

（Bangue Belge Pour L'Etranger S.A. 1936年）等，均規模不小。

至於在港注册開設的華資銀行和銀號，歷史也頗爲悠久。1891年，香港的第一家華資銀行——香港中華匯理銀行（National Bank of China Limited, Hong Kong）即在港開業，並曾發行過面額爲五元及十元的兩種鈔票（後根據1895年《銀行紙幣發行條例》而停止發鈔），1911年，香港中華匯理銀行關閉。此後相繼在港開業的華資銀行有廣東銀行（1912年開業）、東亞銀行（1918）、香港國民商業儲蓄銀行（1921）、康年儲蓄銀行（1922）、嘉華儲蓄銀行（1925）、永安銀行（1931）、香港汕頭商業銀行（1935）等。以上銀行總行皆在香港。不過，在這一時期由華資開辦的金融機構中，還是以銀號爲多數，且有不少是屬於家族式的獨資經營，其中以廣東商人開辦者佔多數。最早一批在港開業的銀號，如瑞吉銀號、鄭天福銀號等，約成立於光緒十年（1884）前後。至1929年估計，當年在港開業之銀號約有五十八家，絕大多數集中於文咸東街以及皇后大道中，德輔道西一帶。僅位於文咸東街的銀號即有瑞生、瑞昌、福和、福華、全盛、全益、裕記、裕恒、麗源、麗興、維吉、維新、順成、寶恒、宏益等三十六家。香港早期的銀號，以其主要業務之別，大致可劃分爲按揭、金銀找換、炒買三大類型，其中尤以經營放款、存款及匯兑爲主要業務的按揭銀號的資本、實力最爲雄厚。不過，有一些銀號後來相繼申請爲銀行進行經營，如三四十年代成立的恒生銀號、大生銀號、大有銀號、永隆銀號、永享銀號等等。

除了英資等外資銀行及華資銀行，戰前由中國大陸來港開設的中資銀行（分行）也爲數不少。早在1916年，中國銀行即在港設立辦事處，並於1919年改爲分行。此後相繼在港開業的有廣東省銀行（1929）、廣西銀行（1932）、交通銀行（1934）、中南銀行（1934）、上海商業儲蓄銀行（1934）、金城銀行（1936）等等。1937年日本擴大侵華以後，內地銀行遷港營業或開設分行者較前增多，1938年即有中國國貨銀行、國華銀行、南京商業儲蓄銀行等。此外，尚有多家銀行在港設立辦事處或通訊處。

可見，在太平洋戰爭以前，香港的銀行業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雖然外資銀行（尤其是英資等銀行）在香港的金融體系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香港的華資銀行（銀號）與中資銀行的作用同樣是不可低估的，它們在支持香港工商各業的發展、鞏固香港轉口港的地位，爲香港經濟的繁榮都作出了積極的貢獻。當我們回顧香港經濟的歷史軌迹的時候，戰前香港銀行業的發展這一重要環節是不應忽略的。正是由於有了戰前的長足發展，才爲戰後尤其是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濟的起飛與隨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港幣雜談

港幣的變遷可稱得上是一個頗爲複雜而又饒有趣味的話題。它關係到每個香港人的切身利益。多年來，海內外不少學者也致力於這一專題的研究。溫故而知新，了解一點早期港幣的歷史，對加深現實的認識也許會有所裨益。

開埠初年，香港幣制一直跟隨英國，實行金本位制。當時市面上流通的貨幣，主要的還是中國的銀錠、碎銀、銅錢，以及西班牙銀元（即“本洋”）、墨西哥元（即“鷹洋”）和英國殖民地印度的盧比銀洋等，種類繁多。中國的幣制在頗長一段時間內仍在香港沿用，其兌換率也以紋銀七錢二分爲一元計。1841年5月1日，率兵佔領香港的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義律（Charles Elliot），在拍賣香港土地的章程中規定，每一銀元即白銀七錢二分値四先令四便士。次年3月29日及4月27日，繼義律之後來港的砵甸乍（即後來的香港首任總督），先後兩次發佈公告，宣佈上述貨幣均爲法定貨幣，而英國及其他外國貨幣仍可按幣面價値流通，並規定每英鎊可兌墨西哥銀元五枚，每枚銀元可兌二又四分一印度盧比或一千二百枚銅錢，政府的賬務及貿易均以鷹洋爲支付標準。至1845年5月1日，英國女皇曾頒佈公告，將英國發行的金、銀、銅幣列爲香港的法定貨幣。但實際上香港市面流通的貨幣，主要還是墨西哥銀元及中國的銀元與銅錢。這種多幣制的局面持續了頗長的

一段時間。至1862年，香港政府又改貨幣單位英鎊爲銀元，採用銀本位制。

香港之有紙幣發行，始於1845年成立的金寶銀行（東藩匯理銀行），該行成立不久，即發行了總額達五萬六千元的紙幣。隨後相繼在港營業的有利銀行（印度倫頓中國三處匯理銀行）、渣打銀行（印度新金山中國匯理銀行）、匯豐銀行（香港上海匯理銀行）以及呵加剌與馬士打文銀行（該行於1866年倒閉），也先後發行紙幣。至1865年，上述五家銀行發鈔總額已達二百八十六萬五千五百六十七元，並獲得港府之認可。但此時人們對紙幣普遍尚缺乏信心，特別是華人，大多仍樂於使用白銀與銅錢。

至於香港之有“本地”硬幣，則比紙幣來得要遲一些。雖然在1863年已由英國倫敦皇家造幣廠（Royal Mint London）鑄造了一批刻有“香港”字樣的銀幣（一毫）和青銅幣（一仙及一文），但眞正由香港本地鑄造的硬幣，還是在此三年後的事。1864年，香港政府通過了該年第二號條例——《設立造幣廠條例》，決定在銅鑼灣的新塡地設廠造幣。1866年5月7日，耗資約40萬元的香港造幣廠開張營業，開始鑄造面額一元、半元、二毫、一毫及五仙（欲稱“斗零”）的銀幣。其時幣値爲一元等於十毫、一毫等於十仙，一仙等於十文。據該廠開業告示所稱，“如有舊銀元、銀錠、銀屑、均可收受代熔代鑄新幣”。但由於種種原因，香港造幣廠終於1868年因虧蝕而夭折，其廠房也拍賣給怡和洋行，而機器則作價售予日本大阪的一家造幣廠。香港造幣廠在其營業的兩年時間，共鑄銀二百一十八萬八千零五十四枚。此後，香港再也沒有自己設廠鑄

造硬幣了。其所需的硬幣，除一度於1895年曾由印度造幣廠鑄造外，後概由英國代鑄。至現在爲止，除上述三家外，英國的詹默士華德公司（James Watt and Co.）、希頓父子有限公司（R.Heaton & Sons Ltd）、京士諾頓金屬有限公司（King' s Norton Metal Co.Ltd）也曾代香港鑄造過硬幣。香港造幣廠倒閉之後，市面硬幣的流通量一度有所影響。至1872年，港府特許香港上海匯理銀行（匯豐銀行）擴大發鈔權，發行一元紙幣，總數達二十二萬六千元。直到1935年，這種一元紙幣才改由港府發行。目前市面上流通的硬幣共有七種，面額分別爲一毫、二毫、五毫、一元、二元、五元，均係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新鑄造的品種。上述六種硬幣，其鑄造金屬構成也有所不同，前三種小面額硬幣爲黃銅與鎳合金，顏色呈古銅色；後三種爲紅銅與鎳合金，色澤近銀白色。外形上除二毫和二元呈十二角海扇形外，其餘均爲圓形。直徑、重量及厚度均大致上與面值成正比。

在香港紙幣發行史上，除了上述五家外資銀行外，華資銀行也曾發行過小面額（五元及十元）的鈔票，這就是1891年在港開業的第一家華資銀行——香港中華匯理銀行。但是不久，港府即於1895年頒佈《發行銀行鈔票條例》，停止了該行的發鈔權。然而，直到1937年8月1日，也即港府頒令終止英國貿易銀元爲香港法定貨幣之後，香港的貨幣制度才告統一。此後尚有一段插曲，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市面小面額港幣奇缺，故港府臨時權將一批原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印刷的中國銀行“國幣”面額五元劵，經加蓋紅色中英文“香港政府壹圓”（Hong Kong Govern-

ment $1）字樣後，作爲港幣一元劵於1941年12月16日發行使用。但日軍於12月25日攻佔香港，這批港幣一元劵也就完成了它的十天使命。隨後，日軍在港强制使用軍票。最初軍票與港幣的兑換率爲一比二（1941年12月25日至1942年7月23日），其後改爲一比四（1942年7月24日至1943年5月31日），再則乾脆禁止港幣流通。原有在港營業的匯豐銀行、渣打銀行、有利銀行、華比銀行、中央銀行、廣東銀行等，以及萬國寶通銀行、大通銀行、運通銀行、友邦銀行、安達銀行、荷蘭銀行、中國農民銀行、中國國貨銀行等"敵性銀行"，分别爲横濱正金銀行與台灣銀行所清算。其間，日軍又强迫匯豐銀行簽發尚未發行的總額達十一億九千八十萬元的港幣。當時英國殖民地部大臣和匯豐銀行曾通過重慶的"自由中國廣播電台"廣播，告誡香港居民不要使用這種非法貨幣。戰後，這批"迫簽紙幣"（Duress Notes）曾一度禁止使用。直至1946年4月2日，匯豐銀行鑒於當時形勢，在取得港府的某種承諾、保證之後，宣佈予以承認。此舉爲恢復港幣之信譽及其後銀行業、工商業的發展，産生了頗大的影響，實屬明智之舉。

太平洋戰爭以後，港幣的發行權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内一直保持着"三駕馬車"——匯豐銀行、渣打銀行、有利銀行並存的局面，但在七十年代末終於打破了。1978年，港府終止了有利銀行的發鈔權。至此，法定的發鈔銀行就只剩下匯豐銀行與渣打銀行兩家，這種狀况一直持續至今未變。現在市面流通的紙幣，即爲匯豐銀行與渣打銀行分别發行的面額爲十元、二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五百元、一千元六種，其中匯豐銀行的一千元鈔還是1977年才開始

發行的。

紙幣的設計與印刷也是一個饒有趣味的問題。早期的鈔票設計大都比較簡單，易於僞造。直至二十世紀後，才漸趨複雜。1927年，香港的紙幣首次有水印設計。七十年代後，開始在紙幣中夾上金屬綫，並採用電腦分色等現代化技術。至於在圖案設計上，則各具特色。在目前流通的鈔票上，匯豐鈔大都刻上該行大厦及其標誌——銅獅；渣打鈔則以風光圖畫以及中國神話中表示吉祥的動物（如麒麟、鳳凰、鯉魚等）爲多。更爲耐人尋味的是，1985年正式落成的香港新的“造幣廠”（位於大埔工業邨）——私營的紙幣印刷廠印刷的新港幣，除了面積比舊鈔略小外，有關“殖民地”的字眼再也沒有了。港幣的設計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香港社會歷史的變遷。

實際上港幣之複雜和有趣遠不止這些。雜談至此，權且打住。至於港幣之匯率與外匯基金問題，港幣之管理與立法基礎問題，“九七”以後的港幣發行與前景問題，等等，就更非三言兩語所能說得清楚的了。

東江引水

在與羅湖一河之隔的深圳市中心東北方三公里，有一處風光秀麗的地方，這裏青山逶迤，碧水盈盈，亭台館榭，競相輝映。它，就是在香港也頗有名氣的深圳水庫。當你假日餘暇至此一遊的時候，你可曾想到，這正是東深引水工程的終點？香港有一半的食水即來源於此。“飲其流而懷其源”，你是否也有此“飲水思源”之感呢？

水哉水哉！近百年來，受盡制水之苦的香港人，對於“水”有特別深刻的感受。雖然由於東江之水越山來，香港的供水已有根本的好轉，但當年那制水的歷史，却是令人記憶猶新的。

歷史上的香港，曾有過那不缺水的年代，古代的航海家也慕名至此汲水補給，芬芳甘甜的溪水聲名遠揚，更為這海陬小島贏得了“香江”——“香港”的美稱。香港開埠後的最初二十年，在工農業及生活上的用水，都是依靠大自然的恩賜。從山澗溪泉的利用到傳統的鑿井取水，成了當年供水的主要來源。1863年，香港歷史上的第一個水庫——薄扶林水塘建成供水。雖然至1871年第二期工程完成後，薄扶林水塘的容量僅有三十二萬立方米，但當年香港人口只有十二萬，也未有大工業用水戶，因此，淡水供應還是可以應付的。至十九世紀末，又先後在港島建成大潭水塘（1887）、黃泥涌水塘（1899）以及分佈於北角、

鰂魚涌、香港仔的一批私家水塘。但與此同時，香港人口却出現了持續的高增長，1895年已達到二十四萬八千四百九十八人，二十多年間人口已經翻了一番。是年，香港終於發生了歷史上的第一次制水。

進入二十世紀後，香港制水頻頻發生，令居民爲之叫苦不迭。因此，如何開發九龍、新界的水源，並引水輸港，便成了二十世紀初年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1911年，九龍半島上的第一座水塘——九龍水塘落成，容量爲一百五十九萬立方米。隨後，又相繼建成了大潭篤水塘（1917）以及石梨貝水塘（1925）、城門水塘（1936）等。其中城門水塘容量達到一千三百六十四萬立方米。1930年，食用水開始成功地從九龍輸入港島。

然而，香港的供水條件畢竟是受到自然地理條件等等的諸多限制。雖然香港受到亞熱帶海洋性氣候之恩澤，年均降雨量有2225毫米，平均年產水量可達十億噸（立方米），但在此區區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陸塊分散，地形複雜，島嶼林立（共二百三十多個島嶼），缺乏修建大型水塘及長距離輸水的條件，而且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降雨又高度集中於4月至9月份，因此，人口的急劇增加與工商業的發展使供水情況日益緊張。在制水比較嚴重的年份（如1929年），港九各處有時連街喉都無水供應，居民要直接去供水站輪候取水，火車廂也曾臨時改裝成水箱到深圳河去汲水，有的船艇更直接到珠江販水謀利。

五十年代以後，香港人口激增，1950年已突破二百萬大關。1959年，香港人口更達到三百零二萬（以後每年大約以十萬的速度遞增）。是年，香港經濟完成了從轉口港

時期向工業化時期的歷史性轉變，全港擁有工廠已達四千五百四十一家，居民生活用水與工業用水已經成爲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而每年數以萬計的遠洋輪船、內河船舶的淡水補給，也成爲香港的一個沉重負擔。因此，依靠香港有限的淡水資源（即使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已無法解决日益增長的供水需求。人們唯一的希望所在就是向大陸要水——東江水!

向大陸要水，這是香港政府一項明智的重大決策。第二十三任港督柏立基打破了依靠本地資源解決用水困難的傳統思想，於1960年4月15日，派出了以署理工務司方世富、副工商處長巴悌等人組成的代表團前往深圳，就深圳水庫供水港九問題與寶安縣政府舉行正式會談。同年11月15日，雙方達成協議，並在深圳舉行了隆重的簽字儀式，由寶安縣人民委員會代表曹若茗與港府代表巴悌在聯合公報上簽字。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也參加了簽字儀式。經雙方協商，深圳每年向香港供水五十億加侖（約二千三百萬立方米），每千加侖水費爲人民幣一角（折合港幣二角三分四厘）。這是港深合作關係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一次歷史性突破。

深圳水庫向港供水之後，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香港用水緊張的壓力。然而，僅僅是深圳水庫本身的蓄水，畢竟是趕不上香港用水急劇增加的需要，制水仍然十分嚴重，1963年的制水竟至每四天才供水四小時，尤其是家居木屋區之居民，其“擔水”之淒涼，實難以言狀。因此，繼深圳水庫供水工程之後，一項規模宏大的東江——深圳——香港供水工程終於在1964年2月動工了。

東深供水工程是一項除供水外，還兼具灌溉、防洪、發電的綜合性水利工程。工程的起點位於東莞的橋頭鎮附近，在此開鑿一條約三公里長的新河道，將東江水引入橋頭鎮附近的泮湖，然後將江水抽入東江支流石馬河。在石馬河的河道上興建六個攔河壩梯級、八座自動化的電動抽水機站，使江水逐級提高（總共提高四十六點六米），令原來由南向北、由高向低流的石馬河水隨着機械的作用轉向南面倒流，從橋頭經旗嶺、馬灘、塘頭厦、竹塘、沙嶺、上浦而進入雁田水庫。再在白泥坑開鑿一條三公里長的渠道，將在雁田水庫的東江水向南引入寶安的沙灣河，流入深圳水庫，然後經管道輸入香港。東深供水工程經過短短一年的緊張施工，於1965年2月勝利建成。整個工程從引水河口到深圳水庫，共開挖輸水河道八十三公里，擴闊和加固了二個中型水庫，架設了一百四十多公里的高壓電綫，挖掘土石方達二百多萬立方米。東深供水工程竣工當年（1965），即向香港供水六千萬立方米。此後，又於1976—1978年，1981年至1987年先後進行了兩期擴建工程，供水能力大爲提高。1978年11月起，年供港水量增至一億四千五百萬立方米，1982年增至一億八千二百萬立方米，1985年又增至三億二千五百萬立方米。至1987年10月，第二期擴建工程已全部完成，供水能力已可達到年六億二千萬立方米，相當於1978年一期擴建工程完成時供水能力的三點七倍。目前，東深工程每年向香港供水已超過四億三千二百萬立方米，約佔香港食用水耗用量的百分之五十七點六（1987）。中方也因此而獲得一筆可觀的外匯收入（自1987年起，每立方米水費爲港幣一元三仙）。只是東

江之水越山來之後，香港的水荒才逐步得以緩解。

在東深工程施工前後，香港政府在本港也進行了多項規模較大的工程，除修建了大欖涌水塘（1957年建成，容量爲二千零四十六萬立方米）、石壁水塘（1963年建成，容量爲二千四百五十五萬立方米）外，1968年和1978年又先後築成了船灣淡水湖和萬宜水庫。這兩個號稱全港最大的水塘，近年存水量約佔香港總存水量的百分之八十五，達到三億立方米左右。五十年代末，港府又開始建立海水冲厠系統（現每年採用海水約一億多立方米），並於1976年在新界大欖涌水塘附近的瀕海地方，修建了一座日產十八萬立方米淡水的海水化淡廠，以供制水期間作爲“後備水源”應急之用。

目前，香港年食水耗用量已超過七億立方米，隨着香港人口的繼續增長與工業生產、遠洋貿易的發展，耗水量也將會繼續增加。但是，由於港府多年來的持續不斷的努力，更由於有了源源不斷的東江水的接濟，自1982年6月1日解除制水措施至今，多年來香港已實現了二十四小時食水供應。也許，香港制水的歷史再也不會重演了。

六村大火

1953年係香港多事之秋。是年經濟不景，火災頻仍，其中損失較大的即有何文田木屋區火災、灣仔禮頓山道木屋區火災、紅磡火災、九龍塘村火災、深水埗石硤尾六村火災……。其中尤以石硤尾六村火災之損失最爲嚴重，對香港後來的公屋政策也頗具影響。

石硤尾六村包括石硤尾村，白田上、中、下村，窩仔上、下村，位於今九龍深水埗大埔道與石硤尾街之東北面。三十多年前，這裏還是尚未完全開發的木屋、石屋集中地，有近十萬居民聚居於此。1953年12月25日（聖誕節）夜九時三十分，白田上村衆安街124號木屋二樓住客鍾某及其妻高氏，因製鞋過程震墜火水燈，繼而燃及膠水，撲救不及，遂釀成大火。消防局雖曾前往搶救，但因風高物燥，地形複雜，灌救困難等等諸多原因，終致殃及六村，大火燃燒長達五個小時之久，燒死居民三人，重傷六人，輕傷四十五人，另燒燬木屋、石屋共二千五百八十間，禍及居民一萬五千零四十戶，造成近六萬居民無家可歸。石硤尾大火時正值寒冬，災民巢覆家破，片瓦不留，舉家大小，露宿街頭，其損失之慘重，並不亞於戊午年（1918）之馬棚大火。

災後，各有關方面迅即展開搶救及善後工作，其中街坊福利會、商會等社團組織均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受災當

夜，深水埗街坊福利會即星夜召集各理監事會同救傷人員，展開救急工作，並暫借深水埗街坊福利會附設之學校及大埔道一四二號東廬爲臨時婦孺收容所。次日成立“深水埗石硤尾六村火災急賑委員會”，由深水埗街坊福利會爲正副主任委員，各機關社團（如中華總商會、九龍總商會、潮州商會、五邑工商總會、東莞同鄉會、基督教女青年會以及各區街坊福利會等）爲委員，分設總務、徵募、急賑、財務、稽核、文書六部掌理事務，並聘請社會局、市政衛生局代表及各界紳商名流（如何東、周壽臣、羅文錦、羅文惠、周錫年、周埈年、顏成坤、郭贊、利銘澤、馮秉芬、李樹縈、鄧肇堅、胡文虎等）爲顧問，進行救濟工作。加入這場救災、善後工作的還有社會局、警察局、消防局、衛生局、工務局等政府部門。當任港督葛量洪及輔政司柏立基也曾到場察看災情。

善後工作除了贈醫施藥、派送食物、配給衣被等外，還展開各種形式的徵募。後經各方努力，共募捐（包括將賑米及剩餘物品變換現款）得款二百三十二萬六千七百九十四元六角二仙，殊不簡單。其中包括各家報社經募捐及各界捐款一百二十六萬三千四百六十六元六角，各埠社團及華僑捐款三十萬二千七百零六元三角，各社團、教會、佛堂經募捐二十八萬八千八百四十三元一角八仙，個人捐款十萬零二千三百三十五元七角，商行、廠號及工友捐款七萬五千五百六十元四角四仙，各街坊福利會經募捐三萬三千八百五十二元四角，各學校經募捐二萬零七百五十六元六角五仙，還有其他義演、義唱、遊藝籌款以及“一元運動”捐款，義賣、義舞、義攝等形式活動捐款。以上所

得款項於1月26日與2月15日先後向每位災民各派發二十元、十五元的賑款，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災民燃眉之急。

石硤尾大火在一夜之間，使如此衆多災民顛沛流離，其艱苦實不堪言狀。然而，此次火災却對香港政府後來的公屋政策及新市鎮規劃的產生有頗大的影響。儘管在此之前，港府已經開始在觀塘等處進行塡海，着手工業衛星鎮的規劃、建設。火災次年（1954），港府設立了徙置處，以處理木屋區居民與工業問題。當年香港的木屋區主要分佈在港島的筲箕灣、銅鑼灣、薄扶林、香港仔以及九龍的九龍城、鑽石山、石硤尾、大窩坪等處。據估計，1953年香港約有木屋居民三十萬，約佔當年人口（二百三十萬）的百分之十三。石硤尾大火之後，港府實行了大規模的木屋拆遷與興建廉租屋邨（又稱“公共屋邨”，簡稱“公屋”）計劃。至1963年，共興建了該類屋邨二十一個（九萬二千四百零七個單位），約可容納五十萬人。這些屋邨按每人平均面積二點三平方米設計，每個單元面積從七點九至二十三點二平方米不等，其盥洗室和厠所則是公用的。儘管港府所建築的公共屋邨用的都是納稅人的錢，而且早期的屋邨設計、建築標準還比較低劣，但比之簡陋的木屋還是稍勝一籌的。早期興建的這類簡陋的廉租屋，雖然大部份已陸續加以改建，但至今在深水埗等處仍可見到。有人認爲，今日的新市鎮政策即萌芽於這一時期。目前，香港房屋委員會對入住廉租屋的申請人資格有明確的規定，即申請人及其大部份家庭成員必須在港居留滿七年，二人家庭每月入息限額爲四千二百港元，十人以上家庭爲七千四百港元。現時公屋租金還是比較低廉的，一般約佔住戶平均

收入的百分之七（私人樓宇住戶約爲百分之十九），公屋租金每兩年調整一次。七十年代以後，官方又推出了“居者有其屋”簡稱“居屋”計劃，規定凡最近七年在港居住，同時住在私人樓宇、且家庭每月入息最高不超過八千五百港元（對住在房屋委員會及房屋協會轄下公共屋邨的家庭，不作入息規定）等者，可以申請購買“居屋”，其價格一般比市價低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並可獲得優惠按揭貸款。這對於那些收入超過入住“公屋”資格而又無能力購買私人住宅樓宇的中下收入家庭，無疑也是頗具吸引力的。至1986年爲止，上述兩類居民（租住公屋及自置居屋）約有二百六十萬人，約佔全港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七。港府爲解決市民的居住問題所作出的努力確是頗有成效的。

繼石硤尾六村大火之後不久，與該區僅一山之隔的大坑東木屋區，於1954年7月22日突然發生大火，燒死居民九人，焚燬木屋二千餘間，受災居民達二萬四千人，僅僅過了半年，位處新界上水的石湖墟又發生大火，燒燬木屋一百八十間、磚屋二百二十間……。木屋火災，一直是一個令人頭痛的嚴峻問題。目前，全港仍有五十萬以上居民居住在條件惡劣的木屋區中，火神隨時都會降臨在他們的頭上。

鐘樓話舊

這些年來，先後陸續出現的香港太空館、香港文化中心等一批造型別致的建築羣，與位於梳士巴利道上緊相毗連的尖沙咀東部以及隔海相望的灣仔、中環，同爲香港最吸引人的地方，被譽爲這"東方之珠"中最美麗的光環。就在尖沙咀天星碼頭東側，引人矚目的屹立着一座約五六層樓高的舊式建築，這就是九廣鐵路（Kowloon-Canton Railway）舊九龍火車站的標誌——鐘樓。它，顯得是那樣的古樸、凝重，而又帶有幾分孤獨與蒼涼，似乎在向人們訴說着它那歷歷往事與百年滄桑……

九廣鐵路從其最初提議興建至今，至少已經整整經歷了一個世紀的漫長歲月。1888年（光緒十四年），當時在九龍的一些中國商人就籌劃建設一條從廣州到九龍的鐵路，並開始了實地勘測。據其後的《孖剌西報》（*The Daily Press*）及《德臣西報》（*China Mail*）報道，當時參加勘測活動的還有英籍工程師。興建九廣鐵路之議曾得到兩廣總督李瀚章以及張之洞等人的支持。據光緒十六年（1890）十月三十日李瀚章諮總理衙門文，當年有位曾經隨節出使外洋、在籍湖北候補知府易學灝，曾就籌集商股、修建九廣鐵路提出過頗爲詳盡的計劃，並擬將全綫分爲廣州至黃埔、黃埔至太平、太平至九龍深水埔三段，認爲如此計劃能够實現的話，則"旣可分香港利權，遇事便於援

應。且東莞、惠州產煤鐵甚多，有鐵路則開礦亦易，於軍旅礦物商賈均有裨益……”。

英國對於在中國修建鐵路一直懷有一種特殊的“熱情”。當時，帝國列强對中國的鐵路投資主要有兩種形式，其一是借款給清政府修築鐵路，即所謂鐵路外債。債權國不僅可以由此而索取重利，而且借款還有折扣（如九折、九五折不等），並以所修鐵路財產作爲擔保，還要參加鐵路的建造與管理，其二是由列强國家直接修築鐵路，廣九鐵路的辦法屬於前者。1898年8月，英國在剛剛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兩個月後，即向清政府正式提出了修築九龍——廣州、天津——鎮江、浦口——信陽、山西——河南——長江沿岸、蘇州——杭州——寧波等五條鐵路的要求。還在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時候，英國就爲其日後修建鐵路作了準備，文中特別規定“將來中國建造鐵路至九龍英國管轄之界，臨時商辦”。次年（1899）3月19日，中英簽署了《香港英新租界合同》，劃定了邊界的走向。4月底，英國才正式完成了對新界的接管。

然而，新界尚未接管，英國便於1899年3月28日（即租界合同簽署後的第九天）由怡和洋行與當時清政府督辦鐵路總公司大臣盛宣懷簽訂了《九廣鐵路草合同》。該合同共有五款，第一款規定，造辦九廣鐵路須依1898年5月13日所簽訂的《滬寧鐵路草約章程》的苛刻條件辦理。其他條款還提出了將來九廣鐵路與粵漢鐵路的互相聯接等問題，並特別申明將來正式訂立九廣鐵路借款合同時，第一款草約章程所有能遵照之處，應與嗣後商定核准之滬寧鐵路正約章程一樣。1903年7月9日，盛宣懷與怡和洋行正式

簽訂了《滬寧鐵路借款合同》，規定借款實價爲虛數九折，利息則按虛數年五厘計，每半年給付一次，借款以五十年爲期，並特別規定“將淞滬已成之鐵路作爲頭次抵押與銀公司，並本約所指將來營造鐵路所用已購及擬購各地基，與夫物料、車輛、房屋各項產業，及他日造成之鐵路該路本身，及該路各項進款，亦一律作爲抵押”。該路的工程師及管理人員也主要由英國人擔任。等等。以如此條件作爲九廣鐵路談判的樣榜，也可見修建九廣鐵路之難了。

《九廣鐵路草合同》簽署後整整經過了八年的時間，至1907年3月7日，才正式由當時的郵傳部左侍郎兼署外務部右侍郎唐紹儀與英方簽訂了《廣九鐵路借款合同》，清政府不得不以高利息向英方借款一百五十萬英鎊（實收九四折），並以鐵路作抵押，重金聘用英國總工程師、總管理人員來修築九廣鐵路華段。

1907年8月，九廣鐵路兩段同時開工，工程頗巨。華段的石龍大橋等處及英段的獅子山隧道，都是比較複雜的建築。數易四度寒暑，終於1911年8月全綫通車。

最初的九廣鐵路，始於廣州大沙頭，終於九龍尖沙咀，全長一百七十八點六公里，其中英段爲三十五點八公里，共設有九龍、油蔴地、沙田、大埔滘、大埔墟、粉嶺、上水、羅湖等八個車站，行車約需一個多小時，華段則爲一百四十二點八公里。其後沿途站、綫略有變更。目前英段設有九龍、旺角、九龍塘、大圍、沙田、火炭、馬場、大學、大埔墟、太和、粉嶺、上水、羅湖等十三個車站，全程約需四十分鐘。此外，起迄站也有所變化。位於梳士巴利道的九廣鐵路總站——尖沙咀火車站，還是遲至1916年

3月26日才正式落成啓用的。其後當局曾於1924年、1954年兩度有搬遷之議，但終因故而擱置，直至1975年11月始遷紅磡現址。原有尖沙咀火車總站則於1978年拆卸，並在原址一帶先後興建太空館與香港文化中心，成爲市民與遊客的一大去處，而舊火車站鐘樓則有幸得以保存下來。廣州方面則於1974年將火車總站從大沙頭搬往三元里現址。過去，九廣鐵路從尖沙咀火車站開出，可以直達廣州大沙頭火車站。至1949年10月14日廣州市解放，九龍北行火車就只能到羅湖爲止，乘客必須在此步行過橋接受檢查，再從深圳火車站換車北上。直至1979年4月4日，雙方經過協商，中斷了將近三十年之久的港穗直通火車才恢復運行。1983年，九廣鐵路英段又實現了電氣化。目前，每天約有三十萬乘客乘搭該路段火車，成爲香港最爲繁忙的公共交通工具之一。

九廣鐵路通車至今，已有近八十年的歷史了。尖沙咀火車站這座一度作爲香港標誌之一的鐘樓，也伴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而年屆古稀，成爲歷史的“古迹”。沿着這歷史的軌迹，人們將可從中窺見這香江昔年的風貌與近代的變遷。

航空軼事

香港的航空史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前夕的1911年3月，當時有一家英國人開設的“遠東飛機公司”曾在沙田舉行過飛機表演，首開香港的飛行紀錄。說起這次的飛行表演，還是相當有趣的。

從世界上的第一架飛機試飛成功到香港的首次飛行表演，僅僅是七年多的時間。1903年12月17日，美國人萊特兄弟製造的“飛行者”號飛機，開始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飛行，但只飛行了十二秒鐘，航距也只有三十七米。1909年，法國人布勒里奧首次飛越英吉利海峽。1911年，美國人羅吉斯首次駕駛飛機橫跨美國獲得成功。同年3月，即有飛機在香港表演，這實在可稱得上香港航空史上之盛事。

是次表演就設在沙田火車站附近的一處沙灘上。因飛行表演在香港尚屬首次，事前香港中西各報也發表消息，故吸引了衆多觀衆前往一睹盛況。九廣鐵路局更爲此而備有專車前往。3月18日（星期六）爲原定第一次表演時間，是日下午，春光明媚，數以千計的中西士女乘搭火車而來，港督盧押也親臨現場，尙有西樂隊在場助興，可謂極一時之盛。當時表演的這架飛機是屬於第一代的推進式螺旋槳飛機，機身長約二丈，闊五尺，重約八百磅。可惜至表演時因風力太勁，飛機一直無法起飛，機師宣佈次日再行表

演，觀衆只得悻悻而歸。但次日風勢仍不減，代理人安記洋行只好在報上登出啓事，澄清事由，謂“昨十八日飛機之所以不起者，因風大危險，非關機器之事，迨後五點鐘時，風勢稍靜，已將飛機試演飛起矣。至十九日，又接天文台報稱風勢更大，早已懸旗不演，爲此佈告。如下日風勢平靜，則諸君於十八日曾購入場票而未得觀者，無論何日再演，均即可將此票入場也”。此後數日，天公仍不作美，表演一直延期至27日（星期一）始舉行。但因數次誤期而令不少觀衆爲之掃興，是日蒞場者僅三百餘人，且受風力影響，飛機升空高度只有六十尺，飛行約及半里距離。雖然此次表演未能盡如人意，但畢竟爲香港航空史揭開了新的一頁，也令市民爲之眼界大開，還是值得一書的。

提起香港的航空史，當然離不開那頗負盛名的“啓德機場”（現稱“香港國際機場”）。

1920年，香港大律師何啓與商人區德等，合資組成“啓德投資公司”，在九龍城外的九龍灣北岸進行了大規模的填海工程。至1924年，共完成填地一百二十噉，在靠近龍津埗頭的新填地上興建了成片的民房，另外在瀕海地段開闢了香港最初的民用機場，並以兩人名字爲機場命名，是爲“啓德機場”。其後機場由港府收回進行擴展。但當時的啓德機場面積尚不及現在的十分之一。二三十年代時，該機場曾一度爲英國空軍所用，後來軍用機場遷往新界石崗，啓德機場才重歸民用。1936年3月14日，英帝國航空公司的RMA Dorado式雙引擎民航機從檳榔嶼首航香港，使倫敦至檳榔嶼的航綫得以延長。同年10月23日，泛美航空公司的Martin 314式水上飛機也完成了舊金山（三藩

市）——香港的横渡太平洋的首次飛行。隨後，中國航空公司也開闢了廣州——香港——上海的定期航班。至太平洋戰爭前夕，香港的民航業已有相當的發展，當時已有多家航空公司在港經營國際航綫：英帝國航空公司與英國海外航空公司開辦的香港——曼谷綫，並與倫敦、澳洲綫連接。中國航空公司由中美合辦的香港——桂林——重慶綫以及香港——韶關綫，在重慶與昆明、嘉定、宜昌、成都、晋陽各綫連接，在昆明與仰光、河內各綫連接。歐亞航空公司由中德合辦的香港——桂林——重慶綫、香港——韶關綫，以及經重慶或昆明與成都、西安、河內等地連接。泛美航空公司開辦的香港——馬尼拉——關島——韋克島——中途島——檀香山——舊金山綫。法國航空公司開辦的香港——河內——西貢——曼谷——仰光——加爾各答——布什爾——巴格達——大馬士革——亞歷山大港——的黎波里——突尼斯——馬賽——巴黎綫等。但是好景不長，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啓德機場首當其衝，遭到日軍的狂轟濫炸。日佔期間，啓德機場再度改爲軍用，並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擴建，九龍城寨與宋皇臺就是在這一時期爲日軍所大規模拆除破壞的。

戰後初期，香港的民航服務尚處於蕭條之中。1946年，只有三家航空公司的定期班機來往香港。此後，隨着香港經濟的復甦和對外貿易聯繫的加强，民航才逐步得以發展，期間還曾發生過一宗令人震驚的重大事件——“澳門小姐”號劫機案。

香港——澳門航空服務始於1935年11月30日，當時係由泛美航空公司的“馬丁一〇三”型水陸兩用機作每周一

次的定期飛行。太平洋戰爭期間曾一度停航，至1948年4月9日復航。當時飛行在港澳間的是一架命名爲“澳門小姐”號的雙引擎水陸兩用機，航行時間約二十分鐘（客輪約需時三個鐘頭）。是年7月16日下午6時，“澳門小姐”號載着二十三名乘客（機組人員四名）由澳門飛往香港，但起飛八分鐘後即失去聯絡。事後發現該機墜毀於附近的九洲洋海面，除乘客黃裕文（據說黃裕文在家鄉眞名叫黃關耀）身負重傷得以生還外，其餘二十六人均葬身海底。後經澳門警方套供，黃裕文對劫機案供認不諱，承認此次劫機目的在於搶劫機上財物。據悉當時黃裕文糾合曾經學習過飛行技術的趙日明以及趙昌堯、趙三才等共四人（均係中山人，現屬斗門縣），事前偵得乘客黃某携帶黃金數千兩乘搭7月16日班機返港，即暗藏手槍等武器同機伺劫。當飛機起飛後不久，黃裕文等人立即採取行動，企圖劫往中山縣八區平沙（現爲斗門縣平沙農場），但遭到機師及乘客的反抗，機師中彈後，飛機瞬即失控墜海。黃裕文因其時在機尾負責監視，當飛機俯衝入海的刹那間得以跳機逃命。但已摔斷大腿，身負重傷。由於黃裕文僥幸得以生還，“澳門小姐”號劫機案眞相始大白於天下。這是香港航空史上的第一宗劫機案。同年12月20日，中國航空公司“空中霸王”號自滬來港時在香港東部海面的火石洲失事墜毀，機上三十餘人竟無一生還。這一年眞是香港航空史上多事之秋。

實際上，香港航空事業之有突飛猛進的發展，還是在五十年代末期以後才開始的。過去啓德機場的飛行操作，還只是局限於九龍灣北岸原有的兩條交叉短跑道上，1958

年進行大規模的發展工程計劃後，才將飛機的起降移至目前伸入海港的巨型跑道。是年，香港共有十七家國際航空公司。次年（1959）7月18日，香港開始有民航夜航服務。隨後爲適應六十年代開始的經濟起飛的需要，又先後進行了多次的填海、擴建工程。至1975年12月，經擴建後投入使用的跑道長達三千三百九十米，可供世界上最新式的巨型客貨機升降。啓德機場設有三十二個設備先進的停機坪，還有航空氣象服務中心和裝備精良的機場消防隊，四座爲飛機提供維修和保養服務的飛機庫。目前約有三十七家航空公司在香港提供服務，每周約有一千二百班定期客貨機與亞洲、歐洲、澳洲、美國、加拿大以及中東等地區的近百個主要城市直接聯繫。由中國民航經營的香港直飛內地北京、上海、廣州、杭州、昆明、天津等地的定期航班以及桂林、西安、南京、福州等地的固定包機，每周約有五十架次。由香港的國泰、港龍航空公司經營的也有十多架次。目前啓德機場每小時平均客流量達五千多人次，繁忙時間每兩分鐘即有一架飛機起降。據1988年統計，當年進出港航班約有八萬七千架次，旅客一千五百三十萬人次，貨物六十九萬四千噸。同年，香港的入口貨物總値的百分之二十，出口貨物總値的百分之二十八以及轉口貨物總値的百分之十六，都是經由該機場處理的。啓德機場已經成爲世界上貨運量最大的空運站。

啓德機場也是世界上少有的位於市區的大型機場之一，與港九兩地商業中心區毗鄰，距繁華的尖沙咀僅四公里，經海底隧道前往港島中區，也只有六公里左右。但是，正因爲這種地理的局限，啓德機場的擴建計劃受到嚴重的

限制。爲此，港府計劃在大嶼山的赤鱲角興建新機場，以取代處於飽和狀態的啓德機場，有關的初步研究報告早已完成，預計需耗資約一百億港元。但由於諸多原因，直至一九八九年，香港政府才正式公佈決定在赤鱲角興建新的香港國際機場，新機場有兩條跑道，可以全日二十四小時使用。按照政府計劃，新機場的第一條跑道將於一九九七年初啓用，而機場落成後，每年處理的旅客數量，可達八千萬人次。值得指出的是，興建新機場以及連接機場的道路和鐵路，係香港有史以來最龐大的工程計劃。

總督譯名

香港自開埠至今，由英女皇任命的總督已有二十七位。從首任港督砵甸乍（Henry pottinger，也譯砵典乍或璞鼎查，1842年至1844年在任）開始，至太平洋戰爭前夕的一百年間，共有二十位。砵氏之後依次爲——

戴維斯(John Francis Davis ,又譯爹核士,1844—1848)

般含（Sammel George Bonham, 1848—1854）

寶靈（John Bowring,1854—1859）

羅便臣（Hercules Robinson,1859—1865）

麥當奴（Richard Graves Macdonnell,1866—1872）

堅尼地（Arthur Edward Kennedy, 1872—1877）

軒尼詩（John Pope Hennessy,1877—1883）

寶雲（George Ferguson Bowen, 1883—1887）

德輔（George William Des Voeux,1887—1891）

羅便臣（william Robinson,1891—1898）

卜力（Henry Arthur Blake,1898—1904）

彌敦（Matthew Nathan, 1904—1907）

盧押（Frederick Lugard, 1907—1912）

梅軒利（Francis, Henry May, 1912—1919）

司徒拔（Reginald Edward Stubbs, 又譯史塔士, 1919—1925）

金文泰（Cecil Clementi, 1925—1930）

貝璐（William Peel, 1930—1935）

郝德傑（Andrew Caldecott, 1935—1937）

羅富國（Geoffrey Northcote, 1937—1941）

太平洋戰爭前後在位的是第二十一任總督楊慕琦（Mark Aitchison Young, 1941—1947），也是香港歷史上唯一的一位"投降總督"。日佔期間，他成了日軍的階下囚，度過了三年零八個月的鐵窗生涯。楊氏之後又有六位港督，這是目前多數香港人還比較熟悉的——

葛量洪（Alexander William Herder Grantham, 1947—1957）

柏立基（Robert Brown Black, 1958—1964）

戴麟趾 (David Clive Crosbie Trench, 1964—1971)

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 1971—1982）

尤德（Edward Youde, 1982—1986）

衛奕信（David Wilson, 1987—　　）

香港開埠的歷史並不長，要記住這二十七位總督的名字，還是不太難的。如果你稍為留意一下港九兩地若干以港督命名的街道，學校或醫院名稱，大概也可十記八九了。例如人們所熟知的羅便臣道（Robinson Road）、軒尼詩道（Hennessy Road ）、德輔道（Des Voeux Road）、彌敦道（Nathan Road）、司徒拔道（Stubbs Road）；金文泰中學（Clementi Middle School）、羅富國教育學院（Northcote College of Education）、葛量洪醫院（Grantham Hospital）、柏立基師範學院（Robert Black College of Education）、麥理浩牙科中心（MacLehose Dental Centre）等等。但是，如果你能再

深一層去品味這些譯名，也許會發現，港督的譯名還是挺有意思的。

還是從現任港督衛奕信之改名說起吧。

衛奕信於1935年在蘇格蘭出生。來港履新前，他曾參加中英兩國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係一名資深的外交官。他的英文名字David Wilson,原中譯名爲魏德巍，1987年1月16日，英國外交部正式宣佈由魏氏出任香港第二十七任總督，以接替上年12月病故的尤德爵士。事過數日，港府發言人，於2月12日宣佈，新任港督魏德巍爵士將於4月9日下午抵港履新。此外，魏德巍爵士已決定在出任港督之後會採用一個新的中文名字——衛奕信。

魏德巍易名之舉，引起了不少港人之興趣。實際上原先的魏德巍此譯名的本義頗佳。魏氏在英國的辦公室內原掛有一副對聯，係其中文老師之作："德者當以道爲本，巍峻應有穩定基。"此聯也可視爲"德巍"一名之注釋。且該聯以鶴頂格嵌入"德"、"巍"二字，也甚得體，堪稱佳名妙對。不過，也有人不以爲然，謂"魏德巍"一名字面意義雖好，但"魏"、"巍"雙鬼出格，諧音"危"、"僞"，象徵不吉利。而據辭書解釋，"衛"字既合中國之百家姓，且有防護、保衛之意;"奕"字取其高大、美貌，謂之精神煥發、神采奕奕也:"信"者，意含信心、信任、誠實、不欺。《論語·學而》曰:"與朋友交而不信乎?"且"衛奕信"之粵語發音比之"魏德巍"更接近於David Wilson,更爲貼切，故以譯"衛奕信"爲佳。如此高論，言之鑿鑿，似乎無懈可擊了。有人還認爲，魏德巍正名之舉，可爲香港帶來"安定繁榮"，云云。David Wilson之定名

“魏德巍”已久，此突然易名“衛奕信”，也可謂鄭重其事了。

眞是無獨有偶，當年尤德爵士來港履新時，其中譯名也有過一場議論。尤德的英文原名爲Edward Youde,如果按照通常外國人的中譯名，是爲“愛德華·尤德”，因而“尤德”的翻譯是合乎“標準”的。即令是從外國譯名中國化的角度來說也是無可厚非的了，百家姓中也有“尤”字姓的。但當年香港的一些譯名“專家”則認爲此名仍有美中不足之嫌，似乎略帶洋味，還是譯爲“余愛華”好。但也有人認爲“余愛華”近乎女性化，不如譯爲“余厚德”傳神、雅致，云云。儘管尤德最終並沒有採用“專家”們的建議，但也可見譯名之不易。

說來也是很有意思的，有時一字之差，就頗費“專家”們推敲，尤德的前任麥理浩的定名就是花費了“專家”們的一番心思的。據悉麥氏原譯未定稿中就有“麥理灝”一名。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記》曰：“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灝”者，義同“浩”，廣大貌也。但考慮此“灝”字近乎深奥，恐日後有人從中躍“景”，錯認“馮京”作“馬涼”，誤將堂堂港督大人寫爲“麥理景”，有傷大雅，因而取其同義、同音（粵語爲hou[6]，普通話作hào），改“灝”爲“浩”了。

這僅僅是近三位港督譯名之“趣”談，但已可見外國人名之中譯並非易事，尤其港督之譯名，更是如此。不僅要考究字義、意境、發音、讀來親切、順口，寫來簡練、優美，迎合佔人口絕大多數的當地華人的心理、習慣，而且要合乎漢語規範，以兩個或三個字爲佳，第一個字更要

符合中國的百家姓，等等，考諸歷任港督譯名，早期大致上是以音譯（主要是粵音）爲主，如砵甸乍、戴維斯、麥當奴、堅尼地，以至二十世紀初年的卜力、彌敦、盧押等。而且時有多個譯名並存，如Sammel George Bonham之譯爲般含、般咸、文咸，Reginald E.Stubbs之譯爲司徒拔、史塔士，等等。其後逐步側重於字義的考究，且越來越符合中國人名的命名習慣，第一個字大都取自中國的百家姓，第二和第三字則側重於音義，讀來朗朗上口，頗具韵味。自第十七任港督金文泰開始，除貝璐仍有洋味外，已大都譯得音義俱佳，甚爲傳神，如郝德傑、羅富國、楊慕琦、葛量洪等，眞可謂深語“譯名學”箇中三昧了。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譯名之選擇，也非小事，或可信乎?

後　記

在年前的一次酒會上，潘耀明（彥火）先生、唐一國先生介紹了香港三聯書店的“古今香港系列”出版計劃，並盛情邀我參預其事。本人不揣譾陋，欣然應命。此書得以問世，首先要由衷地感謝他們的鼎力支持與多方賜教。

香港史研究，內容相當廣泛、複雜。《香江夜譚》寫作的目的，在於寓學術研究於知識普及之中，讓讀者在輕鬆的閱覽中增添一點有益的知識，以期加深對香港歷史的瞭解。書中不足之處，尚祈方家、讀者不吝指正，是則幸甚。

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我曾參考了海內外從事香港史研究的一些學者的成果。責任編輯姚永康先生爲本書提出了不少寶貴的意見。尤爲難得的是，史學界老前輩金應熙教授撥冗贈前言，“古今香港系列”主編梁濤先生賜序。在此，謹一併致以誠摯的謝意。

劉澤生

1988年8月8日

古今香港系列



• 李鄭屋古墓所葬墓主之謎，曾忖測紛紜。多數學者考證爲非等閑之輩，但有人認爲只是一處“衣冠塚”。它究竟建於何時？墓主又是何人？

• “海國浮沉”、“鵝澗榕蔭”、“長橋霧鎖”……昔日文人雅士爲香港景色的題詠，究竟所指何方？現今何處？

• 一個千里而來的福建女子，日後竟成了世人膜拜的神明，人人稱之爲“天后”，但其眞實姓名何謂？

• 本世紀初的馬棚大火、淪陷時期的英雄故事、六十年代的東江引水……，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凡此種種，本書作者撥開積聚的時間塵埃，撫今追昔，均爲我們作了有趣的介紹和解答。

全書收文五十篇，大凡考古文物、名勝遺迹、人事掌故、行業趣聞等皆有涉獵。書中文字流暢，資料翔實，既博採古今史家的研究成果，亦經嚴謹的科學考證，是一部興味盎然的知識讀物。





HK$ 49.00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